

抗日名將 中共戰犯

湯恩伯



薛岳



張靈甫



陳誠



羅卓英

黃花岡

歷史文化
季刊

三民主義思想的產生與發展
改良 還是革命
馬列子孫的返祖現象
發出我等最嚴肅的聲明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中日決戰之二）
中共三位抗日將軍戰死之迷
趙尚志是共產黨的抗日英雄嗎
中華無罪 罪在我輩
什麼是青春無悔
1949之後悲壯慘烈的反共游擊戰爭
抗日漫畫家麥非的命運（上篇）
台灣的親共潮和美國的弄潮兒
台灣新黨研究（專題）
台灣李敖批判（文選）

2005 年第 4 期（總第 15 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9月25日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自治聯合會召開第12屆代表大會。此為部分與會代表合影。第一排左起：黃慈萍、陳新宇、王有才、魏京生、辛灝年、邢錚、魏子丹、易丹軒。

第二排左起：汪成用、楊逢時、范蓉斌、焦琦、賴安志、李剛、周健、王平、賀寶平、姚永戰、陶葉、潘強、毛東林、薛天漢、王建安。

魏京生、辛灝年、魏子丹為特邀。

9月24日，芝加哥大陸學者學生約200人舉辦了“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週年”紀念大會，邀請辛灝年、宋永毅、魏京生講演。主席台上高懸大中華民國國旗，由楊逢時、賴安志、毛東林等主持。



10月29日，美加地區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於紐約召開第22屆年會，圖為部分外地代表合影。左起第五人為本次大會的主辦人和主持人李勇先生。辛灝年為特邀。



誰入地獄？
我不入地獄

秋瑾



歷史文化季刊

2005 年第 4 期總第 15 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SN 1534-2662)

Issue No. 15

Published

December 27, 2005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is published
by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New York
USA

website: <http://www.huanghuagang.org>
or <http://www.huanghuagang.com>
eMail: hgang2001@hotmail.com

Subscription Hot Line: 718-898-9100

Postmaster

Please send address change to: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Copyright: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訂閱本刊請來電：718-898-9100

或來信:

《黃花崗》雜誌社
P. O. Box 425
New York, NY 10163
USA

主辦者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出版者 黃花崗雜誌社

主編 辛灝年

副主編 李剛 博士

主編助理 丁毅 博士、曉黑 博士

主編顧問兼編審 吳學燦、李勇

美術編輯 恆淨

名譽社長 鄭文英

社長 馬佩華

副社長 姚鑫華、易丹軒、賴可正

名譽董事長 周祥（已故）

董事長 周光亞

副董事長 周美娟、路人、孫雲（兼）

第二屆編委會名譽主任 孫國棟教授、丘宏達教授

編委：□	丁 抒	丁 毅	王友琴	宋子明	辛 明	余建文
余大猷	呂 易	吳 倩	蔣學敏	李 勇	李 剛	高 陽
周 健	林牧晨	林才君	吳學燦	郭 平	郭 白	陳志強
陳維健	陸 耘	曉 雲	莊 寧	張育明	孫 雲	易丹軒
秦 晉	高優鐸	夏 雲	葉 寧	賴可正	楊杰倫	楊柳春
黃偉梯	傅申奇	寧仲康	蔡 萌	謝影峰	魏紫丹	魏 玲
王樹一	李 悅	李巨水	沈 雪	宋雁軍	朱玉河	岳 文
胡志偉	胡西山	胡峰迴	許秋山	昂藏秋	高 廈	高 沉
張玉華	張謙誠	章靜秋	趙 蘇	趙增義	謝明明	蕭 玉
官平非	肖 戎	朱執中	林 斯	莫逢杰	樊 星	黃永森

本刊顧問：向厚祿、趙增義、黃玉振、黃其柱、張學海
曾華漢、麥青芬、陳慶國、周勻之、張國威

黃花崗雜誌發言人：郭平 博士

本刊法律顧問：海明威律師事務所 律師：葉寧

黃花崗雜誌 第15期 (特大增刊) 2005年第4期

Huang Hua Gang Magazine December 27, 2005

讀者反饋黃花崗

社論

我為大中華民國鼓與呼

4

馬列子孫的返祖現象

本刊編輯部

5

中共出版馬克思專著每本花百萬

香港明報

8

新聞發佈會

發出我等最嚴肅的聲明

王雍置

9

魏子丹評中共的《為新中國辯》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本刊

10

大陸讀者來信嘲弄中共《為新中國辯》

陸青

11

香港《前哨》指中共妄圖阻止對中國現代史反思

本刊

11

為歷史作記錄——敬答《文學城網站》

本刊

14

新聞綜合

誰是新中國澳洲系列巡迴講演反響強烈

本刊

11

新聞追蹤

鄧尼金重新安葬與俄羅斯共和國的護國戰爭

本刊

13

國民革命與中華民國 專欄

孫文思想研究

三民主義思想的產生與演進

孫常燁

18

追悼孫文輓聯

何彤收集

29

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中日決戰連載之二）

孫挺信

30

死於毛酋之手的抗日名將張靈甫

陶杰

43

春風春雨（衛國戰爭時期歌詞）

鄭文英提供

45

共產革命與馬列中國 專欄

什麼叫青春無悔？

黃健民

46

非凡的人生——一本不同尋常的書

羅汛

50

中共抗日研究

抗日名將趙尚志是共產黨的抗日英雄嗎？

彭小明

51

中共三位抗日將軍戰死之迷：

本刊評點

52

左權之死的另類迷惑

52

彭雪楓戰死在不打日寇而是“打頑”的戰場上

54

中共抗日將軍高敬亭是被中共所處決

55

清算毛澤東

身前何不慮身後？

田健模

56

神話毛澤東灑下多少謊言？

朱執中

58

也說共產黨的“貢獻”和民主自由的“缺陷”

鄒翔

61

1949 之後悲壯慘烈的反共游擊戰爭

胡志偉

63

特稿

惡性心腦型腳氣病的治療：310 例臨床分析

張育明

65

中華文明與世界文化 專欄

中華無罪，罪在我輩！

博客

72

弘傳中華文化正宗：敬神、敬天、敬人

子口

82

理論研討	專欄		
革命與改良	改良，還是革命	袁紅兵	83
	中共無法抗拒顏色革命	張三一言	93
	中共反顏色革命的豆腐渣工程	張三一言	96
專制改良研究	歷史上的泡沫經濟	辛明	99
	改革的悲慘命運	周誠	103
中國知識分子反思	專欄		
	不為護己專利他——懷念真誠的靳以先生	陳家驊	105
	還原一九五七（連載之三）	魏子丹	109
	人間樂園五七幹校（王若望傳記連載之七）	王若望	112
時代與文學	專欄		
紀念詩人楊春光	抗日漫畫家——麥非的命運（記實文學—上篇）	辛然	119
	開啓為民請命詩歌時代的勇敢先鋒詩人鄭貽春	楊春光	127
	有關大雁塔	楊春光	129
	迎客松	作者不詳	62
	風雨同行	雪莉	132
	讀林覺民與妻書有感（外一篇）	何彤	51
	台北某巨奸（七律）	鄭文英	136
中華自由論壇	專欄		
台灣新黨研究	台灣的親共潮和美國的弄潮兒	李勇	133
	郁慕明從地下走到了地上？	編者短評	136
	郁主席，您此言差矣！	賴可正	137
	新黨，你要做大陸的第九個民主黨派嗎？	郭平	139
李敖批判專題	五胎說李敖	辛灝年	141
	李敖——文化界的羣氓化身	楊天水	143
	狼的共性與李敖的個性	徐沛	147
	評李敖的共產主義之旅	任詮	149
	李敖和他坐牢的原因及真相	石巍	153
	李敖的胡言亂語：關於美國 1932 年拖拉機……	網上文選	158
黃花崗雜誌公告	專欄		
	黃花崗雜誌社第 15 次財務公告		159
	榮譽訂戶與謝辭稿酬		99
	專題征稿啓事		140
	下列作者請與黃花崗雜誌聯係		57
	黃花崗雜誌敬告作者		102
	編後		160
下期預告	從宗教比較看我們民族的心靈依歸與前途	王思漢	
	中共已經沒有能力對外發動一場戰爭（下期預告）	北海青年	

讀者反饋黃花崗

辛教授：

……自從兩年前接觸閱讀了《黃花崗》和您的著作《誰是新中國》之後，我真是思路大開，是非大明。您從世界近代史著手，抓綱提領，揭示“民主進步”與“專制復辟”上百年反復較量的軌跡，闡明了“馬列”的虛偽、暴虐和專制——從此我有理由為大中華民國鼓而呼！為民主進步鼓而呼！

敬祝編安！

附支票 100 元，盼能作為《黃花崗》2006 年的榮譽訂戶。

讀者王以源 敬上 05 年 11 月 8 日

敬啟者：

在報上看到辛先生編有黃花崗雜誌，後來在圖書館借到一本（13）期。看後深有感觸，真是看到了中華民族的一線曙光，看樣子中國有救了，不至於被共產黨給葬送掉。可惜我已是七十歲的無業老人，既無體力可效驅馳也無財力可做贊助，只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下一次的國民革命（應該是第四次革命吧？）能一舉消滅邪黨，重建共和，重建真正共和民主的大中華民國，完成國父孫中山先生的遺志。

奉上 100 元訂閱黃花崗一年費用（2005 年）。

敬此恭祝，鴻圖大展！ Raymond Sheng 上

黃花崗雜誌的各位女士先生們：

由於你們的不斷努力，貴刊辦得一期比一期精采、充實，使我不得不由衷地向各位致敬。再者，反共反獨是我的一貫理念，貴刊的發展正是我個人的期盼。敬祝成功、發揚光大！

讀者 張國威 致敬

黃花崗雜誌社：

……我是大陸的黃花崗讀者，首先對黃花崗工作人員的優秀工作表示衷心感謝。另外，為了使得網站錦上添花，提出一個建議：想對文章發表個人觀感的時候，發現網站沒有象搜狐網（www.sohu.com）那樣，在每一篇媒體報導的後面設立網友發表評論的鏈結，以至於沒有實現民主討論的氛圍，希望網路技術

人員能夠改進這個方面。謝謝您的努力，網站辦的真好。

尊敬的辛灝年教授大鑒：

最近偶在《黃花崗》雜誌上閱讀了您寫的兩篇文章，以及在新唐人電視節目中看到了您在德州所作的演講《紀念抗戰勝利 60 周年》，使我心情十分激動，謹在此向您表達我的崇敬之情！

我是一個旅美老者，年逾古稀，但半個多世紀以來長期生活在國內（大陸），腦海中長期存在著一些謎團，諸如：“一九二七年蔣介石背叛革命”、“皖南事變”、“張學良事件”、“延安抗日民主聖地？”等等，始終沒有弄清；而您的著述及講演使我得到澄清與解答。結合我長期的生活體驗及書刊資料的核對，都印證了您所說的都是對的，是公正的，是事實！由此我衷心的慶幸我們近代中國出現了一位了不起的史學家！

中國史學家多得很，但老的如周予同、翦伯贊、侯外廬等悉數被迫害至死；郭沫若、楊國榮、周谷城等則賣身求榮，落得可恥下場；而在中、青年的現代史學家中，有良心、有勇氣的又能有幾人？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中國自出了馬列黨以來，給中國人民製造了巨大的災難。縱觀中國近代史實，中共做了太多見不得人的醜事，諸如三十年代就創建國中之國——中華蘇維埃國。其後，“假抗日”、“統戰”、“土改”、“反右”、“三面紅旗”、“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四、五天安門事件”“六、四天安門事件”以及無端迫害法輪功人員等等（本人非法法輪功人員及信仰者），都十足證明了毛和他的路線是極端錯誤的，他是中國人民的“大災星”而不是“大救星”！奇怪的是至今國內仍將他捧為“偉人”（此“偉人”曾在文革中殺死另一“偉人”劉少奇是也！）

明明是“罪人”卻偏說是“偉人”；明明是“文革”中挑動武鬥的大黑手，卻說成是“舵手”！明明“六、四事件”是錯的（用坦克鎮壓學生說一百個“理由”也都是錯的——全世界人民都認為是錯的），而他們偏偏不平反！

“合二而一”——民主統一中華是億萬炎黃子孫

（下接第 14 頁左下）

馬列子孫的返祖現象

——評胡錦濤與他的「馬教工程」

今年六月，辛灝年先生完成了訪歐巡迴系列講演，其講題就是「驅除馬列，還我中華」。今年十月，辛先生赴澳洲作巡迴系列講演，其講題則為「誰是新中國」。顯然，前者的主題是「民族」，後者的要害是「民主」。但不論是前者或是後者，也不論是在英國的牛津、劍橋和倫敦政經學院，還是在澳洲的悉尼大學和格瑞菲絲大學，更遑論面對的是英國和瑞典的老華僑，還是悉尼、墨爾本或黃金海岸的新華僑，只需辛先生說到「**驅除馬列、還我中華**」，或是「**要做中華兒女、不做馬列子孫**」，或是「**不是中華要驅除馬列，而是馬列禍害了中華**」，整個講演大廳就會爆發出長時間山呼海嘯般的掌聲。這掌聲豈但讓許多人噙滿了痛定思痛的淚水，還使得在場的「特別聽眾」也只好羞羞答答地當眾表示：「現在共產黨也不是共產黨了，也就是掛掛羊頭賣賣狗肉罷了……」由此可見，一句「驅除馬列」，該是何等地符合中華民族的民族感情，又該是何等地符合中國人民的民主訴求。中華民族實在是被馬列糟蹋得夠了，中國人民也實在是被馬列子孫坑害得苦了。誠如辛先生在講演中所闡明的那樣，馬列對中國的長期**思想侵略、政治侵略和文化侵略**，對我們民族、國家和人民的污辱和侵害，委實是罄竹難書。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只要還想做中華兒女，只要還想在中國實現民主、統一與和平，只要還想傳承自己的優秀文化、吸收西方的進步文明、以與各民族並駕齊驅於世界，就絕不能不**驅除馬列**！

但是，辛灝年先生言尤在耳，中國留學生和新華僑的掌音未絕，眼下中國共產黨的領導者和帶路人胡錦濤，居然就在他專制權力到手之後，不僅說出了「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是正確的」話，發出了他要在政治上倒退的信號；而且身體力行，乾脆利用他

到手的專制權力，大手筆地搞起什麼「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來了。套用共產黨的一句黨話來說，一個「死不悔改的馬列子孫」終於“現形”了。他不僅使所有真心愛中華、愛中國、愛自己人民的海內外華人，更

堅定了推翻中共專制統治的信心和決心；也使得三年來一再憑空歌頌「胡溫新政」的人，再也不好意思為這位馬列子孫，繼續毫無根據地「評功擺好」了；更使得那些口口聲聲地叫著他「胡哥」、夢想他有朝一日回心轉意的「善良人群」，感受到透心的絕望。

當然，胡錦濤之所以要花費鉅金來搞他的「馬教工程」，要在五十六年來**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的中國，將「馬列」再次推上人間的頂峰；說到底，就是要維護他到手的專制權力，維護中共「革命」和專制的合法性，藉以維繫他那個已經搖搖欲墜的「紅色江山」。因為，前蘇共賴以建立中共的理論基礎，就是馬克思主義；中共賴以「推翻共和、復辟專制」的根本理論，也是馬克思主義；中共賴以建立「教政合一」之洋教專制政權的教義信條，還是馬克思主義；中共賴以實行殘酷專制統治的指導思想，就更是馬克思主義；而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在中國製造「錯把復辟當革命」的革命混亂和歷史混亂，把一個正在艱難地「走向共和」的中國，推向了極權專制統治的深淵，還是賴以馬克思主義這個——**打著革命旗號來鼓吹專制復辟有理的歐洲倒退思潮**；所以，我們唯有認清了馬克思主義是中國共產黨及其洋教專制政權的「命根子」，才能從根本上瞭解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那個「馬教工程」的由來。

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的「馬教工程」，是因為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25年來，雖然對「命根子」——馬克思主義，不敢改也不肯改。也就是說，不論是在馬克思所建立的倒退政治理論上，還是在馬克思主義所框定的反動政治制度上，他都賴著不改，堅決不改。鄧小平深知，「改」就是「死」。所以，在黨內，誰要改，他就廢掉誰，如胡耀邦和趙紫陽；在黨外，誰想改，他就鎮壓誰，如八六學潮和六四屠城。

可以說是從不手軟，也絕不手軟。但是，爲了救黨，更爲了維繫中共的專制統治，在毛澤東已經將他的社會主義中國搞得國空民窮、人心思變之時，鄧小平又不得不在他的「馬記羊肉店」裏，雖仍然掛著「馬克思主義的羊頭」，但卻「既不易主、更不變制」地賣起「資本主義的狗肉」來了。這就是他的所謂「經濟改革開放」。這場百年之後的「洋務運動」，雖然沒有什麼新鮮可言，雖然是我們前人、也是外國人，早已有聲、有色、用情、用命地做過多少回，卻從來沒有成功的事情；但在鄧小平，其更大的悲劇意義，卻是用「資本主義的狗肉」，將馬克思主義旗幟上那沾滿人民鮮血的「**消滅私有制**」五個大字，塗抹得不倫不類，令所有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們傷心慘目。然而，鄧小平的經濟改革，惟其只能短暫地消解人民的不滿，惟其只能暫時緩解中共政權的危機，惟其只能救社會主義命於一時，特別是雖能製造表面的繁榮和虛假的繁榮，卻更能夠製造中國史無前例的政治腐敗和社會腐爛，其結果便是一旦拆除改革開放的「櫥窗」，人們滿眼所見，就是廣大人民貧窮的重新復歸和仇恨的重新聚斂。所以，當「改革就是找死，不改革就是等死」的人民預言，早就警告中共專制統治只有死路一條之後；當「革命黨何以生？生於政治腐敗」的先賢名言，又要在當代中國應驗之時；當中國又要重新爆發一場偉大的民族民主革命，以志在「**驅除馬列、還我中華；推翻復辟，重建共和**」之日；中共是進而順應潮流，真正推行政治變革，徹底毀棄馬記的政治教條和政治制度；還是乾脆走回頭路，妄圖繼續仰賴馬克思主義的「鐵血理論」，以負隅頑抗；就成了所有良知尚存之中共黨員所必須面臨的痛苦抉擇。但是，顯而易見的是，面對亡黨喪權之最後命運的胡錦濤，想選擇的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而他只要選擇後者，那他就只可能象古今中外、歷朝歷代任何一個瀕於滅亡的專制統治者一樣，在別無出路之時，僅僅是爲了「不死」，也就不得不重新從「強化思想統治入手，來強化專制的政治統治」，並以此來苟延殘喘，作死亡前的最後掙扎。對胡錦濤而言，就是要在馬克思主義的「死亡之路」上重新出發。

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的「馬教工程」，還因爲他所面臨的社會局面，是對馬克思主義信仰的全面崩解。而人民覺醒的根本標誌之一，就是對「**馬列禍害**

了中華」的認知，早已成爲我中華兒女的共識；而信仰危機又勢必會帶來政治的危機，因爲共產黨革命專政的理論根據，已經被徹底地動搖了、顛覆了。胡錦濤所面對的黨內局面，早已是對馬列信仰的日行日遠。「現在的共產黨早已不是以前的共產黨了，馬克思主義早已過時了」一類說法，似乎已經成爲今日共產黨徒們的口頭禪。二十五年在經濟上的**救命改革**和**被迫開放**，蘇聯東歐共產黨制度與政權的相繼滅亡和迅疾滅亡，特別是“貪官污吏遍全黨、人民仇恨積如山”的不堪景象，不僅使共產黨的黨徒們從根本上拋棄了理想，而且使共產黨的黨徒們從根本上改變了思想，甚至從根本上產生了對共產黨及其革命的嘲弄感。胡錦濤面對如是的黨外黨內局面，只要他還在幻想著苟延共產黨和他自己的專制獨裁統治，他就不得不重新借重和只有借重共產黨的祖先——「**馬家洋教**」來凝聚他的黨心。否則，他還能指望用什麼思想、什麼理論，來幫助他「重新收拾紅山河」呢？因爲，掀起了世界民主大潮的人民民主理想，掀開了人類民主進步的偉大民主理論，掀翻了前蘇聯東歐社會主義強權統治的人民民主奮鬥，只能使胡錦濤的共產黨亡黨，共產黨的「**馬列中國**」亡國。

胡錦濤之所以要搞他的「馬教工程」，亦來自於他個人的**愚蠢、虛偽**和**頑固**。

說他愚蠢，首先是因爲胡錦濤這一代接班人，都是被毛澤東、鄧小平們騙大的。他們只知道中共「偉大、光榮、正確」，卻對本黨的歷史罪惡，特別是對中國人民百年走向共和的歷史真相，全然無知。其次，胡錦濤成長的時代，又是一個獨尊馬列、殺盡百家的時代。在這個時代裏，中國人既被剝奪了對自身優秀文明和文化的傳承權，又被剝奪了對西方近代真正進步文化文明的借鑒權。所以，在胡錦濤們的一張「白紙」上，就只有中共畫滿的血淋淋馬列革命圖畫，卻沒有人類真正進步和文明的畫圖。胡錦濤們的「無知」，也就由此而來。再者，就是胡錦濤在共產黨裏扶搖直上的“官運”，又使他不但遠離了八十年代以後人民的歷史反思和政治覺醒，甚至反而成爲這一反思和覺醒的對立面，而繼續將自己禁錮在馬列思想和中共謊言的牢籠裏，而不知“今夕已是何夕”。他在今年全世界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週年之際，在中國人民對國民黨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的艱難

光榮歷史已經反思了整整二十年，並且成果卓然之時，不僅繼續大講特講“中共抗日戰爭中流砥柱”一類的大天謊言，甚至還要“創造性”地製造“所以，中國人民解才選擇了共產黨”這樣的不堪謊言，他對歷史的不知和對民心的無知，可以想見。無知必然造就愚蠢。他上台之後，竟然能夠講出「北韓和古巴在政治上一貫正確」的話，以至於在全世界人民面前丟人現眼，其根源即在於此。

他的虛偽，倒是來自「團派」的總體性格特徵。掌權之後的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共青團，特別是「團派」的中高級領導幹部，都要在一定的年齡層次上等待著被轉換、即被提拔為黨的領導幹部。所以，這些年輕的「團幹」們，在決定著他們政治前途的「黨幹」面前，都是一律地表現得「循規蹈矩，老成持重；丹心耿耿，寧左而勿右」。但是，反轉身來，當他們面對著他們的工作對象青少年們時，他們又必須裝出「朝氣蓬勃、和藹可親、誠懇樸實、假話也能真說」的形狀來。這樣一種長期的「革命工作」，再配著一心要在青年工作中做出成績來往上爬的欲望和野心，就為共青團造就了太多的「革命兩面派」。其結果，自然是練就了團幹們嚴重的虛偽和雙重性格。在中國，這樣的一代代年輕團幹真不知有幾千幾萬。而胡錦濤作為專職團幹和高級團幹，作為一個長期以來全然依靠“共青團之梯”爬上去的“黨幹”，便決定了他虛偽性格的必然形成。只要看看他上台以後，一邊持續製造自己的種種「親民」形象，一邊又堅決毫不手軟地鎮壓異見者。甚至只要廣東鄉下一家村委會的選舉不如他意，他就能大開殺戒。僅此就可以看出這位馬列子孫對「革命的兩手」玩得是如何地純熟。

稱他頑固，一是因為他「出身好」而為共產黨所一手培養，因而「在爹親娘親不如共產黨親」的感恩心情之中長大。其間，他在「只要出身好、成績不好卻可以考上大學，而出身不好、成績再好也考不上大學的顛倒歲月裏」，從皖南鄉下的一介平民子弟，一躍而成為清華大學的優秀學生；從清華的團委書記，再一躍而成為共青團中央的領袖人物。此後，黨不僅為重用他而培養他、更為培養他而重用他，更於共產黨危難之際，將他定為「共產黨王儲」，直至他走向權力的頂峰。所以，他對共產黨的感情之深之烈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一般的共產黨徒所不能比擬的。有報

導說，有一次，只因他發現在自己身邊工作的年輕人讀的是一本揭露當前農民困苦的书，他竟然會勃然大怒地責罵說：「這本書是在給共產黨抹黑！今後不準再讀！」其形狀之猙獰和恐怖，令那位年輕人無可名狀。他因情而生的頑固性可見一般。

二是因為他對共產黨「情深」，才會對共產黨「緊跟」。在中共專制五十餘年的種種倒行逆施之中，在共產黨對我們的民族和人民犯下了一次又一次深重罪行的歲月裡，由於胡錦濤們要「緊跟照辦」，所以，他們才非但不可能成為這些罪行和罪惡的反對者，而且只可能是這些罪行和罪惡的學習者、參加者、效法者和製造者，直至成為有著特出表現的「建功」者。而「緊跟照辦」的結果，便是扶搖直上，更是頑固性的必然加深和持續加深。就象江澤民一樣，江要不是在「六四」屠城之前就敢於在上海對民主運動開刀，鄧後的最高權力不會輪到他；正因為鄧讓江「受命於危難之間」，江也就對共產黨的「未亡事業」——要「鞠躬盡瘁、不死不已」了。當年的清華大學團委書記胡錦濤若不是心領神會，就不可能帶著清華的紅衛兵去「火燒英國代辦處」；尤其是後來已經爬上了「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的胡錦濤，如若不是「心有靈犀」而敢於「擅自」下令開槍，大規模地鎮壓藏族人民的「騷亂」，「為中央擔了擔子」，大約在鄧小平的橋牌桌邊，也不會多了他這樣一位「年輕穩重」的牌友；而他也正是因為成了鄧小平的「牌友」，他之忠於共產黨的頑固性才會愈加根深蒂固。中共的另一個高徒——丁關根，就是在鄧家的橋牌桌邊發跡的。而也正是由「鄧家牌桌」練就了丁的頑固性，丁才敢在中宣部長的寶座上「大開倒車」，為思想文化界所憎惡不已。

三是胡錦濤的頑固性，已為他與共產黨的利害生死關係所決定。眾所周知的是：在共產黨的世界裏，向來就是「逆向淘汰」；向來就不是「選賢與能」，而是「選惡與蠢」。如前所述，胡錦濤絕不是因為敢於反對、反抗共產黨殘民禍國；反之，則是對共產黨的「禍國殃民事業」忠心耿耿、貢獻卓越，才被共產黨選拔、培養、步步提升，直至做了共產黨的「末代皇帝」。反過來，正因為他對共產黨的步步緊跟和處處照辦，才為共產黨、也為自己對國家和人民積累了太多的罪行；由是而終於使他與共產黨結成了在利害

上完全一致的生死關係。到了這種地步，維護黨就是維護自己，維護自己就是維護黨；到了這種程度，亦唯有頑固地維護黨的不亡，才能從根本上維護他胡錦濤的不滅。他的頑固性也因之而被深化到了至高至全的「境界」。胡的一位「恩師」不久前就已經對胡表示了最後的絕望，原因就是「豎子不可以教也」。

必須明白的是，當共產黨的黨運已然是「西風殘照」之時，鄧小平之所以要選定胡錦濤為共產黨的「隔代王儲」，恰與西太后臨終前選擇載灃作三歲皇帝的攝政王一樣，就是因為載灃的愚蠢、虛偽和頑固，勝過了大清朝所有的皇親國戚。因為，對西太后和鄧小平來說，**愚蠢則不會善變，虛偽才能夠蒙騙世人，而頑固就意味著忠誠**。對一個已經洞察王朝之垂死命運的統治者而言，這既是他最聰明、卻也是最無可奈何的選擇。

總之，胡錦濤是一個純粹由馬列毛的「狼奶」所用心喂大的「馬列毛狼孩」，是一架由馬列中國的「共產機器」所**加料**製造出來的「共產機器」。既是一個狼孩，就缺少了正常的人性；既是一架機器，就不存在所謂的良知。他那張永遠沒有表情的面孔，就恰恰證明了他才是一個「標準的馬列子孫」。

然而，這位「標準的馬列子孫」要大搞其「馬教工程」，在實際上又不過是一種「返祖現象」而已。它只能說明：歷經了鄧小平、共產黨的二十餘年改革開放之後，惟其**要改的只是馬列的枝葉，不改的才是馬列的根本**，所以，才不僅會導致這一場專制改良必然失敗的歷史命運，而且誘發了馬列子孫胡錦濤們的「返祖現象」。只因這個「返祖現象」，既出現在馬克思主義黃葉飄零的歲月，又突兀在中國人民已經決心「**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時代，胡錦濤們為維護馬家洋教專制政權的一廂情願，也就只能落得個「流水落花春去也」的命運。

馬列子孫們妄圖以繼續「**獨尊馬教**」來挽救其腐爛專制統治的倒退政治欲望，必然不能得逞；

中華兒女們決心要「**驅除馬列**」以「**還我中華、重建共和**」的偉大歷史追求，必將獲得最後成功。

中共出版馬克思專著

每本花百萬

【香港明報專訊】在全球馬克思思想日漸式微下，胡溫等中共第四代領導人將把指導中共發展的馬克思主義旗幟舉得更高，中共決定實施「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投入大量人力、財力，大規模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具體措施包括將「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升格為「研究院」；撥出巨額資金出版馬克思主義研究專著與教材，每本書約花費 100 萬元人民幣，專家指這種出書花費是中共建政以來少有的。

馬列研究所升格

據最新一期《瞭望東方週刊》披露，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所長李崇富與上海財經大學教授程恩富正在主持組建新的馬克思主義研究院，將在今年 12 月 26 日毛澤東冥壽時成立。新的學院將比原來的馬列所研究範圍更大、人力更強，原來馬列所的編制是 75 人，而新學院將是 200 人。

新學院成立是配合中央正在進行的「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重要工作之一。2004 年 5 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進行第 13 次集體學習，李程二人擔任講者，一起講解繁榮和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問題。

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嚴書翰表示，根據「馬克思主義基礎研究和建設工程」的需要，當局成立了廿多個課題組，每組約 15 到 17 人，編寫有關馬克思主義教材。嚴書翰說，有關教材要直接由政治局常委審定通過，「可見中央對此的重視程度了」。按照計劃，這項歷時 10 年的工程，前 3 年出 13 本書，按照預算，課題組去年設定的啟動資金是 2000 萬元，即平均每本書約花費 100 萬元。嚴書翰表示：「一本書花這樣大的成本，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是少有的。」

根據嚴的估計，現在一般學者出一本書的成本約為 5 萬元，而他先前為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材而出版書籍成本也不過 10 萬元。成本為市價的 20 倍。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晏智傑認為，在中國改革開放的實踐中，已經產生了鄧小平理論、江澤民「三個代表」論和科學發展觀這一系列的理論成果，隨著實踐的發展，以後肯定還會有新的理論產生，暗示中共新一代將推出自己的理論。

發出我等 最嚴肅的聲明

王雍罡

我华夏复国人士——王雍罡，将和所有海内外华夏复国人士一起，在此向我们中华民族的汉奸敌人，向我们人类道德的邪恶敌人，向我们全球正义的恐怖敌人——即苏维埃连锁党国的中国共产党，再次发出我等最严肃的声明：

我們是純種的炎黃子孫，而不是你中共漢奸自認的‘馬列子孫’；

我們是純種的中華兒女，而不是你中共痞子自認的‘黨的兒女’；

我們是純種的華漢人，而不是你中共流氓所自認的‘蘇維埃人’；

我們是真正的中國人，而不是你中共強盜自認的‘中共人’；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繼承者，而不是你中共土匪自認的‘共產主義接班人’。

我們熱愛自己的偉大祖國，但我們決不熱愛你所霸佔下的偽中國；

我們熱愛自己的善良人民，但我們決不熱愛你崇尚暴力的共產黨；

我們熱愛自己的華夏文化，但我們決不熱愛你下三爛的‘黨文化’；

我們熱愛自己的民族之魂，但我們決不熱愛你外來民族附體的魔鬼‘幽靈’；

我們熱愛自己的聖賢祖先，但我們決不熱愛你邪惡無比的紅色教父——馬恩列斯毛華鄧江胡。

我們有自己的人性，你無權用你自己的黨性，來強行代替我們的自我人性；

我們有自己的靈魂，你無權用你自己的黨魂，來強制代替我們的自我靈魂，

我們有自己的思想，你無權用你恐怖的暴力，來控制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思想；

我們自己的人生，你無權用你無耻的謊言，來限制我們每一個人的自由人生；

我們有自己的選擇，你無權用你罪惡的專政，來阻止我們每一個人的自我選擇。

我們是人，有信仰宗教的天然權利，堅決反對你用“鬥爭到底”的馬列邪教，來代替我們自己心中嚮往的和平信仰；

我們是人，有熱愛父母的天然權利，堅決反對你用“懷疑一切”的黨媽媽，來代替我們自己心中熱愛的多親娘親；

我們是人，有選擇配偶的天然權力，堅決反對你用“黨的愛護和關心”，來指定、誘騙、恐嚇與挑撥我們男女之間的戀愛和婚姻的關係；

我們是人，有生育兒女的天然權力，堅決反對你用獨裁意志的政策，一會兒鼓勵提倡‘多生制’、一會兒強行執行‘一胎制’；

我們是人，有自由遷徙的天然權力，堅決反對你用你所發明的戶口制度，來強行阻止和嚴格控制每一個中國人、尤其是九億農民自由的遷徙權力。

我們追求真、善、美，反感你的假、大、空；尤其是你當今的坑蒙拐騙毒；

我們追求天賦人權，噁心你的動物‘生存權’，因為我們是人，而不是你手中隨黨宰割的豬民；

我們追求西方文明的多黨民主共和的憲政制，痛恨西方變態文明的一黨專制加獨裁的現代專政制；

我們追求普世道德的和平、正義和公正，蔑視你人間罪惡的暴力、恐怖和謊言；我們追求聖先精神的大同世界，反對你烏托邦的共產主義和你‘共產共妻’特色的假社會主義。

為已決心不做馬列子孫、要重做中華兒女的中國人，加上一把油！！

為已經作出告別中共的各大團體、組織和政黨，加上一把油！！

故我王雍昱在此，將徹底與共產黨作決裂，向大家莊重宣佈：從現在起，我決意拋棄屬於外來政權性質的蘇維埃連鎖黨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籍！！！！

並呼籲大家，將用不同的方式和方法，退出中共黨國的偽國籍；因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戶口下和專政下的黨國裏，沒有一個人屬於社會中的正常公民；而只有各種特權等級的大小黨民，而只有各種貪官污吏的大小霸民，而只有千千萬萬在掙扎、在痛苦、在擔心、在害怕、在忍受的大小“豬民和羊民”。

一個沒有公民的國家，是一個非正常社會的邪惡國家，一個只有黨民、霸民和“豬民與羊民”的國家，是一個人間魔鬼的恐怖國家。我們作為五千年文明的炎黃子孫，作為優秀的中華兒女，憑什麼理由要做蘇維埃埃連鎖黨國下任‘黨’宰割的“豬民與羊民”？？？我們為了自己的人格尊嚴、為了祖國的民族尊嚴，為了全體百姓的公民尊嚴，應該毫不猶豫站地出來，與中共決裂，與黨國決裂，和我們一起打到世界魔鬼共產黨，重建屬於我們中國公民自己的——《新中國》！



**旅美大陸學者魏紫丹教授發表評論文章
認為中共光明網發表《為新中國辯》是**

打着紅旗反紅旗

【本刊訊】旅美中國大陸學者、《還原一九五七》作者魏紫丹教授日前發表長文，對中共借發表《為新中國辯》對辛灝年發動文革式大批判，提出反批評。而他提出反批評的重心，卻是揭露化名田文的中共大批判寫作班子是在“打着紅旗反紅旗”。

他開宗明義地批評說：《為新中國辯》（簡稱《辯》）一文的作法，對共產黨來說是“反面文章正面做”；對他批的對象《誰是新中國》來說，是“正面

文章反面做”；將二者合起來，從實質上來說，則是“打着紅旗反紅旗”。

他接著指出，“辯”文把它的 30 萬言“摘要”歸結為三句話：一是“近兩年，一本 20 世紀 90 年代末出版於美國的所謂“歷史專著”——《誰是新中國》，在網上悄然瀰漫，雖然沒見出現“熱炒”的火爆場面，但炮製者辛灝年的自我遊說，黎安友（Andrew J. Nathan）等鼓吹者的推波助瀾，以及一羣不明真相者的輕信傳播，早已鬧得沸沸揚揚，甚囂塵上”。二是“他們或是心懷叵測，或是別有用心，或是對歷史無知，用荒唐與謊言為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政策，編織著誘人上當的陷阱，麻醉和毒害著心靈純潔的中國青少年學生，特別是在海外留學的中國青少年學生”。三是“為中國近代史研究與教育，投下一顆毒氣四散的煙幕彈，在網路世界造成極大混亂，引起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強烈不滿。”但這三句話恰恰證明了該寫作班子是《誰是新中國》一書的一位聲嘶力竭的義務推銷員，是在“名貶實褒、名抑實揚、名拒實迎”地確證著該書所展現出的三大特點：一是“內容的真實性沖決了中共建築的謊言大壩”；二是“傳播的廣泛性實屬震撼人心，也震撼了共產王朝的統治根基”；三是“風格的創新使它在諸多歷史專著中獨樹一幟”。

接著，魏紫丹教授便從事實和理論兩個方面，針對中共三十萬言的文革式謾罵，逐一地予以了批判，特別對“辯”文是怎樣用“欲蓋彌彰”的手法，借對《誰是新中國》進行批判，來“打着紅旗反紅旗”的，予以了極其透徹的揭露。

在該批判文章結束時，魏紫丹教授用情很深地說道：

新中國之新，新在國魂；孫中山先生創立的三民主義就是大中華民國的國魂。

辛先生之書，義正詞嚴，經緯交織，涇渭分明，親者快，仇者痛。

辛先生之風，山高水長，日月當空，一身正氣，兩袖清風。

他還不無恢諧和風趣地以“駱駝在前進，狗在叫”的民間俗諺，結束了他的長達七萬字的反批評文章。

魏紫丹教授文章全文將在黃花崗雜誌網站發表。

大陸讀者寫信嘲弄中共“為新中國辯” 與魏紫丹教授反批評文章“遙相呼應”

敬愛的辛教授：

最近仔細研讀了共產黨對您的《誰是新中國》發表狗急跳牆的毫無理性可言的瘋狂謾罵攻擊，可見您的政治影響正在擴大，值得共產黨恐慌，共產黨也說不出什麼言之成理的反駁意見，倒是援引了大量的擲地有聲的《誰是新中國》原文代為宣傳，特此致以熱烈的祝賀，同時對於您將這長達 30 萬言的謾罵文章登載在雜誌的首頁上所表現出的寬闊胸襟報以由衷的欽佩，這正是自由主義的精神實質，您已經成為當今共產黨大陸中國許多成熟的有獨立思想的青年人的……。共產黨 7、8 年一次的思想清洗又要到了（從 1999 年法輪功開始算應該在 2006 年前後），不知道這次又以什麼為藉口殺人。不過現在的中國已經今非昔比，我們很多青年積攢經濟實力、組織勢力，希望能夠儘快參與大陸國民黨（重建）的政治活動，為恢復民國做一定政治貢獻……工作繁忙，實在抑止不住激動的心情，一定要給辛教授一些精神支援。編程式去了，祝辛教授身體健康，活到 150 歲，成為新民國……保重。

北京軟體工程師 深夜左右沒人的時候激動寫就

香港《前哨》雜誌發表文章反擊中共惡毒攻擊辛灝年和《誰是新中國》指中共此一行為是：妄圖阻止對中國現代史的反思

【本刊訊】在海內外有著廣泛影響的香港著名雜誌《前哨》今年 12 月號發表朱執中先生的文章，指北京“光明網”發表三十萬言書攻擊《誰是新中國》，是妄圖阻止對中國現代史的反思。該文不僅稱辛灝年的《誰是新中國》一書是推動華人歷史進步的好書，還稱讚《誰是新中國》一書洛陽紙貴，指該書所產生的歷史性效應，將無疑會促使大陸人民沖破中共所製造的歷史反思障礙。朱文還對中共以謾罵代替論戰的行為深感不恥；並告訴中共，《誰是新中國》一書已在海內外獲得很大影響，中共的謾罵只能是徒勞而已。

新聞綜合

誰是新中國 澳洲系列巡迴講演反響強烈

【本刊訊】旅美作家學者辛灝年先生繼六月應邀赴歐成功舉行“驅除馬列、還我中華”的系列巡迴講演之後，十月中下旬又應澳洲“百鳴文化沙龍、自由中國和澳洲大紀元時報”的邀請，仍由黃花崗雜誌副主編李剛博士陪同，赴澳洲巡迴講演“誰是新中國”系列，反響強烈、再次獲得成功。

雖然“誰是新中國”一書已經出版整整六年，該書出版後辛灝年也曾北美洲多次應邀講演過書中的部分章節內容，但系統地講演“誰是新中國”，在他還是第一次。

這次系列巡迴分為四講，分別在澳洲三個不同的城市舉行。第一講，題為“專制改良與共和革命”，在墨爾本舉行；第二講，題為“內憂外患與走向共和”，在布里斯本的格瑞菲絲大學舉行；第三講，題為“衛國戰爭與真假抗日”，在悉尼大學舉行；第四講，“共和慘敗與專制復辟”，仍在悉尼舉行。除此之外，在澳洲的最後一天，辛灝年先生還應邀參加了在悉尼舉辦的“中國問題研討會”，與著名教授和著名民運人士袁紅兵先生同台講演。袁先生講的是“改良，還是革命”，辛先生則以袁先生的講演內容作前提，為他作歷史的證明，講的是“兩類改良、兩種革命和革命必將取代改良”。



此番“誰是新中國”系列巡迴講演，獲得了很大的成功，反響甚為強烈，聽眾也是越來越多，以至講演廳“一椅難求”，許多聽眾甚至席地而坐，有的更靠牆而立達三、四個小時，卻無人離去。講演間笑聲

掌聲不斷，精彩處則掌聲猶如雷霆大作，似不可以止。而辛先生每場講演後的即興回答聽眾提問，次次都將講演會推上了高潮。

“誰是新中國”系列巡迴講演的成功，不僅因為辛先生準備得好，也講得好；還有賴於邀請方面和主辦單位的積極準備和用心籌劃。澳洲許多法輪功學員為講演的成功，更是付出了太多的心血和勞動。其中尤以墨爾本的 GRECE CHEN，布里斯本的 MAY 和黃先生夫婦、悉尼的洪先生夫婦、SUZAN、SHELLEY 兄妹、齊志強女士和許許多多不知姓名的朋友，都為這次巡迴講演付出了令人永遠不能忘懷的奉獻。

黃花崗雜誌副主編李剛博士仍然擔任此次巡迴講演的英文現場同聲翻譯。雖然翻譯的難度很高，卻不僅勝任如昔，而且博得了英語聽眾的很高評價和一致誇獎。



辛灝年此番赴澳，由於主辦方的週到安排，還應邀參加了澳洲華文作家協會的招待式研討會，用辛先生的話來說，就是“出國十年，未想是在澳洲才回到了作家的隊伍”。這位曾在國內出版過九本大作的知名作家，在談到他在國內做作家的經歷和為了“逃避現實”而“走進歷史”的人生之路時，竟也使在場的數十位作家們感慨連連，與他在墨爾本“老金話館”接受電視採訪所說的人生經歷相映成趣。



辛灝年及李剛和墨爾本的自由中國運動成員在一起

辛灝年先生還有幸與墨爾本的著名民運人士呂易、阮杰、張偉強（還有某上海人）等不少朋友會面暢談。在悉尼，又與澳洲著名民運人士秦晉、李剛、鐘景江、張小剛等許多朋友一再會面並受到了他們的熱情款待。

在中共對辛灝年及其《誰是新中國》剛剛發動文革式大批判的時候，《誰是新中國》澳洲系列巡迴講演的很大成功，顯然別具意義。



辛灝年及李剛和墨爾本民運人士呂易羅雲庚在一起



鄧尼金在莫斯科重被安葬 和俄羅斯共和國的護國戰爭

一、“白匪”鄧尼金在莫斯科被軍禮安葬

鄧尼金是俄羅斯南部白衛軍的領導人

BBC 報導 在俄羅斯內戰時期同紅軍對抗的沙俄將軍被重新安葬在莫斯科，俄羅斯此舉是全國和解的一部分。

安東·鄧尼金將軍率領白衛軍反擊 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領袖。

他的遺骨同哲學家伊萬·伊利奇，及他們的妻子分別埋葬在美國和瑞士。

現在在莫斯科舉行軍禮儀式，將他們重新埋葬在莫斯科 Donskoi 修道院的公墓。

俄羅斯正教領袖阿裏克謝二世大主教讚揚說，重新安葬表明 1917 年（共產）革命在俄羅斯社會引起的分裂最終被彌合。

大主教說，“今天的儀式證明了俄羅斯人的團結，上個世紀的悲劇歷史造成了人民分裂。”俄羅斯文化基金的負責人，電影導演尼基塔·米哈伊科夫說，重新安葬儀式標誌著“俄羅斯恐怖的內戰開始告一段落”。

受蘇共譴責的白俄將軍的安葬伴隨軍禮進行

鄧尼金將軍曾經在沙皇尼古拉二世時期參加了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十月革命後俄羅斯的血腥內戰中，鄧尼金將軍是白俄部隊的一個領袖，那些反共的勢力受到英國、法國和美國的支持。

他們對托洛茨基領導的紅軍發動攻擊，但是被打退，被分別趕到黑海、波羅的海和太平洋沿岸地區，他們的失敗導致白俄軍人和平民大規模向外遷徙。

鄧尼金將軍逃亡到了歐洲，1947 年死於在美國流亡期間。

據報導，鄧尼金將軍的女兒瑪麗娜·鄧尼金娜說：“我父親在美國醫院彌留之際最後的話是：‘我不會活著看到俄羅斯自由了’。”鄧尼金娜參加了週一的安

葬儀式。

反共的哲學家伊萬·伊利奇也在十月革命後逃亡。

二、鄧尼金將軍護國反共資料

4、共和國護國戰爭的失敗和列寧建立殘酷的黨主專制

由於俄羅斯共和國人民對列寧共產黨的抗暴鬥爭，說到底，就是志在維護俄羅斯共和國國統和法統的抗爭，所以，共和國軍人在 1918-1921 年間所發動的歷次反對列寧共產黨獨裁政權的戰爭，才擁有著護國戰爭的本質。

1918 年 6-8 月，共和國軍隊先後從東、南、北三個方向佔領了薩馬拉、辛比爾斯克，喀山、鄂爾木斯克和葉卡特林堡等地，推翻了當地的蘇維埃政權，成立了“共和國西伯利亞政府、共和國烏拉爾州政府”等，全國有四分之三的地區曾短暫被護國軍隊佔領。

1919 年春，在東線，共和國將軍高爾察克、鄧尼金、尤登尼奇，共率軍 130 萬人，向列寧的共產黨獨裁政權發動了聯合進攻。

1919 年夏，在南線，鄧尼金的軍隊曾一度先後佔領庫班、哈爾科夫、察裏津、基輔、庫爾斯克等地，十月進佔奧莫爾、圖拉一線，距莫斯科僅 200 公里。這次進攻一直堅持到了 1920 年 3 月，才遭遇失敗。

1921 年 5-6 月間，共和國將軍佛蘭格爾在波蘭的支持下，從南方向烏克蘭出擊，曾佔領烏克蘭大部分地區。

然而，上述歷次護國戰爭均慘遭失敗。其原因：一是俄羅斯共和國原來就立足未穩，又太短暫，難以形成一個有威權和有力量的政治軍事領導核心，因此，在列寧發動了成功的十月背叛之後，雖然共和國的將軍們為捍衛共和國而紛紛揭竿而起，但是一個缺少威信和核心軍事領袖的大規模軍事行為，因其分散性和獨立性，而難以取得成功。

二是協約國國家雖然承認和支持過俄羅斯共和國，但是，在列寧的十月背叛成功之後，他們也祇是對立即與德國簽訂了“和約”的列寧共產黨政權，表示了象征性的干涉；對俄羅斯人民起而反抗共產黨復辟，表現了象征性的支持。而後，協約國國家為一己之國家利益，而對俄國共產黨政權採取綏靖政策，卻對俄國人民的護國戰爭停止援助，甚至是叛賣，志在

護國護法的俄國人民遂處於“敵有人援、我無人助”的淒涼境地。

三是列寧如同殘酷鎮壓俄國人民的護法運動和抗暴鬥爭一樣，對共和國軍人所發動的護國戰爭，採取了創造性的、史無前例的血腥手段，包括赤裸裸的賣國行爲，才最終地推翻了俄羅斯共和國。

（資料摘自辛灝年“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歷史看大中華民國護國護法的艱辛歷程”，黃花崗雜誌第十期）

（上接第4頁）

的心願，而他們卻堅持定位“一個中國”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排它而不顧，強詞奪理，十足蠻橫！

由於執政者長期的蒙蔽人民（其政權要害是一個“騙”字），因而廣大人民對現代史模糊不知，今天五十歲以下的中青年，可以說絕大多數是現代史“史盲”，令人感到可悲！

尊敬的辛灝年先生，您仗義執言，以浩然之氣還歷史於真實面目，您不是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而是一個清正的史學家，不爲利祿，不畏威武，秉承太史公風骨以史爲志，這就是最大的閃光點！

您做了大量的史學研究和教學工作，您那有根有據、有日期、有地點的著述及演講產生著巨大的影響，使人們對真善美與假惡醜的是非辨別方向充滿了信心——復興中華是有希望的。當然，您的事業與作爲也必然會觸犯了一部分人的禁忌，首先是當權者、既得利益者（及其集團）、毛的徒弟徒孫、高幹子弟、甚至於新出現的“暴發戶”之類……您揭了他們的“老底”，觸到了他們的“痛處”，當然他們會千方百計地找您的麻煩，造謠中傷甚至暗算你，你可要注意安全啊！

撥開迷霧謊言，澄清歷史真相；恢復中華，完成統一；看來中國還要走一段艱難的道路。我輩均已古稀衰老，存世不會太長久了，只能寄希望於你們後輩了。你可要注意健康，保重身體呵，孩子！

歷史昭然，君子坦蕩。今專此函達致意，並順祝撰安！

旅美耄耋老人（無黨派）黃秉華 05 年 10 月



為歷史作記錄

敬答“文學城網站”

2005 年 10 月 24 日，也就是辛灝年先生的“抗戰講演”正在許多網站傳播，他的“澳洲系列巡回講演”剛剛結束的當日，傳說中的海外最大網站——“文學城網站”，突然在網站“最高貴的地位”發表了一段未署名的類似“宣言”式文字，題為“送給對共產黨有深仇大恨的反共人物辛灝年”。鑒於該網站與辛先生和黃花崗雜誌向無瓜葛，又不明其背景，為給歷史留下一份記錄，本刊特將該件“影印”如下，並作出回復。

送给对共产党有深仇大恨的反共人物辛灝年

美
1.9

这样的人物，在 80 年代中后期在中国是非常受人欢迎和尊敬的，但是一些陈年老账，越来越显得苍白。毫不夸张的说，现在这些东西在中国层。所以如果其所经历是真的，对此只能同情他不幸的经历，但他所个人，对国家都是一样，靠翻历史旧账是打不到对手的，况且中国现手吧！

精彩帖子推荐：

• 免费股市即时报价和图表工具

文學城網站的版首宣言式文字全文如下：

全文：

送給對共產黨有深仇大恨的反共人物辛灝年

文章來源：128184 於 2005-10-24 15:54:36 文學城

這樣的人物，在 80 年代中後期在中國是非常受人歡迎和尊敬的，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隨著大家逐漸對歷史真相的瞭解，隨著中國政府和社會的進步，而他們依然還在嚼這些陳年老賬，越來越顯得蒼白。毫不誇張的說，現在這些東西在中國的新一代（70 年代出生）的人中幾乎沒有任何影響力，而這些 25-35 歲的人正逐漸成為社會的主要階層。所以如果其所經歷是真的，對此只能同情他不幸的經歷，但他所選擇的人生道路顯然是錯誤的，毫無價值。人生的意義在於開

創未來，而不在於無休止的翻歷史舊賬，對個人，對國家都是一樣，靠翻歷史舊賬是打不到對手的，況且中國現在前進的速度是遠遠超越你們翻歷史舊賬的速度的，所以這是很沒有前途的職業，如果你還年輕，趁早罷手吧！

黃花崗雜誌社的回復之一：

謝謝這位網友的評論；想必這位網友已經對歷史真相——就是所謂“陳年舊帳”有了相當的瞭解。但是，從辛灝年先生在海外巡迴演講獲得留學生（主要是 70 年代出生的新一代）的熱烈反響來看，和國內外青年讀者對黃花崗雜誌的熱情反饋來看，中國近代歷史的真相遠遠沒有大白於天下，更何況中共御用文人、幫閑文人（如李敖）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歪曲歷史、愚弄人民，所以澄清歷史真相的工作仍然任重而道遠。也就是說，這份“陳年舊帳”，還沒有走到理應被忘卻的時候。因為中共對自己製造的虛假歷史——也就是虛假的“陳年舊帳”，至今仍然絕不放手。它在今年紀念抗戰勝利 60 週年之際，還在動用它的專制權力，繼續地、並且是大規模地在海內外製造“虛假的陳年舊帳”，便是明證。雖然“文學城網站”倒絕沒有要中共“閉嘴”的意思。就不說，1989 年秋天，當中共前總理李鵬在北京師範大學公然說“不需要講歷史”之時，只因在場的一位教授問他說，“那黨史還要不要講呢”？他只能瞠目結舌、無言敢對。因為，他絕不敢將他們的“黨史”當作應該忘卻和拋棄的“陳年舊帳”。如果他敢，他對，中共的“黨史”課，不是早就應該停掉、廢掉、壽終正寢了嗎？事實卻不然，中共的黨史課至今還在照開，充滿謊言的“陳年舊帳”至今仍在欺騙著又一代年輕的中國人。如是，文學城網站的網友們，你們是不是應該對中共有所勸諫呢？或者乾脆也來它一份版首宣言，用以“送給永遠都在製造虛假陳年舊帳的共產黨”

歷史就是歷史，歷史就是“陳年舊帳”，問題只是要問一個“真假”而已。

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共的統治之所以能夠維繫，靠的是兩樣緊抓不放的法寶：一樣是暴力，一樣是謊言。辛灝年先生以及黃花崗雜誌社的工作正是針對後者，從甄別中共偽造的“陳年舊帳”入手，以在根本上否定中共政權的合法性，以期釜底抽薪之效。中共

的謊言不僅包括對民國歷史以及中共建政後歷史事實的歪曲，而且包括對民主憲政制度的誣蔑。辛灝年先生和黃花崗雜誌以歷史文化為主題，同時也探討中國民主憲政發展的道路。待到謊言不再大行其道之日，辛灝年先生和雜誌社同仁或許會高興地「罷手」吧。

然而，即便是到了那個時候，作為“陳年舊帳”的真實歷史，大概也還是割不斷拋不掉的吧。因為，只要你對人類本身還有興趣，對自己民族還有感情、對自己的國家人民還有一份責任感，就不能也不會忘記這筆將永遠是人生和社會之教科書的“陳年舊帳”。就不說歷史恰恰是一面永遠在照映著人生、世道、現實甚至是前途的“明鏡”了，有時還是“照妖鏡”。它自然也在照耀著你們的“文學城網站”。

至於說，辛灝年先生和他主辦的黃花崗雜誌，只因為做的是研究和反思歷史“陳年舊帳”的事情，就是對共產黨懷有“深仇大恨”，就應該如文學城網站所宣言的那樣，應該被 25-35 歲的新一代中國青年所“鄙棄”，那就乾脆如中共的前總理李鵬所期望的那樣，就是只允許接受中共的謊言欺騙，絕不許揭露中共的罪惡歷史，更只能讓中共“年年、月月、天天”地講他的虛假“陳年舊帳”，否則，就是對共產黨有深仇大恨？對此，我們就不想多說了。因為，一是“文學城”代表不了他們，二是未來歷史的“陳年舊帳”——會告訴我們，誰才是“愛中國不愛中共”，誰才是“愛中共而不愛中國”，誰才是為了維護中共的謊言而不惜毀滅中國的歷史，誰才終將遭到歷史無情的“鄙棄”。

你們也能象我們的主編辛灝年先生和黃花崗雜誌全文發表你們的“版首宣言”一樣，將我們對你們的回復刊載在你們的“文學城網站”上嗎？

要知道，它可也是歷史的一部份。待到將來回頭一看之時，也是“陳年舊帳”。

黃花崗雜誌社的回復之二：新唐人電視台《透視中國》節目提供的“觀眾對辛灝年講演及受訪節目反饋”：

本刊編者前言：海內外讀者反饋辛灝年講演和“誰是新中國”的來信來稿甚多，我們不能一一照登。這裏僅僅從透視中國節目提供的反饋中選擇部分刊出，並附來信幾封。目的僅僅是為了和中共及其幫忙和幫閑者“一辯”，不是為了

吹捧該書及其作者。雖然許多讀者、聽眾對該書及其作者的評價，洋溢著相當的激情，也頗有些過譽和溢美之詞，請相信，本刊及其主編尚有自知之明，只是為保持反饋的真實性，才不作刪改，就象我們從來就是全文發表“批評甚至是謾罵本刊及其主編的文章”一樣，希望讀者理解。

…… 第二次辛亥革命 | 廣東 I2005-10-31
再次看完全文，心中感慨萬千。如果沒有馬克思，如果沒有毛賊，如果沒有中共，如果九一八事件推遲一年，如果中共在江西就被剿滅，那麼今天的中華民國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團結和平自由進步的民主共和國，而不是現在惡匪統治糟蹋下的一個千瘡百孔的中國……現在真想聽聽辛先生說說國民黨為何在三年剿匪戰爭中失敗的，導致紅魔能肆虐玩弄中國半個多世紀。（轉自《透射中國》讀者來信）

……在電視上看辛灝年先生的演講，無疑是一種藝術享受，比看文字的效果好很多，所以凡是有辛灝年先生的節目，我都會錄下來的。如能告之聯系地址，我會免費寄去此演講的電視錄像(DVD 影碟，可在任何 DVD 影碟機上播放)。(我們還要更新，所以請以網上的版本為準。編者。謝謝)

1905 年 9 月 10 日

孤 帆 | 四 川 I2005-10-06
曾經我就對我在書本上學到的東西表示懷疑，直到今天看了此文才對整個事實有了比較詳細真實的瞭解。我並不偏袒某個政黨，我想要知道的是事實。在書上我知道的蔣介石是個賣國者 但為什麼蔣介石到台灣後一直沒宣佈獨立？從這點就可以表明蔣介石的愛國之心。我想更多的人都應該瞭解這個人——真實的蔣介石。

大陸學生，就不說名字了 II2005-10-30
看了看，就是覺得對啊。希望以後的時間裡，可以看到更多的真相。兩個感想：1，是不是可以把錄象做的小點，（可以同時把畫質好的和不好的放上去，方便大家根據自己的需要下載）。畫質可以差點，但是只要聲音在就可以了。我們大陸下載東西是要在流量上注意的。2，希望在以後恢復中華了，有朝一日可以從師辛先生！最後謝謝大家的努力，大家都是希望和脊梁！

泰 源 II2005-10-27
剛從網上“人民報”看到辛灝年澳洲旋風 精彩問答（一）和（二），其中說到：著名旅美文學家與歷史學家辛灝年先生澳洲巡迴講演《誰是新中國》，在澳洲華人界刮起一陣辛灝年旋風，從墨爾本、布裡斯本到悉尼，所經之處無不震撼。一些聽過辛灝年演講的民眾欲罷不能，連場追蹤，不少只聽到一場的聽眾連連惋惜沒能聽到其餘演講，希望和辛灝年留

影的、要求買書的聽眾在講演後圍住辛灝年不散。並紛紛要求主辦單位刊登演講全文，及銷售現場錄像 VCD。每場演講結束後，全場觀眾均報以熱烈掌聲，鼓掌達數分鐘之久，辛先生頻頻鞠躬、抱掌致謝。辛灝年演講之後，聽眾提問踴躍。希望貴台有機會將此講演整理後在電視中播出，看電視實況比看文字的效果好很多。現先摘錄一段與大家共饗……Jeong-eu Wang| 中華民國南京全椒縣 I2005-10-24 eizuoll2005-10-24
講得很正確，共產黨就要結束罪惡了

第二次辛亥革命 | 中國 廣東 I2005-10-22
你好，辛先生真是才人。

天 知 道 | 大 陸 I2005-10-19
偉大的清醒之人，正在呼喚沉睡半個世紀的中國大眾，喚醒被謊言和欺騙蒙蔽許久的良知!了不起!

真 國 民 黨 員 II2005-10-17
辛灝年說：李敖是共產主義的胚胎，威權民主的怪胎，臺灣社會的毒胎，紅色中國的惡胎，民主自由的死胎（這是辛灝年在墨爾本收場講演後回答問題時所說。）

真 國 民 黨 員 | 美 國 加 州 I2005-10-17
請問編者，在 2005 年 3 月 26-28 日，辛灝年先生應當地僑學界和媒體邀請，于芝加哥中華會館、芝加哥文教中心和芝加哥大學連續作了三場不同內容的講演，其講演主題依次為：“大中華民國的百年護國護法運動”、“中國統一的原則、道路和時機”和“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在哪里”。新唐人有去採訪，能否把錄影放在網上？Jeong-eu Wang| 中華民國南京全椒縣 I2005-10-16

這麼好的演講還不能下載，太可惜了，建議能不能提供 eD2K 網路的下載方式。有勞了！（編者:正在處理當中）

真 理 戰 士 II2005-10-15
辛先生是真理戰士!!你是一把真理的火炬，照亮了謊言下昏暗的中國大陸。。。。

信 仰 自 由 II2005-10-15
辛灝年先生是當代中國最偉大的歷史學家之一

露 西 | 多 倫 多 I2005-10-14
真正愛國的中國人。太震撼了!太好了!

大 中 華 民 國 公 民 II2005-10-13
向辛先生致敬，為什麼貴台的節目我都下不了，顯示文件不

存在，建議在電腦上發布節目，這樣任何封鎖都沒意義了，
（編者：我們正在更新成二段，請留意下載。謝謝反饋！）

大中華民國公民 II 2005-10-13

為什麼我沒法在線看也沒法下載，說是找不到檔，貴台的所有節目都是這樣，我建議可以在電腦上 24 小時發布節目，這樣任何封鎖都沒有效果，再次向辛先生致敬。

did I 2005-10-12

這個才是中國人

荆楚 I 大陸 I 2005-10-24

謝謝辛灝年先生的辛勤勞動。我看了《誰是新中國》一書，對辛灝年先生的嚴謹學風很欽佩。願先生再有振聾發聵的大作問世！！

lyzjerry II 2005-10-22

我想要辛灝年先生在“透視中國”節目中講的：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特別節目——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上)和：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特別節目——偉大的衛國戰爭勝利萬歲(下)的電視錄像(DVD 影碟)，但是不知道是否安全，我可不希望國安找我談話。

andyIchian I 2005-10-16

很感謝你們！一直以來我對這一段歷史心存疑慮，我想知道張學良其人其事！你能滿足我嗎？

吳馨 I 歐洲 I 2005-08-24

真的很佩服辛灝年先生，當第一次看到你的演講，就把我深深吸引了，那些話都說到了我的心裏去了……

真想當面聽聽先生的教誨，可惜太遠了。。。

吳鐵 I 中國大連 I 2005-08-09

辛灝年先生的大作《誰是新中國》我看過，真是讓人感覺呼吸到了一大口新鮮空氣的感覺一樣。書中的觀點事實客觀詳實，論證有理有力，讓人感受到獨立學者的風範。今天看到辛先生的文章又讓我感觸頗深，感謝您提供的精神食糧。。

秦共 I 中國上海市 I 2005-06-19

辛灝年，一位真正表現出中國知識份子博識，睿智，敢為，氣度的學者。感謝辛先生，感謝新唐人 TV。

china1912 I 山西 I 2005-03-21

我很喜歡辛灝年先生的演講，不知視頻檔到哪裡下載？

尊敬的辛先生：

您好，看了您在芝加哥的演講和賓大的演講，感觸頗深。激動之情，無以言表。講的透徹，深刻，一針見血。又獲悉您將在劍橋、牛津大學等地演講，預祝您演講成功，能喚醒更多的海外青年華人。您的在芝加哥的演講第二部分詼諧幽默而又不失力度，引經據典以理服人。建議您在英國的演講能延續這種風格。偉大的思想往往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而精彩的演講則能使這一意願成為可能。您的孜孜不倦為國為民的行為將為世人所景仰。祝身體健康，闔家安好。

一位大陸同志

高先生（請允許我稱呼您的真姓）：

歡迎您來澳洲巡迴演講。為了解救中國人民的苦難，您不辭辛勞，到處奔走呼號，以喚起人們的覺醒。您是中國人民的脊梁，您是中國知識份子的脊梁，您是中國人民的希望！欽佩您淵博的知識和精妙雄辯的演講（在新唐人電視台已領略過您的風采）。祝您演講成功！

忠實聽眾 張瑞吉

七律一首

今談誰是新中國，想起袁大頭篡奪。
赤縣被戰敗劫戮，五大洲遊蕩魂魄。
真理光芒怎容抹，辛灝年獨解疑惑。
民眾能分清與濁，不會忘國父遺囑。

世潮 2005 · 10 · 15 · 晨即刻墨爾本

注：國父遺囑：“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請自 05 年第一期訂閱以前各期是否可郵購？祈賜示（地址如下……）。

七律一首

讀《誰是新中國》有感

嘔盡心血磨一卷，不堪偽史誤百年；
恢宏嚴謹任推敲，司馬有知亦汗顏。
興邦之路雖坎坷，正本清源史為鑒；
民族有魂良知在，歷盡磨難心未眠。

大陸旅美學子 一帆



三民主義思想的產生與演進

紀念國父誕辰一三八週年

孫常煒

編者按：今年六月，辛灝年先生在應邀赴英國、瑞典系列講演“驅除馬列、還我中華”之時，凡言及孫文三民主義建國道路的歷史正確性和政治科學性時，來自大陸的聽眾，不論是中國留學生還是大陸新華僑，甚至是法輪功的普通學員們，均次次報以激動人心的掌聲。辛先生回來後，又一再接到歐洲聽眾的來信，希望他“大講特講三民主義”。為此，我刊決於本期首先發表著名三民主義研究專家、前國史編修館編修孫常煒教授關於三民主義的重要研究成果，以期讀者首先能夠對三民主義的“之所由來和基本思想”，特別是孫文對馬克思主義的早期批判和基本否定，有一個明晰的了解，以有助於我們進一步地理解和研究。更為重新在中國本土宣傳和普及三民主義的思想，重建共和主義的新中國而努力。

現將具代表性的旅英中國學人夏澤女士的信首先發表如下：

辛老師：您好！

希望您已經從歐洲之行和返美長途旅行的疲勞中恢復過來了……

在聽您的講座前，我曾對三民主義沒有任何的瞭解，認為是個“老掉牙”的東西。在我接觸的人中有很多人都有這種想法，甚至認為那是“台灣國民黨的東西”。聽了您的講座，對三民主義有了膚淺的認識，瞭解了其“以民為本”的基本思想（也許我到現在也還沒有完全理解對？），改變了原來的看法。上次也和你談過一些關於“給中國人民以希望”的想法，因此再給您提個小建議：大講特講“三民主義是中國人民在中共之後的希望”和為什麼是希望。

夏澤 6月24日於英國

正文

三民主義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不論在經濟學上，民族學上或倫理學上，還是在學術研究和革命實踐方面，其不僅繼承中華五千年優良文化傳統，而且融合了歐美近代先進的社會科學思潮，是國父畢生革命思想之總結晶。欣逢國父孫中山先生誕辰一三八週年，爰就三民主義思想產生及其演進各階段，作概略的敘述，謹為紀念，並備商榷。

（一）順序是先民族次民權後民生

三民主義產生的順序，究竟孰先？我們大概可以斷定：首先是民族主義，次為民權主義，最後為民生主義。這個判斷，可以從兩方面來證明：一為世界革命的先例，一為中國革命的文獻。茲依次說明於左：

第一、世界革命的先例：

先民族主義

人類為生存起見，最初為要抵抗毒蛇猛獸，因而需要集體生活，後因團體生活的擴展，逐漸進而組成部落或氏族。嗣又合併若干大小部落或氏族而成一大部落，合併若干大小部落氏族同化之而成一民族（即指種族而言），再合併若干民族而成一國家；或由一國家分裂而成若干民族。總之，所謂部落、氏族、民族、國家之由分裂而合併，亦由合併而分裂；彼此間，相互間，必各出全力以爭生存，以謀繁榮。繼續的分裂，繼續合併，不斷地合併，不斷地分裂；民族部落的內容，不斷地變換，國家民族的名稱，也不斷地興廢——這就是人類歷史上民族戰爭的記載；發生的時間，比較起來為最早。以上系就民族興廢的起源而說，若現代新民族主義的產生，則系十八世紀的事。

次為民權主義

在民族基礎鞏固之後，因內部受帝王或封建貴族、軍閥官僚，或商人、地主及特權階級的壓迫，故人民不甘屈服，遂起而從事政治革命。故歷史上一治一亂、一盛一衰，一個朝代倒下，另一個朝代繼起；新興的特權階級得勢，舊有的特權階級崩潰。如此的不斷輪流更替，逐漸寫成了人類的一部政治革命史，此就民權問題之起源而論。若嚴格的說，民權主義的興起，則自一七八九年法國人權革命起，至今僅二百餘年。

最後為民生主義

民生問題本與人類生而俱來，為一切革命運動最基本的根源。但在工業革命以前，勞資衝突尚未尖銳，民生問題，皆消納於民族、民權二問題之中。直到十八世紀的半期，蒸氣機發明（1765 年——1769 年）以後，機器代替了人工，生產加速地增進，於是造成資本集中、經濟恐慌與勞資兩階級衝突的現象。降至十九世紀中葉，經濟問題之嚴重性，逐漸高出民族、民權兩問題之上。故民生問題之起源雖為最早，但嚴格的說，則其產生實為最後。

國父的言論

故國父說：“歐洲當三百年前，為種族革命時期，近一百年來，為政治革命時期，現今則為社會革命時期。”（註一）又說：“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美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為民生主義之壇場時代也。”（註二）又說：“世界各國，都是先由民族主義，進到民權主權；再由民權主義，進到民生主義。（註三）又解釋說：“民族主義，在人類思想上，本來發達最早，到了後來，覺得自己民族，雖然不受他種民族的壓制，但是在本國之內，還要受特別階級的壓制，像皇帝貴族，高高在上，人民處在他們壓力之下，動也動不得。因為受壓力的痛苦，便生出反抗，便提倡民權來反對君權。所以由歷史上來看，民權主義常在民族主義之後。……由民權主義更進一步，便是民生主義。……歐美各國的民族和民權兩個問題，可說是早已解決了，現在所

受的痛苦，純是民生問題。”（註四）所以國父的意見，是先由民族主義再到民權主義，最後方是民生主義。

第二、中國革命的文獻

中國革命文獻，珍藏甚多，梳剔不易。姑先以“興中會宣言”、“同盟會宣言”、“民報發刊詞”三文為主要根據。

先有民族民權

考興中會系國父孫中山先生二十九歲時所創立（1894 年，清光緒 20 年，甲午）其宣言及會章均側重民族主義，此為民族主義最初產生之證明。宣言雖亦批評政治腐敗，但以“事多忌諱”，故“未敢表示”其“本旨傾覆滿清”（註五）並未討論改變政體與政治機構。可知民權主義此時只在萌芽。至經濟改造問題尚無一字提及。

兩年後（1896 年）國父倫敦被囚拘於中國使館（10 月 11 日至 23 日），脫險之後，“則暫留歐洲，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捷致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了。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余為一勞永逸計，乃採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六）

觀此，可以推知，國父民權主義的理論，在此時期（1896 年至 1899 年）必更有補充，而民生主義的思想，直至此時期方才成熟。

三民主義思想，至此時才告完成，理論方臻充實。

三民主義的完成

至 1905 年（清光緒 31 年 乙巳），適同盟會在東京正式成立，宣言中始正式列舉會章四則：“乙巳春間予重至歐洲，則其地之留學生已多數贊成革命：予於是乃揭櫫吾生平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號召之，而組織革命團體焉。”（註七）

革命團體綱領則是：

驅除韃虜——民族主義

恢復中華——民族主義

建立民國——民權主義

平均地權——民生主義

以上四綱，第一第二是民族主義，第三是民權主義，第四是民生主義。故國父於民國元年講演云：“八、九年前，少數同志，在日本發起同盟會，定三大主義，一、民族主義，二、民權主義，三、民生主義。”（註八）從此可知三民主義的理論，至 1905 年方正式的由黨接受而為革命理論之指導。而建國程式，分軍閥之治、約法之治、憲法之治，亦於此宣言中定之。同年，民報在東京出版，國父親撰“發刊詞”，其中有云：“予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族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適不可以須臾緩。……而民生主義，歐美所積難返者，中國獨以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次年（1906 年）民報周年紀念演講時，又說：“兄弟想民報發刊以來，已經一年，所講的是三大主義；第一，是民族主義，第二，是民權主義，第三，是民生主義。”（註九）

三民主義名詞的正式應用

觀此，可知自興中會成立，以至翌年廣州起義，與夫此後倫敦蒙難、惠州興師、湘粵舉義，似皆未正式引用“三民主義”一名詞。1899 年，國父到日本與犬養、宮崎等談話，僅言民族主義、民權主義。而無三民主義字樣（見黨史稿）。1900 年在粵起義，1901 年到日本宣傳與梁啟超遇，1903 年在上海張園演說革命，1904 年從安南過日本改訂美“致公堂章程”，（見民報第一期），1905 年，國父雖自言揭三民主義以宣傳，但在歐時期之文獻，今仍未見。直至同盟會成立、民報發刊（1905 年），國父正式揭示“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以為革命之方針，而民報中所討論者，又必為三民主義可無疑義矣。至“三民主義”一名詞，則始於 1906 年 8 月，當時香港中國日報以在廣告上介紹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為冗長不便，簡稱“三民主義”。嗣後各地黨報，相率採用，遂成為一普遍名詞矣。（註十）

（二）民族主義的產生和演進

國父誕生於 1866 年（清同治 5 年，民前 46 年，丙寅。年齡皆照習慣計算）。其民族主義思想的產生和演進的階段，可以粗分為左列五個時期：

第一時期、民族思想潛伏時期（12 歲至 19 歲，1878 年至 1884 年，光緒 4 年至 10 年，戊寅至甲申，民元前 34 年至 28 年）。

第二時期、決心推翻滿清政府及宣傳民族革命時期（20 至 28 歲，1885 年至 1893 年，光緒 11 年到 19 年，乙酉至癸巳，民元前 27 年至 19 年。）

第三時期、充實理論立黨宣傳並開始民族革命時期（29 歲至 39 歲，1894 年至 1904 年，光緒 20 年至 30 年，甲午至甲辰，民元前 18 年至 8 年。）

第四時期 黨的改組擴充與積極發動革命運動時期（乙巳至辛亥，民元前 7 年到元年。）

第五時期 民族主義的理論擴展與完成時期（47 歲至 60 歲，1912 年至 1925 年，壬子到乙丑，民國元年至 14 年。）

依照上列各時期，分述民族主義的產生和演進於左：

第一時期：民族思想潛伏期

國父自 7 歲至 12 歲，在其故鄉翠亨村私塾讀書，聞太平軍某遺老講述洪楊革命故事，遂以洪秀全第二自許，潛懷民族思想。

第二時期：決心推翻滿清政府宣傳民族革命時期

國父 12 歲時，始決心推翻滿清政府，並於此數年，積極宣傳民族主義。自雲：“乙酉以後，余所持革命主義，能相喻者，不過親友數人而已。”（註十一）又孫文學說云：“予自乙酉中法戰敗之年始決傾覆清廷創建民國之志。當余肄業廣州博濟醫學校也，於同學中物識鄭士良、弼臣者、其為人豪俠尚義，廣交遊，結納皆江湖之士，同學中無有類之者。予一見即奇之，稍與相習，則與之談革命。士良一聞而悅服，並告以彼曾投入會黨，如他日有事，彼可為我羅致會黨以聽指揮雲”（註十二）又雲：“予在廣州學醫甫一年，聞香港有英文醫學校開設，予以其學課較優，而地較自由，可以鼓吹革命，故投香港學校肄業，數年之間，每於學課餘暇，皆致力於革命之鼓吹，常往來與香港澳門間，大放厥詞，無所忌諱。時聞而附合者在香港只陳少白、尤少紈、楊鶴齡三人，而上海歸客，則陸皓東而已……予與陳、尤、楊三人常往香港，日夕往返，所談者莫不為革命之言論，所懷者莫不為革命之思想，所研究者莫不為革命之問題。”（註十三）

第三時期：充實理論立黨宣傳開始民族革命時期

此時期為對外要求民族獨立自由，對內推翻滿清異族統治。但“興中會宣言”，為避忌會員之疑慮，故尚未公開提倡“造反”，只云：

“中國積弱，至今極矣！上則因循苟且、粉飾虛張，下則蒙昧無知，鮮能疑慮。堂堂華國，不齒於列邦；濟濟衣冠，被輕於異族！……方今強隣環列，虎視鷹瞵。久垂涎我中華五金之富物產之多，食鯨吞，已見效於接踵，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有心人不禁大聲疾呼！亟拯斯民於水火，扶大廈之將傾。慶我子子孫孫，或免奴隸他族。”（註十四）

這一篇宣言，對於中國民族所受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提示得非常悲憤沉痛。惟對推翻清政府恢復滿族政權的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只用口頭的宣傳與實際的行動。故翌年（1890年）9月9日，有廣州第一次的起義，1900年有惠州第二次的起義。至於口頭的宣傳，則自檀香山、而三藩市、而紐約：“所至皆說以祖國危亡、清政腐敗，非從民族根本改革，無以救亡。”（註十五）

理論充實時期

至1896年10月11日至23日國父在倫敦中國公使館被囚獲釋後，留歐考察數年，民族主義的理論，此時為充實時期。

至1899年返回日本，則又從事於宣傳並計畫革命運動焉。

第四時期：黨的改組擴充積極發動革命運動時期

“今者國民軍起立軍政府，滌二百六十年之膾腥，復四千年之祖國。……維中國開國以來，以中國人治中國……今漢人倡率義師，殄除胡虜！”其宣言中所列四綱中之一二綱，即為“（1）驅除韃虜（2）恢復中華”——明明白白地提出民族革命的口號來了。

民族主義初期的意義

不過民族革命的意義怎樣呢？我認為，國父有兩點說明，很是要緊。他在1906年民報創刊周年紀念演講時說：“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滅他們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不是要盡滅滿洲民族。”（註十六）又說：“民族主義，並非是遇著不同種族的人，便要

排斥他；是不許那不同種族的人，來奪我族的政權！”（註十七）這種主張“爭取民族政權”“禁止排斥私人”的意見，何等公正光明、仁慈愷悌！這是以理智來指導革命行動，這是偉大的革命人格的表現；這是中國王道精神的文化。

可見民族主義的內容，從同盟會成立起至辛亥武昌起義止，在文字宣傳上，還只註重兩點意義：一點是昌明漢族主義，要由漢人自己來統治中國；另一點是要造成富強獨立的國家，以挽回民族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

第五時期：民族主義的理論擴展與完成時期

此時期民族主義的內容，伸展擴充，以至完備。在民國成立之初，民族主義中加入國內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意義，同時且主張大同，維持全世界人類之利益。這可於“民元時大總統就職宣言”及“五族共和之真義”，“五族聯合之效力”講辭中見之。（註十八）此後數年又正式提出收回領事裁判權，取消不平等條約等口號。至民國十三年，民族主義六講問世，於是民族主義的全部理論遂臻完備。

結論

根據上列時期的敘述來觀察，則知民族主義之產生，實因清廷政治的腐敗和當時列強的侵略與壓迫，故對內提倡興漢排滿，對外提倡抵抗外侮。繼則理論發展充實、至民國初漸臻完備。然那時，國父仍忙於實際革命工作，故民族主義所有者仍為若干獨立之短篇講演，尚不能憑以窺測其理想之整體。究竟民族主義進一步的意義，所謂提倡中國王道文化、扶助世界弱小民族、恢復民族固有道德智慧和迎頭趕上歐美科學文明等等，還是國父前此沒有想到呢？還是有其他原因？

國父少談民族理論的原因

這個問題，國父自己有過解答。他在“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講演（1906年）中說：“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什麼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著父母總是認得，絕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絕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從來都是一樣的。”（註十九）因為民族主義容易瞭解，所以他為策動革命起見，只作過若干獨立之短篇講演，而不用長篇大論。不是他當時不能

做，而是他認為不必做。民族革命所需要的是行動，不是理論。

故直至晚年，他方從事於民族主義的著作，雖不幸原稿被毀，然流傳之民族主義六講及大亞細亞主義，已足顯示其理論之充實與識力之超卓。

（三）民權主義的產生和演進

民權主義演進的三個階段

民權主義的產生和演進，瞭解其詳細的情形和正確的年月，我們也感覺到困難。原因是國父於 47 歲以前，均忙於民族革命的實際工作，無暇作理論的闡明。同時又因宣傳用之短篇講演，偏重於激動人心，不適宜作學術性的講論。所以“五權憲法”及“人民四權”與“權能劃分”等理論之演進歷程，實屬無法確定。現在只好粗率地將民權主義思想的發展，分作三個時期來敘述：第一時期 民權思想萌芽與組黨提倡時期（20 歲至 31 歲，1885 至 1896 年，光緒 11 至 22 年，乙酉至丙申，民前 27 年至 16 年。）

第二時期 充實理論與積極宣傳時期（31 歲至 39 歲，1896 年至 1904 年，光緒 22 年至 30 年，丙申至甲辰，民前 16 年至民前 8 年）

第三時期 理論正式發表與完成時期（40 歲至 60 歲，1905 至 1925 年，光緒 31 年至民國 14 年，乙巳至乙丑）

第一時期・民權思想萌芽與組黨提倡時期

考國父於 1885 年立志革命，推翻滿清，雖則當時民族思想之高潮，超出民權思想之上，但在事實上則滿清政府政治之黑暗腐敗有以激成之。故此時當亦為其民權思想之萌芽醞釀時期。直至 1894 年，興中會成立，是為組成政黨，提倡民權思想之開始。“興中會宣言”中說：“政治不修，紀綱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註二十）

至國父對於滿洲政府推翻後之政體問題，雖然無明確論到，但我們可以推斷，此時必為美國式的共和政權，主張三權分立的。至於人民行使之政權，恐事前亦未詳細計畫。

第二時期：充實理論與積極宣傳時期

國父在 1896 年倫敦脫險後至 1899 年，留歐考察各國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所見所聞，殊多心得。（註二十一）故國父在“中國革命史”中云：“歐洲立憲之精義，發於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歐洲立憲之國莫不行之。然余游歐美，深究其政治法律之得失，如選舉之弊，決不可無以救之。而中國相傳才試之制、糾察之制，實有其精義，足以濟歐美政治法律之窮。故主張以考試、糾察二權，與立法、司法、行政三權並立，合為五權憲法。更採取直接民權之制，以實現主權在民之實。如是余之民權主義，遂圓滿而無憾。”（註二十二）故在 1896 年至 1899 年數年間，為民權主義理論之充實時期。

“1899 年，國父回至日本，晤彼邦朝野志士，談論革命。又命黨中同志，往返於橫濱神戶之間，鼓吹革命主義。數年之間，慕義來歸者，百數十人。……遂命陳少白回香港創辦中國日報，鼓吹革命；命史堅如入長江以聯絡會黨；命鄭士良在香港設立機關，招待會黨。……時適各省派遣留學生至日，而赴東京之士，頗多頭腦新潔，志氣不凡，對於革命理想，感受極速，轉瞬成為風氣。故其時東京學界之思想言論，皆集中於革命問題。劉成禺演說革命排滿，張浦泉等發起國民報。留東學生提倡於先，內地學生附合於後，各省風潮，由此漸作。在上則有章太炎、吳稚暉、鄒容等借蘇報鼓吹革命（1903 年）。……壬寅癸卯之交，在河內識華商黃龍生等……遇日本時（1904 年）有廖仲凱夫婦、馬君武等多人來會，表示贊成革命……海外華僑亦漸受東京學界及內地革命風潮之影響。故予此次漫遊所到，凡有華僑之處，莫不表示歡迎。”（註二十三）可知在此數年間，國人智識漸開，遂能收宣傳之效果。

第三時期：理論正式發表與完成時期

1905 年春間，國父重至歐洲，“於是乃揭臻吾平生所懷抱之三民主義，五權憲法以號召之，而組成革命團體焉”（註二十四）。此似為國父第一次正式發表五權憲法理論之一年，但尚屬口頭之宣傳，而未見諸文字。其正式以文字討論民權主義政體的則為“同盟會宣言”。該宣言文雖不滿一千六、七百字，但包括民權主義的精義殊多，茲列舉如左：

《民報》週年演講民權精義

- 1、在政體上主張“建立民國政府”；
- 2、“國民皆平等，皆有參政權”；
- 3、“國民公舉大總統及公舉議員”；
- 4、“第一期為軍法之治……軍隊與人民同受治於軍法之下……每一縣以三為限”；
- 5、“第二期為約法之治……以地方自治權歸之其地之人民，地方議員及地方行政官，皆由人民選舉。……以六年為限，始解約法，佈憲法”。
- 6、“第三期為憲法之治”，“憲法上國家機關分掌國事”。
- 7、禁止“奴婢之畜養”；
- 8、“國人相視皆伯叔弟兄諸姑姊妹，一律平等，無貴賤之差、貧富之別。”（註二十五）

除“同盟會宣言”而外，次年（1906年）國父在民報周年紀念的演講，亦多民權主義的精義，茲亦節錄於後：

- 1、“研究政治革命的功夫，煞費經營，至於著手的時候，都是同民族革命並行。我們推倒滿清政府，從驅除滿人那一面說是民族革命；從顛覆君主政體那一面說，是政治革命，並不是把來分作兩次去做。”（註二十六）

- 2、“外人斷不能瓜分我中國，只怕中國人自己瓜分起來……我們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國民政府。”（同上）

- 3、“將來中華民國的憲法，是要創一種新主義，叫做五權分立。”（註二十七）

- 4、“考選本是中國始創的，可惜那時制度不好，卻被外國學去，改良之後，成為美制。……所以將來中華民國憲法，必要設獨立機關，專掌考選權。……這法可以除卻盲從濫選，及任用私人的流弊。”（同上）

- 5、“各國沒有不是立法機關並有監督許可權的，那許可權雖然有強有弱，總是不能獨立，因此生出無數弊病。……裁判人民的機關，已經獨立，裁判官吏的機關，卻仍在別的機關之下，這也是理論上說不過去的，故此機關也要獨立。”（註二十八）

- 6、“五權分立，這不但是各國制度上所未有，便是學說上也不多見，可謂破天荒的政體。”（註二十九）

自1906年以後，國父又因親自領導實際革命工作，故對於民權主義的演講著作，亦鮮發表。

直接民權的意義

民國成立後之演講，均系獨立篇。對於民權主義發揮較詳的：一為民七所著“孫文學說”中第六章“能知必能行；”敘述五院制度及地方自治與軍政、訓政、憲政之治。（註三十）一為民十之講演，說明直接民權，內云：“代議制度還不是真正民權，直接民權才是真正民權。美國、法國、英國雖然都是行民權主義，但是他們還不是直接民權，是間接民權。兄弟的民權主義，是採用瑞士的民權主義，就是直接民權主義。……直接民權一共是四種，叫做選舉權、罷官權、創制權和複決權，這四種權，便是具體的民權。像這樣具體的民權，才是真正的民權。”（註三十一）

國父手著之“民權主義”，雖已被毀，但幸有民權主義六講，國民政府建國大綱，五權憲法及地區自治開始實行法等遺教，我們儘可作為研究的根據而想見其學說博大深邃了。

（四）民生主義的產生和演進

民生主義發展的四時期

民生主義的產生和演進，大概可以粗分為四個時期：第一時期認為討論時期（29至31歲，1894年至1896年，光緒20至22年，甲午至丙申，民元前18到16年）

第二時期 研究創造時期（31歲至39歲，1896年至1904年，光緒22至23年，丙申至甲辰，民元前16至8年）

第三時期 宣傳鼓吹時期（45至53歲，1905年至1918年，光緒31至民國7年，乙巳至戊午）

第四時期 解釋批判時期（54歲至60歲，1919年至1925年，民國8年至14年，己未至乙丑）

茲就民生主義和各期演進，分述於後：

第一時期、民生主義之認識討論時期

此一時期為國父開始認識民生問題之重要而加以討論之時期，應截止1896年止，即倫敦蒙難以前均屬之。但究應自何時起算，則因史料缺乏，無從斷定。此時期之代表著作有二：一為“上李鴻章書”，一為

“興中會宣言”。此二文皆發表於一八九四年，故即自一八九四年起算。

上李鴻章書

“上李鴻章書”，其中最扼要的意思，是說明歐美富強的原因，不在船堅炮利，壘固兵強，而在“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註三十二）此時國父雖尚未標明民生主義的主張，但此四點意思，實為民生建設之主要原則。

興中會宣言

其次是“興中會宣言”，對於中國當時社會民生之凋弊，慨乎言之。內雲：“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註三十三）

又提出民生主張雲：“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皆當惟力是視，逐漸舉行。以期上匡國家以臻隆治，下維黎庶以絕苛殘。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為滿志。”（註三十四）

這是國父初期認識民生問題之重要，而正式提出來討論它。

第二時期、民生主義之研究創造時期

留歐考察研究

此一時期起自 1896 年至 1904 年止，內中包括倫敦脫險後留歐考察之數年。“孫文學說”云：“倫敦脫險（1896 年 11 月 2 日）後，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並結交其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從政國家富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興民族，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註三十五）

在留歐三四年當中，甚至到 1905 年同盟會成立以前，我們固然很少看到國父的講演與著作涉及民生主義；然無疑地這正是他埋頭研究，比較各種社會主義學說的優劣，斟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情形，苦思焦慮，以求創造一種最進步的和平完善的革命主義的時候。

民生主義雖則是由歐美各種社會主義發展而來，但它是進步的、具體的、科學的、創造的一種社會主義——是後來居上的一種嶄新的社會主義。它是發現了中國社會革命的新路線，同時也為世界社會革命指出了一條新路線。

第三時期、民生主義之宣傳鼓吹時期

民報發刊詞

此一時期指自同盟會成立（1905 年）起至民國 7 年止，為國父宣傳民生主義時期。故於 1905 年“同盟會宣言”中提出“平均地權”為“四綱”之一。同年在“民報發刊詞”中又說：“近時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美歐美，猶不能免於第二次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末，之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現之，又不能使之去。吾國治民生主義者，發達最先，睹其禍害於未萌，誠可舉政治革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環視歐美，彼且瞠乎後也。”（註三十六）

民報周年講演

次年，民報周年，國父講演“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註三十七）對於民生主義，尤有較詳盡的說明。茲摘要介紹於後：

- 1、民生主義的作用，是防止後來的社會革命。
- 2、民生主義所以發生的原故。
- 3、社會主義已為一種很繁博的科學，流派極多，主張各別。
- 4、中國今日預籌個防止的法子，總較歐美容易得多。
- 5、社會黨因文明不利貧民，而有主張復古，這是矯枉過正的話。文明進步，是自然所致，不能逃避的。
- 6、解決土地問題的理由與辦法。
- 7、我們做事，要在人前，不落人後。這社會革命的事業，定為文明各國將來所取法的了。

民元時的理論已完備

民國成立，國父對於黨員、民眾、國會之所有演講，幾乎多是鼓吹民生主義。對於民生主義的辦法，於解決土地問題之外，又補充說明同時應該解決資本問題，即發達國家資本用以限制私人資本。在這許多演講中，其內容最豐富者：一、為元年四月辭職後對同盟會員餞別會講“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註三十八）二、為元年十月對中國社會黨講“社會主義之派別與方法，大體已備具於此三講演中。

第四時期、民生主義之解釋與共產主義之批判時期

民國八年“五四運動”，為中國新文化運動之開始，共產理論亦引起國人之註意，民國9年北大教授陳獨秀、李大釗與北平各校一部分學生組成“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同年7月，陳、李等七人，在滬成立“中國共產黨”（內中數人旋均退出）。翌年，經蘇俄第三國際批准成立“中國支部”，於是“中共”於7月間召開第一次大會，宣告正式成立。次年（11年）6月李大釗等（受俄命）向國父請求以個人資格加入國民黨，為“奉行三民主義”而革命。次年（12年），中國國民黨改組，接著於13年1月，在廣州召開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國父大約在民國八、九年間，初識陳、李等之幼稚無識為可憐可笑，至13年國民黨改組註重主義之宣傳時，乃不得不詳細解釋民生主義與社會主義之異同，開始批判馬克思共產主義在理論上與辦法上之缺點。我這個推斷，系以左列四種資料為根據：

一、是民國八年六月二十二日，與戴季陶先生在上海住宅，“關於社會問題之談話”。（註四十一）？

二、是民國十年六月在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註四十二）？

三、是民國十三年一月對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註四十三）？

四、是民生主義四講中之第一二講。

我現在就根據上述四種材料，來證明我的推斷或可無誤：

一、民國八年與戴季陶先生關於社會問題之談話：

在談話中，國父認為當時一般知識份子歡喜介紹共產學說，因為他們不懂中國只有實行三民主義，方才可以免除種種階級衝突、階級鬥爭的苦惱。

知識份子和工人一樣沒有知識

國父說：“中國現在不但工人沒有知識，連號稱知識份子的人，也是一樣沒有知識；工人沒有知識，就是一切新舊知識都沒有的，知識階級裏面的人，就是有，有害的知識，沒有，有益的知識，！對於毫無知識的，給他一個知識是容易；對於號稱有知識的，教他判別是非利害，倒是很難！我們對於中國革命，是要研究英國是這樣，俄國是這樣，法國是這樣，拿許多的榜樣做材料，就歸納到中國該怎樣的本

題，作成一個主張。但是那多數的人，他們卻是不懂的！”“無知”和“不懂”，就是國父給予陳獨秀、李大釗等知識份子的批判。

作無意識的煽動工作

那麼，國父當時為什麼不予公開的批判呢？季陶先生也問起了：“此刻這個時代，思想的震盪，已經到了極點。中國在這世界思潮的震盪中間，也就免不了震盪起來。但是因為知識太低的緣故，一般人，對於世界上的思想的系統，不能夠明白。那些做煽動工夫的人（按指“中共”的青年），就拿了一知半解系統不清的社會共產主義，傳佈在無知識的兵士和工人裏面。這幾天報上登載說：軍隊裏面發現題名“兵士須知”的小冊子，就是這種事實了。如果因為這一種無意識的煽動，發生出動亂來，真是一塌糊塗，沒有辦法了！先生對於這個問題，有什麼意見？”

國父的回答是：“在外國提倡無妨礙、在中國是危險的、但不必憂慮。

“這確是一種危險。因為無論在哪一國，他們各種思想，都有系統的。社會上對於有系統的思想觀察批評，也是有系統的。政治運動是政治運動，經濟運動是經濟運動，各有各的系統，都隨著人文進化的大潮流，自自然然的進步。如果沒有特別的壓力，像我國從前那樣的政治，決不會有十分激烈的變態發生出來的。中國在社會思想和生活上還沒有發達，人民知識沒有普及，國家的民主的建設還沒有基礎的時候，這種不健全的思想，的確是危險。不過，也是過渡時代一種自然的事實。如果要防止他，反而煽動人的好奇心，助成不合理的動亂。再冷靜一點想，無論在什麼地方，荒地開闢的時候，初生出來的，一定是許多雜草毒草，決不會一起始便天然生出五穀來的，也不會忽然便生了牡丹芍藥來的。這種經過，差不多是思潮震盪時代的必然性。雖是有害，但也是用不著十分憂慮的。”

現在，可知國父看陳、李輩之介紹共產學說，只是中國思想荒地上一些雜草毒草，不過使三民主義的播種工作更能普遍而已。惜國人對三民主義播種工作做得不夠，所以大陸變色，言之痛心！

二、民十講演“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

民國十年國父在粵任國民政府大總統，此時陳獨秀、李大釗等正在滬籌組“共產黨中國支部”，這群

抹上粉臉穿著紅衫褲的孩兒們，鼻孔裏套著莫斯科帶來的鐵圈，正在載歌載舞如醉如狂。國父有點看不上眼，於是在中國國民黨特設辦事處，指示同志們以“三民主義之具體辦法（註四十四），來開始來解釋民生主義的不同，以對於陳、李這一流人，加以批判。

現在就該演講中比較重要的部分作出介紹：

第二次對共產黨與共產主義批判八點：

1、“我們抱三民主義的革命黨，和各國的革命黨，都是大不相同的，各國的革命黨，不是只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上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只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

2、“最近俄國的革命，有人說蘇維埃政府是註重民生主義，沒有民族主義的大意味，至於民權主義，不過是他們革命的附屬品罷了！這又是和本黨不同的地方了。”

3、“兄弟所主張的三民主義，實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地學說，順應世界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個結晶。”

4、“民生主義，就是時下的社會主義。諸君想，兄弟提倡民生主義是在什麼時候呢？國人到今日出來講社會主義，已經是很遲了！”

5、“現在許多人講社會主義，都是離題太遠，墮入五里霧中，這也是國人不求甚解的過錯。兄弟所主張地民生主義，有很好的具體辦法，不像那些好奇地人，盡說空言。”

6、“外國是患不均，中國是患貧，這就是中外社會情形的大區別。……但是如果說中國沒有資本家，便可以不要社會主義，那便是大錯。不知道前車之覆，便是後車之鑒。歐洲社會在今日之患不均，便是吾人極好的教訓。那種不均的病根，還是由於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預先沒有解決。所以兄弟提倡民生主義，講到歸宿，不得不解決土地和資本兩個問題。”

7、“社會主義的真諦，如果專從書本中研究，不是專靠幾十本書、幾百本書、或者幾千本書，可以看得出來的；必要有機敏的會心，確實地心得，才可以領悟出來。我常說中國人讀書，越讀越糊塗，大概就是這一類的人！”

8、“我們考察今日世界的大勢，洞觀古今的潮

流，人類社會需要三民主義，真是不可一日缺少。所以兄弟敢下一句斷言，我們中國國民黨的同志，對於三民主義，不必討論，只要求實行。”（註四十五）

三、關於民生主義之說明：

此一講演，為國父在 13 年 1 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發表。對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有簡要的解釋。現在列舉於後：

第三次對共產主義的批判八點：

1、“本總理前聞北京一般新青年，非常崇拜新思想，及聞俄國共產主義，便以此為世界極新鮮之主義。”

2、“遂派代表往俄，擬與之聯合，並代俄宣傳主義，認定共產主義與民生主義為不同之二種主義。”

3、“各代表抵俄後，俄人對之，便極力稱讚國民黨所主張之三民主義。”（編按：是俄共在以“革命的兩手”欺騙國民黨。請參見《誰是新中國》一書及有關資料。）

4“故彼黨（即指，中國共產黨，）遂悉心研究三民主義，認定救國大計，非此不可；於是誠心悅服本黨三民主義，改共產黨員為國民黨員。”（編按：是中共黨人為俄共教唆而欺騙國民黨人。請參見《誰是新中國》一書及相關資料）

5、“就是非而言，本黨既服從民生主義，則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均包括其中。（原文並有圖表示各種主義連帶範圍，茲從略。）”

6、“民生二字，為數千年已有之名詞，至用之於政治經濟上，則自本總理始，非獨中國向無所聞，即在外國，亦屬罕見。”

7、“數年前有一服從馬克思主義的學者，研究社會問題，發現社會上之生計問題，與馬克思學說有不合之點，於是提出疑義，逐條並舉，徵求同志解答。歷年一年之久，而就征者無一人，乃將其著作公之於世，名之曰，歷史之社會觀。其要點大意有：在今日社會進化中，其經濟問題之生產與分配，悉當以解決民生問題為依歸云云。由此可見本總理創民生主義之名詞，至今已有學者贊同矣。由此可知民生二字，實已包括一切經濟主義。”

（8）“至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時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後為英國戈登所破壞，故今日無從考

證。”（註四十六）若俄國今日所行之政策，實非純粹共產主義，不過是為解決民生問題的政策耳。（註四十七）（編按：因時代之局限，此解釋不確。）

四、民生主義講演

第四次對共產主義總批判十四點

民國 13 年 8 月 3 日與 10 日，國父講演民生主義之第一第二兩講，此為國父第一次對民生主義的理論，作詳盡的有系統的說明。對於共產主義中馬克思一派的理論，作詳盡的有系統的批判，亦為第一次。這裏我提出十四點來證明國父對馬克思主義批判的態度：

1、唯物史觀之錯誤

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國父認為“人類求解決生存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才是歷史的重心。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不是歷史的重心。”（註四十八）

2、階級戰爭是社會的病態

“馬克思認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為因，社會進化為果。”（註四十九）國父以為“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相衝突。（註五十）……所以馬克思只可說是一個社會病理學家，不能說是一個社會生理學家。”（註五十一）

3、勞動造成盈餘價值說之謬誤

馬克思“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於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份子的勞動”（註五十二）國父以為“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僅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消費方面，都有多少貢獻。”（註五十三）

4、反對加入國會不合事實

馬克思主張“共產黨要完全本階級戰爭的原理，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社會問題。……至於黨員加入國會去活動，是共產黨所不許可的，以為這不是科學的方法。但是後來德國的共產黨，通同走到國會去活動，延至今日，英國工黨又在君主立憲政府之下組織內閣。照這些事件看來，世界上所發生許多的政治經濟變動，都不是第一次國際共產黨所定的辦法。”（註五十四）

5、資本家的消滅之判斷錯誤

馬克思“以為資本發達了之後，便要互相吞併，自行消滅。”（註五十五）但是從他至今，有了七十多年，我們所見歐美各國的事實，和他的判斷剛剛相反。（註五十六）……各國資本家，不但不消滅，並且更加發達，沒有止境。”（註五十七）

6、爭取勞工保障方法判斷錯誤

“當馬克思時代，英國工人要求八點鐘的工作時間，用罷工的手段，向資本家要脅。馬克思便批評以為這是一種夢想，資本家一定是不許可的；要得到八點鐘的工作時間，必須用革命手段，才可以做得到。到了後來，英國工人八點鐘的要求，不但是居然成為事實，並且由英國政府定為一種通行的法律，令所有全國的大工廠、銀行、鐵路中的工人，都是工作八點鐘。”（註五十八）

7、剝削工人多得盈餘價值之違反事實

“照馬克思的研究，他說資本家要能夠多得盈餘價值，必須有三個條件：一是減少工人的工錢，二是延長工人的工作時間，三是抬高出品的價值。”（註五十九）但是用美國最賺錢的福特汽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就是……縮短工人工作的時間……增加工人的工錢，……減低出品的價格。”（註六十）

8、商人先消滅之預言錯誤

“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精華，是說資本家所得的錢，是由於剝削工人的盈餘；由此便推到資本家生產要靠工人，工人生產要靠物質，物質買賣要靠商人。凡是一種生產，資本家同商人，總是從中取利，剝奪工人的血汗錢。由此便知資本家和商人，都是有害於工人，有害於世界，都應該要消滅。不過馬克思的批判，以為要資本家先消滅，商人才能夠消滅。現在世界天天進步，日日改良，像以前所講的分配之社會化，是種新發明，叫做合作社（註六十一）……現在合作社發生，商人便先消滅。”（註六十二）（編按：由於時代的局限，所言不確。）

9、忽視消費社會之貢獻

“再照馬克思的學說，世界上的大工業要靠生產，生產又要靠資本家。這幾句話的意思，就是有了好生產和大資本家，應該是賺錢，可以大發展，便可

以賺錢。”但“現在是虧本，許多工人失業。”可知“實業的中心……是消費的社會，不是專靠生產的資本。”（註六十四）

10、各國還無完善辦法解決社會問題

“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能相同。我們中國學者，近來從歐美得了這種學問，許多人以為解決中國民生問題，也要仿效歐美的辦法，殊不知歐美社會黨解決社會問題辦法至今還是紛紛其說，莫衷一是。……在歐美常常大相衝突，各行其是。”（註六十五）解決社會問題的完善辦法，外國也沒有。況且辦法要以事實為根據，中外的情形不同，外國就是有好辦法，也不（一定）能在中國應用。所以我們不能不自己想辦法……”這是國父發明民生主義的動機。

11、革命手段不能解決經濟問題

“用革命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在俄國還不能說成功。俄國近日改變一種新經濟政策，還是在試驗之中，由此便知純用革命手段不能完全解決經濟問題。”（註六十六）外國既無先例可資參考。俄國冒險試驗又遭失敗，更可作我們的一種教訓（編按：這是“十月背叛”之後，面對俄羅斯共和國軍民的頑強護國戰爭，列寧為消滅俄國民主革命成果，為撲滅俄羅斯人民的護國護法火焰，更為了在革命名義下重建專制制度，所採取的臨時性“商業政策”。其後，一俟列寧成功地打敗了共和國，建立了列寧的黨主政權，俄國共產黨就立即取消了他的所謂新經濟政策，而且用殘酷鎮壓的辦法，實現了他的所謂“工業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請參見辛灝年文章——“從英法俄德護國護法的艱難歷史看大中華民國艱辛的護國護法歷程”以及相關資料）。

12、中共黨員不懂共產主義

“共產黨員也有不明白共產主義為何物，而常有反對三民主義的言論。但是這種無知妄作的黨員，不能歸咎於全黨及其黨中之主義，只可說是他們個人的行為。”（註六十七）“現在的，中共，黨員，大都不懂共產主義，所以更不能瞭解三民主義；無怪他們閉起眼睛來反對三民主義。”（編按：當時，國父在列強環伺、無一家支持中國國民革命的險惡環境下，由於蘇俄一再找上門來，表示要支持中國的國民革

命，實際是要利用中國的國民革命，來寄生和誘發中國的共產革命。國父雖有警惕，但為俄援，而不得不行權宜之計。這便是他在當時公開說話時，比較講究技巧的一個重要原因。）

13、馬克思的辦法在中國不適用

“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辦法，“要拿事實來做材料。如果單靠學理來定方法，這個方法是靠不住的。因為學理有真的，也有假的，要經過試驗，才曉得對與不對……科學上最初發明的許多學理，一百種之中，有九十九種是不能夠實行的，能夠實行的學理，不過是百分之一。……所以我們解決社會問題，一定是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註六十八）“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也就是共產主義。不過辦法各有不同。”（註六十九）（編按：這在當時，同樣是國父的策略性談話。）“我們講到民生主義，雖然是很崇拜馬克思學問，但是不能用馬克思的辦法，到中國來實行。這個理由很容易明白，就是俄國實行馬克思的辦法，革命以後，行至今日，對於經濟問題，還是要改用新經濟政策。俄國之所以要改用新經濟政策，就是由於他們的社會經濟程度還比不上英國美國那樣的發達，還是不夠實行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不可能的！”（註七十）（編按：顯而易見的是，國父的批評帶有相當的禮貌性。）

14、中國是要用思患預防的辦法

“現在一般青年學者，信仰馬克思主義，一講到社會主義，使主張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社會經濟問題；這就是無異，不翻北風，就懷人民，一樣的口調。不知中國今日是患貧，不是患不均。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辦法，提倡階級戰爭去打平他，但在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的階級戰爭和無產專制，便用不著……我們主張解決民生問題的方法，不是先提出一種毫不實用的劇烈辦法，在等到實業發達以求適用，是要用一種思患預防的辦法，來阻止私人的大資本，不是先穿起大毛皮，再來希望翻北風的辦法。”（註七十一）

總結

綜上所說，可見三民主義的產生，首先是民族主義，次為民權主義，最後為民生主義。這是以世界革

命先例及中國革命文獻為根據的；國父自己也是如此解釋。

就民族主義說，雖在實踐上犧牲本黨多少先烈的生命，耗費國父一生大部分的精力與時間，但在理論方面，國父始終認為發自種性，淺顯明白，如人之於父母，必能認識瞭解。但是歐洲自十八世紀以來，多少民族主義的學者，有主張從文化宗教著手，有主張從軍事武力著手的，亦有主張應與自由主義結合的，亦有以為就是功利主義的，亦有強調集權制度的，亦有忠於人道主義與世界主義的。凡此種種不同的理論，只有國父以過人的智慧、超卓的學識，能夠棄其糟粕，擷其精華，創造出完善的民族主義，以適應中國共和革命的需要。

民族主義的產生和演進，為說明便利起見，分為五個時期：第一、為民族思想潛伏時期。第二、為決心推翻清政府並鼓吹民族革命時期。第三、為立黨宣傳充實理論並開始革命時期。第四、為擴充組織並積極發動革命時期。第五、為民族主義的理論擴展與完成時期。在五個時期中，國父的民族主義的重要理論，自第四時期即已開始，而最完備的則為第五時期中民族主義六講。

民權思想發生的大本營，當推法國；然孟德斯鳩與盧梭所主張者，不過“三權分立”與“天賦人權”之說。以與國父民權主義的產生和演進，可分為三期：第一、為民權思想萌芽與組黨提倡時期；第二、為充實理論與積極宣傳時期；第三、為理論正式發表與完成時期。我們研究時所應注意的，為第三時期中之遺教，如：“同盟會宣言”、“五權憲法”、“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國民政府建國大綱；而最完備的則為“民權主義”六講。民權主義中許多理論，均為國父在政治學上的偉大發明。

民生主義就是歐美的社會主義，起自產業革命以後。但是歐美各家社會主義，理論均不一致，辦法各有不同。國父研究結果，認定無一可以適用於中國，因自創造民生主義。民生主義的產生與演進，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第一、為認識討論時期；第二、為研究創造時期；第三、為宣傳鼓吹時期；第四、為解釋批判時期。第三期中，民生主義之理論與方法，實已具備。如 1906 講演之“三民主義與中國民族之前途”，民元講演之“民生主義與社會革命”，“社會

主義之派別與方法”等，均為極為有價值之遺教，至民國八年以後，中國思想界混入頑梗偏激之共產學說，因此，國父對於民生主義遂作進一步的解釋，對於馬克思主義的缺點，刀摘要的予以糾正。

國父之三民主義原稿不幸被毀，雖於民族主義六講自序中勉國人以“本此基礎，觸類引伸？？遺，更正條理，俾成為一完善之書。”但實際上吾人對於歐美哲學、政治、經濟學說所獲之進益愈多，則欽仰三民主義之精湛博大之心亦愈切。值茲國父誕生一三八周年之日，亟盼全國上下謹遵國父遺教之指示，集全民之智慧，在實施上力求完善，早日完成民主和平統一大業，以期無負國父遺志。

本文重要參考書

國父全集

國父年譜

戴季陶：總理著作有講演記錄要目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

崔書琴：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

Fransis Coker: Resent Political Thoughts, Chop. xv Empirical Collectivism 1934

Paul M. A. Linberger: The political Doctrine of Dr. Sm Yet-sen, 1937

追悼孫文挽聯



何 彤 收 集

孫中山先生辭世後，國人寫有大量的挽聯，充分表達了對中山先生的悼念之情。現收集整理如下，供大家賞讀。

先生去矣，非我族類多啼笑

吾輩哀哉，為他壓迫盡悲鳴

——反帝國主義大同盟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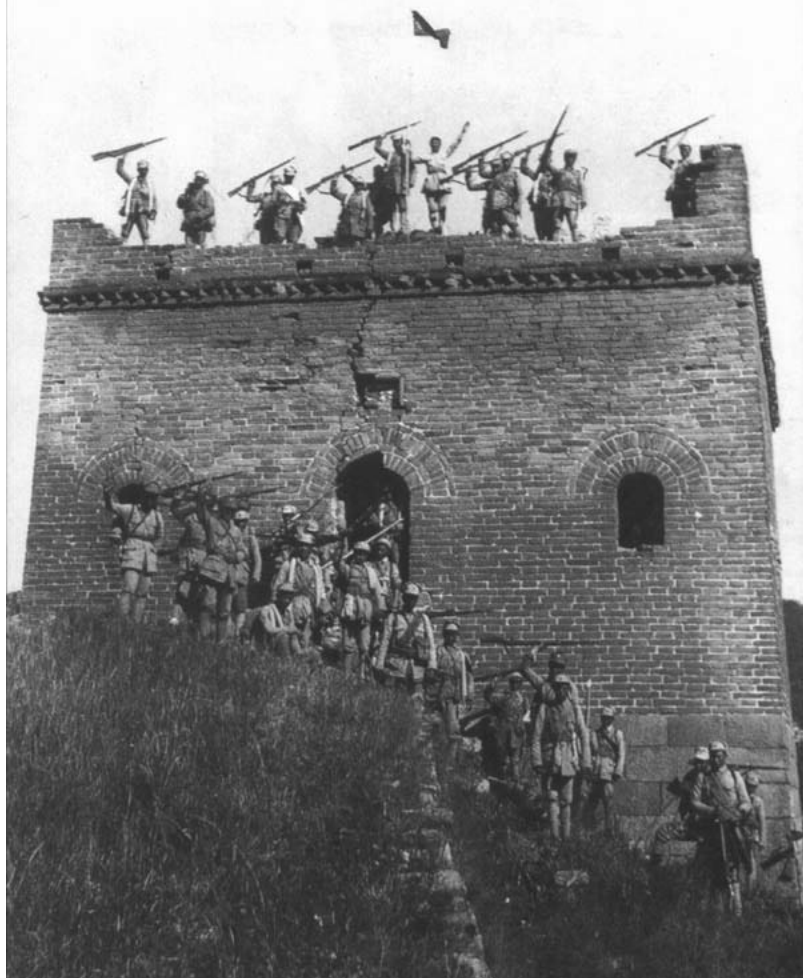
總四十年胼手胝足之工，直是為生民立命，為天地立心，歷程中，揖讓征誅，舉同塵土

流九萬里志士勞民之淚，始知其來也有因，其生也有自，瞑目後，精神肝膽，猶照人寰（于右任）

（待續）

中日決戰

蔣介石領導浴血抗戰記實



選載之二

大陸 孫挺信

第三章 初期反攻

1

1938年11月25日。

蔣介石趕回南嶽衡山，主持召開軍事會議。

軍事會議的主要議題是總結第一期作戰的經驗教訓，確定第二期抗戰的戰略方針。

蔣介石說，抗日戰爭劃分為兩個時期，從蘆溝橋事變到武漢失守為第一期，此後到中日戰爭結束為第二期。在第一時期，我們雖然失掉了許多土地，就

一時的進退而言，表面上我們敗了，但從整個長期的戰局上講，我們不但沒有敗，而且是完全成功的。因為，我們在祖國遼闊的疆土上與敵周旋，使敵人多次欲與和決戰，消滅我軍主力，以求速戰速決，徹底打敗中國的企圖，徹底落空和失敗。

蔣介石說，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們雖然付出了很大代價，但是我們也使日軍付出了史無前例的慘重代價。據統計，在這期間日軍共傷亡四十四萬七千多人。在第一期作戰中，我國軍隊廣大官兵以國家民族的利益為最高利益，出現了像佟麟閣、王銘章、郝夢齡等以身殉國的動人事蹟。使一貫輕視中華民族和中國軍隊的日本侵略軍，不得不為我國軍人的犧牲精神懾服驚訝。也使世界友邦和世界人民對中國軍人的犧牲精神發出讚嘆……

在軍事會議上，蔣介石和將領們分析了敵我雙方的軍力情況。認為：日軍佔領武漢以後，因兵力不足，補充困難，已無力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但是，敵陸海空軍種和兵種齊備，訓練有素，兵器配備較充足，火力強大，戰鬥力仍很強。

鑒於以上情況，第二期作戰，將是敵我相持時期，也就是說在這個時期，日軍不可能再深入到國民政府的後方；中國軍隊也不可能一下打敗日本人，將其趕出中國去。這無疑是明智的判斷。

蔣介石基於以上對形勢的判斷和綜合全體到會將領們的意見，提出了中國軍隊第二期作戰的指導方針和謀略：

連續發動有限度這攻勢與反擊，以牽制消耗敵人；策敵後之遊擊部隊，加強敵後之控制與擾襲，化敵人後方為前方，迫敵局促於點線，阻止其全面統治與物資掠奪，粉碎其以華制華、以戰養戰之企圖；同時，抽出部隊輪流整訓，強化戰鬥力，準備總反攻。

為扶持和培養敵後遊擊力量的民展壯大，蔣介石在這次軍事會議上的決定，正面第一線戰場上，要不斷地主動地出擊日軍，將日軍主力和註意力都吸引到前來，以此減輕敵後遊擊部隊的壓力。

爲了便於指揮作戰，蔣介石對軍隊體制進行了改革。廢除了兵團、軍團兩個層次，以軍以爲作戰的基本單位；取消西安、廣西、重慶等行營，另設天水、桂林兩個行營。以程潛、白崇禧分任行營主任。在最高統帥部之下，由程、白二將軍分別負責指揮南北兩大戰場。

會上，蔣介石重新劃分了全國戰區，調整了兵力部署：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衛立煌。

兵力：第 2、第 3 集團軍。共 12 個步兵師，一個步兵旅、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和其他特種部隊。

負責防守河南及安徽一部。

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

兵力：第 4、第 5、第 6、第 7、第 14、第 18 六個集團軍。共 32 個步兵師，14 個步兵旅，五個騎兵師，三個騎兵旅和其他特種部隊。

負責防守山西及陝西一部。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

兵力：第 10、第 23、第 25、第 32 四個集團軍和新編第 4 軍。共 32 個步兵師，2 個步兵旅，以及其他物種部隊。

負責在蘇南、皖南和浙閩兩省開展遊擊戰。

第四戰區司令長官：張發奎。

兵力：第 9、第 12、第 16 三個集團軍。共 18 個步兵師，2 個獨立步兵旅和其他特種部隊。

防地：廣東、廣西。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

兵力：第 2、第 22、第 29、第 33 四個集團軍，豫鄂皖邊區遊擊總隊。共 26 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和其他特種部隊。

防地：甘寧青及綏遠地區。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陳誠（薛岳代理）。

兵力：第 1、第 20、第 19、第 27、第 30、第 31 六個集團軍，湘鄂贛邊區遊擊總隊。共 52 個步兵師和特種部隊、遊擊隊。

防地：湖南、鄂南、贛省一部。

第十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

兵力：第 34 集團軍等。共 9 個步兵師，一個步兵旅，一個騎兵師，一個騎兵旅和其他特種部隊、保安部隊。

防地：陝西。

蘇魯戰區部司令：於學忠。

兵力：7 個步兵師和特種保安部隊，遊擊部隊。

防地：蘇北、山東遊擊區。

冀察戰區總司令：鹿鍾麟。

兵力：5 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和遊擊部隊。

防地：冀察方面。

全國兵力總計：250 個步兵師，29 個獨立步兵旅；13 個騎兵師，10 個獨立騎兵旅；其他特種部隊和遊擊部隊若干。

僅步兵師來看，經過一年多的抗戰，不但沒被日軍消滅，反比 1938 年 1 月的 210 個步兵師，多出 40 個師。中國軍隊在對日作戰中，得到提高和加強。

蔣介石命令：長江方面各戰區部隊，從 1939 年初開始，分期分批整頓輪訓，補充兵員裝備，到 1939 年底，應全部整訓結束，準備反攻。

2

1938 年 11 月上旬。

當蔣介石在南嶽召開軍事會議的同一時間，在東京，天皇正召開大本營軍事會議。中心議題是分析中國在武漢、廣州失守以後的形勢，制定日軍對中國作戰的方針策略。

天皇對形勢的判斷如下：

帝國於 1938 年秋季，以獲取結束戰局的時機爲目的，實施攻佔廣州及武漢的積極作戰，開取得了顯赫戰果。但判斷蔣政權依然迷夢未醒，殘存於西邊數省，力圖恢復其戰力，建設新的補給路線，且在法屬印度支那尋求補給港口，繼續堅持抗戰以挽回頹勢。

然而，在已喪失中原逃往內地，以及失去主要水陸交通線、豐富資源和大半人口的情況下，我方如採取適當的施策，即使不能加深其內部崩潰，但至少也可使之淪爲地方政權。因此，從戰略角度可能認爲帝國已經粉碎了抗日的中國政權，今後已進入實施政略進攻、取得美滿結果的階段。因此，爲即將誕生的新中國中央政權創造良好條件，支援其成長，是我軍爲達到戰爭目的的重要作業。

對華戰爭的本質屬於持久戰，對淪爲地方政權的蔣政權，與其一味以武力深入窮追，莫如保持必要的戰力，向建設新中國邁進……

天皇和大本營對形勢的估計確實太樂觀了些。在他們看來，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已經降格為地方小政權。同時，他們尚有力量一直進攻下去，只是覺得一味深入窮追沒意思，才停下來不追不打，而專心建設「新中國」。

實際上，當時日本陸軍在國內的兵力，僅有一個近衛師團，完全唱空城計。而在中國已經配置了 24 個師團。（1939 年底，在華日軍已達 25 個師團，和 20 個獨立混成旅團，合計換算為 35 個師團，總人數為 922390 人。）完全喪失了繼續進攻的能力。日本某些戰略家也不得不承認，對華作戰未能殲滅中國軍隊之主力即已達到攻擊的極限。

根據天皇和大本營對形勢的判斷，日本陸軍省於 11 月 18 日起草了攻佔武漢以後，中日戰爭的戰略指導方針。其核心之點為：

第一、日軍從戰略進攻階段轉變為長期持久戰階段。

第二、日軍應採取局部作戰，以確保佔領區。今後的主要任務是「自主指導新中國建設。」

日本方面用主要精力在佔領區扶持新的中央政權，其目的正如蔣介石所估計的那樣，是爲了達到以華制華，以戰養戰。

日軍要重建立一個全國性的中央政權，必然要物色一個合適的人選。他們看中了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大親日派汪精衛。

在日本方面看來，汪精衛自清末以來一直追隨孫中山革命，很有些德高望重的份量，現在又在執行的國民黨中身居要職，對中國中上層人士有號召力。只要他一出馬收拾中國這殘局，中國上下必然熱烈擁護。待一個以汪精衛爲首的「新中國」一建立，就把蔣介石的抗日政府孤立起來，日本征服中國的大業，也就圓滿完成。

一貫反對以武力與日本相對抗的汪精衛，在武漢、廣州失陷之後，其反對抗戰的意圖更加露骨。他認爲中國再打下去，用不了多久必然全部變成日軍的佔領地。不如在尚未徹底失敗之前，與日媾和，尚能保持一些力量，爭取一些「自立」的條件。待講和了，日軍撤走了，中國在親日的幌子下奮發圖強，再行建設，再爭取完全的獨立自主，再與外強爭個高低。但是，在國人積極主張抗日到底，在世界上許多

國家對抗戰鼓勁加油的一片喝彩聲中，汪精衛自感無法說服蔣介石，更沒有力量左右執政的國民黨的抗戰路線。因此，決心孤註一擲，挺身而出「收拾殘局」，走「保種保民」這一條「和平救國」的道路。

1938 年 10 月下旬。

汪精衛暗中派親信高宗武、梅思平去上海與日本特務影佐禎昭、今井武夫等到人密商罷戰媾和之事。10 月 20 日，雙方達成一致意見，即清精衛由重慶出走，然後，汪、日雙方相互發表和談聲明。

11 月 30 日。

天皇批准了「調整日華新關係方針」。基本內容爲「新中國」承認「滿洲國」；華北、蒙古爲日華軍事合作特區；長江中下游地域和華南沿海爲日華經濟合作特區；規定「新中國」之政權形式爲分治合作。在附屬條款中，還有「中國應賠償事變爆發以來日本國民在中國所蒙受之權利利益的損失。」

12 月 18 日。

汪精衛和夫人陳璧君以及陳公博、周佛海、林柏生、陶希聖、曾仲鳴等人，趁蔣介石到陝西武功召開軍事會議之機，從重慶乘飛機，經成都到達昆明，在雲南省主席龍雲的幫助下，包租一架飛機逃往越南河內。

12 月 21 日，陝西武功。

蔣介石正在主持軍事會議，向西北將領們傳達南嶽軍事會議精神，突然接到行政院副院長張群從重慶打來的民報，說汪已去河內與日方商談和平。

蔣介石見電十分吃驚，因汪精衛此舉，弄得不好會使國民政府分化瓦解，使抗日陣線精神崩潰。他急電雲南省主席龍雲，詢問詳情。並讓龍雲轉交他給汪精衛的電報，勸汪回國，勿搞和談之事。蔣介石又急電正在河內進行國事活動的外交部長王寵惠面會汪，力促汪醒悟回國，不要被敵人的「和平」所利用。

汪精衛拒絕回國，決意尋求「和平救國」之路。

蔣介石害怕因汪出走與日和談之事，引起人心浮動，也害怕家醜外揚，命令有關方面，嚴密封鎖消息。

12 月 22 日。東京。

日本方面得知汪精衛已順利出走河內，頓時大喜過望。內閣首相近衛文磨發表聲明，尊汪精衛爲中國

的有卓見之士，把漢奸勢力稱作復興氣勢。近衛聲明說：

日本政府，本年曾一再聲明，始終一貫地以武力掃蕩抗日之國民政府，同時與中國同感憂慮並與有卓見之士合作，為建設東亞新秩序而邁進。

現在感到中國各地復興氣勢蓬勃而起，建設趨勢日盛一日，當此之時，政府向國內外闡明與新生中國調整關係之總方針，以期徹底瞭解帝國之真意。

日滿華三國應以建設東亞新秩序為共同目標而聯合起來，共謀實現睦鄰友好，共同防共及經濟合作。

……

12月24日。重慶。

蔣介石鑒於日本方面已公開向汪精衛伸出和談橄欖枝，汪精衛潛去河內的消息又不脛而走，世界輿論嘩然，而且各執己見，眾說紛紜。特別是德國廣播的消息說，汪某是代表國民政府和軍事委員會前去與日本談判和平問題的。蔣介石不得不在一定場合，在某些方面表明自己的立場觀點，以澄清事實真相。

是日，蔣介石召見美、英大使，正式通知兩國政府，汪精衛無權與任何人談判和平之事，請美、英相信，中國政府絕不會向日本投降。

12月26日，蔣介石借國民黨紀念週會之機，向黨、政、軍高級人員發表演講。在長達八千字的長文中，對近衛聲明進行強烈譴責和批駁，指出：近衛聲明是妄圖滅亡中國的毒計，是擾亂中國內部的陰謀，中國各界不要受其迷惑，而應抗戰到底。

在這裏，蔣介石已微妙地透露汪精衛叛逃之事。但他仍未公開譴責汪，以不致激化矛盾而使汪公開主和。他把汪精衛劃為「內部」一方，而給其留有後退的餘地。

為了「和平」處理汪精衛事件的危機，蔣介石又叫駐英大使郭泰祺「迅向汪先生懇勸」，阻止其與日本進一步靠攏。12月27日，郭大使打電報給汪精衛，力勸其「勿公開主和，表示與中央異志，免於敵人以可乘之機，並早日來歐，暫事休養。」

12月31日上午。香港。

《南華日報》發表汪精衛對日通和的《豔電》。該電以汪精衛及其團體的名義，向國民黨中央黨部、總裁蔣介石及中央執監委員會建議，中國與日本罷戰言和，與日本攜手防共。

12月31日下午。重慶。

蔣介石主持召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臨時緊急會議，討論對汪精衛的處理問題。會議一直開到深夜，於翌日作出決議：鑒於汪精衛值抗戰緊急之際，擅離職守，匿跡異地，散佈違背國策之主張。處處為敵人要求，曲意文飾，顛倒是非，為敵張目。違反紀律，危害國家。決定：將汪精衛永遠開除出黨，並撤銷一切職務。

汪精衛被開除了黨籍，撤了職，仍然還是公民。蔣介石又派谷正鼎前往河內，帶去給汪精衛、陳璧君、曾仲鳴三人的出國護照和旅費，力勸這三位「公民」赴歐。但汪精衛不買蔣介石的賬，破口大罵蔣介石，聲稱不上他的當。

1939年1月初。

蔣介石命令軍統局長戴笠立即派人暗殺汪精衛。

3月20日午夜，河內高朗街。

陳恭澍等七名軍統高手，縱身跳進汪精衛等人住所小院，制住看樓門衛，衝上二樓，用斧頭劈開汪精衛房間門板，見床下有人趴著，黑糊糊的，也分辨不出是誰，料定是汪精衛夫婦，便舉槍掃射。

軍統特務們以為大功告成，哪知，打死的卻是曾仲鳴夫婦。原來，汪精衛命不該絕，恰好在那天夜裏，他把自己的房間讓給了剛從香港趕來的曾仲鳴夫婦。

暗殺事件後，汪精衛等人在河內呆不下去了。日本方面也深恐失去這一重要人物。派影佐、犬養等人把汪秘密接出來，從海防港乘船去上海。

汪精衛潛出重慶後，為什麼不直接去日本或日軍佔領區，而要去法國的殖民地越南河內坐等懲罰？原來，他打算以國民政府要員身份，住到第三國土地上，策動雲南的龍雲和西南實力派將領跟著他揭杆而起，在雲南或兩廣建立「新中國」。然後代表中國與日本謀和。但是，他在那裏擔驚受怕，歷經險情，等了幾個月，西南地區毫無揭杆而起的跡象，這才打消了原來的念頭。

汪精衛乘坐著影佐提供的日本「北光丸」號船，離開越南，航行在無邊無際的南海上。現在，他不得不採用另一種辦法，走另一條路去建設「新中國」了。他深知，這一條路是國人所不恥的辦法：到日軍



台兒莊大戰主將左起：孫連仲、田鎮南、池峰城

佔領區的上海、南京去，在日本侵略者的刺刀保護下，建立他的「新中國」。

3

攻佔武漢以後，岡村寧茨的第 11 軍面臨著嚴重的局面。

如果把岡村寧茨的第 11 軍 30 多萬人馬駐紮的武漢這個點比作一個人的腦袋，那麼，合肥至蕪湖以下就如同這個人的身子，而從蕪湖至武漢這漫長的水路，就正好是這個人的脖子，一個被拉扯得特長特長的「脖子」。

這就是日軍佔領武漢以後的兵力態勢。

在岡村大軍的「脖子」上卡著一把「鋼刀」。這就是第九戰區陳誠、薛岳的 50 多個師的大軍。他們配置在江南鄱陽湖西面，以九宮山、幕阜山為依託，一直在積極整訓，準備反攻，隨時可能揮刀斬斷岡村大軍的「脖子」（長江水路交通線），使武漢日軍陷入重圍死地。

武漢西、北方，更有李宗仁第五戰區的 30 多個師，在靠近日這第一線的隨縣一帶地區構築陣地，窺視近在眼前的武漢城。這支大軍恰如一把高舉著的鐵錘，隨時可能砸向岡村寧茨大軍的「腦袋」。

岡村寧茨將軍很快就感到被這一「刀」一「錘」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伸不出腿去。遂竭力向中央統帥部請求補充兵員彈藥，增加戰力，發動大的進攻，向外擴伸，驅除這一「刀」一「錘」的威脅，以確保武漢佔領區的安全。

1939 年 2 月中旬，東京。

日軍大本營陸軍部閑院宮參謀總長和陸相杉山元等人認為，岡村寧茨中將的意見不無道理，因為在未取得自給自足、以戰養戰之前，長江水路交通就武漢幾十萬日軍的生命線，必須確保。而在「刀」和「錘」的威脅中，以「刀」的威脅為重。於是，決定發動南昌會戰。

天皇批准了此次進攻作戰，並派教育總監西尾壽造大將和陸軍大臣板垣征四郎中將來華主持協調這次作戰。

岡村寧茨得到大本營進攻南昌的命令，立即著手調動集結部隊，抓緊進行戰前準備。

2 月 28 日。重慶。

蔣介石和統帥部的將領們，已從武漢日軍集結的種種跡象中，正確判斷出：日軍第 11 軍將進攻南昌。當即電令第九戰區代理司令長官薛岳將軍：

速將武長路上可移動之兵力增進永修、武寧一帶，而主力出擊部隊應用於武寧方面。

3 月 8 日。蔣介石、陳誠等人根據日軍的動向，判斷敵將於 4 月份發動進攻，於是決定先敵下手，發動四月攻勢。制定了「四月上旬先期制敵，禦敵於修河以北，潦河以西」的進攻作戰計劃。並於當日下達作戰方案：

（一）、第九戰區為確保南昌及其後方聯絡線，決定先發制敵，轉取攻勢以摧毀敵之企圖攻擊之準備，應於 3 月 10 日前完畢預定攻擊，開始日期為 3 月 15 日……

但是，當時第九戰區部隊正在整訓之中，又無車船運兵，部隊機動性極差，調動頗感困難；又加上南昌地區為第九戰區和第三戰區的結合部，涉及兩個部隊的協同作戰。日軍發動南昌會戰的另一個目的，就是企圖佔領南昌，割斷三、九戰區的聯繫。

由於以上原因，貽誤了蔣介石和陳誠關於在 3 月 10 日前完成集結部隊，並進入攻擊態勢，於 3 月 15 日發動進攻的命令。

戰機轉瞬即逝，教訓慘痛。

日軍卻憑藉其大量的汽車、艦船和優良的裝備，迅速調動集結了第 101、第 106、第 116、第 6 等四個主力師團的兵力，以及重炮兵四個半聯隊，戰車一個半聯隊和海軍、空軍一部，共十幾萬人，另有偽軍一萬人。於 3 月 16 日全部進入攻擊狀態。

3 月 17 日。拂曉。

岡村寧茨一聲令下，日軍分三路向鄱陽湖西面中國軍隊各部全線發動進攻。

由於日軍贏得了時間，中國軍隊原計劃的四月攻勢成泡影！各部隊措手不及，倉促應戰，陷入了全線被動的狀態。

左路日軍。

第 116 師團、海軍陸戰隊一部，配上大、小軍艦三十餘艘、汽艇五十多艘、飛機多架，從鄱陽湖北面撲來，對吳城守軍施以立體包圍。守軍預 5 師和第 32 師一個團拼死抵抗，所有預備隊都拉到第一線作戰，仍無法阻擊優勢日軍的猛烈攻擊，全城被日軍炮火的飛機炸成一片廢墟。戰至 3 月 23 日，吳城失守。

右路日軍。

第 6 師團和軍直轄炮兵、戰車、騎兵各一部，在飛機的掩護下，由箬溪向武寧東北守軍第 73、第 8 兩軍進攻。激戰九晝夜，雙方死傷慘重，日軍第 6 師團之 47 聯隊被全殲。在棺材山的大規模肉搏戰中，中國軍隊之第 89 團生還者僅五人，餘皆壯烈犧牲！

中路日軍。

第 101、第 106 師團數萬人，在兩百多門大炮的狂吼聲中，強渡修水河，突破守軍防線，鋪天蓋地朝南昌掩殺過來。3 月 26 日，日軍迂迴包圍了南昌城，並在南昌城和市郊與中國第 32 軍一部、南昌市警備隊展開激烈巷戰和爭奪戰。全城火光沖天，狼煙四起，喊殺聲震天。大街小巷，無處不在展開慘烈的肉搏戰。

3 月 27 日夜。

南昌城停止了槍聲，日軍完全佔領了市區。

在三路日軍會攻南昌之時，第九戰區第 31 集團軍總司令周磊將軍指揮本部十一個師，和關麟徵第 37 軍，對湘東北和鄂東南岳陽、臨湖、崇陽、通山地區之敵，主動出擊，意在牽制日軍兵力。雖斃傷日軍約三千人，但終因此舉純屬「遠水」，無法救南昌之「近渴」。

1939 年 4 月 16 日。

蔣介石命令第九戰區反攻，限令薛岳奪回南昌。蔣介石的戰略計劃是「先以有力部隊進出南潯鐵路，遮斷日軍後方聯絡線，再攻取南昌。」

薛岳根據蔣介石的命令和反攻方案，立即調集部隊，組織實施反攻。

蔣介石任命第 19 集團軍總司令羅卓英將軍為反攻總指揮。反攻部隊分為左、中、右三路。

左路由第 1 集團軍人總司令高蔭槐指揮第 58、第 60 兩軍，向靖安、安義、奉新之敵進攻。並負責切斷日軍後方交通線。

中路以宋肯堂第 32 軍等部，沿贛江西岸北上，直取南昌。並以一部在西山牽制虯嶺、生米街、牛行之敵，切斷西山周圍日軍的交通線。

右路由俞濟時第 74 軍東渡贛江，從東面進攻南昌。

4 月 21 日。

三路大軍開始反攻。

第 49、第 74 軍等部自南昌南方開始進攻，激戰十餘日，未能接近市郊；第 74 軍亦未能渡過贛江。

高蔭槐第 1 集團軍所部向南昌西北方進攻，惡戰十多天，也未能接近南潯鐵路線。

4 月 23 日。

蔣介石命令第三戰區上官雲相第 32 集團軍參加反攻南昌。

上官雲相將軍以第 16 師和預 10 師一部由贛江與撫河中間，從南昌正南方進攻，該部攻勢十分勇猛，很快攻抵南昌市郊。

日軍調動大批飛機助戰，敵機群對市郊反攻部隊進行瘋狂掃射轟炸。

此時，由於南潯鐵路未及時切斷，日軍從上海抽調的海軍陸戰隊數千人，乘坐列車，風馳電掣般趕到南昌。海軍陸戰隊接捨近求遠南昌城防，使第 101 師團主力得以騰出手來，對市郊進行猛烈反擊。

上官雲相的部隊是一支十分驍悍的勁旅，雖勢單力薄，卻在南昌周圍與優勢之敵反復爭奪拼殺，鏖戰一週餘，雙方成膠著狀態。

5 月 3 日。

上官雲相集團軍所部第 29 軍軍長陳安寶中將，接到反攻南昌的命令，立即指揮預 5 師、第 26 師和第 79

師，火速向南昌開進。部隊在荏港渡過撫河，投入戰鬥。

5月5日深夜，陳軍長率領軍警衛部隊和第26師兩個直屬營向南昌疾進，在高坊附近遭日軍包圍，激戰半夜，數次突圍未能成功。天亮以後，日軍增援部隊趕到，集中炮火猛烈轟擊，並出動六架飛機大肆轟炸掃射。陳部官兵傷亡慘重，數度突圍不成。戰鬥到5月6日下午五時十分，陳軍長在指揮部隊作戰時，突遭敵機俯衝掃射，身中數彈，壯烈殉國。

陳寶安將軍自蘆溝橋事變以來，從華北戰場到上海會戰，轉戰於大江南北。繼後，率部在江浙水鄉展開轟轟烈烈的敵後遊擊戰，指揮所部抗日健兒出沒於河湖港汊，予敵以致命打擊。他身經百戰，屢建奇功，因功勳卓著，於1938年7月，由師長擢升為第29軍這支在國內外享有殊榮的抗日英雄部隊的中將軍長。

5月7日。

正在策劃組織反攻南昌的薛岳將軍，驚聞陳寶安軍長以身殉國的噩耗，悲痛欲絕，淚如雨下。

反攻南昌的戰鬥已進行了半個多月。薛岳將軍面對曠野之上屍山血海，深知已無法爭奪戰場主動權，無法克復南昌。遂決心主動承擔南昌失守責任期望統帥部下令停止反攻，以減少謂犧牲。當日，向蔣介石去電：

寶安南潯苦戰，疊挫凶鋒。今寶安壯烈殉國，傷悼已深，敬請重恤。

岳指揮無方，南昌未克，而喪我忠良，敬請重罰，以慰英烈。

蔣介石於接到薛岳電報當天，向薛岳和第三戰區顧祝同上將回電：

國軍對南昌之攻擊兼旬，師久無功，屯兵堅城之下，敵已有備，難以奏效。令第三、第九兩戰區停止對南昌之攻擊。

5月9日。中國軍隊已完全停止攻城，南昌會戰結束。此次會戰，日軍傷亡共計：二萬四千餘人；中國軍隊傷亡總計：五萬一千三百七十八人。

岡村寧茨在發動對南昌進攻的同時，於4月30日，又集結第3、第13、第16三個師團和騎兵第4旅團，共十餘萬人兵力，配以輕重炮二百餘門，戰車百餘輛，發動了對五戰區的進攻，他仍然採取先發制人

的突襲手段，一舉突破第五戰區防線。佔領了隨縣、棗陽地區。

李宗仁命令湯恩伯和孫連仲等集團軍，於5月15日奮起反攻，同日軍激戰數日，於5月19日和23日，先後克復棗陽、隨縣等地。

是役，殲敵四萬餘名。第五戰區將士亦有重大傷亡。

4

岡村寧茨大軍雖然攻佔並保住了南昌，但中國第九、第五兩戰區對武漢的夾擊包圍態勢並未消除。看來僅以武力在戰場上硬拼，岡村大軍是無法解脫被包圍夾擊的被動局面的。於是，岡村寧茨這位日軍的武將，潛心研究了以武漢為中心的華中地區的地理特點和中日兩軍兵力態勢，以及中國軍隊的心理狀況等問題。

1939年夏季。

岡村寧茨完成了他的研究成果，制定了對中國第五、第九兩戰區施以政、戰謀略的主案和指導大綱。其核心思想是：以政治、軍事和派遣特務等各種手段，策反雜牌軍，孤立以黃埔軍校少壯系為主的中央軍，然後殲滅中央軍。

其計劃要領是：

一、結第五戰區的敵軍（指中國軍隊），置重點於策動廣西、四川、軍隊反叛，借此使全戰區走向崩潰；其次，對該戰區的中央軍及其旁系軍加以影響，也要不失良機進行工作。

二、對第九戰區之敵（指中國軍隊），可對四川軍及遊擊旁系軍施以懷柔工作，對其他軍隊（直系軍以外）進行積極的謀略宣傳，引導其喪失戰爭意志和走向投降、逃亡……

三、任務分擔：第6師團對楊森軍策反工作；第33師團對王陵基軍策反工作；軍特務部擔任對五戰區的四川軍的策反謀略宣傳，為此應接受有關師團長的援助。

在大力開展策反工作的同時，岡村寧茨又制定了《江南作戰指導大綱》，將第九戰區的中央軍列為武漢日軍的打擊重點。大綱的中心意圖是：以奇襲手段，儘量在短期內殲滅中央軍。

1939 年入秋以後。岡村寧次集中了第 6、第 33、第 101、第 3、第 13 等師團，及長江艦艇三百餘艘，海軍陸戰隊一個聯隊，飛機百餘架，化學兵隊若干，約十八萬之眾，準備從贛北、鄂南、湘北三個方向同時進攻，圍殲第九戰區中央軍精銳，並計劃於 9 月 30 日以前佔領長沙城。

第九戰區薛岳將軍，新近被蔣介石任命為戰區司令長官。他曾因失守南昌受到蔣介石的嚴厲訓斥。對於失守南昌一事，薛岳覺得臉上無光，有失自己作為主將的面子和自尊心，一直耿耿於懷，決心在長沙地區與敵人好好較量，以雪丟失南昌之恥。

在岡村寧次潛心研究第五、第九戰區情況時，薛岳也組織了一幫參謀人員，在長沙於潛心研究本地區的地理環境特點，日軍企圖，敵我雙方兵力、戰力、武器、裝備等等情況。1939 年夏季，薛岳和助手們對日軍將進攻長沙和進攻時的兵力部署作出了判斷，後來證明，他們的判斷基本上是正確的。他們的判斷要點有二：

第一、日軍將以主力從岳陽、通城方向南進，直取長沙城。

第二、日軍將以有力之一部，從南昌方向西進，以策應湘北主戰場。

薛岳基於以上判斷，確定第九戰區的作戰指導方針為：爭取外翼，後退決戰。

原來湘北地形十分特別。長沙城至岳陽間一百多公里的地段，右有幕阜山、九嶺山，自北而南側峙而立；左有八百里洞庭湖水作屏障；中間開成一狹窄的通道，卻有新牆河、汨羅河、撈刀河和瀏陽河四條水系，橫臥擋道。

薛岳將軍的爭取外翼，後退決戰方針，就是針對這一特殊地形確定的。他認為，在第一線的新新牆河與敵人決戰，則敵強我弱；在汨羅河與敵決戰，敵軍銳氣已減，敵我雙方將勢均力敵；若在撈刀河與敵決戰，敵已被拖得疲憊不支，就變成了敵弱我強。因此，他的作戰指導方針具體是：在新牆河、汨羅河地區，均採取節節抵抗，遲滯、疲勞敵人；將敵人誘至撈刀河、瀏陽河地區

進行決戰。同時，第九戰區主力，應避免被敵人包圍，力爭在動動中跳到側翼，相機出擊。

9 月 14 日。

南昌西面靖安、奉新、高安等地，日軍第 106、第 101 師團各一部，在飛機的配合下，向西進攻，拉開了第一次長沙會戰的序幕。

羅卓英指揮第 1 集團軍和王陵基第 30 集團軍在贛江以西，沿新喻、高安、秦新、靖安南北線從側面攻擊敵人。同時，另派部隊在渣津、修水等地阻敵西進。高安地區的戰鬥尤為激烈。

同時，通城方向。日軍第 33 師師團全部，向南猛攻。企圖突破幕阜山脈守軍，向南直插，配合岳陽方向敵之主力，圍殲守軍第一線新牆河地區中央軍第 15 集團軍。

第 27 集團軍楊森總司令指揮部隊，迎住敵人予以痛擊。敵第 33 師團猛攻數日，未能撞開楊森防線，遂改變主攻主向，於 9 月 20 日，以兩個聯隊的兵力，向東南移動，企圖尋找新的突破口。

9 月 23 日。

岳陽方面。日軍主力第 6、第 13 師團。從新牆河正面發動進攻。同時，以第 3 師團一部和海軍陸戰隊，在敵艦隊炮火掩護下，分乘汽艇若干，從洞庭湖水路迂迴，在新牆河及汨羅江口附近登陸，企圖從左翼迂迴包圍第一線守軍。此時，通城方向之敵已插入長壽街地區，對第一線守軍形成了三面攻擊態勢。

第 15 集團軍所部第 52、第 37、第 77 軍和一個遊



宜昌光復，軍民歡呼

擊縱隊，在關麟徵將軍指揮下，英勇奮戰，節節阻擊日軍的南進。

9月中旬。重慶。

陳誠和白崇禧已根據湘北戰情，擬定了死守長沙和主動放棄長沙兩個作戰方案，送呈蔣介石決擇。蔣介石聯想到日軍第 11 軍進攻南昌時的情況，那次，重慶統帥部作的是死守南昌和拼死奪回南昌的方案，結果，南昌沒守住，失了之後也沒奪回來，前線部隊卻爲了一城一池，損兵折將，付出五、六萬人的慘痛代價。有鑒於此，蔣介石牙幫一咬，定下決心：「取不守長沙方案。第九戰區避免與敵硬打硬拼，保存主力，相機殲敵。」

蔣介石派陳誠和白崇禧前往湘北，傳達統帥部不守長沙城的作戰方案，協助薛岳指揮作戰。

陳、白二位「欽差大臣」趕到湘北淞口，正值日軍主力大舉進攻，守軍第 15 集團軍正與日軍在新牆河、汨羅江一帶節節抵抗，節節後退，陳線仿佛成不支狀態。

兩位大員馬上向薛長官出示蔣介石給他的「綠牌」，令其放棄長沙。以爲這下可是救人於危難之時，定會使薛岳大大鬆口氣了，哪知，薛岳聽說蔣介石要他放棄長沙，竟頓然作色，質問二位大員：「我九戰區幾十萬大軍駐在湘北，竟然不守長沙，這軍人的職責哪去啦？」

陳誠和白崇禧都被薛岳的愛國之心所打動，但一來日軍進攻瘋狂，戰況險惡，二來蔣委員長有令，不敢不執行。所以，竭力相勸其執行統帥部命令。

薛岳已是將軍在外，「軍（君）」令有所不授，無論怎麼勸，他就是不執行那個不守長沙的命令。

日軍繼續傾全力向長沙方向猛攻。第九戰區各路大軍，按著薛岳的作戰計劃，繼續節節阻敵，節節後退。長沙仿佛已危在旦夕。

陳誠和白崇禧十分著急，一方面擔心九戰區精銳被敵包圍殲滅，或在長沙城下與敵拼光打完；另一方面也爲薛岳本人捏著一把汗，公開違抗統帥命令，稍有閃失，這小子的腦袋準掉無疑。那天夜裏，陳誠、白崇禧連續給薛岳打了九次電話，嚴令他立即執行蔣委員長的命令，馬上把長沙的守軍撤出，其他部隊也儘快作轉移。

薛岳在電話裏慷慨陳詞：「湖南所處戰略地位，關係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巨大，作爲軍人，我們應該發抒良心血性，誓與長沙共存亡！」

白崇禧副總參謀長耐心相勸：「正因爲湘省戰略地位重要，才配置九戰區長期持久守衛，如果因一座長沙失去主力，還怎麼長期堅持，現在已處於相持階段，相持階段的主旨在於保持實力，與敵相持，以圖總的反攻。來日方長，應儘量避免與敵死拼，與敵同歸於盡。要知道，日軍一直求之不得的是速戰速決。南昌會戰的教訓就該吸取。」

一提起南昌那一戰，薛岳就覺得心頭被猛地戳了一刀。衝口喊道：「這裏絕不是南昌，長沙城我是守定了！」

白崇禧大爲光火，也對著話筒喊了起來：「不要感情用事嘛！服從命令是軍人的天職！」

薛岳聲稱就是砍他腦袋，這長沙城也絕不放棄。

兩人在電話上大吵起來。

陳誠覺得這樣吵下去，更有礙軍機。他與薛岳共過事，瞭解這人堅毅的軍人性格，不輕易下決心，但當他一拿定主意，就是掉腦袋也斷難改變。再說，第九戰區部隊和作戰情況，人家作爲司令長官比中央大員要熟悉得多，統帥部的決定只是根據理論得出的。現在也應該聽聽他的意見。

陳誠從吵得面紅耳赤的白副總長手上搶過電話筒，問薛岳，「守長沙你有把握嗎？」

薛岳的回答相當乾脆、肯定。

陳誠又問目前九戰區部隊的情況如何。

薛岳報告說：「除少數部隊失去聯繫外，絕大多數都在英勇作戰或有計劃的調動轉進。全軍殺敵熱情非常高。」

陳誠攔下電話，與白崇禧商量，先尊重薛岳的意見，讓其守長沙，但要馬上把這裏的情況向蔣介石報告，請他重新裁決。

白崇禧表示同意。

日軍主力在水網地帶受到守軍步步攔擊，付出了重大代價，好容易衝破汨羅江防線，又受到守軍節節攔擊。進入撈刀河畔，全軍已疲憊不堪，時間也已過去十多天，所帶糧秣彈藥多已耗光，只能「靠天吃飯」，伸長脖子等飛機空投接濟。

其他兩路日軍的情況也十分不妙。

通城那一路助攻部隊（第 33 師團），現在已深深地陷進楊森部隊和大批遊擊部隊的包圍之中，不但不能協助主力圍殲中央軍精銳，「助攻」長沙城，連第 33 師團本身，也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啦！

這是因為：第 27 集團軍第 134 師的一個團，在白沙嶺一線阻敵時，打死一個不小的日軍軍官。日軍突然像發了瘋似地前來搶奪那個被擊斃了的軍官屍體。這邊一看，那屍體竟如此貴重，必有原因，便也發了瘋似地用猛烈的火力打退搶屍的日軍。於是，雙方展開了一場搶奪屍體的惡戰。結果，那屍體還是被中國軍隊搶了過來，從那寶貝死鬼身上的圖囊裏，搜出了第 33 師團的作戰任務區分和標圖，以及其他極為重要的文件。得知，敵第 33 師團圖將從南嶺攻白沙嶺，再攻龍門鎮，直下長沙，助攻長沙城。

當時，楊森集團軍是由西北向東佈防，重點放在準備阻擊南昌方向來敵。楊森獲得了這個情報後，果斷地變更了部署，把主力都調來圍攻由北而來的第 33 師團。結果，在長壽街地區，將敵圍住，經一晝夜的激戰，把第 33 師團主力殲滅大部，殘敵遺棄輜重、馬匹逃回通城去了。

南昌那一路（第 106、第 101 師團各一部），本應突破九嶺山區守軍防線，進入湘省，從瀏陽地區包圍夾擊長沙城的，結果是足不出戶，被羅卓英和王陵基兩部堵在「門口」，連高安城都沒出得來。

對岡村寧茨將軍來說，在他潛心研究對第五、第九戰區政、戰謀略時，所未及考慮到的是，中國數以百萬計的老百姓，在當地政府和軍隊的組織下，把敵後新牆河至撈刀河之間的大公路、細馬路挖成了新土，將這一地區的鐵橋、木橋、石頭橋也給炸、撤了個精光。

日軍主攻部隊的後勤補給線幾乎全給卡斷了。

按照岡村寧茨的計劃，川軍應該被策反過來幫日軍打央軍，至少也應使其中立或逃亡。現在，第九戰區的川軍王陵基的第 30 集團軍和楊森第 27 集團軍，士氣高昂，殺敵立功的鬥志反而更加旺盛。

還有，按照岡村寧茨的計劃，日軍在進入長沙之前，就應把第九戰區主力殲滅掉，日軍將高奏凱歌，邁著正步入長沙城。現在，他的第 11 軍團面臨著的情況是：他的主力部隊已快到長沙城下了，但是，第九戰區的主力，在對日軍進行了毫不客氣地、逐次打擊

之後，按照計劃迅速閃向兩側有利地區。那幕阜山、九嶺山中，「貓」著的大軍，真使岡村大軍望而卻步，膽顫心寒。他現在才猛省過來，薛岳將軍並不是抵敵不住而是敗退，而是以長沙城為中心，擺開個使人毛骨悚然的「大口袋」，正張著恐怖的大口等著敵人去鑽呢。

乖乖！好險！

風村寧茨立馬撈刀河畔，看著那座可愛的長沙城，又望望四周那恐怖的山川河流，再看看自己那被拖垮的部隊，唯恐被部下看出自己悵然若失的心情，一本正經地宣佈：「本次作戰目的已經達到，本軍無意佔領長沙城，全軍撤退！」

10 月初旬。

日軍全線敗退。

薛岳指揮各路大軍猛追猛打。

10 月中旬。

陳誠將軍電告蔣介石：

……我 79 軍於壽市陣地突破後，即協同增援之 20 軍沿途夾擊南犯之敵，於排樹港、毛家嶺、朱矣廠、漿市街、龍門廠等處疊予重創。乃至長壽街，獻鍾市一帶，敵已饑疲，不甚一擊，分途鼠竄。湘北之敵經我第 3、第 19、22、15、第 6、第 77、第 95、第 107、第 195 等師於新牆、汨羅兩線逐次抵抗，消耗極重，迨進至長沙、金井、福臨鋪、橋頭驛之線，已氣挫力竭，費克再進。是時奉新西犯之敵被我 74 軍側擊，斷其歸路後，其一部經甘坊擬竄銅陵，遭我第 1 集團軍堵擊；一部經九仙陽擬竄修水及西犯山口，遭我 20 集團軍堵擊，被圍於陽郭城市之區域，拚力掙紮，仍無以解決其圍厄。贛北、鄂南西方之敵既不克策應湘北之主作戰，乃被我各個擊破，於十月十日進至新牆河，恢復九月十四日前之原來之態勢。

白崇禧將軍向蔣介石報告：由薛岳將軍獨斷決定並指揮的此次湘北會戰，取得了戰略和戰鬥的全勝。殲敵四萬多人，其中少佐以上日軍軍官四十餘名，繳獲槍炮輜重無數。

重慶，軍委會。

蔣介石得到電報，一時興奮不已，竟將薛岳膽大包天，對抗他命令的事忘到九霄雲外。當即致電嘉勉薛岳和第九戰區全體參戰將士：

此次湘北戰役，殲敵過半，舉國振奮，具見指揮有方，將士用命，無任嘉慰。

5

1939 年隆冬。

北風呼號，寒凝大地，萬里破碎的河山，一派痛苦不堪的淒涼景象。但是，中華民族心靈中的屈辱已達極限，中華民族心中復仇的怒火卻像火山一樣爆發了，其勢銳不可擋。

長江兩岸，大江南北，萬里疆場，到處都響著蔣介石對參加冬季反攻的將士的訓示的聲音：

日軍的進攻能力已經被我國軍大大消耗，其進攻的銳氣已遭我頓挫，只有招架之勢，窮途末日，與此相反，我強大的國軍已經完成重建和整訓，戰力倍增，轉守為攻的時機已經到來了！我全軍抗日將士，要發揚決戰決勝精神，奮勇殺敵，收復失地！

第一戰區司令長官蔣鼎文將軍，指揮大軍向太行山南麓，黃河以北的日軍發動猛攻。

第九戰區司令長官薛岳將軍向所屬部將們聲稱：我九戰區五十萬大軍，要直下武漢，飲馬長江，光復中原！薛岳一聲令下，九戰區幾十萬精銳之師，從江南直向江北之敵掩殺過去。

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將軍，在大軍反攻之前，已派遣一個加強團的兵力，東渡襄河，插入敵後，破襲漢口至宜昌和京山至鍾祥間的公路、橋梁、通訊線路，開展敵後遊擊戰，正面配合張自忠第 33 軍集團軍、李品仙第 2 集團軍、孫震第 22 集團軍和王瓚緒第 29 集團軍等大軍總反攻。

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將軍，正指揮本戰區各集團軍對皖南、贛北和江浙地區日軍大力反攻，突然又收到蔣介石電令：

日寇兵艦、軍船隨時遊弋於長江中，威脅我兩岸城市，並進而侵犯我湖北地區，防礙我軍對各省的收復。著該戰區直屬防區內，選擇臨長江之制高點，構成堅固的要塞式工事，截斷日寇兵艦、兵船在長江中的往來。

顧祝同立即抽調上官雲相集團軍之王敬久第 25 軍，和唐式遵集團軍之郭助琪第 50 軍，強攻貴池縣境內的官股煤炭山，以實現蔣介石電令上的戰略目的。

長江兩岸的冬季大反攻作戰，於 1939 年 12 月上旬開始，至 1940 年 2 月 20 日前停止。中國方面投入第一線直接對日進攻作戰的兵力在五十萬人以上，前後歷時兩個多月，大小戰鬥一千三百四十次。攻取了若干城鎮、據點、陣地。後來又被日軍奪回去了一部分。

反攻作戰期間，宋慶齡、宋美齡、宋靄齡三人曾前往第五戰區前線慰問傷病員。宋美齡檢查和佈置了她所負責的軍委會戰地服務團在該戰區的戰地救護工作，並和十餘個傷員握過手，掖過被子，餵過幾勺子湯藥什麼的，以示親切關懷。

日軍大本營陸軍部對冬季反攻的反映和評價：

——這次大反攻，打得武漢第 11 軍東奔西走；

——中國軍攻勢規模之大，鬥志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均屬罕見。

——我軍損失不少。

——在中國事變八年間，彼我主力正式激戰並呈現決戰狀態，當以此為最。

——這一年來（1939 年），未按所期望的進展，作戰的主動權均未掌握，以此面臨中國軍隊頑強勇敢的冬季攻勢。

——我方損失及消耗繼續增大，而對中國軍隊的打擊顯著減弱，明顯暴露其守勢。

——這一年（1939 年），歷經南寧苦戰及冬季攻勢的防禦戰等，這在整個中國事變中成為陸軍最暗淡的時代……

6

1939 年 12 月 4 日。

日軍第 5 師團今村中將，命令該師團所屬號稱「鋼軍」的第 21 旅團，在旅團長中村正雄少將指揮下，攻佔了廣西戰略要地崑崙關。於是，又把中國軍隊冬季反攻的怒火，燒到了華南——崑崙關。

蔣介石決心在崑崙關打個樣兒給日本人瞧瞧。親自選調了一批精銳部隊參戰，其中包括全國唯一的一個機械化軍（第 5 軍）。

反攻崑崙關的總指揮為白崇禧。

參戰部隊序列如下：

第 38 集團軍司令徐庭瑤所部，第 5、第 6、第 99、第 36 等五個軍，共約十三個師。

第 16 集團軍總司令夏威所部，第 31、第 46 兩軍，共約六個師。

蔡延錯部，四個步兵團。

鄧龍光第 64 軍二個師。

葉肇第 66 軍二個師。

第 43 軍一個師和教導總隊。

空軍飛機一百架。

總計：十五萬四千六百四十二人。

參戰各部隊根據蔣介石、白崇禧的命令，秘密地從湖南、廣東、四川等地向南寧運動。

白崇禧將反攻部隊分成東、西、北三路軍。

西路軍由第 16 集團軍五個師組成。攻擊大高峰以西地區。

東路軍由蔡延錯等部四個師組成（另有約六個師的預備部隊），反攻崑崙關一帶。

12 月 7 日以後，今村中將不斷得到報告，說南寧以北約四十公里的地方，將有十萬中央軍開，反攻崑崙關。狂妄的今村中將對此付之一笑，斷言在南寧以北的山地間，絕不可能有十萬大軍通過。

12 月中旬。就在今村中將趾高氣揚之際，中國軍隊已按總指揮白崇禧將軍的命令，不聲不響地進入了攻擊地區。十多萬大軍分別埋在南寧以北的山地裏，只等一聲令下，便可全線出擊。

12 月 16 日。

機械化第 5 軍軍長杜聿明將軍在譚蓮村召開團長以上軍官會議，宣佈本軍作戰任務和計劃。該軍擔任主攻崑崙關的任務。其三個師的戰鬥部屬為：鄭洞國的第 1 師擔任崑崙關正面進攻；戴安瀾第 200 師為總預備隊；邱清泉第 22 師迂迴敵後，插入崑崙關與南寧

之間，向六塘守敵進攻，切斷南寧與崑崙關的交通聯絡，斷崑崙關之敵的退路。

會議正在進行，陳誠和白崇禧兩位上將一同到前線視察各部隊準備情況，特地到第 5 軍集結地，檢查和巡視了這支王牌軍。兩人來到會場，陳誠板著面孔，威嚴地命令杜軍長必須如期拿下崑崙關，否則，要杜軍長提著腦袋去見蔣介石。

杜聿明筆挺地立在陳誠面前，神情嚴峻地大聲回答：「是！」

軍官們見之，無不肅然。

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行動，保密工作和大軍的調動，如同一個月前

日軍頂著狂風巨浪出擊一樣出人意料。十多萬大軍就在今村認為完全不可能通過的地方，順利通過，在今村認為不可能集結的地方集結起來。杜軍長的機械化重炮兵旅，開到崑崙關附近丘陵地帶的密林中，在距敵前沿陣地僅三四華里的地方，迅速構築起陣地，一排排炮口

悄悄對準了敵人的陣地。邱清泉的第 22 師戰車部隊，已從崑崙關以北的思隴越過重重大山，經太平村向崑崙關南面的五塘地區穿插。

12 月 17 日。

今村中將仍在慶幸自己的聰明正確的判斷，認為南寧北面無戰事。上午八時，他放心大膽地命令及川支隊向龍州和鎮南關進攻，去奪取中越邊境上的兩個戰略要地。

及川少將率領本支隊乘坐數百輛大卡車，浩浩蕩蕩地從南寧出發。

當天晚上八時。埋伏在山地裏的中國軍隊，在坦克的導引、掩護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對崑崙關動動了全線反攻。



排炮怒吼，地動山搖，崑崙關被火光和濃煙吞沒。

中國軍隊喊著復仇的口號，海潮般地撲向敵軍陣地。

丘清泉的機械化戰鬥部隊，突然出現在崑崙關側後敵軍眼前，一舉攻佔了五塘、六塘地區，切斷了崑崙關守敵的退路。

杜聿明和其他各路反攻部隊指揮官都在第一線指揮督戰。杜軍長胸前挂著望遠鏡，冒著敵軍猛烈炮火和敵機的俯衝轟炸，從容鎮定地指揮部隊，一步一步地縮小包圍圈，一口一口地吃掉崑崙關守敵。

反應遲鈍的今村中將到 12 月 18 日才得知中國軍隊大舉反攻崑崙關的消息。他不顧攻、防雙方的優劣狀況，當即決定圍殲反攻的中國軍隊。令第 21 聯隊首先向崑崙關急進增援。

12 月 18 日。

下午五時，第 21 聯隊從南寧出發，八時許到達九塘，立即被埋伏在公路兩側的丘清泉坦部隊切斷了後路。坦克炮火將六塘到七塘的橋梁全部轟塌。整個聯隊被優勢的中國軍隊分割包圍，陷入了完全孤立被殲的境地。

丘清泉指揮戰車部隊向被圍之敵發動攻擊，坦克車隊衝出樹林，在中央公路上向敵人衝撞掃射。敵潰不成軍，爭先恐後向兩旁山地抱頭鼠竄。

公路上丟下累累敵屍和各式車輛二百多台，各種輕、重武器無數。

同日，中國東、西兩路部隊也分別在南寧附近發動反攻。

12 月 20 日。

今村中將又令中村支隊從南寧出發，增援崑崙關。該支隊剛行至五塘地區，又被丘清泉等部包圍在二十五公里長的狹長山溝裏，陷入絕境。

今村這才感到情況不妙，急令正在向龍州和鎮南關前進的及川支隊主力回援崑崙關。

12 月 21 日，清晨。

及川支隊的伊藤大隊，分乘一百零五輛大卡車，火速回返南寧救援。但是，當浩浩蕩蕩的卡車大隊開到南寧以西附近時，突遭優勢中國軍隊的伏擊，車隊陷入大軍重圍之中。敵伊藤大隊多次突圍，皆告失敗。

10 月 22 日。

中國空軍連日頻繁出動飛機，對崑崙關守敵和六塘到九塘地區被圍之敵，實施猛烈轟炸。

日軍已頻臨彈盡糧絕狀態，是日起，敵飛機對被圍各處之日軍空投彈藥和食物。但是，天上「飛來之物」大多被中國軍隊給搶了過來，日軍的飛機成了中國反攻部隊的運輸大隊。

是日夜間，由於雙方短兵相接，許多地方處於混戰狀態。中國軍在九塘以北互相發生誤戰，雙方用手榴彈對炸了一整夜。

12 月 23 日。

上午十一時許，支隊長中村少將正高舉戰刀嚎叫著指揮部隊突圍，一顆開花子彈從他左頰處貫穿，把他那滿臉橫肉扯去一大塊，頓時血湧如註。經緊急包紮處理後，這位已不能吱聲了的「鋼軍」將軍，又揮舞著戰刀，指揮殘部拼死突圍。

12 月 24 日。

中村支隊主力從七塘拼死朝崑崙關突進。早晨八時，中村少將在九塘以西督戰，受到丘清泉部隊近距離機槍掃射，當即斃命。

中村支隊主力四千多人被殲滅。

中國軍隊打掃戰場時，在旅團長中村正雄屍身上搜出一個日記本，該旅團長在戰死前夕寫道：

帝國皇軍第 5 師團第 21 旅團，之所以在日俄戰爭中獲得了「鋼軍」的稱號，那是因為我的頑強戰勝俄國人的頑強。但是，在崑崙關，我應該承認，我遇到了一支比俄軍更強的軍隊……

12 月 28 日至 30 日。

中國軍隊連續對崑崙關發動攻擊，戰鬥異常慘烈，山嶺嶺滿是中、日兩軍的屍體。

崑崙關之敵彈盡糧絕，他們只得挖野菜落穗充饑。一個個蓬頭垢面，在饑寒交迫中作垂死掙紮。

他們的炮彈打光了，就把槍炮砸毀或埋藏起來，燒掉軍旗，削成竹槍竹刀同中國軍隊作最後拼殺。

12 月 31 日。

在 1939 年的最後一天裏，中國軍隊以重大代價，全殲了崑崙關守敵，奪回了崑崙關。

今村中將向統帥部報告：「在此地帶上（指崑崙關），蔣軍比任何方面空前英勇，值得我軍表示敬意。」

1940年1月初旬。

日軍第21軍安藤吉將軍決定對崑崙關的中國軍隊來一次意想不到的奇襲，以奪回崑崙關。遂由廣東境內調兵西進。

1月中旬，日軍大本營為支援第21軍的南寧奇襲作戰，下令從關東軍調來兩個飛行中隊，配置於華南。

1月22日，近衛混成旅團和第18師團等部，分別在七塘和南寧以南集結完畢。

此時，白崇禧、陳誠、張發奎等人已擬好崑崙關防守作戰方案。

但是，日軍在中國軍隊尚未部屬就緒，後續部隊亦正在向崑崙關開進之時，突然發動反攻。日軍機群連續出動，對崑崙關及其附近中國守軍進行突擊轟炸，又對向崑崙關運動的中國軍隊進行阻擊。

由於中國軍隊後續部隊未及時趕到，崑崙關地區守軍倉促應戰，左右兩翼薄弱點很快暴露於敵前。日軍主力在一週內，如狂風掃落葉似地連續攻陷了崑崙關西邊的武鳴、思隴；北面的賓陽、鄒圩、上林等地，切斷了崑崙關後路，在清水河流域一帶，與守軍對峙，震撼了整個黔桂後方。

此時，柳州、互山一帶兵力空虛。若敵人渡江北進，不需大的兵力，就可使中國軍隊難於抵抗。柳州方面一片驚慌，民眾多作逃難準備。凡可使用的後方部隊，甚至尚在訓練中的軍校學生，都已準備開赴前線禦敵。

2月3日。

崑崙關失守。中國守軍受到沉重打擊。

陳誠、白崇禧等人馬上更變兵力部署，加強兩翼，側擊敵後。以一部兵力佔領左側要點，企圖阻敵北進，以主力由貴賓路方向迂迴出擊，企圖切斷北進之敵的後方交通線。

但是，日軍此次行動，旨在奇襲反攻，誓報「鋼軍」被殲滅之仇。他們以突然的行動發動閃擊戰，達到重創崑崙關中國軍隊之目的後，在中國軍隊大舉反攻之前，於2月10日，突然掉頭南下。除第5師團等部仍留守南寧和附近主要據點外，主力則於欽州灣安全登船遠去。

真是一次遠距離漂亮的奇襲作戰。

2月24日。

中國軍隊第二次佔領五塘和崑崙關在內的戰略要地。

第5軍軍長杜聿明中將在巍峨的崑崙關上，建立了一座「抗日陣亡將士紀念碑」，以永遠悼念和呼喚，為中華民族的獨立自由流盡了最後一滴血，而長眠在崑崙關上的二萬七千零四十一名將士的亡靈。



死於毛酋之手的抗日名將

張靈甫

陶傑



抗日戰爭勝利六十週年，特首曾蔭權飛北京出席慶祝和紀念活動。

曾蔭權競選時自稱中學的中國歷史科會考不及格。曾爵士是「香港仔」的典型，香港「番書仔」和

他們的父母，以英文和數理化成績優異為榮，中國歷史跟體育和勞作一樣，只屬閑科，中國歷史與中國語文的成績太好，反而見不得人，令人感到羞恥。

為此，中國歷史未嘗及格的曾特首北上出席抗戰勝利六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不知有何感想？如果我是中國政府，我會視曾特首為出席此一活動的最理想的香港嘉賓。

當前時興追索「日本侵華戰爭真相」。非常好，日本侵華戰爭的真相，不止是一場南京大屠殺的確切人數，而是八年抗戰（應為十四年抗戰，八年全面抗戰）的全套真實版本，特別是這場衛國「抗戰」，是誰「抗」的，如何「抗」，打的誰，誰挨打。探究歷史真相，我最有興趣。

然而，抗戰的真相如何？不如換一個角度，從抗戰結束後的那一年說起。

一九四八年耶誕節，中共新華社發表一張「國民黨戰犯名單」，共五十人。除頭號「戰犯」蔣介石之外，頭十名依次為：李宗仁、陳誠、白崇禧、何應欽、顧祝同、陳果夫、陳立夫、孔祥熙、宋子文。

名單上還有張群、薛岳、余漢謀。「戰犯」張群是尖沙嘴彌敦道東英大廈的那四個字的題字人。「戰犯」薛岳和余漢謀是廣東抗日名將，六十年代曾經住在香港。「戰犯」白崇禧的公子白先勇，是小說名家和城大的講座教授。香港的下一代，或許懵然不知，殖民地的香港原來一度是一座「戰犯之城」。

然而，戰犯的名單少了一人，這個人曾經是中國軍隊抗日傳奇的常勝將軍。他名叫張靈甫，西安人，中學時代曾習書法，篆書寫得很好。張靈甫二十歲才中學畢業，考取北大歷史系，畢業後轉入黃埔軍校，畢業後投身國民革命軍第一師。

張靈甫在江西追剿搶掠村莊的中共紅軍時第一次負傷。結婚之後不久，卻懷疑妻子與人通姦，把妻子殺掉，被關進了監獄。

一九三七年蘆溝橋事變，國家正急於用人。張靈甫獲秘密釋放，加入了新銳部隊七十四師，曾經率領過一百名敢死隊員，親自提著機槍向日軍掃射，殲滅日軍八百多人。南京保衛戰，張靈甫第二次受傷，帶傷參加長沙會戰，在抗戰尾聲，張靈甫在湖南雪松山與日軍最後血戰，戰後得到蔣中正委員長頒授寶鼎勳章。

張靈甫在抗日勝利後一九四七年的內戰中，奉命抗擊共產黨。他本來擅長平原戰，但國府國防部作戰廳長劉斐是共諜，故意調派張靈甫到蘇北孟良崮打山林戰。孟良崮之戰苦戰四晝夜，國軍彈盡糧絕，共軍二十萬像一窩螞蟥一樣湧上山頭，張靈甫是軍長，再度身負重傷被俘，毛澤東下令把張靈甫在戰亂中就地處決。

這就是張靈甫的名字不在戰犯名單之上的原因。張靈甫令日軍聞風喪膽，毛澤東替日本報了仇。

張靈甫是中國軍人之中最有性格魅力的一位。他文武雙全，軍功是一人打拼出來的，忠肝烈膽，殺妻一事尤為驚人。英雄的性格不可能完美。正因為張靈甫曾經過份的衝動過，更令人對他的一生追思緬懷。以張靈甫將軍的學歷，與英國許多投身戎馬的貴族精英相似，他是中華民族的百年英胤，然而在「解放」後的大陸，張靈甫的名字出現在革命小說《紅日》裏，卻是一個醜惡乖戾、反對「人民」的大奸角。

換了另一個文明國家，張靈甫的一生不會如此結局。他將會是東方的麥克亞瑟、亞洲的蒙哥馬利，備受民主黨或共和黨、保守黨和工黨的一致推崇悼念。如果張靈甫是白種人，好萊烏一早會以他為主角，為他拍了像《鐵血將軍巴頓》一樣的戰爭巨片，而且還會由史提芬史匹堡一級的大師當導演。張靈甫比余漢謀和薛岳唯一更幸運之處，是他早以身殉國，而且死在共產黨槍下，因此豁免了毛澤東標籤的「戰犯」辱稱，他也不必像國民黨其他抗日將領「戰犯」如杜聿明和黃維，接受毛澤東的「改造」，釋放出來之後，還痛哭流涕地承認「罪行」。張靈甫死得其時，是衛國戰爭之中無數捐軀的英烈之一。當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面容肅穆地參拜靖國神社，張靈甫和成千上萬中國士兵一樣，一早與草木同腐，屍骨無存。

抗日戰爭過去六十年了，在眾多國軍英烈之中，我最敬重張靈甫先生。如果有一天我有很多很多錢，當中國已經不一樣了，我會在蘇北孟良崮他犧牲的戰場，建一座亭子，為他立一座石碑，敬撰一篇悼文，在西風裏下跪向他誦讀，讓亭子和石碑供人憑弔，尤朝朝著落日的方向，向著無數衛國的英魂。他們以寶貴的鮮血和生命，為中文辭彙中早已被褻瀆和踐踏的「愛國」兩個字，留下了最後一絲永不消褪的光澤和餘溫。

（網上文選）

（上接第 104 頁）

們判斷是非的標準不是黨的宣傳，而是神的旨意。宗教和中共之間展開的是爭奪群眾的鬥爭，實際上是你死我活的鬥爭。這就是為什麼中共對法輪功和地下教會的鎮壓如此殘忍的原因。儘管法輪功還不是宗教，只是吸收了一些宗教的思想。宗教對中共進行了堅韌的、長期的、不屈的鬥爭。由於宗教佔有半合法的有利地位，進行柔性的合法對抗，而不是剛性的暴力對抗，所以他不會敗，儘管你可以壓制他，且絕對無法取消他。相反，宗教會吸收越來越多的人和中共鬥。最後，軍隊國家化。中共對軍隊抓得最緊，這是保住其政權的最後一道防線。實在不行就來武的，「搶桿子奪取政權，搶桿子保衛政權。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中共出動軍隊，用坦克車壓學生，鎮壓了學生運動，進一步驗證了中共的理論。至於是非曲直，軍隊完全蒙在鼓裏。中國的軍隊實際上成了中共一黨的軍隊。實行民主就必須軍隊國家化。軍隊屬於人民而不是屬於某一個政黨。軍隊的職能只能是保衛國家，保護人民，而不是鎮壓人民。如果中共失去了軍隊，那末他在人民的反抗中失去了鎮壓的手段，只能徹底失敗。所以中共維持了一支世界上最龐大的軍隊，而且這支軍隊的職能主要是對內的，是用來對付人民的。這一點中共不會改。但是，事不由己。軍人也是有思想，有頭腦的。社會上的民主思潮一定會波及到軍隊，影響軍人，轉化軍人。軍人覺悟的結果就是站到人民一邊。用來準備鎮壓人民的槍，也可以用來鎮壓獨裁者。心中的怒火燃燒，身上的繩索就會崩掉。中共想永遠抓住軍隊，那也只是徒勞。

綜上所說，中共不可能進行政改，甚至連經濟改革也不可能徹底進行。中共的經濟改革只不過是爲了延長其統治。一旦改革的發展影響其統治地位，中共必將進行反扑，扼殺任何改革。今天的中共甚至不如滿清末年。滿清不僅進行了經濟改革、洋務運動，而且也著手政治改革、君主立憲。即使如此，尙且不能自保。今天中共完全不敢進行政治改革，因爲它在政治上不能退，「失去政權就失去一切」。在中共眼裏，政治沒有民主可言，只有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經濟上不能徹底改革，政治上根本就不能動，那中共就只能比滿清敗得更慘，就只能被時代的車輪壓得粉碎。

衛國戰爭時期歌曲

春風春雨



（鄭文英前輩提供）

又是一年春風，
吹白了多少少年頭，
多少壯懷為著故國愁。
又是一年春雨，
灑綠了多少異鄉樹。
多少傲骨埋進了荒丘，
多少人在春風裏憔悴，
多少人在春雨中消瘦。
為什麼憔悴為什麼消瘦？
為的是青春不再、歲月如流……
歲月如流，
卻流不去家恨國仇。

又是一年春風，
春雨如故鄉依舊。
鄉愁，
多少傲骨埋進了荒丘。
一年的歲月如流，
流也悠悠；
一年的青春消逝，
愁也悠悠；
流去了壯懷憤慨，
卻也流不去家恨國仇；
流去了青春惆悵，
卻也流不去家恨國仇。
流不去家恨國仇，
家恨國仇……



們和他們的家人處心積慮，不惜代價。甚至他們的幸福和痛苦，都維繫在上面。我們是用忘記青春的辦法

來喊出青春無悔的；我們是用「戲說乾隆」的手法來戲說我們的過去。我們不是英雄卻裝著英雄來炫耀自己的傷疤。我們又像有意在粉飾和掩蓋

什麼，就像要粉飾和掩飾我們做乞丐時的骯髒和屈辱。你們看，英國大詩人是這樣描寫乞丐的：

……

我們在人世間自由地行走
誰敢說僕從如雲的香車，
就比我們走得更加輕快；
我們在香香的乾草上摟著姘頭，
誰敢說明謀正娶的夫妻，
就比我們更加恩愛

……

如果乞丐們後來也像知青一樣體面地做人了呢？啊，乞丐無悔！知青是文化大革命的產物。它不是延安時代傳播革命種子的那個知青，也不是文化大革命前那些考不上大學和生活難以為繼、在一種虛幻的政治光暈下走向農村的知青、而是政府在政治上焦頭爛額、經濟瀕於崩潰時，對一代人乃至國家，不負責任也最無可奈何的選擇。它像政府肌體上的一個盲腸，既無用處，還有隱患。於是我們聽到了毛澤東那程式化的沒有誠信的號召。跟著就是整個社會的動員，像捉雞捉鴨一般搜盡了這老大國家的每一個角落，那種家庭離散的淒慘籠罩了整個世界。我們為什麼要用今天來感謝昨天？我們為什麼要用今天的人樣來粉飾過去那喪家之犬的狀態？我們值得為苦難去唱讚歌嗎？那種被時代扭曲的人性我們還要自作多情地去延續它嗎？實際最有資格說「青春無悔」的，應該是一直都沒有返城的知青。應該站在獻出了青春的那塊土地上

什麼叫“青春無悔”？

一個老知青的反思

黃健民

編者按：一位生活在城市貧困線上的癌症患者黃建民從昆明寄給本刊他關於當年知青生活的長篇自傳體小說《剝奪》。這是一部悲愴的作品，其間充滿艱辛和苦難，也不乏生存的意志和思想的閃光。本刊將這部書稿的一部分摘登出來，在文革爆發四十週年即將到來的時候，奉獻在歷史和心靈的祭壇上，並以此回應曾經在部分老知青中甚囂塵上的「青春無悔」論調。

知青是文革的產物，是文革走到窮途末路時的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或丟棄。

古代有每年用一對童男童女祭天地、鬼神的罪惡風俗，殘酷的是，這是整整一代童男童女，做了文革的犧牲。當父母看著他們帶著天真的樂趣手舞足蹈地走向祭台，就痛苦地感到這是一個不需要人性的時代。

「無悔」是對自己的選擇的一種反思。當知青卻不是自己的選擇。對自己剝奪的青春表示無悔，除非是繼承了那個時代所培育的扭曲的意識形態。那些丟盔卸甲回到城裏的青年們，幾年以後喊出了「青春無悔」的豪言壯語。這時他們已一掃昔日的那副狼狽，豪氣衝天。他們都已結婚成家，人到中年，各得其所。那一場曾被視為劫難的夢已被歲月過濾了，罩上了今天的光環。就像我們的後代，用那令他們神往的大串聯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浩劫一樣。所不同的是，他們用的是想象，而我們是背叛。大家歡快地交談著，和當初在舊城相聚一樣愉快，但那青春的美麗永遠消逝了，他們卻像一群沒有開過屏的老孔雀，卻在追尋那爭奇鬥艷的場景。他們忘記了，為了一個礦工的職業，為了一個清潔工的崗位，為了一個城市戶口，他

去喊「青春無悔」。但這樣的話，他們把這幾個字無論喊得怎樣如雷貫耳，卻像被曠野吞沒的呼喚，其他人卻像坐在一輛飛馳的列車上聽到被拋下的同伴無奈的辭別，山林的寂寞和田野的空曠在等待著他們，而我們飛向城市的心情是何等的輕鬆和暢快！我們為成功地叛逃而喊出「無悔」的豪言壯語，我們為死去的青春出現的回光返照而激動不已。

我想，評價知青運動的是非，還有幾個最簡單也最朴實的方法：

一、沒有誰再願意去當知青。那些無後顧之憂的當今的志願者，在待遇不菲和公平的社會環境下，在「邊遠地區」堅守一年以上的都鳳毛麟角，就很說明問題。

二、知青為了回城，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只要利用知青回城的心裏，什麼事都敢對他們做。這點不就說明了知青是個什麼東西！

我們會對苦難中的一絲溫暖永誌不忘，尤其是有一個視我們為「人」的父老鄉親，就像難忘我們在幸福中遇到的劫難一樣。我們不能以此來掩蓋那一段生活的真實。不管那段落魄的日子跟那裏的風景一樣被描述得多麼美麗，沒有哪個知青會把他的兒女送回到那個真實的過去。今天，我們對我們現在譽為父母般的鄉親，保持著一種優勢心態，以這種驕傲和自豪回來的時候，那種青春無悔的豪言壯語太容易了。我們的這種感覺依托的是我們處境的改變。但我以為更重要的，是我們回訪的還是像三十年前一樣生活著的鄉親，還有那些作踐過我們過去的頂頭上司。那種寬容大度給我們一種崇高的美感，也讓我們有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感覺。實際他們現在對我們已沒有多少意義，甚至在我們眼裏一文不值。我們顯示著自己，送他們錢、物品，享受著一種施捨的快樂。我想，假如我們過去來這裏是在一片荒山野地裏開闢獨立的「青年農場」，如今的回歸沒有了這些鄉親，我們還有沒有這種暢快？從另一個角度說，我們是帶著那個過去的傷害留下的屈辱的烙印回來的，我們不知不覺有著一種微妙的要洗涮它的心態。知青運動造就的只會是這樣的人。我們要感謝的是今天不是昨天。

我們返城時只有一種「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的急切心理，走得那樣迫不及待，再沒有人想到那些「父老鄉親」，更沒有人想到包一把「第二故鄉」的泥

土。老婆丈夫不要了，兒女成了孽債，「家當」棄之不惜，當了兵團和當地領導的甚至官也不要了，這塊土地上的東西變得一文不值！現在的領導是那樣熱切地歡迎老知青們舊地重遊，甚至百倍地甚於當年。原因很簡單：當初來的是一文不名，要他們收養的孩子；如今只要有那麼幾個有錢有權的城市富豪和高官，就會因這種「血緣」帶來意外的財富。而那些曾經真正為知青付出代價的「貧下中農」，沒有人會想到他們，連起碼的補償也得不到。就是知青自己，在怡然自得地接受了他們甚至載歌載舞地又一次真誠的感情付出之後，在他們面前做了最愜意的展示，接著再一次絕塵而去。我們不知道那些曾視知青為沒媽的孩子，玩弄於股掌之中的鄉官小吏，怎樣去看那「青春無悔」。我們只感到我們的「父老鄉親」以及我們的青春和苦難被我們的同類出賣了，而且價格低廉。我們甚至會並不恰當地想起那個千古名句：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青春無悔給那些人吧，如果不是知青運動，他們也許一輩子也見不到那麼美麗的女人，還莫說佔有過她或她們。他們有的沒有逃過處罰，判刑了，坐牢了，多少年以後他們又重新構建了他們的生活，他們也許才有權利說：青春無悔！甚至會自豪地說：「死也做了個風流鬼！」而我們的那些受害同胞，卻不願去回想那些揪心的日子，或者有意無意在掩飾它，有的至今還活在那個陰影下，甚至在合法的魔爪下，注定要過完痛苦的一生。青春無悔給那些人吧，這些後來成了各界名流的人們，曾在他們面前俯首貼耳，唯命是從，甚至任其凌辱。青春無悔應該給那些耀武揚威的人們，他們曾經毫無人性地踐踏知青的人格和權利還升了官的人，至今還引以自豪。青春無悔本身就是一種傷痛的呼喊，是觸摸著一塊疤痕在扭捏作態，是對那些掠奪者的再一次恭維，是曾為自己牽腸挂肚的父母和親友那份付出所表示的輕賤。那是文革的受害者對文革一句多麼由衷的讚美，我們還要讓文明來一次倒退麼？讓你的兒女再重蹈覆轍麼？我們同樣能找到讚美文化大革命的最充分的理由。比如我們把坐車不要錢、吃飯不要錢的到處隨心所欲的串聯；甚至把批判教師和走資派、參加武鬥的場面，描述成五彩繽紛的人生，又何嘗不可呢？

我們不會因為看到鮮花的嬌艷去感謝糞便的骯髒和奇臭，我們怎能忘記真的功勞是人、土地和鮮花自身呢？如果我們是被一個騙子拐賣到富貴人家，我們去讚美騙子都會有些不可思議，如果我們被騙到一個又窮又冷酷的人家，還有什麼值得讚美呢？有人說知青無非是去當了一下農民，世世代代的農民還沒叫苦呢？這讓人想起小學生嘲笑同學時用的那個詞——弱智。莫非要我們循著這種邏輯把國家主席跟乞丐扯到一起，質問我們男人為什麼不可以像女人一樣去生孩子。以同樣的邏輯還應該提到的問題是，知青算什麼，還有右派呢……我們也看到了後來觸目驚心的知青的處境，令眾領袖們臉面無光，連江阿姨震怒後也批示「殺一儆百」。但這對於一個時代的悲劇又能挽回什麼？那些「殺一」的和被「一殺」的本來就是一伙。有幾個知青感到出了口氣和雲開日出的？它更不是雨露和陽光，四周還是一片黑暗。

從後來中央對知青問題的不同意見來看，大多數知青有兩種命運：一種是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一種就是世代融進了那些窮鄉僻壤，像我們重新見到「閩土」一樣。知青回到城裏讓人耳目一新，短短幾年的知青生涯鍛煉了一代人，可見那是一種怎樣非同尋常的力量，「百年樹人」呀！而除了苦難，還會是什麼呢？沒有人再去奢談政治和理想；對社會的弊端有了認同。如果還有人對你來做什麼思想工作，來談什麼思想和主義，要麼會感到別有用心，要麼在赤裸裸的欺騙，說的是一些口是心非的話；鄙視那些「與人奮鬥」的人。這時我們又想起了那句名言：生活是我們最好的老師。他們現在的不再盲從的思想，僅憑這一點，當時就有資格在盈江監獄裏度過一段刻骨銘心的歲月。於是我們看到一種人性的回歸，看到一場醜陋的化妝舞會的結束。這種思想的解放，正是後來知青在城市生活中有令人矚目的優點的根源，可它偏偏是對「再教育」逆反的結果我們不希望自己的兒女當知青。我們寧願不要知青的那些被稱道的優點，也不能再讓我們的兒女遭受那種扭曲和強迫接受一種不平等。我們希望他們真正獲得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權利。

中共中央關於知青問題的會議不知開過了多少，整個過程也都過去對一個問題的處理大同小異：當一種傷害已經持續了很長，發生得很普遍，血淚成河，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才會被政府提到議事日程上

來。有人上書，有人直陳，有人寫內參，問題再不解決就要出事了，才有了會議。如果換了對象和場合，說不定又要抓出多少右派和彭德懷。成千上萬的女知青被姦汙，她們很多還是來自首都北京，足以看出知青當時是個什麼東西。於是我們看到了江青「殺一儆百」的批示，有了「強姦知青就是強姦我」的傳言。法律開始嚴肅起來，憲法開始捍衛人民的權利，黨和政府的關懷體現了出來。「祖國的花朵」凋謝了，「八九點鐘的太陽」不再升起；該殺的殺了，該判的判了，兩方都自認倒霉去吧！沒有人再會去關心那些無辜者的人生，甚至連句安慰的話也沒有。除了強姦，再沒有人過問知青中的其它問題，即便是個知青問題的專門會議，無非也就說說而已，最多發個簡報，就算有了結果。中央有過多少會議，在回城之前，對廣大知青的來說，有跟沒有並沒有兩樣。

感覺是思維的起點。李先念說：文革以來城鎮知青下鄉一千多萬，而國家又從農村招工進城一千多萬，花了一百億，買了四個不滿意：知青不滿意，家長不滿意，農民不滿意，國家不滿意。胡耀邦說：上山下鄉是「一舉兩害」，既害青年，也害國家。林彪說：知青是變相勞改。專家學者說：農村人口向城市轉化，才是文明社會發展的趨勢。紀念知青運動 XX 週年，知青們的熱情還在。沒有人去紀念「大躍進」多少週年，沒有人去紀念文化大革命多少週年，沒有人會紀念「五七幹校」多少週年，因為這些運動禍國殃民。倒是有人紀念「知青運動」多少週年，而且都是知青運動的受害人——知青自己！看來倒有點像中國人為了不忘國恥而去紀念「九一八」。但又不像，一個是恨，一個卻是愛。甚至有的高論覺得此不失為培養人才的一條道路，就像有人說如果日本佔領了中國，中國就會像日本一樣富強一樣。你一下就覺得醜陋起來。

知青為什麼在後來返城後變得「能幹」起來，首先是他們思想受到解放然後才是生活的磨煉。這種解放是社會的弊病給他們的傷害造成的，他們變得通情達理，思想開闊。但他們沒有必要感謝這種傷害。知青在「知青運動」中似乎沒有失去什麼，因為他們本來就一無所有；或者說那個年紀他們應該得到什麼，他們竟可憐地從來沒有想過。他們沒有想過自己，更沒有想過國家，或者想了白想。如果知青是今天才出

現，那將是一個怎樣深刻的悲劇。這首先是民主自由的思想已不只是百姓認同。憲法給予的人的權利不只是被少數人玩弄於股掌，社會的發展在等待著每一屆而不是一代的教育成果等等。如果要毀掉這一切，那簡直就是一場屠殺。我們知道，真正要做，中共有這個能力，那會是怎樣的一浩劫。如果事情仍然像過去驅逐一群綿羊一般再次發生了，我們看到的將是父母放棄城市所有的文明，陪隨著自己的獨生小皇帝，一次有去無回的悲壯的遠征。琴聲再也不會響起，所有的期待成了泡影，他們的父母會被我們的父母苦痛苦得多，因為他們更懂得自己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又遭到更赤裸裸的踐踏。在同樣的結果面前，認為應該這樣與不應該這樣有著根本的不同。就像對同一種行為看成罪惡與不是罪惡的反應決不會相同一樣。同時更勇於捍衛自己權利的新一代人，必將與那種逆潮流而動的暴政，展開一場悲壯的搏鬥。

我幾乎沒有看完過一篇知青小說。這個「幾乎」差不多等於零。認真地看張曼菱不到三萬字的小說《有一個美麗的地方》時，已是她發表這篇小說十多年之後，這還因為她和我是在一個縣的昆明知青。每一本知青小說，我似乎都翻開過，都覺得它們跟我的知青生活相差太遠。我的知青朋友們互相談到這些書時，大體都說「難看」，「寫些什麼」。這倒決不是指作者的藝術水平和思想水平，而是跟我們的經歷根本不是一回事。這甚至導致了我們曾經有過的相同的痛苦不能共鳴。寫知青的長篇小說幾乎都是農場的。我們插隊的地方就有農場，那裏有不少北京、上海、四川知青。但我們之間幾乎是完全隔絕的。當然也有相鄰的互有所往來，但這很少，更談不上思想認識的交流。我們像生活在兩個世界，各自有意無意中劃地為牢。後來我看到《中國知青夢》，才知道一些驚心動魄的事情就發生在我們旁邊。我們即使聽到的農場知青的事也極為有限，大多是跟他們相鄰的插隊知青在閒聊時偶然提到的，多半還是打架鬥毆和風流故事。例如農場的四十老幾的某營長娶了個十六歲的北京知青，現在已經生了兩個娃娃，五顏六色的尿布像聯合國的國旗，挂得到處都是之類。有一次還聽到農場知青提的一個問題：「你們為什麼不到農場而要插隊？」這先不說我們都是身不由己，我們首先的感覺是：愚蠢！誰會願意在農場那種體制下生活。只要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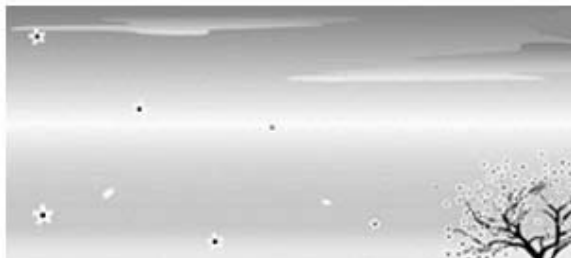
農村女知青成「建制」的被強姦就可以看出這點。這在昆明知青中是不可能發生的。提問題的人好像是從生活有保障這點出發的，而我們卻是從自由和權利這個角度做出本能般的反應的。我們的知青小說像那些應景的文章，要麼把我們的苦難附著在改天鬥地的豪情壯志中，要麼把生活中固有的美麗把知青的真實混為一談。《中國知青夢》我看了幾段，已經是我在一本知青小說中看得最多的。這是因為那些驚心動魄的場面。我看的不是知青而是故事，跟看其它小說沒有多大區別。倒是中央對知青的一些做法，才把我和這本書聯繫起來。也許如果我不是插隊知青而是農場知青或別的什麼人，我會把這本書看完。

我們的愛情和孽債，都誕生在一片浮土上。我們是因為看到我們的命運和憲法以及政府所有動人的宣言和承諾而痛苦，是因為看到自己的命運和世界文明的進程背悖而難受，是在自己從小長大最無奢求的生存都得不到而產生的失望。那些小說和詩歌、音樂，甚至各種過去覺得荒唐的哲學……總之，生活成了老師，讓他們去感受、思考馳騁了起來。於是過去的教育變成了美麗的謊言，生活把真相告訴了他們。人們為此感到痛苦的時候，常常是無可奈何的時候。愛情在知青的世界裏要容易也更危險得多。因為無論男知青還是女知青，給他們選擇的條件並不多，沒有了城市那些豐富的誘惑，就像在共同生活在一張風雨飄搖的大船上的清一色年輕人，只要對方的一絲青睞，就可能變成愛情。如果真的有心想，你會用過去有過的一面之交或微不足道的一點什麼關係，立即化成一張走向愛情的通行證。只是由於前途的渺茫，才使人一邊走一邊頻頻回顧。如果有好感，這無疑是一個自由地追尋對方的最好機會。農村給了你最理想的條件，而且單純而自然。從某種意義上也可以講，知青有著更多的自由。他們可以自由的歌唱，放肆的貶斥時弊……好像知青有了更多的人的權利。那你想，如果一個人被丟進勞改營和瘋人院，讓他們無論怎樣的言行自由，你覺得是好事嗎？誰能說清放逐的自由是種什麼自由？如果我們來回憶一個毀滅了的世界，無論我們曾在那裏有過怎樣的喜怒哀樂，那種毀滅的痛苦會緊緊地纏繞著我們，即便是一個快樂的場景，也會使我們感到她像一具美麗的僵屍，讓我們的心顫抖起來。我們可以記述她，卻絲毫找不回那種快樂的感

覺，反而成了一件十分難受的事。小城是埋葬知青青春的墓穴。人們以為只要把手洗乾淨，就可以還像紳士一樣津津樂道地喝著酒去講那些知青的故事，去回憶那些當了官的知青曾在他們手下俯首貼耳的樣子。但總有人會為這個墓穴寫上銘文，記錄下知青被流放和洗動的日子，讓人們知道這座小城有過的歷史的一頁。

成千上萬的知青被送進了一個當舖、一個實驗場、一個集中營。我們看到今天的志願者，帶著優厚的條件和無後顧之憂的政府的許諾走向窮鄉僻壤，但幾乎沒有人會在一年之後還留在那個地方，他們有了逃避苦難的權利。我們經歷的是一個今天的青年看來不可思議的時代，是遭遇了殘酷的剝奪還不能呻吟的時代，而且這種剝奪一直延伸到改革開放的下崗或失業，並禍及我們的後代。如果我們是今天的志願者、是些向貧下中農或者別的什麼人拜師學藝的學生，我們會受到如此徹底的剝奪麼？德國和日本會為他們在二戰中擄掠的勞工進行賠償，誰會為知青賠償呢甚至不再剝奪他們呢？知青本來是國家的一筆財富。這筆財富有多大？最直接的算法，就是國家從 49 年建國算起，投入到這幾千萬人身上的教育費用。這已經是個一想就讓人腦袋膨脹的數字。如果再讓它從世界發展的機遇角度看，那又是一種另人痛心疾首的事。這種對國家財富的揮霍，稱得空前絕後了吧？而對視為國家未來的青年人權利的剝奪和踐踏造成的傷害，可能是比經濟的影響更深刻和持久的事。

當我們通過苦難、掙扎，又支離破碎地撿回我們被剝奪的權利和尊嚴時，別人和我們一樣會奇怪，為什麼我們沒有像憎恨甚至抱怨一個像劫取了我們一個不足道的錢包的小偷那樣，去對待那些掠奪了我們青春和權利的人，反而送出了「青春無悔」這樣的秋波。莫非我們的人性真的剝奪得那樣徹底嗎？我們何必為剝奪後的施捨感恩戴德！



非凡的人生 一本不同尋常的書

羅 汛

車爾尼雪夫斯基說過，引起人心靈震撼的作品，才會是一部好的作品。我們看到的黃建民的作品《剝奪》，就是這樣一部勾魂的作品。

在現實生活中，超常規的東西是不多見的，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的千篇一律的文章也比比皆是。就像號稱植物王國的雲南省，舉目都是閑花野草。金邊蘭、茶樹王之類的珍稀植物，藏匿深山，很難被看到和發現。

在五花八門的刊物中，要想看到記錄下痛切的人生經歷並準確地描寫這種感受的文藝作品很困難，而像《剝奪》一書在知青文學中更是鳳毛麟角。那帶著血與火的文字震聾發憤，悠然自得的神精像受到了電擊。

作者的經歷讓我想起「錯版郵票」——郵票中的珍品。他錯生在「苛政猛於虎」的「新中國」，錯生在「剝削階級」家庭，錯在成了一個知識青年，錯在一個有理想有志向的青年與命運的抗爭。他兩次坐牢，後一次在看守所的整個過程竟戴了四年的大鍊，受盡了非人的折磨，而最後被判死刑。同時他經歷了「從天堂到地獄」的感情折磨，他的初戀毀於一旦，女友被強姦，他經歷了無產階級專政最兇殘的糟蹋。他是用一顆純潔善良甚至柔弱的感情來體驗了這一切的，也正因為如此，他的感受和思考才價值不菲，今天在我們看到他寫成了書，不能不引起震撼！

歷史要有人去寫的，中國有過好的開始：皇帝做錯了事，史官理所當然記錄在案；皇帝震怒殺了講真話的史官，但繼任者照寫不誤，這就是真實和良心。杜甫用詩去寫民間疾苦，當時的社會不接納，連他父親都指手劃腳，說他不遵循寫詩的規矩。最後歷史照樣認同了他。

《剝奪》一書也可貴在它的真實，真實的經歷、真實的感受、真實的思考，因而也才有了飛揚的文采和精致的心理描寫。作者認為不是他有多麼高超地駕

驚畫筆的技巧，而是他眼前有一個出色的模特，這就是他的經歷和感受。

在暴政下一個人斷然死去是平常也容易的事，但一次次遭遇強盜般殘酷的剝奪，尤其是以青春和愛情做對象，就是一幅又一幅血淋淋的圖畫了。被侮辱的靈魂被扭曲著、踐踏著，發出令人心碎的呻吟和吶喊，作者用犀利的文字，就像用刀尖蘸著血和淚，把它們鐫刻下來。老的、少的，賢與不肖，是知青不是知青，無不為之動容。我想就是那些苦難的始作俑者看了也許會「良心發現」，當然他們得良心還在。

我們得感謝作者，他寫出了一代人的苦難，撕開了地獄的面紗，把自己的血淚釀成了讀者的佳肴。文中妙語聯珠，有些精當的描寫使人覺得就像把宇宙飛船送上了太空的軌道一樣精確。

有位哲人說過，所謂天才，就是破譯了上帝密碼的人。作者不信邪，苦難成了他追求人生真諦的動力，他要去解開心中的謎，社會的謎和文學的謎。

作者是在癌症的病痛中開始並完成這本書的寫作的，而為了寫這本書，他用顫抖的雙手學會了打字。像書一樣，我們同樣為作者堅忍不拔的追求所激動，也為他再一次與命運的抗爭叫好。

讀林覺民《與妻書》有感（外一首）

何 彤

一封家書赴死前，便將英名留身後。
真情滿紙催人淚，字字九鼎重千秋。

感潘達微

聚得英雄骨，鑄就萬代碑。
民族精神在，傳薪賴達微。

1911年“三·二九”之役失敗後，5月3日，同盟會人潘達微先生冒險挺身而出，不顧滿清當局禁令，以《平民日報》記者的公開身份，組織了一百多人（收屍人），把散落並已腐爛的七十二位烈士的遺骨收殮安葬，使一代英烈的業績彪炳史冊，永垂不朽，激勵了一代代的中國人民。因以詩讚。

德國 彭小明

東北抗日名將趙尚志 是共產黨的抗日英雄嗎？

2005年八月香港鳳凰衛視有一個歷史節目叫做抗戰英烈頭顱回歸記。說的是東北抗日的民族英雄趙尚志烈士。烈士率領東北地區人民武裝抗日遭到日軍的巨額懸賞，一兩骨頭一兩金，一兩血肉一兩銀。不幸被奸細誘入圈套，受傷被俘，寧死不屈，壯烈犧牲。

由於海外出現了新唐人電視臺，播放了“一寸山河一寸血”和“誰是新中國”等電視節目，揭露了中國抗戰史上的真相：共產黨不是抗戰的主力，真正抗戰的主力是國軍和淪陷區的反抗組織。國民黨為抗戰犧牲了二百餘位高級將領，共產黨除了左權等個別人士，還有什麼人，在抗日戰場英勇捐軀（按：左因遭遇日軍於逃跑中被炸傷不治而死）？鳳凰衛視是黨的喉舌，它勉為其難，要為共產黨的抗戰歷史好歹做一點有根有據的補救。恰好趙尚志烈士遺骸的頭顱2004年被發現後歸葬，於是成了宣傳“共產黨抗戰”的好材料。

不過，看完這段系列節目之後，覺得趙尚志烈士的抗戰業績跟黨的領導實在掛不上鉤。趙烈士少年時代加入共產黨，還有一些共產黨反壓迫鬥爭的經歷，可是當1931年以後東北變成了偽滿殖民地以後，趙尚志雖然還自認是共產黨員，可是他的言行跟黨的領導實際上不大有關係。三十年代初，黨中央在幹什麼？1930年，在駭人聽聞的富田事變中，毛澤東為首的江西前敵委殺害了紅軍中的所謂AB團分子將近十萬幹部戰士，直到近幾年中共中央才給富田事變勉強平反。1931年日本攻佔瀋陽北大營的九一八事變沒有激起共產黨的民族義憤，它還繼續在前蘇共斯大林的命令下，組織城市暴動，建立認俄為父的中國農村蘇維埃武裝割據政權，最重大的任務是執行共產國際的指示，搞“武裝保衛蘇聯”。五次反圍剿，最後失敗，逃離江西蘇區，力圖打通與蘇聯勾連的通道，輾轉到達陝北。在這段時間裏，中共中央根本無心顧及東北的抗戰事務，而趙尚志只跟滿洲的共產黨北滿省委有

關係。趙尚志苦心組織了珠河反日遊擊隊，巧妙殺敵，卻遭中共北滿省委的猜忌，將遊擊隊失利的責任栽在他的頭上，將趙開除出黨。但趙尚志團結民間的反抗遊擊隊，仍然堅持抗戰。但不久就傳來了“中共中央特派領導人王明和康生等人”從莫斯科發來的指示，要抗日武裝去聯合偽滿的國軍。這哪里是抗戰，分明是漢奸，當然遭到趙尚志的抵制。在孤軍抗戰中他誤信了謠言（蘇軍領導要接見東北抗日領袖），越過中蘇邊界去尋找黃埔軍校時他的俄國教官加侖將軍，可是他哪里知道，將軍早已受到史達林整肅，後來被迫害致死（編者按：加侖是 1929 年蘇軍大舉侵略我國東北的實際指揮者和元凶）。等他到達蘇聯境內，竟遭蘇方扣押。蘇聯共產黨從來都採取機會主義的態度對待中國人民的抗日鬥爭，1929 年因中東鐵路事件攻佔東北大片領土，繼續霸佔鐵路主權。此時此刻的趙尚志沒有獲得英雄的禮遇，倒是作為嫌犯在蘇聯被關押了一年半。要不是發生了日蘇之間的張鼓峰流血事變，還不會將趙尚志釋放回國。更讓趙尚志想不到的是到了 1941 年 4 月 13 日，蘇聯共產黨領導人史達林竟跟日本帝國主義當局簽訂了《日蘇中立條約》。條約規定日蘇雙方相互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和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兩個帝國主義分別霸佔了中國的兩塊土地之後“相互尊重”起來，史達林是什麼樣的朋友？當趙尚志返回東北之後，再次遭到中共北滿省委的敵視，竟將他第二次開除出黨。當他率領戰友襲擊敵偽警署的時候，被特務的槍彈擊中，無法脫身，他將隨身的公文交給其他同志，掩護他們突圍。這些公文中還包括他向黨組織申訴和辯白的信件。當他怒斥日寇、慷慨赴死的時刻，實際上已經不是共產黨員了。“恢復黨籍”的事情，離他犧牲的日期已經過去了四十年（1982）。他不屈不撓地抗擊日寇，令敵人聞風喪膽，完全是出於自己的民族情操和愛國熱忱，跟共產黨並不相干。毛澤東的黨中央跟他沒關係，王明康生的投降路線遭到他的抵制，北滿黨組織則只給了他不斷的猜忌，懷疑和兩次開除黨籍的處分。這樣一位黃埔軍校出身的抗日將領竟被鳳凰衛視拿來為共產黨的抗戰歷史裝點門面，實際上完全不倫不類。說到底，不僅不能給共產黨的臉上貼金，反而讓黨的臉面越描越黑。

中共三位“抗日”將軍戰死之迷

編者按：中共要“紀念”抗日，就必須繼續撒謊。但中共於抗戰時期，確實又“戰死”了幾位將軍，所以，這幾個將軍就成了中共用來證明他領導抗戰的證據。好在歷史的真實只有一個，而且遲早要大白於天下。所以，這幾位將軍究竟是怎麼死的，也就陸續地隨著中共的紀念而“浮出了水面”。這裏發表的都是從大陸報刊、雜誌、網站上轉載的文章，這三篇文章，對於中共幾位將軍的為“抗日”之死，或是發表見解，或是放聲歌頌，我們原文照錄，只在關鍵的地方加上幾筆評點，以與作者和讀者一起來辨析真偽。也算是對歷史盡一點責任吧。

左權之死的另類迷惑——評點

原文：中國憤青

評點：若品

對 CCTV 的惡俗節目一向不感冒。昨晚（9 月 1 日）因在同事家小聚，看到一個題目似乎是“家書”的節目。左權之女拿著左權生前寫給妻子劉志蘭的家書，訴說左權的情感世界。因左權生前是八路軍副總參謀長，為“我黨”（引號為本刊所加）在抗日戰爭中犧牲最高將領，便留了點意。據節目中左權之女左太北介紹，左權生前極愛其妻及左太北。極愛其妻我是相信的，有多封家書為證；極愛其女則稍有疑惑。左權家書寫到：“如逆流萬一不幸來到（請注意，左權是說“逆流萬一不幸來到”，不是說“萬一我為抗日犧牲”。可見他並無要為抗日捐軀的思想準備，而只是有恐遭不測的預感。他的預感究竟是什麼，讀者可讀下文。），你盡可不必顧及我，大膽地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

1942 年 5 月 22 日（犧牲前三天），他再次寫信強調：“我雖如此愛太北，但如時局有變（仍然是說“如指時局有變”，不是說“如我為抗日而有不測”），你可大膽地按情處理太北的問題，不必顧及我，一切以不再多給你受累、不再多妨礙你的學習及妨礙必要

時之行動為原則。”從信的內容看，只要不妨礙劉志蘭的生活、學習及安全，對左太北是可以“按情處理”的，為此還特意強調讓劉志蘭不必顧忌左權本人的感情。“按情處理”，說白了就是愛怎麼著就怎麼著吧。左太北本人的解釋是，左權之意為可以將嬰兒託付給老鄉。如果真如此，信中直接寫明“可託付老鄉”就行，何必要說“按情處理”呢？按情處理就包括了託付他人之外的其他選擇，比如在情況緊急時，拋棄路邊。這種事，在中國歷史上就曾經發生過。劉邦逃命之時，為了馬車能跑得快點，就曾把妻子與親生子女推下車去。正所謂，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命是自己的，老婆是可以再討的，孩子也是可以再生的。

但我更關注的不是這些，我更關注左權是如何犧牲的。於是便查了查資料，在河北省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主辦的《長城線上》網站上發現了一篇詳細記述左權將軍的文章《太行豪氣傳千古——憶左權將軍》（<http://www.hebei.com.cn/node2/syzt3/yzhszl/thyj/userobject1ai300336.html>），發現左權將軍生前竟然是“托派份子”（左將軍有關不測的預感終於有了下落，也就是說，因他是托派，而且共產黨在黨內處死過相當數量的托派分子，所以，左將軍才有了不測之感。顯然，這一不測與抗日犧牲一類的念頭，全然無關，或曰，他全然就沒有要為抗日而犧牲的念頭和想法，所以他所作的任何對身後的交待都與為抗日犧牲無關。），並且直到“1982年，劉志蘭又親自給當時的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再次要求中央發文為左權平反，取消對他的‘留黨察看’處分。考慮到劉志蘭的心情，中央有關部門終於寫出書面檔，對早年左權同志受王明路線打擊迫害一事予以平反，取消對左權同志的‘留黨察看’處分，並將該檔放入了左權的檔案，但沒有對外公佈。”該文沒有解釋中央不公佈左權“平反”消息的原因。（中共為左將軍平反不對外公佈，左將軍“為抗日犧牲”倒是對外公佈了；中共不公佈為左權平反的消息，卻公佈左將軍是共產黨的“抗日烈士”；讀者可以思考其中的原委甚至是奧妙究竟何在。）

還是據上文記述，左權是在指揮八路軍總部“撤退”的過程中被日本侵略者炮彈擊中犧牲的。這與我找到的其他關於左權將軍犧牲經過的文章所述相同，可以互相印證，應該是可信的（左權之死有種種說法，但其共同點，都說不是在一場與日寇面對面的頑強戰

鬥中壯烈犧牲的。因為，如果連八路軍的副總參謀長都戰死在對日戰爭的戰場上，則這一戰役該有多大？中共的抗日史，至今只說他“領導”了平行關大戰，發動了“百團大戰”。但事實上，前者只是在國民黨已經消滅了敵阪垣師團二萬二千主力之時，林彪才懷著“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心情，不顧毛澤東五道不準打的命令，襲擊了日軍的一支輜重部隊；後者則是彭德懷違背毛的命令，擅自發動了一系列扒鐵路、炸碉堡的“百排小仗”，結果，非但被中共批判是暴露了八路軍的實力，彭德懷最後竟因此而在文革中被枉送了性命。我們說遠了，但無論如何，是不存在另一個連八路軍副總參謀長也戰死其中的中共抗日大戰役的。而本文所說的“指揮八路軍總部撤退”，倒是有些真實，因為，“鬼子來掃蕩了，八路軍進山了”的台詞，特別是毛澤東的一道又一道不準打日寇的命令——請學習毛澤東選集第三卷，倒是能夠使我們對八路軍副總參謀長“指揮部隊撤退的原因”有所了解……）文中強調，左權將軍曾多次機會可以先行撤退，但他都放棄了，甚至斷然拒絕了彭德懷將軍讓他撤退的命令。猶為令人不解的是，文章中有這麼一段話：“一顆炮彈在他身旁爆炸，飛濺的泥土劈頭蓋臉揚了他一身。作為一名老兵，他應知道緊接著會有第二顆炮彈射來，他應先臥倒，然後一個側滾翻，就可避開第二顆炮彈，這個動作下意識就能做到。然而他沒有這樣做，而是連腰都沒彎一下，站在高地上一直大聲喊著指揮突圍，完全將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果然第二顆炮彈又向他射來，他的喊聲戛然而止，硝煙過後，他的身影也從山口處消失了！”依該文所述，左權之死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待避開炮彈後再接著指揮耽誤不了幾分鐘時間。而且據央視現場左太北與某導演的介紹，炮彈打來，大家都臥倒。可見左權當時如果稍微採取一點保護措施，可能就不會犧牲。但身經百戰的左將軍，卻在炮火下“連腰都沒彎一下，站在高地上”。這是為什麼呢？難道僅僅是為了指揮撤退那麼簡單？我從來不認為，最高指揮官必須身先士卒暴露在敵方的炮火下才算盡職。（顯然，作者要告訴我們的是，左權不撤退、甚至要“壯烈犧牲”的原因，絕不是為了打日寇，而是他身為托派分子，不僅前途暗淡，還有不測之命，此念常襲在心，其內心的壓力可以想見。所以，在左權深心之中，他應該想的是，倒

不如為日寇炸死，倒是死得其所。但是，必須明白的是，這絕非是為抗日而死，更不是為國犧牲，而只是一個懦夫逃避生命的行為，是自殺。所以，如果作者所述，確為真實，大約這就是中共遲至 1982 年，才在其妻的一再要求下，為“考慮到其妻的心情”，才為他平反卻又絕不公佈的原因。由此看來，左權之死，又怎能談得上“為抗日而壯烈犧牲”？這與 206 位國民黨將軍面對面地戰死在抗日疆場之上，又何能相提並論？）

左權犧牲後，眾人只顧逃命，只是“三名北方局黨校的青年學生……將遺體抬至一處荊棘叢中，拿一床軍被蓋好，又遮蓋一些樹枝。”後來才由總部警衛連“找到了將軍的遺體並就地掩埋”，說明了戰爭是如此殘酷，為了逃命，最高首長的遺體可以拋棄不管。

此後，日本侵略者“截獲到我方‘左權失蹤’的電報，在十字嶺到處挖、找，終於挖出了左權的棺木，打開後給遺體照了像，登在了敵偽報紙上。敵人的暴行一時間讓山河失色，大地舉哀，復仇的呼聲響徹華北。這一情況黨中央和中央軍委是知道的，但一直沒有公開。”在中國，掘人墳墓是不可容忍的侮辱行為。日本人大概出於炫耀戰功的目的掘墳拍照，這絕對是人神共憤，此暴行必將激發我軍將士的對侵略者的仇恨，但黨中央出於什麼目的而不公開日本人的暴行呢？（因為中共知道左將軍是自殺，而不是犧牲。）

眾所周知，前蘇聯托洛茨基曾與史達林進行了一場“兩條路線”的殊死鬥爭。最後以史達林派大獲全勝告終，“托派”份子被殺被流放不計其數，僥倖逃得性命者政治生命也難以恢復。以托洛茨基本人為例，在亡命天涯墨西哥之後，依然無法避免追殺，被人用冰鎚砸死。政治鬥爭演變成血淋淋的對肉體的殺戮。文章將左權的“托派”說成是王明的迫害，但為什麼在王明失勢之後，左將軍的冤屈不能得到平反呢？為什麼直到 1982 年中央已經為左將軍平反，卻不對外公佈消息呢？

想起每 4 年一次的美國大選，競選人為了不同的理念，兩條路線甚至三條路線激烈鬥爭。勝利者沒有洋洋得意，失敗者更無性命之憂。失敗者不僅不會有性命之憂，還可以繼續宣傳其理念，以求得更多的支持者。總之，愛什麼派就什麼派，都不能成為消滅生

命的理由。這樣看來，路線鬥爭的結果並非一定要以某一方肉體或自由的喪失來結束。

想到歷史上眾多“站錯隊”的人，生不如死的事例，左權將軍堅決放棄生還機會，並故意暴露在敵方炮火下，難道是“以死明志”麼？（如果左將軍當真是“以死明志”，明其“絕非托派”之志，則與抗日何關？與為抗日犧牲何關？）

中共抗日將軍彭雪楓是戰死在 不打日寇卻大打國民黨的戰場上

——中共彭雪楓傳評點

彭雪楓將軍，原名彭修道，乳名興隆，1907 年 9 月 9 日出生於河南省鎮平縣七裏莊，4 歲即跟祖父念書習字，稍長，先後在本村私塾和縣倉房及察院高等小學就學，1921 年小學畢業，14 歲隻身投奔在天津教書的伯父，考進天津南開中學，第二年，經馮玉祥將軍部下擔任書記的五叔推薦，進入西北軍 11 師軍官子弟學校就讀，“追求革命真理，接受馬列主義”。1925 年 6 月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二年 10 月在北京匯文中學轉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正式黨員，並擔任支部書記。

1930 年 5 月經上海黨組織介紹被派往湘鄂贛蘇區工作，任駐湖北的紅 5 軍 5 縱隊 5 大隊政治委員，6 月，紅 5 軍在平江擴編，成立紅 3 軍團，彭雪楓任紅 3 軍團 8 軍 1 縱隊 3 大隊政治委員，以後，歷任紅 8 軍第 8 師、第 2 師及第 4 師政委、中央軍委第一局局長、江西軍區政治委員、紅 3 軍團第 5 師師長、政委、紅 3 軍 13 團團長、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第 2 縱隊司令員、紅 1 軍第 4 師政委、八路軍總部參謀處少將處長兼八路軍駐晉辦事處主任、河南省委軍事部長、新四軍遊擊隊司令員兼政委、新四軍遊擊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支隊隨營學校校長、新四軍第六支隊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八路軍 4 縱隊司令員、新四軍第四師師長兼政委、淮北軍區司令員、淮北蘇皖邊區黨委委員等職。

彭雪楓同志作戰英勇，身先士卒，經常戰鬥在前線，參加過第三次反圍剿、第四次反圍剿、第五次反

圍剿，參加了二萬五千里長征，1936年強渡黃河，縱橫山西西部廣大地區（都與中國人民長達十四年的抗日戰爭沒有關係。如果一定要說有關係，那就是在“九一八”之後，國難當頭之下，接受前蘇共和中共的命令和指揮，參與了種種制造動亂、混亂和叛亂的武裝賣國行徑，並且功勳卓著。）；1938年2月奉命由山西臨汾轉武漢，接受中共中央賦予的新任務：在河南確山縣積蓄力量，領導發動魯、豫、皖、蘇廣大敵後遊擊戰爭（假抗日之名義，在敵後建立共產黨的武裝和政權，繼續分裂正在正在艱苦抗戰的中華民國。），1938年9月在竹溝成立新四軍遊擊隊，彭雪楓任司令員兼政委，張震任參謀長，彭雪楓親自在河南竹溝創辦了著名的《拂曉報》（目的是為宣傳共產革命而非衛國抗日，抗日不過是幌子。），深受廣大幹部和軍民喜愛，受到黨中央的讚揚。

1938年9月30日，根據毛澤東、周恩來、葉劍英電令，率兩個新兵連373人，進軍豫東敵後，1939年1月率部向徐州方向挺進，以永城為中心，在永城、亳州、渦陽一帶建立抗日民主政權，同年為擴大根據地，又率部向淮上進軍，直指蚌埠、鳳台、懷遠、宿南、蒙北地區，開展遊擊戰爭（這就是毛澤東說的，“要讓日本人多佔地”的目的。共產黨就是這樣在八年抗戰之中，藉口抗日，而佔據了敵後的廣大地區，卻從來也不用“農村包圍城市”的偉大遊擊戰術，來解放任何一個為日軍所佔領的城鎮，甚至與日軍做生意、賣鴉片、互通有無。請讀者參看2005年北京巧妙出版的黑皮書《延安日記》——前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代表、前蘇聯塔斯社駐延安記者佛拉基米諾夫著）。

1940年，根據新四軍軍部命令，率新四軍第六支隊活動於運河線、黃泛區，1941年5月奉命轉移到津浦路東，進入皖東北地區，與淮北路東地區活動的部隊會合，7月組建騎兵團，從此，淮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始有了一支機動性大、戰鬥力強的騎兵部隊（這是在執行毛澤東於1940年5月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給東南局的指示信。該信命令新四軍必須迅速向皖東北等地區進行擴張，並且為了擴張，絕不要對正在抗日的國民黨軍隊手軟。請讀者參見毛澤東選集第三卷）。

1942年-1943年，彭雪楓與鄧子恢、張震、吳芝圃等在山子頭戰役中，一舉全殲來犯頑軍（請注意，是

頑軍，不是日軍。也就是毛澤東在1939年之後所一再命令打擊的主要敵人——“國民黨頑固派”。用毛澤東的話來說，“國民黨頑固派，雖然今天還在抗日，但明天一定會投降”，所以，要堅決打擊、絕不手軟。而當時新四軍主要打擊的國民黨頑固派，就是我台兒莊大戰中的國民革命軍主力——韓德勤部。以上引文，請參閱毛選第三卷），當場擊斃國民黨保安第3縱隊司令、淮泗專員、地頭蛇王光夏、獨立第六旅旅長李仲實，並活捉國民黨江蘇省政府主席、蘇魯戰區副司令員韓德勤（中共史家自己交待了！只是交待得遠不夠徹底）。

1944年，日寇攻陷鄭州、洛陽、許昌、鄆城等38座城池，中共中央、毛主席決定向河南敵後進軍（只要日本人“多佔了地”，毛主席就要立即命令向敵後進軍“也多佔地”，卻絕不迎戰於“敵前”。），彭雪楓奉命西征，8月越過津浦鐵路，行至小朱莊，首戰頑軍王傳授，取得殲敵千余的勝利，為部隊西進打開了勝利之門（請注意，彭雪楓一直是在打國民黨，而不是在打日寇）。9月11日，在河南夏邑東八裏莊圍殲土頑李光明的戰鬥中，彭雪楓將軍親自指揮戰鬥，正當戰鬥勝利結束時，不幸流彈擊中，英勇殉國，時年37歲（中共史家明確招認：彭雪楓將軍是在中國人民的艱苦抗戰之中，一打再大只打大打正在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並在“打頑”勝利結束時，不幸被流彈擊中而死，絕不是為抗日而死，更不是為國捐軀；而是為共產黨而死，為出賣中國人民的偉大抗日戰爭而死。或許，他在打頑的勝利聲中不幸中流彈而死，正是蒼天的應有報應吧！）。

（本文摘自蔣中健、林文善、唐培遠著作《楓陵流丹》）

中共抗日將軍高敬亭 是被中共所處決

——中共高敬亭小傳評點

高敬亭，原名高志員，1907年8月出生於新縣新集鎮董店村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0歲喪母。因家庭貧困，唯讀過六年私塾就輟學在家幫父親種田。

在大革命時期（中共的所謂大革命時期，是指1924-1927年共產黨參加國民黨後、藉中國國民革命以

發動中國共產革命的時期），湖北省黃安縣(今紅安縣)的共產黨員方進賢、梅光榮等人以走親訪友為名在鄂豫邊區開展革命活動。高敬亭受到了革命的啓蒙教育，隨之開始了革命活動（應該準確地說是受到了共產革命的啓蒙教育並參加了共產革命）。

1927 年 11 月著名的黃麻起義爆發（實際是前蘇共命令中共發動的“八一”南昌暴動等一系列武裝叛亂之一），高敬亭參加了工農革命軍（共產革命軍）。1929 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4 年重新組建紅 28 軍，並任政治委員，他以超人的膽略，領導和堅持了三年的遊擊戰爭，經歷了無數的艱難困苦，奇跡般地戰勝了百倍於己的強敵，在多次反圍剿中，他無比忠貞地捍衛了大別山的革命紅旗。（這一時期中共武裝革命的性質，請參見彭雪楓一文評點）高敬亭領導的紅二十八軍自成立之日起，儘管在強大的敵人面前也曾遭到過損失和傷亡，但在根據地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始終保持一千多人的主力部隊，英勇地打擊了敵人，成為根據地人民心目中的一面堅持戰鬥的旗幟。1937 年紅 28 軍改編為新四軍第四支隊，高敬亭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

1938 年 3 月 8 日，高敬亭奉中共中央命令（姑且不論是否中央命令，見下文）率軍抗日。7 月在高敬亭的指揮下，先後在皖中連續取得了 13 次戰鬥勝利。（戰績大小，姑且不論，但高敬亭抗日卻是真的）

在高敬亭率四支隊與日軍浴血奮戰之時，由於受錯誤路線影響，將他秘密逮捕，並押在安徽省肥東縣青龍場儲家圍子。6 月 24 日上午 8 時，將高敬亭槍殺在青龍場。時年，高敬亭年僅 32 歲（為何要槍斃高敬亭，中共于今不敢面對，更不敢公開內情。但僅從此文所述事實，就可以知道，他不是戰死在抗日的戰場上；但卻如前文所述，他是在立下了抗日的戰功之後，被中共下令秘密逮捕槍決的。理由是受“錯誤路線”影響。誠所謂“燭影斧聲”，天機不可泄漏。但是，安徽民間卻有傳說，認為他正是因為不聽上面不準打日本的命令，才遭遇殺身之禍。八十年代中期，更有皖人劇作家要為高敬亭寫傳，特別是寫他抗日的功績，卻無處敢於發表。不過，中共雖然至今不說是什麼錯誤路線害死了高敬亭，現在卻說高敬亭是共產黨戰死的抗日將軍，這謊也撒得太大了些！）

身前何不慮身後



田建模

四十載萬歲寢癖，一萬年罵名太久。
翁嫗笑談文革事，身前何不慮身後？

中國自有文字記載已來，只不過二、三千年，能有幸載入史冊的委實不多，而得以留芳或遺臭（大賢或鉅奸），更是萬中難以挑一。然而，“史”不可以全信。因編撰者多為官差，褒貶美醜，須得仰承上意。故民間又冒出了野史、稗史、外史、演義等等，其中亦難免不經之談。

近代、現代因相隔不遠，跡痕猶可尋，故不難究析。譬如當今對毛之種種評議，無論臧否，皆有事例可為援引。對此，本文不欲多說，僅只提出一點以供探討：人皆以為毛絕頂聰明（江青曾說：“主席這個人，在政治鬥爭上，誰也搞不過他。”）從權術陰謀來看，毛縱橫排闖，拉拉打打，可說是恣意而為，毫無顧忌。但其失算亦甚多：反胡風，是其失算也；反右，是其失算也；大躍進、人民公社，是其失算也；反右傾機會主義，是其失算也；搞文化大革命，是其失算也。然而，最不可思議的，乃是其人一門心思整人，而罔顧身後。古人曰：“終須一個土饅頭。”任憑極尊極榮，驕狂跋扈，總有個寂災之日。一朝閉目撒手，權柄空落，那時一任他人折騰，再由不得你了。此乃婦孺皆曉，以毛之博覽通達，豈能不知？然而，其人之所作所為，恰恰提供了一個反證！“爾曹身與名俱裂，不廢江河萬古流。”毛批鬥人時，曾不無嘲諷地引用此句。但他可曾料到，在世之時，便有人以此腹謗，又何況其身後乎？

人生在世，礙難擺脫者，“名”與“利”也，但兩者也並非連體——得利者往往享名，而享名者卻未必得利。詩曰：“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林昭、張志新等人便是——直到刑戮之後方享有美譽盛名（但家屬還得繳納三分錢子彈費）。若拿毛來作比

說，貴為黨與國家主席，“和尚打傘無法無天”，“一句頂一萬句”。其人權欲熏天，疑嫉甚重，故其病危時，有人竟慰說：“主席放心，大權還在您的手中。”此系何人？即周恩來也，惟周能揣知毛心事。

說毛“罔顧其身後”，有人以為不然，引其防修反修理論為例。然而，此正反映毛恐懼疑慮之心理。眾所周知，所謂“黨內的修正主義及走資派”，即毛指認的“中國的赫魯雪夫式野心家”劉、鄧一派。此可溯源於一九五五年蘇共二十大反史達林秘密報告，五六年中共“八大”鄧小平所作黨章修改報告中強調集體領導，“毛澤東思想是黨的指導思想”一語被刪除，1959年“大躍進”失敗，全國餓死數千萬人，以及1960年六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檢討（毛以為是影射和觸犯）。故與其說一次次發起運動在於反修防修，倒不如說心懷鬼胎，為大權不至於旁落，而殘酷消滅一切稍有違拗者；堵人之口，防範一切可能的翻案，以保證“無產階級專政”路線的永久延續。

說毛“罔顧身後”，是指一意孤行全不顧及後果與將來——一切真能如毛籌謀的那樣嗎？還是到頭來事與願違，落得個千古罵名？這，無疑是權勢欲蒙蔽了心智。權欲這個東西，以能操縱和控制一切方才稱心，否則，便會疑忌重重，極為煩燥難耐。我們說“以史為鏡”或“史為借鑒”，那只是文人們在書齋裏的迂論，對於位居於至尊者看來，文人可以任意操控，歷史可以隨意塗抹，這原本無足輕重；重要的是可以為所欲為，一顯抱負與施展（或曰野心與“陽謀”）；於是乎，“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亂行。”所謂“春風得意馬蹄疾”。當此時也，飄飄然恍若神仙，以為領袖精神感召下，萬民騰躍，眾志成城！何嘗肯檢點，肯稍作收斂？待到禍由已起，日見其彰了，則掩飾推卸，或嫁禍於他人。倒反及不得千百年前的皇帝（後者還有個“罪己詔”，作一點自省自責。）明明是頭腦發熱，“小資產階級狂熱”，搞“大躍進”、“放衛星”，浮誇虛報於前，餓殍遍野於後，竟然自欺欺人，說是什麼“自然災害”！死者已矣，自然作聲不得；倖存者苟且以活，一樣也只得吞咽。再看林林總總的報刊雜誌，有關“偉光正”的各式頌諛之詞，更是塞滿了大大小小版面！正合了一位詩人所說：

“你們說謊／他們說謊／我們說謊／大家說謊／但，依然‘熱愛’！”

雖基業猶存，卻已風雨飄搖。後繼者無論資歷或強勢，均是每況愈下。所謂“中興”，所謂“盛世”，也只是肥皂泡沫中炫目的五顏六色罷了。從官方應景式的紀念儀式中，從贊詞和美譽間，不難看出和聽出心口相違，勉為其難的尷尬來。而社會正在掙脫思想桎梏，民間正在思索覺醒，整部箝制言論的機器已開始失靈，一個放聲抗言的時代正在來臨！什麼是潮流？以“民主憲政”與“言論自由”為標的，挾億萬聲勢溶聚匯合，浩浩蕩蕩奔騰而下者是也！

身前享盡榮與貴，身後蓋棺知如何？今日之情狀事態，莫非毛不曾思慮預料？非也。其臨終前曾有“腥風血雨”之語，便是預感後事之不妙也。作為垂死之人，彼時心情之複雜苦楚當可想見：以半生之力，戎馬倥傯，獲取至尊之位；又以半生之力，大“鬥”大“整”，以期固其獨裁，卻不料“愈鬥”愈亂，愈“整”愈散——以至於離心離德而不可收拾！

“身前何不慮身後”，亦可理解為“身前太過慮身後”。指的是，毛剛復自用，始則以為“真理在手”，絕對正確；鑄成大錯後，恐重蹈覆轍，遭人唾罵，故以高壓及“運動”箝人之口並轉移視線，以至於愈陷愈深而不能自拔。其所作所為看似全不顧及身後，實質不然，其內心惴惴不安，是對於身後將來之莫名恐懼也！

有道是“早知今日，何必當初。”從因果論來看，有大作孽，則必有大報應，也正合了“不是未報，時候未到”之語。“時候”者，總清算到來之日也！而當今紛紛紜紜之街詬巷罵，即可看作是清算風暴來臨之前兆！

下列作者請與黃花崗雜誌聯係

敬啟者

- 1、因沒有地址不能寄出第13期稿費，請下列作者與本刊聯係：伏虎、陳家驊、齊輝、劉建安、乃木、任全。
- 2、請舒天然先生與本刊聯係，以便本刊給您寄出第14期稿費。

神化毛澤東 撒下多少謊言

長文“國傷與國殤”節選之一

朱執中

神化領袖，或說搞個人崇拜，是世界各國共產黨一個通病。既爲了奪取政權，也爲了鞏固政權。中共也不例外。大約從 1940 年代初開始，黨內有些人基於各種原因，便一步步去神化毛澤東，對他的才力、人格作出超乎實際的溢美，甚至誇張與說謊。如此做法雖有眼前或短期功效，但後患無窮。毛澤東大半生的實踐可作見證。《東方紅》這首歌先在延安地區普遍唱起來：“東方紅，太陽升，中國出了個毛澤東，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大救星”，就是利用民俗語言去神化毛澤東。明眼人想一想就明瞭它隱含著中共當時的政治企圖和目的。先前介紹《東方紅》出處，都說它是陝北有的農民“熱愛”毛主席，自動編出歌詞，有的民歌手再以當地民歌歌調唱出來。這些說詞無非想告訴讀者，陝北農民、廣而大之是中國廣大農民都是自覺自發地去信任、崇拜、擁護毛主席的。改革開放後，廣東《羊城晚報》登了一篇短文，揭露《東方紅》的真作者，原來是延安時代一個中共藝術幹部在學習“文藝爲政治服務”宗旨後創造出來。那麼這之前公開的文字不都是謊言了嗎？這不過是封建時代野心家謀皇位打江山所造童謠、簽語的拙劣翻版。但中共卻讓它唱遍大陸！

“毛主席萬歲！”據說也是從延安喊起。後來神州大地響遍了“毛主席萬歲！”的呼號聲。人活到一百歲，至今還屬“古稀”，何況萬歲。而且兩千多年來，它都是朝君主皇帝的專用歡呼，人民領袖毛澤東竟然千萬次地親耳去聽，至死還未自覺到要明令將它禁止？！自甘讓此神話與謊言存世。

“毛澤東思想”這句話，同上兩句謊話不同，帶點實，是實實在在地把毛澤東向神壇推進一步，也可以說對把他推向紅色皇座起了關鍵作用。此話首創者劉

少奇可真始料不及。它的要害是：一、把它列入中共黨章作爲全黨指導思想，等於承認它已經成熟、正確且系統化，定爲“一尊”地位，每個黨員都得服膺；二、把它吹成是馬列主義的發展，這就更加強了毛控制黨內黨外思想之權。因他自個就把馬列主義定爲“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那麼作爲這一思想體系的繼承與發展的“毛澤東思想”，不也變成了“真理”嗎？中共 82 年實踐的檢驗證明所謂毛澤東善於結合中國國情去運用幾大方面的馬列主義理論，根本不是真理，而是謬論。諸如階級鬥爭是歷史發展的動力；實行無產階級專政；消滅私有制；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時代思想等……對 56 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不是弊大於利，禍大於福嗎？不但害苦害死了廣大民眾，連這句話首倡者、時爲國家主席理應受到“憲法”保護的劉少奇，不也是被毛澤東活活整死了嗎？把這個思想桂冠加給毛澤東、連帶相關的鋪天蓋地而來的頌詞，今天，如果站在中國人民和民族國家立場去評論，可以說都是一派謊言。如果至今還有人堅持說，毛澤東思想是光輝的思想，立過大功啦！要這樣說未嘗不可，言論自由嘛。但在他立過甚麼功、爲誰立的功這點上要分清。毛澤東運用他的思想、才智、魄力以及陰險、狠毒、狡猾等特性，以及善用打進國軍核心的共諜，指揮中共及其一百多萬武裝力量，打敗了國民黨、蔣介石，終於奪得了政權。這的確是他立的大功，但這僅僅是對共產黨、以及既得利益集團和少數人立功。對大多數民眾來說，正如上述。

神化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登峰造極。甚麼“大樹特樹毛主席權威”，甚麼“四個偉大”：偉大領袖、偉大統帥、偉大導師、偉大舵手。依中共語系，偉大常與正確、光榮相連在一起。

毛澤東真的這麼偉大、正確嗎？約略從他加入共產黨後的主要作爲和社會後果去看，也可知它是大謊話。毛澤東善於用撰寫高論、甚至詩詞掩飾他自少漸成的成皇成相的政治野心以及一黨利益，鼓動輿論，精心捉摸因歷史與時代的種種因素導致貧困、不均而引發的民心，特別是那些無產者、流氓的動向和要求，並適時加以組織利用，以他們的生命與暴力爲革命基礎，向中華民國政權挑戰，大喊“一切權力歸農會”，實質歸他這個 1920 年代中期已在湖南被稱爲“農民大王”的共產黨員擁有。他一旦探明了中國革命——

農民戰爭這條路子，便信心倍增，野心更大。自此，他便無限量誘引、利用農民廉（無）價的生命去為共產革命、為他實現開拓新皇朝的妄想鋪路。農村包圍城市之戰打勝了，眾吹鼓手大讚毛澤東在戰略上發展了馬列主義。其實，中國歷史上多個農民起義領袖，為謀皇位而打江山，大都先占農村，後打城市和京都。毛澤東主導農民革命，不過是新時代新翻版，其中只有一些新招數而已。這“四個偉大、正確”，是中共嘩眾取寵之輩又一次的誇張與謊言。

20 世紀世界民主潮流滾滾向前。中國“勝者為王，敗者為寇”的老定理應修正了。因過去的“王”多靠暴力上位，而不是走憲政與民主選舉之路。毛澤東第一次晉見紅色沙皇時曾投訴自己在黨內所受“委屈”、“壓制”，史達林安撫他說：“勝利者不應受譴責”。這與中國“為王”的老話很近似。但對此不譴責可不行！因為現代這類各式各樣的“王”，對他運用暴力、謊言、毒辣手段上臺，絕大多數不但不反省，公開坦承自己的罪過，反而與時俱進地用更巧妙的方法掩蓋罪惡歷史，更精心地包裝偽造的真相。有時他們不慎地間接承認已罪的一點史實，但思想感情上還是沒半點反省。坐穩王位的毛澤東，1964 年接見日本社會黨訪華代表團團長、黨主席佐佐木更三時，權大氣粗的他，不經意露便出了醜事的底子道：“不用作甚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段話恰好是毛澤東自曝國騙的罪行，既得意忘形回想起他們在抗戰中以奸詐掩蓋消極抗日的劣跡，廉價贏來內戰勝利的本錢，又掉不了說謊的本色，奪取來的政權並不屬於人民，而是屬於他和中共的。在這意氣風發中他怎會為抗日時背離人民與國家的利益而悔過。

大陸那些喜歡鼓吹個人崇拜的大人物與追隨者，還曾在生活層面上，不斷向毛澤東大獻頌詞。直到江核心時代，此類國騙風還沒有停刮。寫文章、出書、辦電影、照片展、生活實錄等等。這半個多世紀，不知出籠了多少？看的人不知看膩了沒有。這些生活上絮絮套話，亦少不了誇張、虛飾與謊言，也屬國騙的另一支。

鼓吹者常突出毛澤東同工農兵見面、談話的鏡頭，宣揚“偉大領袖”多麼親民、愛民。看過照片、錄

影的人，多數都曾認為這是“真的”。可一旦得知毛生活的另一面，就會恍然有悟了。1958 年底，由於大樹“三面紅旗”，工業、農業許多事搞過頭，搞錯了。這時好些農村已出現糧食不夠吃，農民開始餓肚子，但毛澤東還是偏信“糧食放衛星，畝產萬斤”的假數位，在一次中央會議上，他竟然說，1959 年糧食多了，吃不完，農民就可以休息了，就可以放假一年（見丁抒著《人禍》288 頁）。結果 1959 年起好些省農民因無糧餓死的越來越多。難道毛澤東真的瞭解農民、關愛農民嗎？

再看看他怎樣對待年輕的男、女兵。延安時代，當毛澤東還是四十多歲的壯年，他便常常要年輕的勤務兵為他扣皮褲帶，綁鞋帶了。這豈不是開始當影子皇帝的派頭。住進皇帝宮殿的中南海，下屬為毛澤東和其他中央領導，先後設了兩個舞廳。每處都為他修了一間專用休息室。邀來舞伴多是各兵種總部文工團年輕姣好的女演員。毛澤東自然喜歡摟著她們跳，被選中的也以此為榮為樂，願為“偉大領袖”服務。毛澤東看透了她們的心。共舞中發現哪個年青女兵合心意，便領她進入專用休息室，“說情況”，兼有“肢體傾談”，一待一、二個小時。彭德懷元帥看不順眼，罵了句：“老毛想搞後宮”。這話對毛的生活帝皇化真是畫龍點睛，入木三分。京夫子著的《中南海恩仇錄》中記敘，設在春藕齋內的這個舞廳及毛的“秘戲處”，從 1960 年開始用，或一周兩三次舞會，或晚晚開，毛常常到場，他的“秘戲”演過多少？外人誰也說不清，知情的近衛們又為君者諱。直到 1972 年，毛因林彪事件氣得中風後行走不便，這舞廳才停止使用。毛的生活側面，對那些“偉大”謊言不是最大的諷刺嗎？毛帶頭生活腐化，與今天許多共黨領導幹部的同類腐化，是不是起了上樑不正下樑歪的影響呢？

毛澤東也曾被塑造儉樸、清廉的形象。可實際上，從“新中國”初立時大量印刷、發行毛澤東著作，即使相當部分由公家購買，他都一直照收稿費與加印數稿酬。而且著作中的大部分文章，如《矛盾論》、《實踐論》、《論聯合政府》、《論人民民主專政》、《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等等，都是中共中央組織的寫作小組撰寫，修改完成，再用毛澤東個人名字發表，這部分文章稿費他也全部照領不誤。他主政 27 年，毛著約引發五、六十億冊，到 1980 年

代，他的稿費積存了一兩千萬元（由鄧小平批示，予以凍結）。大陸知道這內情的人，都說毛澤東是“新中國”第一個首富。文革發狂般地濫印，花的卻是國家資金，成本總計起來恐怕是多少個億元。1976年，毛澤東去世前還領取加印部分的新稿費，並設專人爲他管賬。因此有不少人說這是變相貪污，應依法起訴。毛澤東從參加共產黨起，便不斷大呼“打倒封建地主階級！”1950年代，在中共中央會議上，他發指示：“要消滅資產階級，要消滅小生產者！”文革又狂喊“鬥私批修！”這系列言行，使大陸人在印象中是毛澤東最恨私有制，最恨剝削，最恨金錢！不愧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領袖”。誰能料到，他口頭、態度是這樣，隱秘行爲卻是愛錢如命，而且貪的是被他胡弄得國窮民困這樣一個國家的錢！何況他雙手還染滿人民鮮血！共以幾十年光陰、無數資源、無數謊言去塑造這麼一個“萬歲”、“萬萬歲”、“四個偉大”的政治大偶像，令民眾一律向他頂禮膜拜，服服貼貼，難道這不是又一個大國騙嗎？

大陸有人說，毛澤東已走下神壇，此話不完全對。過去至今，因中共某些領導認爲這個偶像仍有政治影響與瞞蔽人民的作用，只讓他從神壇的高高臺階上走下幾步，便急忙請他駐足，讓天下臣民繼續頂禮膜拜，特大油畫天安門城樓高掛，乾涸的皮囊仰躺在精美的高堂中，它的“偉大思想”依然入黨章進憲法……這個幽靈比大陸活著的十幾億芸芸眾生還要豪華、神氣！本來歷經八十年暴力革命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慘痛實踐、已檢驗出塑造毛澤東這尊神只是一個悠長陰暗的國騙，可改革開放以來仍有人半明半暗地大加利用，欺世保己，導致許多民眾至今視線迷糊，識別不出它的恐怖真面目！這是怎樣的悲哀？怎樣的絆腳石？

毛澤東是“新中國”金口定案及其賴以施霸的獨裁政體首創者，主政27年，發展到登峰造極。他自誇“我比秦始皇更秦始皇”，是狂妄自招的最佳寫照。他之後的歷屆繼任人，不論職稱是主席、總書記，或“垂簾聽政”，基本上都是蕭規曹隨，只有施政方式與程度的變化，但其中亦有兩位令人懷念的熱心政改者，如果當時他們得伸其志，大陸今天的政治局面，想已成大改觀了。

所謂“金口定案”，就是過去封建皇帝禦口一開，可定國事是非曲直，也可以定臣民一生榮辱與生死的現代翻版。這是政體落後、法制不張，不受任何約束、監督的極權。金口定案，有時還能切合實際，定的合理、正確，但也因高高在上，常常臆想、假設、主觀、武斷地去獨裁獨斷，由此它就必以謊言、假政爲基礎，顛倒黑白，錯置是非，枉殺善良，冤判無辜，遺患遺怨無窮！想不到不甘在野死拚濫打地去奪權、一而再高呼反對國民黨、蔣介石一黨專政、領袖獨裁、要爲人民爭民主爭自由的毛澤東，一旦坐上北京金鑾殿，迅即把昔日他的反對口號，變成自己施行惡政的準則，人性的虛偽、奸滑、無恥、貪權莫過於此。拿他的“爲王”及其社會惡果，同撤到臺灣的中華民國、蔣介石及其繼承者的執政與後果比，後者雖也有某些專制表現，但其憲政、民主、經濟的發展，比同期大陸的表現，不是優良太多嗎？比如說，毛澤東能“爲王”就證明他過去領導的暴力革命是正確的。十多年來，大陸不少富正義感的學者，依據史料對這個中國現代史懸案進行多方面的探索，得出一些新的結論。辛灝年教授所著《誰是新中國》，是其中代表作之一。這雖然無補於已過去的既定歷史，但如能廣爲傳播，引導他們在認識上把這一段被顛倒的歷史顛倒過來，端正史觀，提高民主意識，從而成爲促進中共政治改革的一份力量，還是有其意義。他們說“爲了要建立民主‘新中國’，才打倒中華民國”，我們再看看領導“新中國”的歷屆中共黨魁是怎樣仿效毛澤東“金口定案”，如何堅持獨裁政體，繼續常以謊話治國定案的事實，就可知道當年這句漂亮話也是謊言。

毛澤東主政27年，親自發動和領導“鎮反”、“土改”、“三反”、“五反”、“肅反”、“反右”、“文革”等政治運動。每次都爲開展運動撰寫一套“理論”，其實都是莫須有的捏造、詆毀被鬥對象的謊言，也即國騙。比如文革，他心中的焦點本來是要打倒被認爲是反對他的國家主席劉少奇以及一大批重要幹部。而他卻把文革謊言說成是爲防止黨內走資派復辟資本主義而要保衛社會主義的鬥爭，是共產黨與國民黨鬥爭的繼續等等，真是滿紙謊言。給劉少奇戴上“叛徒、內奸、工賊”的假罪名，就殘酷地把他整死。他金口一開，“地主是反動剝削分子”，即

使他們沒有毆打、殺害農民，不少人也被槍斃。國民黨軍政人員和黨、團員，僅是歷史問題，並無罪狀，金口一開定他個“歷史反革命分子”，便可以肆意殺害，有的人讀中學時因參加三民主義青年團，也被綁赴刑場槍斃。這種以謊言定罪殺人，據說有五千多萬人。可見“新中國”金口定案害人不淺，並且讓冤死者幾千萬遺屬留下深深的心靈創傷！

也說共產黨的“貢獻” 和民主自由的“缺陷”

試答舒天然先生的兩個問題

英國 鄒翔

讀了《黃花崗》雜誌第十四期舒天然先生的文章，筆者想嘗試著回答他文中的兩個問題。一個是他明確提出的反問：“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產黨難道沒有為中華民族作出一點貢獻嗎？”還有一個是作者留給讀者思索的問題：“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是否給全世界都帶來“政治上的光明和進步”和“經濟上的繁榮和昌盛”，看一看非洲、拉美地區的經濟發展現狀就可以了。”

我先不直接觸及這兩個問題，想從一個看似無關的問題入手：如何評價化肥質量的好壞？一個莊稼人，怎麼才能知道自己所用的化肥好不好？這個問題，沒有受過科學訓練的人可能會這麼做，把化肥澆灌在莊稼上，看秧苗是否一天天長大。也許五十六天後用尺一量，哇！苗子竄到這麼高了，難道你還能否認這是種好化肥嗎！因為這是鐵的事實呀！上化肥之前，我的秧苗只有寸把長，用了化肥後我的作物長到膝蓋上了，這能說化肥不好嗎？稍有科學頭腦的人就知道，這種評價方法是非常荒唐的。因為你沒有對比，就不能說明問題。所以在科學試驗中，總是要引入“對照”組的概念才能說明問題。你要想證明你的化肥有效，那就要設立對照實驗，讓另一組同樣的秧苗接受相同的土壤、光照和水分，唯一的差別就是不用你的化肥，看看它長得是比用化肥的快還是慢。也

許不用化肥的長得比用化肥的還快，那我們就不能說，用了這個化肥對作物生長有促進作用。只能說這是種劣質化肥，用了比不用更糟糕。

那麼我們現在再來看看中國共產黨對我們國家的貢獻，它究竟做了哪些可以樹碑立傳的好事。當然這個問題顯然比評價一個化肥的好壞要難得多，因為顯然我們不可能去做個簡單實驗來得出結論，更不可能讓時光倒流，把國家一分為二，一半為實驗組，接受共產黨的領導；另一半留做對照組，不要共產黨來領導。但是起碼我們在思索的過程當中還是可以遵循同樣的思路的。好了，按照前述那種偽科學測評的方法，我們很容易找到“毛主席老人家”領導的共產黨的豐功偉績：人民翻身做了國家主人；建成了大慶油田，甩掉了貧油的帽子；長江上“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等等，等等，例子一抓一大把。我們若用科學的思維，來具體分析一下這幾個“經典”的例子，它們能說明毛澤東共產黨英明嗎？結論是非也！中國人民翻身做了國家主人？我姑且假設這是真的，那我也還是要問，其他非共產獨裁國家人民難道就做不成國家主人嗎？恐怕比我們做的還好吧！建設大慶油田、長江上造座大橋，沒共產黨的領導就幹不成嗎？

年幼時思維簡單，記得當年老師給我們讀報上登載的黨向唐山地震災區人民派去的“人民子弟兵”奮不顧身搶險救災的報導時，每每能感動得我熱淚盈眶。98年洪災、2003年“非典”，政府也積極組織了救援工作，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也在煽情地報導，但是我卻沒那麼感動了。只是覺得那是一個政府應該做的，是他們的職責，而不是他們的功勞。更談不上什麼共產黨領導的優越性。人民不去追究政府在災難起因中的責任就已經算是寬宏大量了，談何感恩！民主國家的政府應對類似的災難也會積極的開展救災工作的，也許其中“可歌可泣”的事例還不比我們的少。他們的“子弟兵”在和平時期也是能救民於天災降臨之時的，而絕不是只會在大街上開槍向人民掃射。

一個國家以及她的人民不管什麼政權在統治，其追求更富裕的物質生活的原始欲望總是時刻存在的，經過幾十年的積累，總有些經濟建設成就。這些成就歸根到底是人民的成就，而不一定是統治者的成就。

一個開明的政府更能調動人民生產建設的積極性，人民的經濟建設成就就能夠更大。這其實和莊稼生長的道理是一樣的，有沒有化肥莊稼都是要長的，所不同的是劣質化肥會阻擾它的生長，優質化肥能促進其生長。灑了劣質化肥以後，我們總不能把作物的長高長大說成是化肥的功勞吧。要再追究劣質化肥對環境的污染和對生態的危害，那就更是罪該當誅了。

如果咬文嚼字談“貢獻”，共產黨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或是說共產黨能做到、而一個民主政府做不到的“貢獻”還是不少的，但是筆者實在想不出來共產黨的領導有什麼積極方面的“貢獻”。還望舒先生賜教，明確指出什麼是只有共產黨能做到的，而換了個民主政府就做不到的“千秋功績”。

下面再來討論舒先生的第二個問題，怎麼來探就“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和“共產專制”的優劣。舒先生說，看一看非洲、拉美地區民主國家的經濟發展現狀就可以了。其實不少和舒先生觀點相同的人(估計都是他的馬列主義同志)在辯論起這個問題時，更喜歡舉印度的例子，以證明民主不一定比共產專制好。我覺得這種舉“個例”的方法是不科學的。

請允許我還是繞個圈子，從一個不相關的事說起。比如有兩家藥廠，都宣稱生產出了治療“非典”的特效藥。如果我們得知，甲藥廠的藥給張三患者吃了，他就“神奇”地好了；而乙藥廠的藥給李四患者吃了而沒被治好，我們僅僅憑這點對比，就能判斷究竟是甲家的藥好，還是乙家的好嗎？答案是不能的。因為張三和李四的身體狀況也許各不相同，病情的輕重也不一定一樣。所以就憑個別病人的治療結果，是不能評價一個藥品的療效的。藥界評價藥品的療效，總是要組織幾百人，甚至上千人、上萬人來做療效評價的。這樣，在集合大到一定程度時，我們可以把“甲藥治療組”和“乙藥治療組”裏的患者其他方面的不同，設法降到最低，通俗些講就是被“平均”成一樣的了，這樣我們可以認為兩組患者的唯一差別就是服用藥物的不同了。比較這兩組患者的治癒率，我們就可以得出結論，究竟甲乙兩藥廠誰的藥更有療效了。

那麼，我們再來看看國家。非洲、拉美的“民主”國家和印度，它們與中國的國情差別很大，就這麼比較很難說其差別是政治制度造成的，還是國情造

成的。總之，我不贊同這樣的觀點，說因為印度比中國窮，所以民主不如專制；也不贊同因為美國比中國富，所以“民主政治和自由經濟”比“共產專制”好。這種比較是欠科學的。國家與國家的自然狀況和國情都不相同，單一的比較很容易產生謬誤。我更相信象藥效評估那樣，增大樣本數，做較嚴格的科學比較的結果。比如我們可以隨機抽取 20 個共產黨獨裁的國家，再隨機抽取 20 個民主國家(你不能故意只選歐美發達國家，但是也不能故意只選印度和非洲貧窮國家，一定要強調“隨機”)，然後再比較他們的人民生活水平，國家經濟建設狀況等等，做具體的統計分析，這樣也許能更可靠地得出哪種制度更優越的結論。當然樣本數是越大越好，結果更可信。只是遺憾的是，恐怕現在找不到更多的共產獨裁國家了吧？還能找到 20 個以上嗎？

迎客松

老人家不必見笑
我生在高處
難免有幾分高傲
只會低頭不會彎腰

小朋友何必嬉笑
立身在懸崖
當傾聽雲海波濤
如何是好如何是了

我的舞蹈拒絕紅塵的妖嬈
我的呼吸發出青山的微笑
一個深淵之上的思想者
為何被命運畫地為牢
我隨風劃出千萬個問號
每一個都是人間的鏢鏢

黎明脫下星辰的袈裟
黃昏卸下陽光的戰袍
一根根松針像挺直的脊樑
生死一樣屹立不倒
將身影再一次寫滿雲霄
明月與清風一般自豪



1949 之後 悲壯慘烈的反共游擊戰爭

（長文節選）

胡志偉

反共遊擊隊員三百萬人壯烈成仁

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第七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的報告中指出：「有意地保存一部份國民黨軍隊，讓它原封不動，或者大體上不動……這是又一種鬥爭方式。但是這種反革命遺跡和反革命政治影響，歸根到底要被肅清……他們中的許多人將被改造，他們中的一部份人將被淘汰，某些堅決反革命份子將受到鎮壓」。

五十天後，他簽署了〈中國人民解放軍佈告〉對國民政府黨政軍人員作了「准予量才錄用，不使流離失所」的承諾，然又加上「無嚴重的反動行為或嚴重的劣跡」的但書，至於「反動行為」「嚴重劣跡」的定義如何，則由中共當局主觀界定，逕由各級軍管會或軍事法庭一審判決執行，並無獨立機構監察制衡。兩個月後毛澤東為紀念中共成立廿八周年，寫了〈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把這種濫捕濫殺定性為「向著帝國主義的走狗即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及其幫兇們實行專政，實行獨裁」。這就為此後大規模的屠殺異己埋下了伏筆。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共在北京建政。斯時川東川北猶在激戰。九日中國國民黨總裁蔣中正於臺北發表〈告全國軍民同胞書〉，號召國軍「在短期內完成相當的準備，發動積極的反攻」，此後國共內戰在西南與沿海島嶼繼續激烈展開：成都撤守是在十二月廿六日，西昌撤守則延至翌年三月廿七日。但是隨著土改、鎮反運動的深入開展，大陸各地反共民眾紛紛揭竿而起，少數民族的抗暴鬥爭也風起雲湧，一批業已投共的國軍官兵則伺機反正。在廣西、湖南等省，地方反共武裝結合國軍遊擊部隊，一度達百萬之眾。當時，在台灣中華民國尚處於風雨飄搖境地，美國政府宣佈在台海採中立立場，所以大陸各地的反共遊擊隊在內無糧草、外無援兵的情況下，被共軍各個擊

破，景況極為慘烈。中共宣稱投入一百四十多個師的兵力，歷時四年才將這場「中國歷史上最大的『匪患』」平息下去」。

五十年代大陸的反共遊擊戰爭究竟付出了多少人命代價呢？據一九六九年四月

七日莫斯科電台廣播，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二年有二百八十萬人被毛澤東處死；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有三百五十萬人被殺。在一個月內處死的最高數字則是北京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透露的：皖浙蘇魯四省一個月之內死了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人；在華中和華南，一個月內則死了一百五十萬人。中共內務部長薄一波在鎮反報告中提及：「為了永久的和平，為了人民民主，在過去三年半（一九四九——一九五二），我們清算了二百多萬土匪（按：指反共遊擊戰士）」

法國外交官傑奎斯·圭拉麥將軍估計，從一九五一年二月至一九五二年五月間，至少有三百萬人被中共殺害。

在台灣方面，自然樂見大陸上反共游擊武力發展壯大，一九五〇年四月十三日臺北中央日報頭版以大篇幅報導“游擊武力遍佈大陸，到處活躍對抗共匪”。同年十一月廿六日，又以頭版報導“大陸反共游擊武力，艱苦奮鬥壯大起來”。十月廿五日中共宣佈出兵「抗美援朝」，國軍總政治部副主任張彝鼎召集中外記者會，報告中國大陸反共遊擊隊發展狀況，證實有一百六十一萬四千六百一十人，其中以西南地區力量最大，有四十七萬七千六百卅人。一九五三年，國軍總政治作戰部主任蔣經國抵美時接受傳媒訪問，則宣稱有七十五萬遊擊戰士正在同中共作戰。

這支數以百萬計的反共遊擊部隊，在上世紀五十年代為中國的獨立、自由、民主，以自己的血肉之軀，扮演了感人至深、慷慨悲壯的一幕。可是，由於傳統的「成王敗寇」歷史觀的茶毒，他們的英雄事跡長期湮沒不彰，甚至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國防部史政編譯局，也鮮少有關大陸反共遊擊隊的記載與出版物，儘管他們之中相當一部份官兵本係國軍戡亂部隊，而且部份指揮官是由台灣奉命回大陸指揮護國遊擊戰爭的。

五十年代初期大陸反共遊擊戰中，有一位不可忽略的風雲人物——毛森。那時菲律賓華僑組團訪問台灣，敬獻三面錦旗，第一面獻給總統蔣公，第二面獻給行政院院長陳誠，第三面便是獻給毛森，由此可見此人曾炙手可熱、權傾一時。

殘殺俘虜慘絕人寰

自一九七八年大陸改革開放以來，價值觀念漸漸遠離僵硬的馬列教條，自上而下充斥了「一切向錢看」的信念。作為清水衙門的檔案部門，為了「創收」，也動開了賣檔賣檔案的念頭，所以塵封幾十年的反共遊擊隊檔案便得以重見天日，雖然開放檔案幅度有限，但也足以使外人窺見共產鐵幕遮蓋下之冰山一角。

一九九九年九月，共軍總政治部直屬的解放軍出版社推出《新中國剿匪紀實叢書》，洋洋灑灑六鉅冊二百廿萬言。其作者根據中共中央及各省市自治區檔案館、各大軍區政治部、各省委黨史研究室、各省市地方誌辦公室、軍事科學院資料室、軍事博物館資料室、全國政協文史辦以及解放軍檔案館所存檔案，披露五十年代初期共軍在華東、中南、西南、華北、東北、西北地區分別殲「匪」（按：中共席捲大陸之後，仗著成王敗寇的定律，便把國軍留在大陸的殘部、保安部隊以及敵後遊擊隊統統視為「土匪」而以大部隊圍殲之）四十一萬六千、一百十五萬、八十五萬、兩萬九千、七萬九千、六萬人，合計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考慮到東北、華北陷共較早，反共武裝相對較弱，且統計數字截止期是一九四七年五月與一九四九年五月；而中南、西南陷共較遲，國民黨在南方有較周詳的布建，且統計截止期為一九五二年六月與一九五〇年二月（華東為一九五二年八月，西北一九五〇年一月），所以南方殉難人數數十倍於北方。再者，中共慣用「殲滅」這個含糊性的動詞，泛指殺死、殺傷、俘虜的總數，但時隔半個世紀，愈來愈多的剿「匪」部隊成員撰寫回憶錄，承認「那時國民黨兵敗如山倒，大批的降兵讓押運的部隊疲於奔命，上面乾脆下令：除了團、營一級的俘虜軍官留下審訊，其他俘虜由連一級指揮員自行處置……最常用的辦法就是乘夜晚分批押到河邊、山邊用刺刀捅死，用他們自己挖的坑埋掉，每天都要殺一兩批人」，用國軍俘虜練刺刀還不過癮，一些共軍中下級軍官還挖出俘虜的心肝切

片炒熟了下酒。即便僥倖逃過鬼門關，在戰犯監獄與遣送回籍監督勞動的國軍被俘官兵無一避免歷屆運動的殘酷折磨，死得更慘。所以，共方公佈的殲「匪」二百五十八萬四千人，其中絕大多數可歸入非正常死亡的類別，這同薄一波所宣佈的「清算二百多萬土匪」已經比較接近了。柏林自由大學教授郭廷鈺在其傳世之作《中國現代史》中指出「反共游擊隊被害者約三百萬人，國民黨遺留在大陸的黨員被害者約一百四十萬人」同薄一波所承認的殺人數字大體吻合。倘若加上五十年代中、後期反右、肅反、西藏平叛諸役的殺人數，則遠遠不止區區三百萬人了。

大陸撤守前，蔣公在日記中寫道：「今日的仇敵，是堅強、惡毒、兇險的共黨，我們用什麼辦法來對付敵人呢？只有以新的精神、新的力量、新的生命來迎接新的時代，奠定新的基礎」「我們今天要前進，莫退，莫退，前進！我一定要不屈不撓地奮鬥下去！」他所說的「新的力量」「新的基礎」就是指當時散佈於全國各地的地方遊擊隊，擬把建立與發展地方武裝、開闢敵後戰場，作為反攻大陸、收復失土的重要手段。

國民黨退守台灣後，土地只及大陸的三百份之一，人口只及六十份之一，無論從社會資源、外交情勢諸方面考量，派人滲透大陸乃至反攻大陸，都不啻以卵擊石。蔣氏父子對兩岸力量的對比洞若觀火，但仍然不屈不撓，知其不可為而為之，那是基於道義與使命感——作為中華民國締造者、捍衛者的中國國民黨，如果由於戡亂失利退居台灣便主動放棄光復大陸的責任，那麼即使她能在台灣安和樂利、繁榮富足，也只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所以國民黨對彼岸的中共政權無論如何也要做出枕戈待旦的攻擊姿勢，哪怕派飛機擲下反共傳單或以空飄、海漂形式向大陸飢民贈送些糧食罐頭，也足以使億萬受苦受難的大陸同胞知道國民政府還在寶島台灣存在並依法施政，不至於完全忘懷。所以，儘管突擊隊登陸後很快全軍覆沒，儘管空飄、海漂的食物大多數被大陸軍警沒收而到不了百姓手中，但是對大陸的襲擾工作仍然堅持了四十年之多。

（本文所餘三萬字，下期仍將節選，全文並將於黃花崗雜誌網站上網，敬請讀者閱讀。另作者投稿「蕭縣游擊戰爭」一文因已在網站發表，本刊臨時撤稿，特此敬告作者）

惡性心腦型腳氣病的治療：

310 例臨床分析¹

張育明ⁱⁱ

審閱者：鄒蔭方ⁱⁱⁱ、李明俊^{iv}、徐鶴皋^v、楊永年^{vi}

編者按：腳氣病係因硫胺極度缺乏所引起的一種營養性疾病（1-16）。本報導稱謂心腦型腳氣病者是指一定特殊羣體在極端饑寒和高度體力消耗與精神壓迫環境下所發生的一種暴發型維生素 B 族耗竭症候羣。發病極為兇險，如不極時診斷，加以有力搶救，所有患者可當即暴死。此綜合症之發病者如內燃機之突然熄火一般，可謂無生還之望。筆者在 1958 年至 1962 年中國大陸在大躍進和「人相食」的饑荒年代，在河南省挖水庫、修公路、築鐵路、造石料、開礦山等極度體力耗竭的工地上，曾搶救過大批這個類型的患者，在診療過程中走過彎路，所得的教訓是慘痛的！從而在實踐中所獲得之經驗也是寶貴的。現嚴格選擇其中診斷明確、記錄較詳的共 310 例，分析報導於下，並著重討論其發病機制及療法療效問題，以供大家參考並希批評指正。

診斷標準

本組病例的診斷標準為：（一）發病前有強重體力勞動和營養不良史 5 個月以上；（二）體檢可查到有不同程度的舌炎、口角炎、牙齦炎、糙皮病等多種維生素缺乏的體症，（三）在勞動中暴發性起病，發病後 1-3 小時內從各工區抬到工地醫院急救者；（四）臨床表現以深度昏迷和心源性休克為主；（五）除未被搶救的死亡病例外，對大劑量鹽酸硫胺治療有明顯的療效（死亡的病例中，發病情況相同且查不出引起急性昏迷和周圍迴圈衰竭的任何其他原因）。

資料分析

一、一般資料：

1、性別及年齡：本組病例全系男性強重體力勞動者，年齡在 18-30 歲者，26 例，占 8.3%；31-40 歲

者，67 例，占 21.6%；41-50 歲者，111 例，占 36%；51-58 歲者，106 例，占 34.1%。

2、發病月份：3-5 月，190 例（61.3%）；6-8 月，21 例，（6.7%）；9-11 月，18 例，（5.8%）；12-2 月，81 例，（26.2%）。分析說明發病以春季最多，冬季次之，這顯然與當時當地春冬兩季缺乏新鮮蔬菜、食物單調（以薯乾面、咸蘿蔔為主）、氣候寒冷、露天作業、同時伴有體力消耗極大和當時精神處於高度緊張狀態有關。

二、臨床表現：本組病例均系在強重體力勞動過程中急性發病，從症狀暴發到進行急救的時間為 1-3 小時。本組病例與其他相當數量未統計在本組內之患者不盡相同，概本組患者均經嚴格選擇符合診斷標準且均為非有明顯消瘦者，半數患者僅有輕度兩下肢凹陷性水腫。急救時的臨床表現，除一般維生素缺乏的徵象外，主要為心血管和腦神經系統嚴重的急性機能障礙，以後者為先發症狀。患者均處於深度昏迷、瞳孔擴大、角膜反射消失、心音微弱、血壓下降（收縮壓 80 毫米汞柱以下）、四肢或及全身發涼，奄奄一息，生命瀕於極度危險狀態。

1、症狀：據追問 259 例經搶救而復甦的患者，他們在急性發病前 1-4 個月就已出現各種不同程度的多種維生素缺乏症狀，如舌痛、口角糜爛，流涎腹脹、四肢麻木、下肢沉重、小腿脹痛、全身發困和容易疲勞。全部病例在急性發病前 2-5 日內都曾有超重體力勞動及/或神經精神高度創傷病史。均呈現以下明顯的前驅症狀，如抑鬱、煩躁、焦慮、胸前發緊發悶、心前驅隱痛、心跳氣短、視物模糊、眩暈耳鳴、終日昏沉若有所失、如處夢境、精神緊張惶恐。但本組患者原有體質均甚良好，自然條件優秀，身體高大者居多，且從無或很少患病史，故而他們才必須並才有可能繼續堅持操作原有之簡單的強重體力勞動。昏迷前約半小時左右，患者開始感覺精神恍惚，多數自訴「魂不附體，兩腳如踩棉花」，顏面肌肉（特多見於嘴角及外眼角附近）發生陣發性抽搐，嘴唇、口腔、全舌及嗓子發乾發麻，眼前天地呈現一片蘭黑，頭皮發麻，頭沉發脹，耳鳴如氣笛，「腦袋裏好象打雷打閃」，就是在此時，本組全體患者仍在昏沉夢境中堅持操作原來的簡單體力勞動，但旋即有「一股氣從心窩處經胸往上衝」，隨即跌倒不省人事。部份病例分

別有：膈逆 47 例（17.9%），此系惡兆，有此症者予後多屬不良；尿道灼痛 149 例（56.9%）；噁心或/及乾嘔 219 例（83.2%）；小便失禁 184 例（69.9%）；大便失禁 24 例（9.1%）；流涎過多 194 例（74.7%）；尿量顯著減少 159 例（60.4%）；言語不清 56 例（21.3%）；聲嘶 44 例（16.7%）。經過治療後，除少數症狀如四肢麻木（尤其是手指足趾），聲音嘶啞和頭暈腦脹等消失較慢外（需 1-2 個月），絕大部分症狀均可於用藥後 1-3 周獲得好轉。個別例中，有些症狀改善很慢，如有一例聲音嘶啞竟持續達 7 個月，有 14 例股外側（坐骨神經分佈區）有如掌大的區域麻木感持續 9 個月後方始消失。全組恢復患者幾乎無例外地在病癒後均顯示有程度不同的精神改變，大多表現為沈默、寡言笑、對周圍事物缺乏興趣和與世無爭、逆來順受的性格改變。

2、體徵：本組病例于入院時均處於深度昏迷及休克狀態。呼吸增速者 206 例（65.9%），隨著病情的惡化，可迅速轉化為過緩；緩慢少於 16 次者 74 例（23.7%），此系危象，呼吸愈緩慢，其病勢愈兇險，死亡病例中入院時呼吸竟有低至每分鐘 8 次者。角膜反射均消失，瞳孔散大，失去反應。收縮期血壓均降至 80 毫米汞柱以下，其中 172 例（55%）測不出。心率過緩者 220 例（70.4%）；在 38-60 次之間，平均 49 次。心率在 90 次以上者僅有 48 例，最速者 116 次，故心率大於 90 次就被認為是增速，僅占 154 名。叩診心臟濁音界在本組病例均未發現明顯擴大，限於當時條件未能做 X 線檢查或心電圖描記、甚屬遺憾！對心臟擴大問題，1976 年日本學者有馬氏（8）曾經論及該國近年來發現有迴圈系症狀的腳氣病患者，甚至經 X 光線檢查也未能找出心臟擴大者之病例，但經硫胺治療後心影更為縮小，故仍然認為心影雖無擴大之心臟原本就有擴大。故此對本組患者叩診心濁音界雖無明顯擴大並不意味著心臟本身原本就無擴大。

根據我們對相當數量各種類型腳氣病患者所進行的臨床觀察和實際體會認為，所謂濕型腳氣病患者多為早中期之比較慢性進行性以下肢水腫為主要表現的全身性浮腫患者，有不少病例出現全身性漿膜腔積液，此類患者多因症狀包括神經系統症狀（有神經系統症狀如手腳麻木感覺等並不就是乾型）出現較早且明顯，這就迫使患者及早地減輕勞動或獲得休息，如

此就可使心腦機能得到一定的緩衝和保護（5、7、9），從而給心臟以發生代償作用之條件和機會，但終因未獲得膳食改善及/或正確診療，因而就發生心肌肥厚及/或心室擴張，如此就是一般文獻（1、6、8-11）所描述的心臟以向右擴大為主，向左擴大次之，向上擴大輕微的所謂「錢袋形」腳氣病性心臟（8）。此類患者的心率多在 100 次左右，頸靜脈可有不同程度的怒張、肝可腫大、腹水，甚者呈現端坐呼吸，雙肺底部有囉音，舒張壓可低至零，心律不齊者占少數。本型患者如發生包括大量心包積液的全漿膜腔積液時，則病人多平臥，大多精神萎靡、兩眼凝視、表情呆滯。膝腱反射可遲鈍，可消失（乾型者則大多消失）。此類患者最易因急性心機能不全而死亡，但予後較諸乾型者為佳，如能及時改善膳食並獲正確治療，則濕型患者可望痊愈並可迅速地恢復勞動能力。而以神經肌肉萎縮為主要症候的所謂乾型腳氣病實際上都是本病的晚期患者，在我們觀察的病例中，可謂無例外的均由經過不經徹底或從無正確治療和膳食改善而倖存下來的濕型患者發展而來。我們體會乾型並非一發病就呈現乾型而是本病已發展至晚期的患者。濕型尿頻而尿量少，乾型尿急而尿量多。乾型大多呈全機體性萎縮而以神經肌肉萎縮為主者，只有少數「黃乾瘦」患者可在前脛腓骨部位表現有輕微指壓性水腫，而「黑乾瘦」患者絕無發現有水腫者，晚期之乾型患者大多萎縮成「皮骨人」即成為慢性萎縮型麻痺性腳氣病患者。我們曾觀察到具有 WERNICKE 氏病的臨床表現者也僅見於乾型患者之中。就在這些「皮骨人」中竟還能有極少數病例拖著下垂的雙手兩足，步履蹣跚地掙扎活動。有一例 28 歲青年陳某，體重僅遺有 34 斤！但他仍不時地在室內外行走，生命止息何難？最難地是機體就是處於如此狀態，尚能以喘息存活！這深刻說明大自然在歷史長河中對機體精雕細刻所賦予生命的應激緩衝能力是何其強大！本型患者的心臟濁音界是縮小的（可能其縮小的程度較其他細胞器官為輕）甚至難以叩出。這類重症萎縮型患者的每一個細胞均可發生或稱謂不可逆性的萎縮性變化。他們的心音微弱、只在肺動脈區較為響亮，心率多數緩慢、心律也大多不齊，以過早搏動及二三聯律最多見，脈搏微弱幾不可觸，收縮期血壓多在 50 毫米汞柱左右，四肢甚至全身發涼，只胸骨左右發溫、聲嘶氣

促，上眼瞼下垂及面神經麻痺者有之，痙攣者有之，此類患者多終日捲曲床上，表情痛苦，無聲無息。對這類患者無論怎樣進行診療，有時確實很難使他們扭轉進行性加重萎縮的病程，獲救者只是少數比較早期而比較年輕且經長期（半年以上）精心調治的病例。大多數本型患者最終多死於腸炎、痢疾、肺炎、肺結核、褥瘡等併發症。部分患者可于凌晨（多在晨 3 時左右）死於低血糖性昏迷。尚有少數病例可因暴食一餐（如肉絲麵條）而死於急性胃擴張。另有少數患者可因一時心情激動或神經精神創傷突然小哼一聲，臉色當即蒼白，口角流涎，眼球白翻，額頭鼻尖可有汗珠，醫護人員往往未及搶救，呼吸心跳就已停止。對這種因末梢血管擴張所造成的急性虛脫，才應稱謂一般所描述的「衝心型腳氣病」。而如本組之暴發性包括致嬰幼兒于非命的急性型，我們認為應稱之為「惡性心腦型腳氣病」為宜。生活實踐和醫療實踐能夠提供很多資料說明腳氣病之症候可因當時、當地硫胺缺乏程度之輕重、緩急、並存因素和所處與流行病學有關的內外因素和客觀條件之不同而可使其症候學有相當大的變化幅度。

本報導組之半數患者僅可在肺動脈區聽到微弱的心音。心律紊亂者 16 例（51.9%）；以過早搏動及二三聯律為主，僅有二例酷似心房纖維性顫動。兩肺底部可聽到囉音者 169 例（54.5%）。有輕至中度紫紺者 132 例（42.5%）。僅 11 例顯肝臟腫大，只占 3.5%，這是充血性心力衰竭的一部分表現抑或是因營養不良所致肝細胞變性的結果，尚難斷言。但本型患者病情的發生、發展和轉化均極為迅速，且僅少數病例有輕度肝腫大（右肋下小於 3 釐米），而臨床檢查並無明顯的心臟擴大，在治療上也未曾使用過對抗心衰的藥物，而病情在這方面也無進一步暴露，故在本組病例中，充血性心衰的證據是缺乏的。此外均查到有各種不同程度的其他維生素缺乏徵象；手足背面及/或頸部之糙皮病表現者 52 例（16.8%）、舌炎 110 例（35.5%）、口角糜爛 224 例（72.2%）、（牙齦炎 152 例（49.0%）、皮膚乾燥及不同程度的毛角化（下肢較著）161 例（51.9%）。全組患者均顯手足及/或全身發涼、腹部膨脹和深淺神經反射消失。值得著重指出，本組病例曾見到 49 例（15.8%）有臍的糜爛，糜爛由臍中心向外擴散浸及臍周皮膚，呈淡粉紅色並有

滲出及出血，經結痂、乾燥有裂隙、有痛癢感，長者 8 個月未愈，經外塗龍膽紫藥水，滴各種抗菌素液均無效。後發現臍病變外觀及轉化規律和口角炎相似並一致，乃試滴核黃素水濟，5 日內即乾燥、結痂、脫落後痊癒，以後也不再復發。故此種臍糜爛或稱臍炎當系核黃素缺乏症的一個表現，尚未見其載諸文獻，故可認為系新發現的一種特殊體徵。本組患者之一般體徵均可於治療後一個月內先後消失，唯過早搏動及腓腸肌壓痛持續時間較久。有 10 例患者經 3 年之觀察，一直有過早搏動。

3、實驗室檢查：本組病例，大多顯輕度貧血，血紅蛋白 8-11 克，紅細胞 300-400 萬，白細胞計數及分類則大致正常。糞有蛔蟲卵者 245 例（79.0%）；有鉤蟲卵者 51 例（16.4%）。尿常規檢查均正常。56 例曾做腦脊液常規檢查均無異常發現（淋巴細胞個別例可多達 8 個，但絕無多核細胞發現）。限於當時條件未能測定血丙酮酸含量、血鉀定量或血清蛋白檢查等。

三、治療方法和結果：本組病例均採用綜合性治療，包括一般急救和不同方法的大劑量硫胺療法；

1、一般急救療法：本組病例曾全部使用，包括；（1）休克體位、保暖、針刺人中和人工呼吸；（2）尼可刹米及安鈉加交替肌注，每 15-60 分鐘 1 次，直至清醒或死亡；（3）複合維生素 B 液（每 2 毫升內含硫胺 10 毫克、核黃素 0.3 毫克、尼克酰胺 10 毫克、泛酸鈉 4 毫克）4 毫升肌注，每日 3 次、5 日後 2 次、10 日後 1 次，15 日後改為口服複合維生素 B 片，3 片每日 3 次；（4）50%葡萄糖液 40-60 毫升混合抗壞血酸 500 毫克靜脈注射，每 2 小時 1 次，連用 3 次後改為每 8 小時 1 次、3 日後每 12 小時 1 次、6 日後每日 1 次，10 日後停止注射改為口服抗壞血酸片 100 毫克，每日 3 次；（5）25%葡萄糖 40 毫升由股動脈向心注射，每 40-60 分鐘 1 次，直至收期血壓穩定在 90 毫米汞柱左右。

工地醫院當時急救工作開始時，曾對患者當時處境與膳食情況做過一些調查和分析，著手就使用複合維生素 B 肌注和抗壞血酸葡萄糖靜注就是當時思想傾向的明證，但我們對本病之暴發型原來可只聞其名而從未見其實，尤其未曾想到過在臨床上竟有如本組病例之如此兇險者！故對開始階段數量的病例，僅使用此 5 項在當時認為還是比較全面的急救療法，曾希冀

患者很快蘇醒並糾正休克，實踐證明，不僅未達預期的目的，卻也未能使 1 例患者獲救！並且有相當數量的患者就是在靜注葡萄糖時呼吸心跳停止。情況兇險！責任沉重！教訓慘痛！關鍵時刻，筆者忽然猛省，回憶業師鄒蔭方教授曾講述解放前在上海，曾有一些外觀看來體質並不壞的拉車工人，在緊張的強重體力勞動中突然跌倒死亡者，後確診為暴發型腳氣病。經鄒蔭方教授啓發和當時的險情，迫使我們急切採用大劑量硫胺療法。

2、大劑量硫胺療法：根據採用方法不同，分做以下三組：（1）鹽酸硫胺 500 毫克肌注組：每 2 小時肌注 1 次，共用 3 次。依此法共治療 34 例，死亡 27 例，死亡率為 79.6%，均在第 1 次注射後 10-90 分鐘內死亡，故死亡例只肌注硫胺 1 次，其中 8 例由昏迷轉入躁動後 30 分鐘左右又昏迷死亡。獲救的 7 例，均於注射硫胺 1-3 小時後開始躁動不安及呼喊，經過 3 小時左右轉為安靜嗜睡，又隔 1-3 小時後方始逐漸清醒，清醒後，患者精神極度抑鬱，表現極為痛苦和疲乏。（2）鹽酸硫胺 500 毫克混合 50%葡萄糖液 40 毫升靜脈注射組：緩注 10 分鐘，每 2 小時 1 次，共用 3 次。依此法共治療 119 例，死亡 18 例，死亡率為 15.1%，均在第 1 次注射後 10-60 分鐘內死亡，故死亡病例只靜注硫胺 1 次。本組患者一旦轉入躁動，就無死亡者。獲救的患者，在第 1 次靜注硫胺後 60 分鐘左右，出現躁動之後，複經 1-2 小時漸轉嗜睡，又經 2 小時左右後清醒，均表現抑鬱、痛苦和疲乏。（3）鹽酸硫胺 500 毫克混合 25%葡萄糖液 40 毫升由股動脈向心注射組：只注射 1 次。依此法共治療 157 例，死亡 6 例，死亡率為 3.8%，未獲救者均於注射硫胺後 5-20 分鐘內死亡。治愈的病例均於注射硫胺後 30 分鐘左右開始出現歎息、翻身、乃至突然坐起、張望四周、有如大夢初醒，均表現抑鬱、痛苦和疲乏。本組患者多在 1-2 小時內清醒，部分病例在恢復過程中曾出現情緒煩躁、輾轉反側、但均無躁動現象。

以上三組共 310 例，共死亡 51 例，總的死亡率為 16.5%。上述三組的治療，除採用大劑量硫胺的注射方法不同外，其他治療則完全相同，但三組的療效差別極為明顯，說明大劑量硫胺的給藥方法對本病之預後起到決定性作用。我們認為發病後救治愈早並採用大劑量硫胺從股動脈向心注射的療效最為顯著。

討論和結語

一、惡性心腦型腳氣病的發病機制：本組患者之所以在發病當時尚在堅持操作強重體力勞動且均系在勞動過程中急性發病，就是因為他們素有良好體質而無明顯消瘦，尚且未及形成一般臨床上所稱謂的；症候局限在神經肌肉系統為主的所謂「乾型」、合併有明顯水腫的所謂「濕型」以及以心機能不全為主的「心型腳氣病」之故（4）。也正是因為他們素具某些優秀的自然條件包括忍辱負重的堅持性和遭受重壓時表現突出毅力精神領域的成熟性，故此才造成本組惡性腦型腳氣病這個非等同於一般文獻（1、6、8、9、14）所描述的特型出現。僅半數患者顯兩下肢輕度凹陷性水腫，當與膳食中長期缺乏或無蛋白質及其原有體質本身長期遭受消耗有關。注射強心劑、呼吸興奮劑、靜脈乃至有暫時升壓作用的動脈內注射大劑量高滲葡萄糖液等均未能使本組患者得救，且曾有相當數量的類似患者就在注射葡萄糖液的當時呼吸心跳停止！實踐發人深省，我們曾疑慮在機體的酶系統遭受急劇破壞的當時，使用強心劑和葡萄糖液不只無益還可能有害甚至促成呼吸心跳停止加速死亡遺憾地是限於當時條件，實難做縱深探討。全組病例雖進入深度昏迷也無多汗、四肢震顫或驚厥等，加之對此急救療法無效，當可排除營養性低血糖性昏迷或一般原因之休克。從採用大劑量硫胺的療效來看，可以斷定本組患者系在硫胺逐漸地、隱匿地缺乏的基礎上，在機體極盡適應、調整、應激和緩衝之能事後，因促突破病變因素的出現，使重度的硫胺缺乏轉化為迅猛地突急性加劇，在臨床上就暴發出有如本組患者所表現的兇險的心腦症候群。

腳氣病的主要症狀雖然大同，但其表現也會一個年份和另一個年份，一個地方和另一個地方可能存在小異乃至大異。其顯然差異主要由硫胺缺乏、耗損和需求的輕、重、緩、急程度所決定，而且也和其他並存因素例如酗酒、感染、高溫（或低溫寒冷）作業和體力急劇消耗等均密切相關（7.8）。促成本組患者的突變因素當以長期得不到補充而又在急劇消耗的體質又迅猛地在神經精神高度緊張狀態持續進行極度的急劇消耗之故。即在比較相當短暫的緊迫時間內發生如此劇烈的壓倒式生物物理學和神經體液調節機制的重創性大改變已大為超過機體的適應、緩衝和耐受能

力，這種罕見的臨床所見就是機體內外環境的有機統一和調節反射機制所遭受的重創已達到非生命力所能及的程度，猶如正在啓動著的內燃機之突然熄火一般，本組患者之所以如此發病，其癥結就在於此。試想最近幾年在比較發達的國家，曾有一些生活富裕、體格健美的運動員在參加比賽之後尚且可以發生腳氣病，均實事求是地予以報導（8），而本組患者發生此型暴發疾患當也可為臨床家所理解。我國近年來也屢續有所報導（14）。

因為正常的生化活動有賴於各種酶的參與才能進行（2、7、12、16）。硫胺之噻唑核的鹼性羥基與二分子的磷酸基以酯鍵結合成輔酶型硫胺即硫胺焦磷酸鹽，此活性硫胺在線粒體中對丙酮酸氧化脫羧酶輔酶的丙酮酸脫羧酶、一羧基戊二酸脫氫酶複合體和構成磷酸己糖短路中的轉酮酶三者都有極其重要的代謝作用。醣在細胞內分解時，經無氧酵解所產生的丙酮酸，其進一步氧化就需要這種脫羧酶和脫羧輔酶才能完成，使丙酮酸脫出羧基使成二氧化碳和水，同時釋放大量的能，就是丙酮酸先成乳酸再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也必須有此酶參與才能完成，這個生物氧化的觸酶即脫羧輔酶就是這個硫胺焦磷酸鹽，故硫胺一旦缺乏，這種酶形成不足及/或難於形成，丙酮酸難於進入三羧迴圈。氧化脫羧作用不能進行，如此不僅醣氧化不完全而且三磷酸腺苷脂肪酸的合成也受阻，這就不僅影響機體的能量供應，而且丙酮酸、一酮戊二酸和乳酸在體內大量堆積，組成細胞的氧化代謝機能發生障礙。丙酮酸等的堆積，對機能危害甚大，以中樞神經和心血管系統首當其衝（4、5、8）。此外硫胺缺乏時膽酸脂酶的活性增強，乙酰膽鹼的水介作用加速，當即影響神經傳導。具有三個分子磷酸基的三磷酸硫胺在腦神經中參與一定的機能作用（4、8）。縱然硫胺與神經機能之間的確切生理機能和作用迄今尚未完全明確，但可肯定腦神經細胞的活動是完全依靠醣的燃燒作為能量來源的（2、12、15）。心肌的活動也是以醣的燃燒作為主要的能量來源，只於必要時，脂肪酸也可提供一定的能量（8、12、15）。本組患者的先發症狀是嚴重的腦神經機能障礙就是此理的有說服力的說明，只當高級神經的營養調節機制對機體的統帥機能發生紊亂和失靈之後，暫時由因硫胺極度缺乏致合成也嚴重受阻的脂肪酸提供能量尚在勉強堅持活動

的心肌才比較被動地卻是迅速地隨即發生機能障礙，故本組病例系以「衝腦」為主且在先，「衝心」為輔而在後。

硫胺焦磷酸鹽在神經興奮膜中含量甚為豐富，腦組織受刺激後能釋出硫胺焦磷酸鹽，因之它作為興奮膜的結構成份當然就與其興奮機能自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故硫胺缺乏對神經興奮進而對腦神經之整體機能必然影響至大（4、8）。同時，硫胺做為丙酮酸和一酮戊二酸的脫羧酶，在醣分解和脂代謝中產生出乙酰輔酶 A，這種乙酰輔酶 A 可進入三羧酸迴圈，繼續氧化供能，同時乙酰輔酶 A 對三磷酸腺苷的產生極為重要（2、12、13），故缺乏硫胺時，即導致心肌收縮能的缺乏，同時因周圍血管擴張造成周圍血管阻力減低，此種血液動力學改變和心機能不全均系心肌因硫胺缺乏所致能量產生障礙之故。故當機體長期缺乏硫胺後，首先是腦神經、其次即心臟這兩個生命器官的機能活動因能量供應缺乏等因素而處於嚴重的進行性損害狀態，如不迅速糾正，則其機能紊亂和形態異常必然處於數變過程中，遇有促成突變的因素，當可發生質變的飛躍。如本組病例所見，發病均系在強重體力勞動過程中並有神經精神重創等明顯誘因，沒想這些因素定能使正在進行體力消耗的機能代謝率又迅猛地增加，對能量的需求也必然地隨之急劇增加，這就促使體內環境更進一步處於總動員之應急狀態。同時在體質極度消耗過程中，醣也必然又大量而迅速地通過各種代謝渠道動員出來燃燒，但體內硫胺的缺乏已達極點，機體已無能進一步提高能量供應，腦、心二生命器官為最大限度地維持原來簡單的機械性體力活動所必須的最低能量要求耗盡後又得不到新的補充，就是在此瞬間，即造成因硫胺缺乏這個癥結所致之生命活動障礙和急性心源性休克為主的綜合病症，臨床表現為深度昏迷和周圍迴圈衰竭，這就是本病惡性心腦型發病機制的關鍵所在。

本組病例均伴有不同程度的核黃素、尼克酸和抗壞血酸的缺乏，設想也會有血鉀的缺乏，這就更加促使機體代謝在許多重要環節上的失常（2、7、9、10），故而更加降低機體的緩衝應急能力，而促使病情複雜化和病勢嚴重化。故在治療上採取大劑量硫胺的同時，補充其他維生素還是有一定理論基礎的。

二、股動脈向心注射硫胺的療效和機制：基於上述，從代謝角度觀察腳氣病症候的發生系由於丙酮酸、一酮戊二酸和乳酸的急劇堆積和三磷酸腺苷，脂肪酸等產物極度缺乏以及由它們所導致的惡性循環和綜合性不良連鎖反應之結果所造成。為突破這些代謝中的致命性失常，加速丙酮酸氧化以迅速供應機體生命活動所需之能，爭取時間儘快扭轉昏迷和糾正休克快速使用大劑量硫胺實屬必要，故本組病例在搶救時一次均給予硫胺 500 毫克。開始採用肌注的方法，但死亡率很高（達 79.6%），究其原因，可能因患者在重度休克狀態下，局部注射吸收不良，注入的藥物不能及時發揮作用，延誤了僅有的極其有限的生命時間，致重要器官機能未及發生順轉之故。此外，患者出現的躁動也會格外加重已經處於極度衰竭狀態的心、腦負擔（死亡患者中有 8 例經過躁動後又轉入昏迷而死亡）。既往靜注硫胺曾有發生過敏性休克者（3），故這次肌注失敗後，對改用靜注顧慮重重，後經上級領導機關批准，才使用靜注，使死亡率降至 15.1%，這仍然意味著現場有成批的青壯勞動者死亡。對經過嚴格選擇的病例死亡率尚且如此之高，對其他具有一定因素、隱疾和體質低劣的患者當可不言而喻。難怪遠在 1906 年日本海軍軍醫高木氏面對當時海軍官兵腳氣病之兇險慘狀而聯想到對日本帝國前途之危害時，能使其心戰膽寒（13）。之後我們又經批准改為從股動脈向心注射的方法，死亡率進一步降至 3.8%，肯定了後者在療效上的優越性。用此療法，有如毒毛旋花子素苷解除急性左心衰竭一樣，為患者在 15 分鐘內可顯奇效，絕大多數在 40 分鐘內，平均 30 分鐘左右，臨床開始明顯好轉，如呼吸轉為勻稱，面色由暗灰土色之死相轉為稍帶紅潤，四肢涼度減輕或變溫，瞳孔回縮，角膜反射恢復，心音稍增強，血壓較快回升（原來測不到者，收縮壓可升至 50 毫米汞柱，甚或可升至 90 毫米汞柱，舒張壓多在 10-0 之間）。經股動脈注射死亡的 6 例，均系發病後 3 小時才開始急救的，且年齡均在 50 歲以上，治療失敗可能因救治較晚和年齡較大。本療法之所以優於一般的靜注，設想將藥物直接注入股動脈後，通過快速加壓，借逆血流壓入之溶液能迅速地升高主動脈內的壓力，使處於心源性休克狀態中之主動脈瓣關閉完全，藥物就可隨血流迅速地直入冠狀動脈並立即使其迴圈得到

一定程度之改善，心肌活動的能量供應乃隨之獲得初步解決，因此，也就必然地迅速導致周身迴圈的改善，其機能當即得到一定程度之恢復。正因為機體重要器官有了最低要求的血液和必需物質供應，更因在生物氧化中起癥結作用的酶系統迅速新生，乃使代謝失常首先被糾正而生命活動所急切需求之能有所供應後，機體的各種神經反射機制和神經體液調節機制才能以恢復正常的，能動的有機性轉動，使機體因代謝和生命活動機能的嚴重障礙所造成的中樞神經系統、心血管和其他器官系統間遭到急劇破壞的相互關係又重新有機地建立起來。本療法之所以能如此起死回生，就在於大劑量硫胺從股動脈快速加壓逆血流進入機體後能夠迅速地促成這種能動的轉化，實踐證明通過股動脈向心渠道給藥和由靜脈經心肺循環再回心到周身的給藥途徑絕不等同，而大量硫胺迅速地直入冠狀動脈和中樞神經系統，對處於生物氧化窒息狀態的心腦細胞起有飛躍的質變作用，尤如小劑量的抗生素對細菌是抑制作用，大劑量時可有殺滅作用一樣。故溶液由股動脈向心注射在動力學上所起的作用和頸動脈竇體與主動脈弓內所發生的壓力感受性反射、化學感受性等複雜的神經反射機制（15）的效果同時和作為突破代謝失常的尖兵與原發性動力物質的硫胺暫態、迅速、大量地出現在與生命活動攸關的細胞內所致之良性迴圈和順轉性連鎖反應組合就是本療法之所以獲得預期療效的關鍵所在。

三、輔助療法的意義：對惡性心腦型腳氣病的治療，無一例因本文之一般急救療法獲救，甚至就在靜注葡萄糖時呼吸心跳停止。只有積極使用大劑量硫胺才能挽救生命！但是否在脫羧輔酶系統恢復機能之前，對此型患者靜注高滲葡萄糖液，使用強心劑和呼吸興奮劑有可能促成本型患者呼吸心跳停止，加速死亡？做如是之設想也並非毫無根據（12）（13），概正常空腹血漿含丙酮酸 0.2-2 毫克%，含乳酸 5-20 毫克%，硫胺缺乏患者之血中則大大超過此值。已經證實（12、13），就是正常人掇食為一定量的葡萄糖後尚可引起血內丙酮酸和乳酸一時性呈陡直曲線上升，1 小時後達到高峰，3 小時後方始恢復原來水平（12）。這在硫胺缺乏的患者此陡直曲線升的更高，其峰更陡直，持續時間更久（12、13、16）。故而在硫胺未充分補充，酶系統尚未恢復正常的代謝轉動秩序，脫羧

輔酶尚未形成及/或參與活動之前，靜注高滲葡萄糖液只能加劇嚴重危害機體的丙酮酸乳酸的進一步大量堆積而絲毫不能起到一般臨床上所希望的能源作用，確能使心肌加重中毒而停搏，生命中樞因進一步中毒麻痹而致呼吸停止，因強心劑呼吸興奮劑多次使用也只能使機能力竭和疲憊不堪的生命中樞和生命器官復因額外興奮而加劇衰竭，如此對待一個機體的適應，調節、緩衝及應激能力喪失殆盡生命垂危的患者又何以不是加速其死亡！故此只有大劑量使用硫胺後，脫羧輔酶一旦迅速組成開始活動，酶系統之正常機能秩序一旦建立並開始轉動後，再適量使用高滲葡萄糖液才可能有所裨益。我們認為，在搶救暴發型腳氣病時，第一針大劑量硫胺就混合生理鹽水 30 毫升行股動脈快速加壓向心注射，甚至可混合小劑量（例如 5 毫升）蒸餾水緩慢靜注當均可收到較諸混合葡萄糖液更為優越和理想的療效。在當時對本組患者採用保暖、休克體位、人工呼吸和補充其他維生素等當有積極作用，但治療中應儘量減少活動，患者以把能量消耗降至最低水平。于此宜指出，若非本病的致命性暴發型者，對硫胺的使用途徑仍以肌肉注射和口服較為安全。

通過大量臨床實踐，我們設想，在臨床上遇到各種病因的垂危患者，當機體的生命活動瀕於熄滅的邊緣，但生命器官尚未發生絕對不可逆性的變化時，可以採用針對股性關鍵藥物直接從向心方向由動脈快速加壓注入主動脈，用之突破關鍵性地和生命攸關的緊要環節，急切促使機體良性迴圈的形成和生物物理學的順轉性連鎖反應，以圖喚醒窒息的生命活動達到爭取時間挽救臨床死亡的目的，這也或許可能成為今後臨床領域值得深入探討的一個新課題。

後記：筆者在此後的臨床工作中，曾用 25%葡萄糖 60ML 加硫胺 500MG 經股動脈向心注射療法搶救呼吸心跳完全停止、經口對口人工呼吸半小時以上未能復甦的溺水患者，吊死患者，96 歲衰老死亡患者各一例。此三例患者均經一次注射後當即復甦，溺水及吊死者均系青年人，呼吸心跳恢復後，當即翻身呼歎一聲「我的媽呀！」96 歲老婦完全系因衰老生命器官功能衰竭緩慢進入臨床死亡的。復甦後又生活十天，言談記憶均清晰。呼吸心跳恢復後五小時首次排尿，尿液呈洗肉水狀，限於當時條件未作化驗檢查。

基於上述，筆者有理由設想，由 SARS-COV 感染所造成的重症急性呼吸窘迫綜合症所造成的大批急性死亡，股動脈向心注射療法很可能具有起死回生之效。一般人認為病毒感染例如乙型肝炎均系全身性疾病在個別器官有較顯著的局部表現，故此 SARS 除高熱和下呼吸道重症造成呼吸衰竭，很可能心源性休克，腦神經功能調節機制不全，乃至腎功能低下均系造成該病死亡之綜合性原因。如此用本股動脈藥物向心注射療法突破呼吸迴圈衰竭很可能對 SARS 有挽救生命之效。苟如是，藥物經股動脈向心注射療法就啟動一個搶救各種臨床死亡的新途徑。

參考文獻：

- 1、上一醫：實用內科學。第 6 版，474 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73
- 2、中國協和醫學院，生物化學講義。181-183 頁，北京，1954
- 3、陳易新：注射鹽酸硫胺引起過敏性休克一例。中華內科雜誌，5（7）：593，1957
- 4、ROBBINS SL：PATHOLOGIC BASIS OF DISEASES。P497，W B SOUNDERS CONIPANY LSA 1974
- 5、GOULD SE PATHOLGY OF THE HEART 2ND ED PP 234，500，520，998，CETHOMDS LISA 1960
- 6、林兆耆等：內科學。483-490 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64
- 7、BEATON GH， ET AL：NUTRITION IN PREVENTIVE MEDICINE PP136-45， WHO GENEVA 1976
- 8、王懋梁譯（日文）：腳氣病複現的若干問題。防治研究工作通訊，第 3 期 48-52 頁，湖北省醫學科學院 1978
- 9、Beeson PB, etal :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 14th ed Vol 11 PP 1055, 1372-1313, W. B, Saunders Company LSA 1975
- 10、Davidson S, etal: Human Nutrition and Dietetics 2nd ed PP 433-440, E.S Livingstone LTD London 1963
- 11、候祥川 營養缺乏病綱要及圖譜。11-13 頁，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1957
- 12、Canta row A, etal: Clinical Biochemistry, 6th ed PP 667-670, W.B Saunders LISA 1962
- 13、Harris LJ: Vitamin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4th ed PP 40-73, Cambridge press LIK 1955
- 14、安徽醫學院病理解剖教研組：急性嬰兒腳氣病（附四例屍檢報告）。病理資料彙編第一集，1-4 頁，1977 年 10 月。
- 15、Brobeck JR: Best and Taylor』s Physiological Basis of medical Practice 9th ed. PP 7-112-132, 9-121-161, The williams and wilkins company LISA 1973
- 16、Bell GH, dtal: Textbook of physiology and Biochemistry 9th ed PP 70-72, 160-170, 441-448, Churchill Livingstone LISA 1976

註釋

ⁱ 本文於 1966 年經衛生部醫政司批准擬在內科雜誌發表，後因文革驟起以涉及國家機密為由退稿；1980 年改寫本稿；

ⁱⁱ 河南醫學院（現鄭州大學）（下同）退休醫師

ⁱⁱⁱ 兒科教授

^{iv} 內科教授

^v 內科教授

^{vi} 微生物學教授

中華無罪，罪在我輩！

論我輩才是卑劣的罪人

大陸 博 客

有人問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是什麼，是自我安慰嗎？

我說：如果是自我安慰的話，就不會用這麼叫人難堪的標題了：我輩才是卑劣的罪人。

還有人問我：你不是很崇拜西方文化的嗎？為什麼還要寫這類東西？

我告訴他：喜歡，不等於獻媚。

比如說：喜歡一個女人，就去親吻她的臉。而獻媚一個女人，不僅去親吻她的臉，還要再去舔她的腳。

中國現在有一些人，他們的文化反思行為過激，變態。我就是要給這些人一個耳光。這個耳光，我能打多重就打多重。

這種人的觀點有兩種：1、把人類歷史上普遍的醜陋現象，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的醜陋，再論證中國文化為劣等。2、把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國民素質低下現象，說成是中國民性惡劣，再論證中國人是劣等民族。

中國早在經歷西方文明衝擊以後，常有一些人對本民族的政治、文化問題做出反思，這是好事，不可否認的是：這些反思的人，很多都是為中國的進步做出貢獻的人。

但是，我們的反思，也出現過一些過激的地方：

對傳統文化的徹底否認。文革中把中國傳統文化幾乎都叫做『封建糟粕』。甚至導致了破四舊的大悲劇。

對中國歷史的全面否決。說「封建社會是 2000 年的黑暗」，文革中尤甚。

目前，這樣的論點仍舊存在，想來很可笑，居然都是被歷史否定了的，陳舊不堪的極左思想（按：是

赤禍思想）。所以出現，無非換了個招牌。原先叫打倒封建，現在叫「勇而知恥」。

我可以告訴這樣的人，勇而知恥和勇而無恥的差別很大，如同君子 and 無賴，勇士和小丑！

在歷史上，人類至少已經有 5 次大規模的，對文化的破壞，這 5 次破壞有個共性：認為文化有問題，是垃圾，是魔鬼，是醬缸，所以去破壞。

一，羅馬人。信仰天主教後，瘋狂破壞古希臘，羅馬文化，拆神廟，砸神像，取締奧林匹克運動會。理由——天主是唯一的神，其他的是邪魔。（認為什麼文化都有問題）

二：西班牙人。硬說美洲土著文化是『魔鬼』，大肆破壞。（認為什麼文化都有問題）

三：德國法西斯。（認為什麼文化都有問題）

四：文革破四舊運動。（認為什麼文化都有問題）

五：塔利班炸毀巴米揚大佛。（認為什麼文化都有問題）

我曾經問一個喜歡咒罵中國傳統文化的人：「中國古代領先，現代落後，是我們對不起古人？還是他們對不起我們？」。他慚愧而又很無奈的拍了一下桌子，說：「哎！我們對不起祖宗！」

於是我再問道：接力賽跑，先人領先，後人落後，後人有資格罵先人嗎？」回答是：「沒有。」

這不禁令我想起德國戰敗的時候，一些政治家在查里曼大帝像前說的那句話：「我輩才是卑劣的罪人！」

再看看當今的中國，
那些咒罵祖先的勇士，

那些拒絕把中國落後的責任說成是自己責任的勇士，

那些論證中華民族是劣等民族的勇士，

那些論證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的勇士，

那些不斷嘲笑小腳，八股，辮子，太監，卻不敢抨擊『洋垃圾』的勇士……

他們的勇敢，都被那句深刻自責的話抹殺了。

因此我敢大膽地說，勇而知恥的真正意義，在於承認：我輩才是卑劣的罪人！

1、我思想的動搖

把世界歷史的醜陋，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特色的醜陋，再論證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這種人類自白癡。

很多年前，大概是我上高中的時候，有一本書和一部電視劇在當時比較流行，書的名字叫《醜陋的中國人》，作者是台灣的柏楊；還有一部電視劇叫做《河殤》，劇本是蘇舒陽寫的。所宣揚的思想大同小異，總的來說，就是把中國傳統文化比做汙穢的「醬缸」，把中國一百餘年落後的原因歸咎於祖先創造的文化——特別是儒學。

書中列舉了一些中國文化的糟粕，比如：八股文，小腳，廷杖，太監。盲目膜拜偶像，愚忠愚孝，對思想的禁錮，男女地位的不平等。也提到了一些中國人的愚昧和殘暴的行爲：比如在饑荒年間易子而食，焚燒阿房宮，焚書坑儒，耍弄權術，相互傾軋，內鬥不止等等。於是得出結論，中國的落後在於傳統文化的低劣，應該放棄傳統文化，接受西方文明(實際上是全盤西化)。看了這兩部作品，有一種深刻的感覺，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真是近乎一文不值，西方的文明確是燦爛輝煌，而且這兩部作品舉出的一些例證，讓人看來，他們仿佛說的都是鐵的現實——中國文化代表野蠻，而西方文化代表進步！看的久了，竟然產生了一種西方殖民者在當年求之不得的思想：就是中國人和現今落後的民族是天生的劣等人種，而歐羅巴人——特別是日爾曼人，是絕對優秀的民族。中國要想進步，就必須在思想，文化，意識形態，文字結構和各個方面向西方人靠攏，或許還可以有點生機。

那時候看了這些作品，我很贊同。說心裏話，我同意！因為那時候還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才上高中，對中國的歷史一知半解，在我模糊的印象中，仿佛柏楊的話都是對的，中國確實存在著很多黑暗的東西。而且中國歷史中的保守，腐敗和專制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但是西方有愛因斯坦、伽利略、愛迪生那麼多的科學家，有雨果、普希金、莎士比亞那麼多的文學家；有著名的藝術大師達芬奇和梵高；更重要的是，西方有民主、自由和科學。

那時候我曾經說：我們自詡為有 5000 年的文明，可是放眼看看，現在我們使用的東西，幾乎無一不是西方人發明的。我曾經贊同《河殤》裏的一句話「不要自己再騙自己！」是的，我們不要總用文明古國地大物博來麻醉自己，要承認自己的不足，勇而知恥。要拋棄傳統文化，拋棄民族的劣根性，中國才有希望。柏楊曾希望外國朋友，特別是美國朋友幫助中國人去掉劣根，我贊同。因為那時候在我眼裏，美國是自由發達的象徵，是文明的標誌。

我當時確相信這樣的觀點，不過那個時候，還有很多事我不懂……

我忘記了一件事，在我從內心崇尚西方文明的時候，我居然連《世界歷史》都沒有好好看過一眼。

高中以後，我看了聖經，論語，莊子，粗略的讀了一些佛經的故事。後來，我開始仔細的翻看《中國通史簡編》。工作以後，我讀了世界歷史。

在看中國歷史的時候，我還比較同意柏楊等人的觀點的，只是產生了一些疑問，比如：《河殤》裏曾經說過：萬里長城是中國鎖閉國門的象徵，這樣說符合歷史實麼？說中國人歧視、壓迫婦女，可聖經裏也明明指出：女人是男人的依附品，要聽從男人的擺佈，甚至辱罵婦女為淫婦。柏楊說中國在儒教建立統治地位以後，就沒有出現過有新思想的哲學家，可范縝，顧炎武，戴震明明都是有獨立見解的思想家啊……但是，我對他們的思想還是基本贊同的。只是覺得，有的所謂「劣根性」他們不是說的很準確而已。

在看世界歷史的時候，起初，說真的沒什麼深刻的感受，只是覺得西方人國家多，民族多，歐洲的戰爭特別多，宗教糾紛也比較頻繁……但在這個時候，仍對西方文化沒有產生什麼太壞的印象。不過我的疑

問卻增多了：柏楊反復嘲諷中國人有太監制度，可是羅馬，土耳其傳統上也存在太監，並且歐洲國家還存在閹割藝人的現象。莫非太監制不是中國的專利？再有，柏楊反復嘲笑中國的廷杖是「脫了褲子打屁股」，可是羅馬帝國也有用棍棒打死大臣的傳統啊，而且還割下腦袋……(即聞名世界的法西斯酷刑)再仔細的看下去，我不禁茫然……文明民族，優秀民族。這些本在我腦海裏對歐洲人做出的定論不禁一個個的動搖了！

2、醜陋的人類

看到上古文明的時候，我還對希臘、羅馬的燦爛文化有所欣賞，而在看中世紀歷史，一直延續到英國議會戰爭以前那段歷史的時候，說真的，我不忍再看：人類歷史上居然有這樣卑劣的爾虞我詐，居然有這樣喪心病狂的對文明的摧毀，居然有這樣在東方連最野蠻混亂的暴君所做不出的獸行和醜聞！

★破壞

我曾經說「中國人破壞文化，例如項羽焚毀阿房宮，董卓破壞長安和洛陽，外國沒有這種行為！」但是我錯了。現在我才知道：把世界歷史的醜陋，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特色的醜陋，再論證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這種人類自白癡。

在古代，西羅馬滅亡的時候，哥特人，即日爾曼人的一支，在羅馬大肆焚燒建築，民房被毀壞了 45000 座，而宮殿居然有 1800 座被焚燒淨盡，珍寶被搶走，所有的金銀財寶和戰俘都成了哥特人首領阿拉里克의 陪葬品，書籍和文物則被砸爛銷毀。就算 100 座宮殿抵得上一個阿房宮，哥特人的破壞量，也是 18 座阿房宮，這是一個令人嘖目的天文數字！而歐洲人因破壞而形成的天文數字遠遠不止這些……

1618 年，仍然是德國人，這個血管裏流著準蒙古人的血，卻被一些人稱為天生優秀的、純種的民族(其實是希特勒自詡為純種)，竟然無恥地向自己的文化和人民舉起了屠刀。為了宗教糾紛，30 年間，德國人把丹麥人請來，把瑞典人請來，後來還喊來了西班牙人和俄國人，叫來了幾乎所有的臨近國家，打開自己的國門，做什麼呢？通商嗎？傳播文化嗎？不！是破壞！是屠殺！30 年內，德國人口死亡三分之一，建築

竟然毀壞了六分之五，德意志近 2000 年的古文明幾乎成為絕學——正是這些優秀的德國人，在 300 多年後又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破壞在延續，並且一次比一次嚴重、惡劣、喪失人性！

不僅僅是德國人，歐洲其他國家的人對文化破壞的興趣也是很濃，並且規模之大、影響之深遠，令人歎服！荷蘭人痛恨西班牙統治者，於是拿文化出氣，他們拿出他們以後破壞印尼文明的手段，一口氣燒毀，砸爛了 5500 多座教堂，其中 300 多座是在羅馬初期那個時代建立的，有近千年的歷史。而西班牙的阿爾法公爵也不示弱，拿出他們老祖宗以前滅絕印加文化的手段，把西歐文明的集中地，荷蘭最大的城市安特衛普夷為平地。安特衛普的財政收入佔整個西班牙國庫的一半。西班牙人這樣毀壞自己的經濟命脈，說好聽點是歇斯底里，說難聽點則是精神分裂——原來我以為，歐洲人只是殖民者破壞其他地區的文化，後來我才知道，他們連自己的文化也不肯放過：1687 年，威尼斯人用大炮猛轟被喻為「希臘之寶」的巴特農神殿；18 世紀以後，來自西歐的列強也紛紛來搶劫，如同焚燒搶奪圓明園一樣！好一個破壞文明的民族！令人費解的是，當羅馬人吞併伽太基以後，明明把伽太基劃歸為他的一個行省，使之成為羅馬帝國的一部分，還要在那裏縱火六天六夜。在城市的四周撒鹽，把伽太基的文化破壞怠盡，實在是難以理喻……更可怕的是，原先知道中國人在饑荒的年代易子而食，感覺很是野蠻，後來才知道，俄國人在東征的時候，統帥波雅可夫（此人是個文官）藉口軍糧不足而率領部下大吃人肉，活人也吃，屍體也吃，從莫斯科一直吃到黑龍江邊，吃的昏天黑地白骨成山……說到這裏，我覺得很累。因為歐洲人破壞文化，摧殘人類的事例仍然只談了一小部分。

歐洲歷史上，很少看到他們破壞一座宮殿——這不是誇他們。歐洲人毀壞文化，小規模的是徹底破壞一座城市，大規模的則是消滅一個民族的文明！

好好的一座羅馬城，高盧人來了，焚燒；迦太基人來了，焚燒；哥特人來了，焚燒；羅馬人自己治理，仍然是焚燒！印加，瑪雅文明的毀滅，十字軍東征帶來的災難，胡格諾戰爭的內亂和破壞，胡斯戰爭的血腥殺戮，法國、西班牙在意大利的暴行……如果你想全面瞭解柏楊等人所稱頌的西方文明人的文化業

績，那麼你自己慢慢看吧，有可能看三天三夜，也看不完。

★內奸

我以前認為中國人漢奸多，秦檜，汪精衛，袁世凱，哪個不賣國，而且還唆使昏君殺害岳飛、袁崇煥這些民族英雄，所以中國人素質太差，文化有問題，難怪被人欺負，被人統治。

但是我錯了。

論證自己民族漢奸多的人，本身就是漢奸。

且不說二戰中法西斯繳獲那那些歐洲列國的軍隊，也不說土耳其人組織基督徒蹂躪歐洲。

單我剛才提到的德國人打開國門，讓外國人入侵自己，還屬於爲了宗教糾紛的原因，姑且情由可原的話，那麼英國國王叫來意大利和德國的雇傭兵到英倫三島鎮壓凱特的農民起義，那簡直是禽獸不如式的奇思怪想。慈禧太后聯合駐紮在中國的英法士兵，鎮壓太平軍起義，雖是賣國，但還不至於千里迢迢的去「請」，相對之下，慈禧和英王這對賣國的活寶「兄妹」中，似乎英王更加沒有廉恥和人格。

阿拉里克侵略羅馬，羅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英勇抵抗，被羅馬昏君（兼智殘人士）霍諾留殺害。貞德在保衛法國的時候，竟被自己所保衛的國民用 4 萬法郎賣給了英國人——這是流氓下三爛的手段。而且令人作嘔！

法國人把自己的民族英雄當婊子賣嗎？！捷克將軍華倫斯坦爲德皇抗擊丹麥人的入侵，結局是被騙到皇宮用毒箭射殺——同樣是流氓手法。岳飛被害，還有莫須有的罪名，華倫斯坦之死，真是死得窩囊！漢尼拔在被他保衛的國王處死的時候感歎：「一個多麼讓羅馬人害怕的人就要死去了！」布匿戰爭延續百年，在戰爭最關鍵的時刻毒殺民族衛士，他們的文明真是可見一斑。

至於更可笑的，是羅馬和波斯的戰爭，起先 3 次，無論勝負，驕傲的羅馬人都「大方」的向波斯帝國支付大量的黃金，拜佔庭帝國看來是太富足了，於是先後將 21000 磅黃金拱手讓出，連查士丁尼也不例外。

拿破侖三世在普法戰爭時戰敗，向打敗他的普魯士國王大獻殷勤，令人肉麻，而他的子孫也延續了他

留下的傳統——二戰前夜，法國代表在慕尼黑出賣了捷克，以爲獲得了和平的法國人竟然在使館面前跳起了歡快的集體舞。二戰初期，在眼睜睜的看著自己的盟友波蘭士兵用長矛衝擊納粹坦克、最後紛紛墜馬身亡的時候，法國人卻躲在防空洞裏，看電影般的欣賞。兵臨巴黎城下，又是這些自我感覺很優秀的法蘭西人，推選了貝當和賴伐爾兩個賣國賊，徹底出賣了自己。而後，法國獲得和平了嗎？不！他們的國人被法西斯武裝起來，充當法奸，侵略俄國，化做炮灰……以上這些就是歐洲歷代賣國賊的醜惡嘴臉！但僅僅是一部分而已。

★酷刑

以前我認為中國人善使酷刑，殺人的刑罰五花八門。但是我錯了。現在我才知道：把世界歷史的殘忍，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特色的殘忍，再論證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這種人類似白癡。

中國最可怕的刑法莫過於「凌遲」，就是用小刀在人的身體上一點點的削割皮肉，然後在人的心臟上補上一刀。而在「文明」的歐洲，羅馬教廷對人施以劓刑不是用刀，而是用鈍器——牡蠣殼。在行刑以前先砍去手腳，而在行刑以後他們是不會在心臟上補一刀的，人會自己慢慢的掙紮死去（一個名叫希帕莎的希臘女幾何學家曾無端慘遭此刑）。而在法國，是用融化的鉛水一點一滴的淋在人的身體上，然後用鉗子一塊一塊的把皮肉夾下來。當然，在施刑之前，人的身體還要撒一層生石灰。至於挖眼睛，割耳朵，五馬分屍，點天燈等酷刑，在歐洲歷史上，特別是在德國土瓦本農民起義被鎮壓的時候，更是屢見不鮮。

更讓我哭笑不得的是，三十年戰爭期間，歐洲人發明瞭一種「癢刑」，即在罪犯的腳心上塗抹蜂蜜和食鹽，讓羊來舔食，以致於罪犯活活笑死，真是「聰明」絕頂的創造！

★禁錮

以前，我以爲中國人禁錮思想，摧殘文化，比如八股文的盛行，文字獄的出現。現在我知道，中國在禁錮思想方面和歐洲人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公元五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宣佈天主教爲國教。此後至十七世紀前後，1200 年間，歐洲不允許印刷（這等於掐斷了文化的根源），不允許進行「異端」

的科學研究，不准許進行宗教上的辯論，更不允許在文化、藝術上有「異端」的創作。在西班牙，爭論聖經的人，男的活埋，女的活活燒死。在德國加上一條：異端被處決後，財產歸告密者所有。而在法國，17 世紀初期，如果你膽敢手持一張有印刷字體的紙張，就會被判處死刑。德意志的反異端法和宗教裁判所聞名歐洲，列國也紛紛效法。好容易到了馬丁·路德實施宗教改革，而日內瓦『教皇』加爾文仍不允許唱歌，跳舞，做遊戲，穿漂亮的衣服，仍舊禁止音樂，並且殘酷的鎮壓再洗禮派。祖祖輩輩信奉天主教的歐洲人民卻不能看聖經，這是一個極端奇怪的現象，因為聖經只能用希伯來和古希臘兩種文字抄寫成書，即使看也看不懂，直到宗教改革，歐洲的老百姓才第一次看到用自己民族文字書寫的聖經。這樣禁錮思想破壞文化的民族，難怪面對黑死病的流行而束手無策，難怪文盲遍地，以至於創立醫學僅有 200 多年的歷史。

中國有焚書坑儒，歐洲可謂無書可焚，無儒可坑。

中國，我想法家和儒家是不會發生械鬥的，而陸王與程朱兩派理學的鬥爭，也僅限於辯論的範圍而已，最多糾集點儒生狠狠吵一架。雖然中國多宗教，多信仰，但是宗教戰爭是沒有的，中國什麼樣的宗教，也不至於動輒以教義為依據，對人民橫加死刑。

死刑！死刑！死刑！歐洲莫名其妙的設立了很多死刑的名目。

胡斯和哲羅姆因反對教會的盤剝被處以死刑，布魯諾因贊成哥白尼的學說被處以死刑，托馬斯·莫爾因拒絕承認英王為宗教領袖被處以死刑(開始打算把他內臟掏出烤熟後餵給畜生)，而塞爾維特因為在血液循環上有一點新的發現，居然被宗教改革家加爾文活活烤死。

康帕內拉因為撰寫一部《太陽城》被監禁了 27 年，有功於國、在戰爭中獻出一條手臂的塞萬提斯因得罪教會，被剝奪教籍，失去工作的權利，最後悲慘的死在貧民窟！至於拉伯雷，他是僥倖從暴徒手中逃脫的，協助他發行《巨人傳》的好友卻死於亂棍之下！連米開朗哲羅都因為在《末日的審判》中有了「異端」的創造傾向，而險些被教會起訴……

上古的時候，歐洲人就殺害了蘇格拉底和伊索，中世紀的時候更是變本加厲的殘害文明精英。歐洲文明，你有為你撒播種子的農夫，但是你有土壤嗎？若說是生長壯大，也是在幾百年以後。而在這之前，你要經受過多少次的焚燒、毀壞和滅絕啊！中國的八股文考試，設立的時間最多只有 700 年，而歐洲的宗教極端統治是 1200 年，若說和他們比較摧殘文明、禁錮思想的能耐，這一點我們東方人只好自嘆不如，簡直是望洋興嘆。因為倘若李時珍，徐光啓，曹雪芹，祖沖之，李白，杜甫，馬均，孫思邈這樣的人在歐洲，恐怕已經死了幾百次了，更不要說《水滸》的作者施耐庵！

★惡君

中國曾經出現了一些百年不遇的混蛋統治者。隋煬帝，明武宗，秦二世，桀，紂，桓靈二帝……但是，請你相信我，這樣的暴徒和禽獸型的統治者，在中國若是只有屈指可數的幾個，那麼在歐洲，他們可以找到很多的同類，而且荒淫之極，兇暴之深，都遠遠超過中國的這些惡棍！把世界歷史的醜陋，說成是中國歷史上獨有特色的醜陋，再論證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這種人類似流氓。

我不想一一列舉法蘭西的 12 個昏君，關於他們的話題無止無休。

羅馬皇帝尼祿，這個舅舅與外甥女結婚生下的怪物，幼年時看到他母親殺死他的父親，大受啓發，成年後嗜血成性，為了奪取權利，先將他母親的坐船鑿沉，因其未死，更派遣武士追殺。對懷孕的妻子乾脆一劍刺死。除了揮霍和濫殺以外，竟突發奇想的忽然焚燒了整個羅馬，大火連日不絕，百姓死亡無數，他卻站在陽臺上哈哈大笑，至於縱火的原因，至今沒有準確的說法。大概只能歸結為「精神不太正常」了事。東方也有過因戰爭引起的大破壞，但是這樣莫名其妙的破壞行為，恐怕連世界歷史裏也難找到它兩個。

格拉克拉，這個羅馬尼亞的大公，做出的事情更是荒謬絕倫。因見中亞商人不行脫帽禮，便殘忍的將中亞商人的帽子釘在腦袋上。為了顯示威嚴，在宮殿門口插上幾十個高大的鐵籤子，將活人像穿烤肉一樣穿起來，並且日日更換新人，名為伸張正義，實際上

只能顯示他是個心理不正常的人。而女王瑪格里特三世居然擁有一個用 12 歲以下少女的鮮血灌成的游泳池，最後嚇得凡家裏有少女的文武大臣都紛紛逃亡。我不知道他們的殘暴是否能比得上中國的紂王，但是我知道，紂王擁有的是酒池肉林，這是他奢侈的表現，依仗鎮壓反抗的是炮烙和虿盆，這是他殘暴的象徵。格拉克拉的人肉林和瑪格里特的人血池，只讓我感到殘暴和奢侈都遠遠超過紂王——尤其是他們喪失人性的「想像力」！以前看中國歷史，當我看到唐中宗的女兒將他毒死後，我覺得實在是沒有人性，但當我看到羅馬皇帝塞維被他女兒女婿活活打死，馬上將屍體扔到大街上示眾，並且悍然用馬車傾軋以後，我不禁驚歎：好一個文明的民族！中國即使有殺父弑君的惡行，也沒有這樣瘋狂，無恥，沒有天良和明目張膽的事例啊！伊凡雷帝雖然偉大，但是他也難以改掉歐洲人傳統的野性，最終將他的皇太子親手用權杖砸死（列賓的油畫伊凡雷帝有所表現。而愷撒，他是被自己的私生子白魯德刺了致命的一刀……

當我看到中國歷史上出現了一個弱智皇帝司馬衷的時候，我覺得可笑而且可恥。但瞭解了不到一半歐洲歷史的時候，居然發現了一群弱智皇帝或國王，除了前面提到的格拉克拉以外，法國的查理六世是精神病，俄國的費多爾沙皇是胎裏帶的傻子，羅馬君主克勞狄是小兒麻痹兼白癡，另一個羅馬皇帝霍諾留雖然智殘，但相對稍微清醒一點，因為他還沒有忘記殺害保衛羅馬的民族英雄斯底里哥，於是就大肆株連！

★淫亂

以前聽說隋煬帝強暴自己親妹妹的時候，覺得令人髮指。回過頭再看歐洲人的作為，不禁啞然失笑。希臘人有親姐弟通婚的偉大傳統(埃及豔後的丈夫就是他的親弟弟)，而在羅馬，舅舅可以娶親外甥女，同父異母的兄妹可以結婚。至於希臘傳說裏所講的，一個王子殺自己的父親，娶自己的母親，並且和自己母親生了四個孩子的文明事蹟，更能揭示歐洲亂倫文化的根深蒂固。

……這樣的亂倫習慣似乎已成悠久傳統，希特勒的第一個情人吉莉就是他的外甥女，我不知道是否是羅馬文明在現代社會的一種延續？！以前看到過一個對皇帝的評論，說：明武宗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混蛋

皇帝，理由是他和大臣的妻子通姦。而在歐洲，由於皇帝不允許納妾，於是在各個國家的宮殿裏，普遍地出現了國王和大臣的妻子有染的性醜劇，說歐洲的宮廷是換妻俱樂部也許並不很過分。乃至於上行下效，終於在公元 10 世紀，形成了一種上蒸下淫，男女混居的民間「文化」。若真以混蛋的標準來衡量明武宗，那麼歐洲的君主則紛紛成為混蛋，其傳統當然也因該叫做：混蛋傳統。伊麗莎白一世就是這種傳統的產物。偉大的拿破侖綠帽繽紛，優秀的彼德雪王的皇后在後宮大量飼養男寵，強悍的伊凡雷帝企圖強暴兒媳。癡情的馬利女王為情夫報仇謀害親夫……如此雞飛狗跳的高貴宮廷，想必也是因這種悠遠的文化影響而至。

如果愷撒在出使小亞細亞的時候，不和國王尼科美斯發生不正當的關係，他還是值得我佩服的。因為愷撒有很多頭銜，終身獨裁官、國家元首等等……但是從小亞細亞回來以後，他又多了個稱謂：王后的情敵。請看看這首諷刺愷撒同性戀的歌詞：

愷撒征服了高盧啊，
尼科美斯征服了他。
愷撒英勇凱旋了啊，
因為他征服了羅馬。
尼科美斯沒有凱旋，
可是征服了愷撒！

★陰謀

有的人說：歐洲人光明磊落，原因是產生矛盾以後，不勾心鬥角，而是採用決鬥的方式。我不知道中國的流氓相互抽死簽(形式和決鬥很相似)是否也屬於光明磊落的一種，我想讓這樣的人看看，歐洲人是怎樣的「光明磊落」。

亞歷山大，希臘和馬其頓的統治者，對觸犯他的人毫不留情，先殺自己恩師亞里士多德的侄子，後奮起一槍，親手刺死自己的救命恩人(歐洲人總是喜歡自己動手)，殺功臣的本領絕不在朱元璋之下。尤其可恥的是，他殺害自己從小一起長大的好友時，竟裝瘋賣傻，偽裝喝下「神水」後神智不清，殺害自己父親的老部下時，手段居然是派刺客暗害——這是朱元璋所做不到的一種詭計。亞歷山大號稱宇宙四方之王和埃及

及的法老，但是倘或說他是「光明磊落」，那我實在不敢苟同。

教皇，在歐洲是被列國尊重的角色，歐洲的君主和國王都用親切的口語稱之為「爸爸」。就是這些歐洲人的好爸爸們，在公元 8 世紀的時候，偽造了一份《君士坦丁大帝獻土》的聖旨，欺騙歐洲各國定期或不定期的向他出讓土地，詐騙延續了 700 多年，才被那不勒斯的歷史學家瓦拉揭穿。堂堂教皇，做「勞改犯」的勾當，而且詐騙時間之長，詐騙財富之多，真是空前絕後。勞改隊裏有句俗話，叫：甯交十個王八蛋，不交一個詐騙犯！教皇啊，歐洲各個國王的父親，讓我怎麼評價你呢？！更可恥的詐騙還不只是這件事！歐洲在 16、17 世紀的時候，教會大量向民間出售「免罪符」，即購買免罪符的人，靈魂可以直升天堂。欺騙民眾也罷了，還把他們尊崇的聖人不當人看：隨便拿一塊破毯子，胡說是基督用過的；隨便找一塊破頭巾，說是聖母瑪利亞戴過的；最無恥的是用豬、羊等畜生的骨頭冒充聖彼得的遺骨，5 個金幣出售一塊。倘若這個第一教皇在天有靈的話，怕是要在天堂裏失聲痛哭了。至於用一堆雞毛冒充天使的羽毛出售，他們就更不難做出。

在德國，40 餘年以內，出現過 4 次農民起義，鞋會起義（鞋是代表貧苦農民的標誌），領主和爵士們欺騙農民，假裝簽定和約，然後瓦解農民軍，最後進行血腥鎮壓。土瓦本和法蘭克尼亞農民先後兩次爆發起義，德國統治者都不厭其煩的反復使用這樣的手段：簽定和約——解散義軍——屠殺農民，中國人尚且知道君無戲言，歐洲的君主們無恥已經到了極點。

同樣，在英國和法國，也都出現過類似的情況，不過方式變了變，是誘騙農民軍的領袖去談判，然後馬上拘捕，殺害，他們對待紮克雷起義領袖卡勒如此，對待英國農民領袖泰勒亦如此。海地獨立領袖杜桑·盧維杜爾，也是被拿破侖用誘騙的方式抓捕的——歐洲人的光明磊落體現在哪裡？難道是體現在丹特士先光明磊落的偷普希金的老婆，再在決鬥中殺害普希金嗎？最讓人吃驚的是，俄國出現過假沙皇。在俄羅斯，皇叔伊斯基爲了謀取權利，居然從立陶宛找來一個英俊高大、瀟灑個體的流氓來冒充去世多年的皇子季米特里，而且假沙皇在俄國先後出現了兩次，真是世界宮廷史上的一幕超級滑稽劇，也是一個讓人哭

笑不得的「奇蹟」！這樣的例子在文明的歐洲不勝枚舉……

伊凡雷帝上殺國舅、皇叔，下誅太子，其母爲家族權臣謀害，其子被波里斯暗殺，而波里斯也死得糊裏糊塗。一個時代的宮廷，就殺得如此地昏天黑地。

1000 年來，有 20 個教皇死於非命，10 個教皇死因至今不明，這就是歐洲的光明磊落。

空前絕後的、難以想像的詐騙，醜聞，殘酷，荒謬和滑稽劇，在歐洲不知出現過多少次。想想看，這不是比中國歷史要黑暗、恐怖、噁心、愚昧數倍的歷史嗎？

這樣我們才可以不把自己當作唯一的醜陋。

還是那句話：把人類共同的醜陋，說成是自己民族特有的醜陋，進而論證中國文化是劣等文化——這是毫無意義的反思，其手段類似白癡。

說到這裏，我不想在多談西方的歷史。我只希望那些信奉柏楊、或者《河殤》的人們，動點腦子，好好看看點書，看看世界歷史，或者東西方關於宗教、哲學的著作。倘若覺得難讀，那麼看陳必祥先生編寫的少兒讀物《世界五千年》也可以。看關於歐洲古典文化的幼兒讀物也可以。總之。希望不要在一知半解的情況下，混混噩噩，自充淵博，亂做評論，亂發牢騷，還把自己當做是思想進步且很有個性的明白人。以至於說出「朝鮮人是劣等民族，韓國人是優秀民族」。的荒唐話來。

另外，有的中國人有這樣的言論，比如：中國人就是生孩子的能耐大，什麼也不行。還有：中國人人種本來就不好。

甚至於：法國人管中國人叫婊子（說話時語氣平穩安詳，充滿肯定的態度）。我想和這樣的人說：「你母親也是中國人，是不是……」甚至於還有人說說：「蒙古人能統治中國，所以說中國的文化有問題。」則是邏輯昏亂的傻話。中國被蒙古統治了 89 年而俄羅斯被統治了兩個半世紀；蒙古人不僅攻下了巴格達，還最終征服了印度（莫臥爾王朝）；東羅馬帝國就是被曾受蒙古統治過的土耳其人滅掉的；依照這樣的說法，豈不是西方文化的問題更加嚴重？！

偏激地歧視自己是沒有必要的。

希臘曾受過異族的千年統治，不知道自卑者們是否有興趣藉此貶低西方文化？

五胡亂華的時代，也正是西羅馬滅亡的時期，匈奴人不僅攻破了長安，同樣也打進了拉文那。對於自卑狂們來講，他們只會強調中國蒙受的恥辱，然後再發表文化劣根性的言論，至於西方，似乎羅馬城的焚燒都能代表西方的一片光明。——他們絕不會說隻言片語的不好，因為他們多數根本不瞭解西方，也懶得瞭解（註：倫巴第，阿拉伯，斯拉夫，保加利亞亦侵略過東羅馬）。東西方歷史都有過黑暗和屈辱，文化上都存在著缺陷和不足，中國和羅馬都多次經歷過外邦的入侵，都嘗受過割地、賠款的滋味。我們的一些同胞，何必苦苦自辱，煞費苦心的證實自己是劣等民族呢……

4、正視自己的弱點：

我承認，我們也必須承認，我們的國家是發展中國家，因此，國民的平均素質，要底於發達國家。

因此，一些中國人在國外，由於素質不高，而遭到歧視——這是我們不能逃避的現實。

然後我們或許可以做兩件事情：

1) 論證自己是劣等民族。

2) 為教育事業捐款，或儘量的宣傳有利於國家前途的體制。

如果我在歐洲或者美國，我看到華人隨地吐痰，大聲喧嘩，超速行車，夾個買東西，打架……我不會去證實中國人是劣等民族，我會憎恨那些破壞了中國的『文化』——禮儀廉恥、仁義道德的人。我更會在自己國家的政治、經濟等各方面體制中找問題。

當今中國人普遍素質低下，我們必須承認——原因不在中國人劣等，而在：政治的落後甚至是反動和經濟的不發達。因此，與其承認自己是劣等民族，不如承認體制落後。與其論證自己是劣等民族，不如為希望工程捐一點錢——哪怕一元錢，也是有價值的。

有的人，把發展中國家（非洲、拉美、東歐）普遍存在的國民素質低下現象，說成是中國民性惡劣，再論證中國人是劣等民族。對教育工程的捐款一毛不拔。這也叫一種本事吧。

有人說：「我挖掘中國人素質低劣，是自暴家醜！是爲了警醒世人！」我想大聲的質問這些人——你們還有一點點人的起碼的勇氣和智商嗎？

中國四大譴責小說：《官場現形記》，暴的是官家的醜陋。《老殘遊記》，暴的是官家的醜陋。《孽海花》，暴的是官家的醜陋。《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暴的還是官家的醜陋。

美國人彈劾總統，罷免官僚也是暴上層社會的家醜，中國民間反思文革還是暴上層社會的家醜。孫中山和康有爲，哪個論證過中國人的素質低劣？探討過中國人是不是劣等？他們的打擊、指責的是什麼？你們不走腦子也知道了。

良心呢？！

還有人說『中國人素質不高，是因為儒家思想是偽道德。』

放屁。

歐洲封建社會，很多國家的市民都不講衛生，他們在牆角大小便，不洗澡，馬丁路德沒有去論證『西方宗教是偽道德』，而是提出『清洗宗教，重建道德』的口號。孫中山先生提到國人素質不高，也呼籲要重建道德，日本《教育大旨》，說『道德教育以孔子爲主，使人人崇尚城市品行』，只有文革時代的《論語批註》，才說「仁愛是虛偽的奴隸道德」，而眾所周知，文革的後果，是國民道德的又一次淪喪！

素質的提高依靠教育推動。能通過挖掘劣根性來提高中國人的素質嗎？如果把《醜陋的中國人》印刷成13億冊，發給每一個中國人，甚至發給那些偏遠地區的文盲，有助於國人素質的提高嗎？有此看來，柏楊的智商，還不如一個幫助農民脫盲的鄉村教師。或者一個為教育事業籌集資金的乞丐（如武訓）。

我不想菲薄武訓先生，我們家鄉管乞丐叫做『臭要飯的』，可是有的人，連臭要飯的都不如。

一個國家的強大，不是靠什麼發掘劣根性來完成的。

5、體制救國

信奉基督教的英國人，信仰天主教的德國人，崇奉神道的日本人和信東正教的俄國人，他們的文化傳統、民性、風俗和種族截然不同！他們之所以能夠走向強盛，並沒有組織一個挖掘劣根性的「罵祖宗團」去日本神廟或者聖彼得大教堂前罵不絕口，更不是改變基因注射藥物，讓自己搖身一變成爲優秀人種。而是依靠改變落後的政治體制，以帶動經濟的發展和進

步。然後發展產業，統一祖國，去舊維新。華盛頓、羅勃斯比爾、丹東是這樣做的，孫中山先生也是走同樣的道路！資本主義革命，使歐洲擺脫了愚昧和落後，使教會逐步廢棄了反異端法和宗教裁判所。使歐洲的人民能夠創造出財富，發揮出聰明智慧。資本主義革命，讓那裏原本無知無學的人懂得尊重科學，創造嶄新的文明；使原本昏昏噩噩的人恢復理智，並發揚了他們的想像力和凝聚力。

國王推翻了，極端宗教統治結束了，封建制度垮臺了。歐洲依然是信仰天主教的歐洲，但是讓我們看看——革命前後歐洲的命運，是大不一樣了！這如同在整個歐洲歷史上劃出一道閃亮耀眼的鴻溝。完善共和的國家體制，發展生產力才是一個國家走向富強的道路。克倫威爾等革命家都是在為建立新的國家制度而奮鬥，而沒有一個人成天抱頭苦思：我們民族的劣根性在哪呢？當年破壞孔林的紅衛兵領袖譚厚蘭都知道反省，企圖通過挖掘「劣根性」來救國的中國人，就不可以反思一下嗎？

砸爛文化以求救國，那是匪夷所想。

伏爾泰告訴法國人：我們不必為中國取得的成就而感到吃驚，以至於認為其體制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完善的——伏爾泰強調的是：體制。

孟德斯鳩，他倡導三權分立的原則，也是談及體制，而非高喊：徹底砸爛天主教！可是曾經有人高喊：徹底砸爛孔家店，這樣做，真的能救中國嗎，讓我們回頭看看……能嗎？

拯救中國，依靠孫中山等革命黨人，靠順應時代的改革者，不靠柏楊，更不可能依靠聶元梓，蒯大富之流。辛亥革命被認可，而文化大革命則被否認。一切用偏激的手段破壞文化以求進步的運動，只能在歷史中暴露出自身的劣根性，甚至殘忍和愚蠢。納粹黨和塔利班，以及一些激進分子妄圖用徹底焚毀一類文化的手段，來換取所謂的成就，即使沒有戰爭，這種人也必然失敗。

文革時代，人們對中國文化喊『封建餘孽』；現在，還有人在對中國文化喊『醬缸文化』。這絕不是什麼好的預兆。希望歷史不在重演吧。

6、我們才是卑劣的罪人！

中學時在教科書上，看到一個中國歷史上對發明率的統計，看得我無地自容。

中國自唐以後，發明率一直是比較高的，我們現在，根本沒有資格去和他們比較！

因此，我對先輩的成就，只有一分驕傲，更多的，是慚愧。我們與其如阿 Q 一樣，用『我們先前比你們闊過啦』，來安慰自己，不如在先輩面前深深的反省：為什麼我們那麼廢物！如希臘被北方蠻族征服後一樣，幾乎代代出廢物！我們不會重蹈覆轍吧……

至於咒罵文化、咒罵祖先的人他們把責任推卸到古人身上，自然會好受些，這或許也是一種精神勝利的阿 Q 精神法的延續和發展。

不要遷怒於古人，那不叫本事。

宋朝官制腐敗，兵制存在嚴重的缺點，因此導致被人欺凌，後代的人只會鄙薄他們，而不會衝著強盛的漢朝，唐朝時期的人發牢騷。中國在世界領先了 2000 年，傳到我們手裏，落後了。返躬自省，勇而知恥是必要的，是對的，但是勇而知恥不代表遷怒於強盛的祖先，而是應該在落後的自己身上找原因！這就好比接力賽跑，跑在前面的人本來是領先的，然後接力棒傳到後來者的手中卻落後了，如果後來者挖空心思的去埋怨領先的人，而不去找自己落後的原因，那麼我覺得這不僅是怯懦，甚至是無恥。

我絕對不相信自卑狂和以侮辱自己民族為樂的人能振興任何國家，但我知道欠缺基本歷史知識，卻又大言不慚的發表謬論，肆意詆毀東方文明，證實自己是劣等民族的人，已經在中國有了市場。在他們的眼裏，自尊是愚蠢而保守的，自強是無望的，自己是事實求是的，而自瀆是最快樂的！他們的理論依據，不過是片面和無知兩大法寶，我深信這些人多數擁有一顆賣國無門的熱切之心。

取長補短，應該是一個正常人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

愛德華·吉本認為，拜佔廷生存 1000 年的歷史，「始終是一個衰弱、悲慘的故事」。可是我們民族的一些敗類、無知者和糊塗蟲，卻如此盲目的崇拜西方的所有「文明」。對西方的一切東西統統吞噬在靈魂裏，不分好壞，不知好歹，不識香臭，不區別精粹和腐朽。

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誰都會說，但是有誰真的去做了呢。難道我們的婦女廢棄纏足，就是爲了去隆胸嗎？就是爲了學習他們的同性戀和傳播愛滋病的本事嗎？

譬如我們羨慕一個發達的國家，對於我們來說，要學習的是他先進的政治和經濟體制，人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以及人權和法律意識。至於他的缺點：散漫，荒唐，怯懦，頹廢則不必學，更不應該去效仿他們的「劣根性」，以至於導致了大城市爆發同性戀大遊行。

還有的人，高喊：不養狗就是沒有愛心的表現。抱著疼著愛著哈巴狗，卻把自己的父母拋在養老院，幾個月不看望一次。這種人屬於取其糟粕，棄其菁華。崇拜西方到了顛三倒四的境界，寧願養狗也不養父母。

我想詢問一下那些挖掘中國文化劣根性的學者們，高人們：

中國正處在『東西文化』交流融合的時代，對來自國外的劣根性，我們挖，還是不挖？

一個人除了生命，還有民族。

歐洲人及其他們的後裔有天主教，基督教，阿拉伯人，印尼人和伊朗人有伊斯蘭教，印度人有印度教……爲什麼這個世界上就偏偏沒有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地位？！倘或傳統文化中因包含一些缺陷和過時的東西，而就一定要被定性爲「封建社會」的象徵，那麼，把歐洲帶入黑暗的羅馬天主教會又該當何罪？！如果傳統文化注定要壓迫婦女，那麼我們是否可以認爲，天主教注定要禁止離婚和永遠反對異端？！馬丁路德能改革「神」設立的天主教，我們就不能改進先人設立的思想和文明嗎……

任何民族都沒有權利妄自菲薄。沒有自信和自尊的人本沒有出路，何況是民族！

1609 年，荷蘭的資產階級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資本主義共和國，比法國領先了將近 200 年，但是法國人還是從很多方面超過了他們！中國在明朝中期的發明是當時世界的百分之 70（我們這一代人恐怕連百分之 7 都沒有），當時向來落後於中國的歐洲人既然能超過我們，我們決不可以失去超過他們的信心和希望。

去年秋天，我來到北京。站在十三陵面前，我肅然起敬，又不禁深感慚愧……

那幾代人，幾乎把握著整個東亞和東南亞，讓他們臣服，上供。和遙遠的俄羅斯和奧斯曼帝國，強大的印度莫臥爾帝國並稱列強；那幾代人，驅趕了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人，五次殺進他們的國土，一直打到幹難河畔，讓他們付出巨大的代價；平定西南土著的叛亂，兵不血刃的征服女真，控制了吐蕃和新疆，朝鮮和越南，打敗了自命不凡的日本人和強悍的荷蘭人，把持著幾乎所有周遍國家的命運，並且讓航線一直通向非洲，給他們帶來友誼、文明和文化的交流；而絕不是西方式的殺戮和破壞。數百年來無敵於天下。

而我們，我在想：相比之下，我輩真是卑劣的罪人！

是的，黃河再淵遠流長也要匯入大海，但是蔚藍色的大海不是由一條多瑙河的水匯集而成的。

多元的世界也是如此，多元文化的美利堅，就是榜樣。

發達國家憑藉先進的經濟，改造了非洲的文化：啤酒，麵包，太陽曆，舞蹈（蹦迪），改造了美洲的文化：香菸，卡百拉舞，改造了歐洲古典文化：寶齡球，更改造了澳洲文化：草群舞，蹦極。美國把孔子誕辰，作爲教師節。

隨著一些落後國家的進步，印度的瑜珈豐富了我們的生活，印度的草藥也是高等文明的體現，我希望隨著南亞經濟的發展，快快呈現在世人面前，以使我們的生活更加豐富，完善。

我想起查理曼大帝的第一次文化復興……；讓我們的民族再來開始……！

勇而知恥。並沒有錯。勇而無恥，絕對錯了！

清醒的中國人，還是從自我做起吧。因爲我們才是中華民族歷史上不爭氣的後人和罪人。

中國，醒來！



弘傳中華文化正宗：

敬神、敬天、敬人

棄絕中共黨性惡行：戕神、傷天、害人

比利時 子口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國風氣源一國政」。今日凡在中華大陸中共國歷經人生者大多有此同感。水土、風氣存乎於我中華文化大構之中。神道、天道、人道相濟共生之整體乃我中華文化大構。中華文化之所以可謂博大精深，因其起於多元，化於多變，兼容並蓄，不拘一格，融於大構之內。神道、天道、人道各有所別，但相合於中華文化大構之中，除相濟共生，難有偏激求獨之可能。今日世事、人心之偏激，皆非我中華文化正宗能苟同。今日人類文明社會所推崇，正合我中華文化正宗之標示。眾所周知，中共黨性邪說非我中華文化之正宗，中共國亦非我文明之中華民國。只有反華才會擁共，只有反我中華文化，才會堅持中共黨性之惡行。

一、敬神

《易·繫辭上》：「陰陽測之謂神」。可見神僅存乎人心之內，同時亦存乎人心之外。所謂哲學之偶然，更顯神力之精妙。「鬼神」常連用於我國文、民語之中，亦顯我中華文化之博大精深，人對神之敬畏、驚嘆，由知神而能知天、知人。人可敬神道、亦可守常道。

二、敬天

《荀子·天論》：「明天人之分，則可謂至人矣」。可見天、人分際存乎人思，人無思或人滅思，即無天、人之分，人性亦無存。敬人思乃敬人之本。敬人思乃敬天之始。人可敬天道，不外守常道。

三、敬人

《禮記·中庸》：「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可見無誠人將不知天、人之分。敬人，首

重敬人思之誠。人、天、神之分，誠思可感；人、天、神之合，誠信可受。天子人無獎懲，人傷天必害人。人可敬人道，適正守常道。

綜上所述，何謂常道？常道乃神、天、人之融匯於中華文化大構之道，亦人類文明之大道也。今日神學、哲學、科學皆在此大道之中。人之存在，管是神意，或是天意，還是人意，任何解釋皆不出我中華文化之大構。人類只有敬神、敬天、敬人，才能誠信合作，持久和平。

在中共治下的中華大陸，幾十年來，以中共政治口號治國，史無前例地破壞我中華文化之大構，至成邪惡另類，挑戰人類之共有文明，「假、大、空、邪」橫行，幾陷我全球華人於不義之境地！何談「和平崛起」？何談「對人類有所貢獻」？因信仰而定罪，戕神如此，可見中共之狂妄；顧環保而斷流，傷天如此，可見中共之無知；惜人命而奴役，害人如此，可見中共之邪惡。中共這樣的專制羣體，在人類上萬年的文明史中亦屬罕見。中共企圖以教禁、報禁、黨禁毀我大陸華人之知性與悟性，這種毀我中華文化正宗之行徑，正是其徹底反華滅祖之表露，顯示其從根本上乃邪惡另類之屬性。

筆者在此呼籲：凡我全球華人，應弘傳中華文化正宗：敬神、敬天、敬人；廣開我等知性與悟性大道，明察中共邪惡黨性對我中華文化、世界文明、人類良知之大害；理解我大陸華人同胞身陷思禁之無奈，助其恢復對我固有文化之信心，識別中共黨性之邪惡，恢復我中華文化正宗之生機。

世不可一日無真，國不可一日無善，人不可一日無思。人類不可一日無空氣，社會不可一日無真誠，政治不可一日無光明。整個的人類文明正在和平更新，全球華人將如何參予？尤其是我中華大陸華人如何知情？



改良，還是革命

兼論海外民運的政治思潮與政治意志

袁紅兵

前言

爲什麼中共暴政歷經了那麼多次危機，卻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踏平萬里艱難，迎來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

無數人千萬次地問過這個問題——有多少政治犯在被押上刑場之前，昂首怒目，逼問蒼天；有多少思想犯，在漫漫無盡的苦役和勞改之路上，淚幹血滴，逼問乾裂的大地；又有多少良心犯，在黑牢的鐵門之內，用乾枯的心去追問那似乎永遠不會消散的黑暗；又有多少被迫流亡國外的中華兒女，時常悲憤如漫天飄飛的紅葉，去追問那湧向我可愛祖國的萬里長風！

是的，中共暴政歷盡危機，爲什麼還不崩潰？中國的自由民主何時才能贏得屬於自己的盛大凱旋？今天，我將回答這個問題。

我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很可能只是爲中國的民主革命書寫一篇墓誌銘；當然也可能，我的回答會和其他智慧之士的思想一起，撞響中國民主革命的晨鐘。而結果如何，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能力理解真理，並崛起於危難之際；完全取決於我們這個民族還有沒有潛力，孕育出如同戊戌六君子到辛亥的英烈那樣一群英俊秀麗、國色天香的中華兒女，他們願意爲自己國家、自己民族的命運去浴血奮戰。但是，無論結果如何，我都必須首先把我所理解的關於革命的真理告訴天下。

當改良主義思潮仍然像滾滾陰雲籠罩在中國民主運動上空的時刻，當許許多多自稱是自由主義知識份子的人們還在以百種妖嬈、千般媚態、萬種風情，向中國兜售改良主義幻想的時刻，我，作爲一個獨立而自由的知識份子有責任向歷史講述革命的真理。



袁紅兵教授悉尼中國問題研討會上講演改良還是革命

一、政治改良主義是海外民運凋敝的政治意志原因

縱觀海外民運思想史，可以發現改良主義思潮始終是造成政治思想混亂的潛流。因此，爲使海外民運能形成足以同中共暴政決戰的政治意志，首先就必須對改良主義思潮進行思想的清理。

政治改良主義已經被過多的學者進行了過多的詮釋。庸人學者們的主要能力之一就是把簡單的問題繁瑣化，當繁瑣到上帝都厭倦的時候，便很少有人會願意對之進行討論。於是，庸人學者就會以對繁瑣的獨佔而宣稱他們的淵博。爲了避免除皓首窮經的腐儒外無人感興趣的繁瑣，爲了能夠對問題作簡要、明快的討論，本文所謂的政治改良主義只限於當代中共的政治範疇之內。

當代中共政治範疇內的改良主義思潮可表述如下：即使在“六四”事件之後，中共仍然有意願和能

力，通過由其主導的漸進的政治改革，最終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因此，一切其他社會力量都應當以推進中共實現其民主政治改革的意願，作為決定自己政治活動的前提。

當代中國，改良主義思潮的人格承載者，主要有兩部分人。一部分是被“六四”一陣狂風，由中共官僚體制內，吹到了海外民運中的人；另一部分為現在仍處於中共體制內的學者和官員，其中還包括某些結成朋黨、互相吹捧自己是自由主義者的文人。

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者對於中共暴政乃是一分情仇，二分怒意，三分鬱悶，四分失望，五分責怪，六分哀怨，七分苦戀，八分憐愛，九分寬容，十分幻想。改良主義者對中共暴政具有棄婦懷舊似的幻想，那種愁腸千迴、幽怨萬般的依戀，可以令石人垂淚，只可惜中共暴政在政治改良的意義上毫無憐香惜玉之意。

八九“六四”，中共用鐵血手段向歷史申明：它決不允許通過體制內的政治改良和平演進到民主政治——它決不允許用任何方式改變一黨專制的極權政治。

儘管改良主義的文人製造或引進了諸如新權威主義、威權政治、後極權政治等等一系列偽概念，試圖說明中共專制已經軟化，因而有改良的實際可能，但是，“六四”對和平情願學生和市民的血腥大屠殺，勝於雄辯地證明，中國仍然處於典型的極權政治之下；中共暴政乃是人類歷史上最泯滅良知的極權政治。

“六四”之後，中共暴政被徹底剝去了政治道德的遮羞布。它淪落到只能靠骯髒的物欲收買人心、維持專制的可憐境地。它要全體中國人的良知都在物欲的追求中腐爛，以便所有的人都忘卻它在“六四”中犯下的反人類罪行。中共暴政在這個意義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付出的代價是，當它希望全體中國人都腐爛時，它自己首先腐爛了，而且腐爛到無可挽救的程度——事實上也沒有誰真正想要挽救。

當前的中共“上層一萬家”，乃是貪官污吏、奸商惡賈和無恥文人共同構成的黑幫集團。這個政治黑幫唯一的政治意志只在於，用一切方式強化極權專制。而強化極權專制的作用有二：一是中共官僚集團可以繼續藏匿於暴政鐵幕之後，規避歷史對其反人類

罪行的大審判；一是權貴階層能夠利用國家權力，在受到專制法律保護的條件下，繼續肆無忌憚地掠奪國家、社會和人民的財富。通過政治改革實現民主，對於中共權貴階層乃是自殺行為，因此，中共政治黑幫集團根本不可能有政治改革的意志和激情——它沒有自殺的意志和激情。

正如當年戊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近代史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國改良和革命的界限。

在已經喪失任何可能性的情況下，改良主義的“棄婦”們依然或者呼天搶地，或者媚態百出地召喚中共暴政的自我改良，結果必然是讓人們在思想混亂中迷惘於改良的幻想，從而掩蓋只能用民主大革命開闢中國未來命運之路的真理。

縱觀歷史，可以發現一個基本的政治鐵律：改良總是以強化改良運動主導者的政治地位作為目的；專制的改良，不是為了否定專制，而是為了給專制注入新的政治活力。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實際上對“政治改良”寄以超出其能力的過分希求。由專制政治的最高核心主動啟動並主導否定專制政治的政治改革——這種希求不僅違背政治邏輯和人性的邏輯，在人類歷史上也很難找到實際例證。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喜歡以台灣民主轉型為例，來論證改良主義的合理性。在此，他們忘掉了一個基本事實：作為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精神價值，是三民主義和五權憲法，即中華民國從政治理論基礎到法律制度本體，都與民主共和理念一致。蔣介石的獨裁（或曰威權）只是以軍閥割據、日本入侵、國共內戰等國內國際形勢的具體背景為根據。蔣經國的民主措施，只是在新的情況下，向中華民國立國之本的理念的回歸。所以，所謂台灣經驗根本不適用於分析中共暴政——這個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典型、最殘凶、最狡詐、最虛偽的極權政治的走向。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喋喋不休、津津樂道的另一個例證就是“戈巴契夫現象”。但是，這種現象並不能為當代中國的改良主義思潮提供辯護。中共的“戈巴契夫”胡耀邦和趙紫陽，均被中共自己的專制鐵手扼殺。這一事實表明，中國專制之獸性絕非原蘇東地區的共產黨統治可比。這且不論，問題的實質在於，東歐和前蘇聯的歷史性變革的主要動力，並非來自共產

黨統治集團主動啟動和主導的改良，而是來自經過長期積累並最終爆發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戈巴契夫、謝瓦爾德那澤、葉利欽等人物的出現，使東歐和蘇聯的民主進程比中國少了許多艱難，這是他們偉大的歷史功績。不過，只有共產黨官僚體制之外的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才是東歐和前蘇聯的民主政治之父。

在中國的社會危機呼喚革命的時刻，在中國的苦難和艱難渴望革命的時刻——當中國的命運問題必須用堅硬的革命加以解決的時刻，改良主義的溫柔小夜曲，聽起來就顯得格外冷酷。

苦戀政治改良主義的深情，與仇視革命的恨意同生共長。革命，這個曾經引導人類殺出中世紀專制重圍的具有英雄情懷的概念，現在卻受到極不公平的侮辱和貶低。攻擊革命的思想最初或許來自西方，但是，對革命表現出激烈怨恨的，卻是當代中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的文人。

革命意味著什麼？

就近現代專制和民主政治的範疇而言，在近代，革命意味著徹底否定中世紀的封建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為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在現代，革命主要意味著徹底否定共產黨的極權專制，建立憲政民主制。

無論近代還是現代，革命的一個明確特徵在於，發動和主導社會大變革的力量均起自於統治集團以外的各個社會階層；儘管革命並不拒絕同專制統治集團內部的某些派別作策略上的妥協或聯合，但是，**革命之魂總在民間，而不在專制統治集團之內。**

回顧近現代史，可以毫無困難地發現，革命是憲政民主制的主要鑄造者。沒有革命的狂飆突起，就沒有《獨立宣言》，就沒有《人權宣言》，就沒有封建專制的崩潰，也沒有東歐和前蘇聯共產專制陣營的土崩瓦解，煙消雲散；革命如果被近代史否定，巴士底獄直至今天還會屹立不倒，人類可能還在中世紀的黑暗中，戴著專制的鐵鏈蹣跚而行；革命如果被現代史否定，東歐和前蘇聯地區的人民就將仍然在專制鐵幕的陰影中承受苦難的命運。

許多改良主義的苦戀者，正是在利用革命賜予的言論自由權利，忘恩負義地詛咒革命。他們把革命等同於暴力，誣指革命就是以暴易暴；斷言革命必定導

致暴力的無限制使用，導致暴民政治。他們所能舉出的主要例證，便是法國大革命和共產黨的所謂革命。

在文人殺害“革命”的思想刑場上，法國大革命竟被描繪為暴力、罪惡的象徵；羅曼·羅蘭夫人的一句話——“自由、自由，有多少罪惡假汝而行。”——成為某些文人心目中對法國大革命的有罪判決。

但是，當改良主義苦戀者以無限制暴力和暴民政治的名義徹底否定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人權宣言》乃是法國大革命的思想之子，直到今天，人類在爭取人權的過程中，仍然在相當程度上執行著《人權宣言》的遺囑；當改良主義苦戀者對滾落於巴黎街頭的貴夫人那美麗的頭顱憐香惜玉，並因此徹底詛咒法國大革命時，他們忘記了，正是法國大革命摧毀了中世紀黑暗的象徵巴士底獄，從而使在鐵牢中囚禁了數百年的政治犯和思想犯的冤魂，得以重見白日。

法國大革命的過度暴力確實深刻地傷害了它的道德價值。之所以出現這種過度暴力，大體有兩個原因。

其一，法國大革命爆發於歐洲——這中世紀黑暗最沉重的地方，它當然要比英國和美國的民主革命更艱難，也當然要受到專制勢力的更殘酷無情的反擊。正是專制勢力反擊的殘酷無情，刺激法國革命趨於極端化，從而導致暴力的過分使用。

其二，法國革命的主導者們最初犯了一個屬於理想主義者的致命錯誤——他們寄予政治革命太多的期待。他們不懂，政治革命的目標應當以政治體制的變革為限度，而其他屬於精神領域的變革，只能在民主政治建立之後，在人們普遍享有思想和言論自由之後，通過文化或宗教的方式來進行。凡是企圖用政治革命的方式解決價值觀念和思想領域問題的地方，一定會有超過理性限度的暴力；凡是人們能夠用包括“革命”在內的任何神聖的名義，對思想進行強制的時候，就是獸性戰勝人性之日。

上帝才不會犯錯誤，如果有上帝的話。法國大革命的英雄們把自己當成拯救人類的上帝，並由此鑄成大錯。法國大革命因為他們的錯誤而蒙受恥辱。但是，無論如何，法國大革命都是人類走向民主政治的偉大里程碑，儘管，它沐浴在過度暴力的血腥之中。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如同孔雀喜歡炫耀尾巴一樣，喜歡炫耀他們的“理性”，他們的“冷靜”，他們的

“非極端化”。然而，在否定革命的問題上，他們卻毫不理性，毫不冷靜，並且非常情緒化，非常極端——他們完全無視《人權宣言》和攻克巴士底獄對整個人類歷史的無可取代的貢獻，只以過度暴力的名義，就徹底否定了法國大革命；他們還不經任何邏輯的過渡，就進而斷言所有的革命都一定會導致以暴易暴，導致暴民政治。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在徹底否定革命過程中表現出的激烈情緒，頗似假作單純的妓女聲稱自己看見一滴血就會暈倒時的矯揉造作。

如果說對法國大革命的徹底否定是一種非理性的極端主義情緒，對共產主義革命的態度，就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精心設計的思想陷阱。

且讓我們看改良主義苦戀者們對待共產主義革命的思想邏輯：共產主義革命是暴力神聖化的過程；共產主義革命表明，革命就是以暴易暴，就是暴力濫用；所以，今天對共產黨的統治絕對不能採用革命的方式，否則，就是暴力的輪回，革命之後上台的暴民，說不定比共產黨還壞。

上述思想邏輯是由錯誤的概念、錯誤的類比和無端的推定構成的思想陰謀，**陰謀的目的在於，以反暴力的名義，要求人民在中共暴政前放棄革命的權利。**

從文藝復興開始，直到現代，人類命運的政治主題一直是革命——由專制，通過民主革命，進入民主法治時代。這個歷史進程的前一時期革命的物件，是中世紀的封建專制；而後一時期的革命對象則是共產極權專制。就民主革命的範疇而言，所謂的“共產主義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而是專制主義的借屍還魂，是對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是專制主義的復辟。理由很簡單，共產主義運動在眾多國家內建立起的政治制度，全都是人類歷史上最暴虐的極端專制主義統治。所以，歷史已經作出結論：“共產主義革命”乃是偽革命，真專制；是反革命。

改良主義的苦戀者用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來否定對中共暴政的革命，是由錯誤的類比得到的錯誤結論。共產主義偽革命的血腥和暴力，是由它的靈魂，即它的理論所決定的。共產主義理論斷言，階級仇恨，以及由這種仇恨催生的階級鬥爭，是階級社會發展的動力；共產主義偽革命要實現的第一個政治目標，就是建立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而且共產主義理論認為，國家就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

力工具。可以看出，正是由於暴力和仇恨這兩個概念在共產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中互相激發，才創造出了恐怖的歷史。

民主革命在理念上與共產主義革命不可同日而語。民主革命的目標，乃是建立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政治制度，和每個公民擁有平等法律權利為原則的社會公正。在理論中，暴力和仇恨並不是民主革命的圖騰。儘管也出過法國大革命過程中過度暴力的現象，但民主革命本質上與人性一致。前蘇聯和東歐上世紀九十年代發生了民主大革命，而革命過程中暴力的運用完全被限制在人類的理性和良知能夠接受的範疇之內，並沒有出現過度暴力和血腥的恐怖。這表明，民主革命已經成熟到不被仇恨所誘惑，並能有效而人道地駕馭歷史命運的程度。

討論進行到此，應當得出結論：在中國沒有改良可能的情況下，散佈改良主義幻想；在中國需要政治大革命的艱難時刻，侮辱並否定革命——這正是造成包括海外民運在內的中國民主運動思想混亂的根源。混亂的思想，無法熔鑄出明確而堅定的政治意志。沒有明確、堅定的政治意志，民主政治運動就不可能形成強大的政治能量，去挑戰，去震撼中共暴政。

一、政治改良主義也是海外民運頹敗的組織原因

政治意志是政治組織的靈魂；政治組織是體現政治意志實效性的機構。海外民運組織林立，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個組織真正具備同中共極權專制作政治決戰的素質和能力。之所以如此，根本原因之一就在於，海外民運的各組織均沒有形成具有高度理性並與現代人類道德意識相一致的民主革命的政治意志。相反，在改良主義思潮的嚴重毒害之下，各民運組織政治結構軟弱渙散，政治紀律蕩然無存，政治能量如風中之燭。

最經典地表現出改良主義思潮毒害的政治組織觀念，莫過於聲稱要把民運組織構建成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或者要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政治組織。

上述政治組織觀念乃大荒謬。這種荒謬是建立在對政治範疇基本認知的錯誤之上。

在憲政民主制度的政治範疇之內，才會有同“執政黨”相對應的“反對黨”的概念。中共極權專制之下根本沒有“反對黨”生存的任何空間。現代之中國，只有老子黨和兒子黨——共產黨是老子黨，政治協商會議內的各政黨都是由共產黨發薪水養活的兒子黨。老子黨與兒子黨之間實行的是“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的專制倫理關係。所以，中國的兒子黨必須通過比共產黨自我吹噓更賣力地吹捧共產黨，作為自己生存的政治前提。

不知要在中共極權體制內組建“反對黨”的諸君，是否要讓民主運動步中國兒子黨的後塵？更不知具有建設性之“反對黨”之“建設性”要如何體現？因為，有利於中共極權的“建設性”才被中共專制之法允許；有利於否定中共極權、實現民主政治的建設性，則一概被中共之法以“顛覆國家罪”予以鎮壓。以為用“建設性”一詞的掩護，“反對黨”的生存權就可以得到中共的肯定，乃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之舉。如果是在中國大陸，出於鬥爭策略的考慮，提出建設性“反對黨”的概念，或許還應當被理解。來到海外，依然傳播這種概念，實在令人齒冷。

至於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構建當今之中國民運組織的觀念，流播更廣，為害更甚，其荒謬性也更加明顯。憲政民主體制之內運作的政黨，同要與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民主政治組織，處於完全不同的政治範疇，面臨完全不同的政治任務，因此，這兩類政治組織必須各自具有與其所處政治範疇，和承擔的政治任務相適應的完全不同的組織結構，而決不可以互相模仿。

按照外國“議會黨”的模式組建民運組織，由於政治範疇的錯位，使海外民運組織徹底喪失了向中共暴政挑戰的銳利的政治意志，徹底喪失了同中共暴政政治決戰所必須的迅速的決策能力和果斷的行動能力。海外民運組織也因此變成“政治的自由市場”，成為小政客叫賣雜亂的政見，低智商的野心家炫耀小聰明的領域。而潑婦廝打般的內鬥，毫無政治道德底線的陰謀，沒有任何政治紀律約束的我行我素，更徹底剝奪了海外民運組織形成堅硬的組織構架，決戰中共暴政的可能。

其實，構建具有建設性的“反對黨”也好，組建“議會黨”式的民運組織也好，其意識的深處都鬱積

著濃烈的改良主義氣息。此類組織的構建者似乎並不把推動極權專制轉化為憲政民主的歷史進程當作自己的政治責任，他們只是滿足於事先組建起在憲政民主制度下運作的“反對黨”，或“議會黨”，並通過“善意”或者“建設性”的呼喚，促使信奉極權專制的中共自動改良為遵守憲政民主原則的政黨，然後，他們再與中共一起坐在“圓桌旁”，共商民主建設的大計。

思想至此，令人哭笑兩難。只要想一想中共暴政五十六年間以國家恐怖主義為紙，以強權暴力為筆，蘸著中國人民無盡的血淚書寫的罪惡史，便可以明白，希圖組建“反對黨”和“議會黨”諸君對中共暴政的希求，完全是癡人夢話，醉漢顛語。

改良主義思潮束縛中國民主運動的另一條鐵鏈，就是要求民運組織的行為具備以專制之法為標準的“合法性”。中共暴政有兩類法律。一類法律是公開宣佈的，一類是實際執行的。公開宣佈的法律用來欺騙人民和國際社會；實際執行的法律是為了維護極權專制。不知改良主義思潮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符合的哪一類法律？如果符合公開宣佈的法律，只能是幫助中共暴政欺騙世界並自欺；如果符合實際執行的法律，民主運動組織就同中共暴政維護專制的意志一致。民主運動組織的天職只在於否定中共極權的法律制度，創建憲政民主的法律制度。要求民主運動組織的行為符合專制之法，同要求民主運動組織與中共暴政同流合污沒有什麼本質區別；民主運動組織一旦放棄徹底否定專制法律的努力，並去符合專制法律，也就否定了自己存在的全部政治價值。

有人竟十分自得地為海外民運組織內亂烽起、內鬥不止、軟弱渙散的狀態辯解曰：追求民主的組織只能如此，像中共那樣講統一的政治意志，講鐵的紀律，講嚴密的組織結構，就必然導致奪權後的獨裁專制。

上述辯解的一個基本邏輯錯誤，就在於把兩個不具可比性的概念加以類比——民主革命組織與共產黨如雲泥之別，不可同日而語。如果以民主革命是文藝復興以來“永恆的政治主題”為大背景審視，共產黨根本不是革命黨，而是偽革命黨，反革命黨。因為，舉凡共產黨建政的制度全部是中世紀專制的否定之否定，全是中世紀黑暗更泯滅人性的復辟。民主革命組

織與共產黨在基本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共產黨崇尚暴力和階級仇恨，其政治目的就是爲了用暴力奪取政權，並建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階級專政。民主革命的組織崇尚自由、民主、人權，其革命的目的不是爲了奪取政權，而是爲了建立遵循“人民主權”原則的憲政民主制度，並把自己對權力的要求，置於人民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的選擇之下。民主革命組織同共產黨，這兩類在理論基礎，政治意志，政治目標都南轅北轍的政治組織，怎麼可能產生同樣的政治結果？那些爲海外民運組織可悲的現狀進行辯解的人，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庸人，就是居心叵測者——他們希望海外民運組織永遠處於缺乏政治決戰能力的可悲狀態。

政治命運就如同草原上的野馬，只服從強者的駕馭。具備堅硬的政治意志、嚴密的組織結構、嚴明的政治紀律、迅速決策和果斷行動能力的民主革命組織，才是駕馭政治命運的強者。使歷史遺憾的是，目前海外民運組織不配稱爲強者，而弱者必定被命運輕蔑地拋棄。

要想扼住命運的咽喉，就只有成爲強者。革命和革命黨，乃是中國民主運動走向強者之路。而且是唯一的路。

三、為革命正名

革命，是近現代歷史的政治主題。近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中世紀封建專制（或君主專制）；現代，革命的目的是否定共產極權專制；當前，革命的目標是攻克專制主義最後的巴士底獄——中共暴政。

從歷史事實的角度審視，否定革命，就是肯定中世紀的千年黑暗，就是肯定前蘇聯和東歐的共產極權專制。然而，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正在否定革命。

爲了砸碎改良主義苦戀者們用污蔑和謊言鑄成的囚禁“革命”的鐵牢，讓“革命”重新如英雄般走上與人類最後的專制暴政——中共暴政決戰的戰場，我們必須爲革命正名。

就現代中國而言，革命的涵義應當明確表述如下：通過全民大反抗和人民大起義，實施政治大變革，否定中共一黨專政的極權統治，否定中央極權的國家結構，實現以“主權在民”爲理論原則，以多黨制爲政治基礎的憲政民主，建立聯邦中國。

革命同不受限制的暴力之間，並不具有改良主義苦戀者斷言的那種必然聯繫。明確即將來臨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已經成爲最緊迫的理論要求。

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政治大革命同暴力之間的關係，表現爲三項原則：

第一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的基本政治目的，就在於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體現爲國家恐怖主義的暴力，因此，**民主政治革命在本質上是政治暴力的天敵，是政治暴力的徹底否定者。**

第二原則，民主政治革命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所能允許的一切方式，結束中共暴政的專制統治。這些方式包括前蘇聯東歐地區人民反抗共產專制的各種運作方式，也包括中國人民抗爭暴政過程已經使用和正在使用的各種方式。革命所要解決的重大課題之一，就是如何採取有效措施，將孤立、分散而又廣泛發生的維權抗暴的活動組織起來，最終形成統一意志指導下的全民大抗爭和全民大起義。

第三原則，民主政治革命絕不崇拜暴力，絕不提倡暴力，但也不否定在反抗專制暴力鎮壓時，人民擁有採用適度政治和法律強制力，維護自己天賦人權的權利。

首先，對於中共極權專制利用國家恐怖主義，以專制惡法的名義和暴力方式，摧殘、剝奪公民權利的犯罪行爲，人民有權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

其次，在人民以和平的方式進行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活動時，如果中共專制當局利用國家暴力進行鎮壓，人民有舉行全民大起義的權利。當然，人民會根據具體條件下是否有利於民主革命成功，來決定是否以及何時行使這項權利。

再次，當形勢發展到民主革命與中共極權專制決戰的關鍵時刻，如果必須使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才能取得決定性勝利，民主革命即當果斷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以推動歷史進程。羅馬尼亞人民在革命過程中，果斷處決齊奧塞斯庫，阻止專制力量重新集結反撲，加快革命成功的步伐，就是合理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的典範。在這種情況下採用適度政治強制力，恰恰是爲早日結束專制暴力，實現社會的非政治暴力化所必須的。

“非暴力”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最賣力炫耀的一塊道德遮羞布。不過，即使是真理，一旦被吹噓到令人肉麻的程度，人民也有理由懷疑吹噓者的真誠。甘地和馬丁·路德金發起的“非暴力反抗運動”，是改良主義苦戀者們要求中國人民學習的經典之作。但是，如果真的學習了，中國人民將進入更加苦難深重的命運。

甘地和馬丁·路德金及其領導的運動面對的是什麼？是以自由、民主、人權理念為立國之本的政治體制。這樣的政治體制本質上符合人性，因此，它可能被人性所感動，被非暴力運動的道義力量說服。這是甘地和馬丁·路德金成功的根本政治原因。

中國人民面對的是什麼？是崇拜國家暴力的極權政治。中共暴政不會被人性所感動，也不會被道義力量說服。“殺二十萬學生，換二十年穩定”，就是獨夫民賊暴力意志的宣示——中共暴政只能被革命的意志所征服。讓中國學習甘地或馬丁·路德金，實質上就是要求中國人民在維護人權、抗爭暴政時，也要任由專制政治隨意摧殘虐殺。試想，如果“六四”之夜學生們不是撤退，而是學習甘地，繼續在天安門廣場上“非暴力”地反抗，結果會如何——結果定然是坦克群從學生的血肉之軀上壓過，將“非暴力”抵抗壓成動盪的血海。

改良主義苦戀者們不經過任何邏輯的推演，就將人民革命等同於暴民政治，並以此為由聲討革命。但是，值此人民革命尚只是政治設計，而中共極權專制已經將國家恐怖主義運用到極致之時；值此中共暴政利用國家暴力，貪婪地攫取社會財富，肆無忌憚地踐踏人權之日；值此權利被剝奪的民眾可憐到只能用跳樓、服毒、自爆、自焚、無望的上訪等方式，表現一腔悲憤之際，不去譴責中共暴政——這個暴力的根源，卻以反暴力的名義，唾液四濺地誣衊否定中共暴政的、尚未發生的人民革命，這是多麼無恥的偽善！有文人曰：偽善也可能是善意的開始；我說，偽善比公開的罪惡更接近罪惡，因為，偽善除了罪惡之外，還有無恥的欺騙。

改良主義苦戀者另一個最能表現他們苦戀的觀點，便是宣稱“街頭民主”沒有真正的社會歷史價值，因此應當推動“議會民主”。

愚昧到何種程度才會不明白，中國的所謂“議會”——人民代表大會，不過是中共暴政的一個橡皮圖章。如果在這個橡皮圖章上能夠雕刻出民主，那麼“小蝦也會吹口哨了”。人民代表大會的存在只有一種實質性政治價值，那就是作為中共極權專制的“民主”修飾物，來欺騙國際社會和中國人民。

崇尚“議會民主”者所蔑視的“街頭民主”，實質上是公民的各種維護權利，抗爭暴政的活動。這種活動在相當時期內是積累政治大變革能量的主要方式。因此，否定了“街頭民主”，就意味著否定了當前中國公民維權抗暴可能採取的主要方式，就意味著否定了政治大變革的可能性。

崇尚“議會民主”者，在八九年“六四”期間，以為波瀾壯闊的民主運動有成功的可能，曾一度投機他們鄙夷不屑的“街頭民主”，試圖充當學生運動同當局之間的政治掮客。殊不知，以正義的激情為底蘊的學生運動，根本不受政客式的理性利益權衡的控制，終使政治掮客的努力，成為一枕黃粱。而崇尚“議會民主”者也被中共頑固派視為學生運動的“幕後黑手”，被迫流亡海外。這真可謂造化弄人。

“六四”學生運動引發的民主大潮退去之後，這部分改良主義苦戀者傷感之餘，又重彈貶低“街頭民主”之老調，希冀得到專制者之憐愛。只可惜他們已經人老珠黃，而中共貪官們卻只喜歡摟著年輕貌美的三陪小姐，傷感地唱“遲到的愛”。崇尚“議會民主”者，不過是一小群熱衷於充當客廳英雄的文人，這就註定了他們的政治願望不可能在歷史大舞台上實現。但是，他們的觀念卻加劇了海外民運思想的混亂，加深了如北京初冬之霧般朦朧但濃重的改良主義幻想。

“民主革命”，是近現代史政治領域的“永恆主題”。命運已經註定，以英國革命為起點的政治歷史進程，將以中國民主革命的勝利作為最後一幕。唯有自由民主在中國成為現實，整個人類歷史才可能走進另一個主題時代，人類的心靈也才可能開始新的精神探索過程。如果任由改良主義苦戀者在思想領域謀殺了革命，人類的歷史就將繼續在專制的最後鐵幕下徘徊；如果中國人民放棄了革命的權利，中國的命運就將凋殘於對民主的絕望之中。

四、中國呼喚革命

中國的政治現實呼喚革命；中國的社會大危機呼喚革命；中國的偉大命運呼喚革命。

胡耀邦、趙紫陽時代，命運曾賜給中共以政治改良的機遇。然而，中共通過對胡耀邦、趙紫陽的政治迫害，以“六四”屠城的方式，最終拒絕了命運的恩賜。歷史的機遇並不像太陽，每天都會從東方升起——抓住了它，歷史的機遇就如同插在心上的利刃一樣真實；沒有抓住它，歷史的機遇就如同飄忽的時間，一旦逝去，便無可追回。有必要再說一次：如同六君子的血洗去了中國近代改良和革命的界限一樣，“六四”之血，也洗去了現代中共改良與革命的界限。

“六四”之後，鄧小平以及官僚集團基於掩埋反人類罪行的陰暗心理，指令專制權力教唆整個社會去瘋狂追求物欲，以使中國人的心靈在物欲中腐爛，從而忘卻道德和良知，忘卻“六四”之血的精神價值。陰險的中共官僚集團把兩個最具社會能量的群體——商人和知識份子納入官僚特權階層的範疇，從而形成了由腐敗的官權、骯髒的金錢和墮落的知識共同構成的政治黑手黨。

政治改良需要以執政集團具有崇高的政治意志為基礎。中共，這個犯有重重反人類罪行的政治黑手黨，它尚存的唯一政治意志，就在於利用國家恐怖主義、謊言和利益收買，毫不妥協地維持極權專制。因為，唯有依靠專制的國家權力，中共官僚集團才能繼續壟斷政治利益和經濟利益；唯有躲藏在專制的國家權力之後，中共官僚集團才可能規避人民對其反人類罪行的大審判。

我們相信中共內部存在眾多良知未泯的人士，但是，在政治大腐敗的背景下，他們不足以形成政治改良的政治意志。中共官僚集團從整體上已經喪失了政治改良所必須的政治道德素質。這就是中國最重要的政治現實之一。中國或者同中共官僚集團一同腐爛下去，直至萬劫不復之境；或者超越改良的幻想，以政治大革命，贏得自由民主的未來——中國有史以來面臨的最冷峻的命運抉擇就在於此。

長期以來，種種自以為是的庸人之見廣泛流播，已成革命昂視闊步踏入現實的思想障礙。今日，且擇其要者破除之。

其一曰，中共當局控制著強大的現代化軍隊，控制著強大的國家權力，壟斷著中國一切政治資源，掌握著國家經濟命脈，因此，以結束中共專制為目標的革命根本就沒有發生的可能，遑論成功。

持此類觀點的人沒有理解一個基本的事實：中共致命的危機並非來自物資力量的匱乏，而是源於精神和政治意志的腐爛。

人類的歷史是由心靈，由意志走向現實物性世界的。人類歷史本質上是心靈史，意志史。雖然在現實物性世界中，中共目前還表現出強勢存在，但是，在心靈和意志範疇內，中共早已一敗千里，潰不成軍。

“文化大革命”的歷史悲劇和“六四”血案，使中共變成政治道德的破落戶；蘇東地區社會主義陣營頹然崩潰，又使中共變成思想理論的破落戶。當今之中共既無能力重建政治道德，也無能力再創思想理論之基礎，唯有靠“即得利益”來換取黨的凝聚力。然而，當利益成為唯一的價值取向時，政治組織必然黑社會化。黑社會化的結果又必然是政治組織內部以私利為驅動力的組織幫派化，以及各幫派之間的權力和利益搏戰。當今中共不斷懲罰貪官，無非是在權力爭奪中取得強勢的幫派，對弱勢幫派的清洗。從清洗的殘酷性可以發現，黑手黨化的中共內部權力和利益的爭奪，正在血淋淋地撕裂中共自身。

通過以上討論，可得出一個結論：中共已經是魂銷魄散之黨，而建立在私利基礎上的黨的統一性，正由於遍佈黨內各級組織的殘酷的權力鬥爭趨向瓦解。因此，一旦出現重大社會事變，處於精神分裂和組織瓦解狀態下的中共，很難有效地使用名義上被它掌握的軍隊和其他政治社會資源，來體現統一的政治意志。而喪失了統一意志的物質力量的強大，乃是泥足巨人。

否定革命可能性的第二種典型的庸人之見，可以如此表述：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使國民經濟高速增長，而經濟的高速增長，必然產生保障中共統治穩定的政治效應。

上述觀點的致命錯誤在於，對中國現代經濟性質缺乏基本瞭解。中共主導的經濟改革造就的，並不是以公平競爭為原則的自由市場經濟，而是“權貴市場經濟”。“權貴市場經濟”以腐敗的專制官權為軸心，以權錢交易為動力，以墮落的知識界廉價的“合

理性”論證為遮羞布。“權貴市場經濟”的天性決定了，經濟的發展必然要以權力腐敗的深化，權貴階層對人民和社會財富的瘋狂攫取，自然資源和環境資源的毀滅性破壞為補充。“權貴市場經濟”已經成為社會不公正的根源之一。因此，經濟的發展過程同時也是社會矛盾的積累過程，而且經濟發展的速度越快，社會矛盾積累的速度也就越快。高速發展的中國經濟正預示著，社會大危機高速接近導致社會崩潰的臨界點。

馬克思曾從黑格爾那裏抄來歷史發展的宿命論，然後又以必然規律的名義，將宿命論植入共產黨的社會發展觀。如果真有宿命的話，“權貴市場經濟”的發展必然導致財富和權利的極度兩極分化，便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宿命。而財富和權利兩極分化的極端發展，又必然撕裂社會的穩定。在特定意義上，正是中共建立的“權貴市場經濟”，在為否定中共暴政的社會大變革準備了充分的條件——黑手黨化的中共乃是自己的掘墓人。

但是，革命的社會條件並不等於革命；革命的崛起除了社會條件之外，尚須具備政治條件，即革命黨的橫空出世。

沒有民主革命的引導，一旦出現中共統治危機導致社會自然崩潰的現象，那對於中國將意味著社會的大動亂，民族的大分裂——中國將陷入前所未有的大災難之中。唯有以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的理念為引導，通過民主大革命，中國才能踏過重重社會危機，艱難但成功地開拓民主建政的新紀元。

中國面臨嚴峻的命運抉擇。如果人民放棄革命的權利，在可預見的未來，中國將失去美好的前途，並墮入萬劫不復的社會悲劇；如果仁人志士放棄了組建民主革命黨的努力，就等於放棄了革命。

五、革命黨興，共產黨亡

中共暴政喪失了堅定的政治信念和具有邏輯說服力的理論，因此，在精神的領域內它已經失敗了；中共暴政喪失了道德的感召力，全憑暴力、謊言和物欲利誘維持統治，因此，它執政的道德基礎已經崩潰。但是，中共暴政卻依然是一個如刑場般真實的存在——出現這種狀況的原因何在？

歷史的邏輯一再表明，即便是完全喪失了存在理由的宿命，如果沒有受到另一種意志的強有力挑戰，也會在歷史運行的慣性中，繼續保持其存在。儘管那是腐朽的存在。中共暴政面臨的局面就是如此。沒有強有力的政治意志和政治能量對其實施劇烈的震撼，中共暴政雖然屍居餘氣，卻也要依恃歷史運行的慣性，保持其現實存在性，並將中國拖入難以預測的大災難的地獄。

革命黨就是斬斷歷史慣性的銳利的政治意志；革命黨就是以雷霆萬鈞之勢，對中共暴政作最後震撼，並使之驟然崩塌的政治能量。革命黨不起，共產黨不銷；革命黨興，共產黨亡——這必將是歷史的結論。

在現代之中國，應當如何理解革命黨？

革命黨的基本政治目標，就是通過全民的政治大革命，徹底否定中共極權專制，建立以主權在民原則為靈魂的現代憲政民主政治；徹底否定與極權專制意志一致的現行國家結構，組建聯邦中國。

革命黨運用革命的方式所要達到的基本政治目標，首先在於否定極權專制制度，實現憲政民主，而決不運用革命方式，謀求執掌國家權力——這是革命黨為自己設定的首要的政治紀律。任何政黨執政的權力，都必須在憲政民主政治制度建立之後，由全體公民通過公開、公正、自由的定期選舉來決定。而革命黨在憲政民主實現之後，重要的政治任務之一，便是使自己由革命黨轉化為按照憲政民主的政治制度運作的議會。

與基本的政治目標相一致，革命黨把徹底否定一切形式的國家恐怖主義和國家暴力，作為自己的重大政治職責。革命黨將運用現代人類理性和良知允許的一切方式，發動民主革命。革命黨不提倡暴力。但是，革命黨確認，當公民的人權受到中共暴政的國家暴力侵犯時，公民有按照現代法治精神進行正當防衛的權利；當人民維護人權、抗爭暴政的和平運動受到中共當局的國家暴力鎮壓的時刻，人民擁有起義的權利。革命黨還確認，在民主革命與中共暴政進行政治決戰的時刻，為防止中共當局聚集國家暴力，鎮壓民主革命，人民有權採用適當政治強制力，剝奪中共當局運用國家暴力鎮壓民主革命的能力。

要依據同人類歷史上最成熟、最兇殘、最狡詐的極權專制進行政治決戰的要求，來構建革命黨的組織

結構。革命黨的所有組織構建，都必須符合“迅速決策，果斷行動，紀律嚴明，生存力頑強”的原則；都必須有利於高效地凝聚和發揮強大政治能量。

精神和意志是現實世界歷史發展的終極原因。因此，革命黨在否定中共極權專制的革命過程中，將首先把精神和意志的領域作為戰場，以具有創造性的有效方式，同中共暴政開展心戰。心戰的作戰目標有三：1. 徹底摧毀中共軍隊、官員、員警、御用文人、奸商惡賈殘存的專制意志，以及對專制政治生命力的信心；2. 在全社會範圍內進行民主革命的大啓蒙，讓全體人民毫無疑義地明白，中共暴政是萬惡之源，是人民苦難的根源，是社會不公正的根源；唯有全民的抗爭和人民大起義——唯有民主革命，才能徹底否定中共暴政；3. 在全民範圍內，特別是被中共暴政肆意摧殘和踐踏的農民、農民工、下崗工人、復員轉業軍人中，廣泛傳播憲政民主的理念，聯邦中國的理念，使憲政民主和聯邦中國，成為中國人民共同的政治理想。

可以預見，當民主革命在心戰的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之時，她在現實中的凱旋就指日可待了。

中國大陸目前民怨沸騰，民怒沖天，民變烽起；中共暴政已是千夫所指，萬人側目。中共可悲地淪為政治黑手黨，政治黑手黨的天性就是踐踏民權，掠取民財。所以，暴政之下，起自民間的維權抗暴活動，勢將愈演愈烈，並成為一個時期內人民反抗暴政的主要形式。革命黨的最主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通過自己的組織活動，使大量分散的人民維權抗暴活動，逐步形成互相配合、互相呼應、互相支持的具有統一政治意志的全民大抗爭。

面對海外民運的頹勢，一些沒出息的“民運人士”不僅不思考如何重整征袍，再舉義旗，反而滿足於被稱為“民運人士”的虛榮，並以不同方式散佈“海外民運無用論”，為他們頹廢的政治意志作合理性的詮釋。今日，為創建革命黨，不得不清除“海外民運無用論”。海外民運對於中國大陸民主革命的興起，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共暴政對人民實施員警和特務統治，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嚴格的社會監控體系。在這種情況下，革命

黨將自己的統率機構置於海外，可以確保革命黨的統率機構不被中共摧毀，這對於革命黨的持續存在和發展至關重要。

大陸內部的農民、農民工、復員轉業軍人、下崗工人和上訪群體中，通過多年群體性維權抗暴活動，已經形成了准組織聯繫。各類群體中，也已經湧現出許多“天然”的領袖人物。這種情況是大陸發展革命黨的組織基礎。不過，大陸政治環境嚴酷，如果革命黨在大陸各類群體，以及各地區間發生大規模的橫向組織聯繫，則一處組織被中共秘密員警破獲，就可能使革命黨的整個組織網路都受到致命威脅。而由駐於海外的統率機構同大陸內各群體、各地區的革命黨組織發生縱向聯繫，即便一處組織暴露，也不會有牽一髮而動全身之虞。

革命黨的組織策略可表述如下：革命黨創建在海外，統率機構在海外，大規模發展在國內【至於在國內發展組織的有效策略體系，屬於革命黨的最高思想秘密，不宜公開討論】；國內各類群體、各地區的黨組織之間不發生橫向組織聯繫，唯有海外的統率機構同國內革命黨各組織發生縱向聯繫；國內革命黨各類群體和地區的組織之間的配合，不能通過橫向的組織聯絡進行，而只通過由統率機構協調各項維護人權，爭取民主的行動來實現。

海外民運另一重要作用表現在心戰領域。在海外的各民主國家，革命黨可以建立起直指中共暴政的安全的心戰基地。精神和意志領域，是革命黨選擇的決戰中共暴政的主要戰場之一。

另外，在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為大陸革命黨的運作籌措資金等諸多方面，海外民運也具有不可取代的作用。

中國命運在召喚革命的同時，也在召喚革命黨。革命黨是革命之魂。唯有在革命黨的引領之下，中國民主運動才能重返歷史的中心。而組建民主革命黨面臨的首要任務，就是如何重建中國民主運動的，特別是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

多年來，狂悖荒謬的野心人格和詭詐百端的小政客心理，以及由此引發的民運內鬥醜聞，早已撕碎了海外民運的道德形象。喪失了道德感召力的政治運動決不可能感動命運，並贏得光榮的未來。重建海外民

運道德形象的關鍵之點，就在於重建海外民運的人格形象。

民主革命毫無疑問是屬於全體中國人民的神聖事業，但是，民主革命党的中堅必須具備聖徒情懷，必須具有悲憫天下之心，必須願把自己的生命作為祭品，獻給中國的自由民主事業。歷史是由人創造和書寫的。庸人書寫俗不可耐的、甚至卑鄙的歷史；高貴的人格則創造高貴的歷史。中國的前途端賴蘊涵不可抗拒的道德魅力的革命黨；革命党的道德魅力首先取於革命党的領袖集團要由勇於獻身的英雄人格，和悲憫天下、不謀私利的聖徒人格構成。

中共將政治變成血腥、骯髒的領域。但民主政治必須淨潔。以高貴的政治道德淨化政治——這是民主革命黨必須承擔的歷史職責。

只因心靈已在物欲間腐爛，對於被稱作中國人的茫茫人海而言，是否還有潛力創造出能駕馭命運的革命黨，在今天已經成為問題。中國的前途，乃至人類的命運都在凝神屏息，等待著這個問題的答案。唯願上天賜福中國，還能有中華好兒女，對這一問作出可以傲視千古的回答。



元臨川窯牙白鏤空龍鳳筆筒

中共無法抗拒顏色革命

（香港）張三一言

一、甚麼是“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是由民眾直接迫使現專制或阻止進一步民主化的政權下台，令制度演變為民主或更民主的革命。它是直接民主在新世界政治格局下的創造性運用；是目前對各式專制政權的致命威脅。它首先發生於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之交，把現代社會特種極權獨裁的共產政權和制度變為與人類文明接軌的自由民主政權和制度；其後也發生在其他專制制度、政權或阻止進一步民主化的政權的地方。現在主要的專制大國的政權及其御用學者正“總結經驗教訓”，並因應提出“顏色革命”、和平演變的預防工程。

二、顏色革命發生過程

顏色革命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專制鐵腕統治，實行血腥、高壓和恐怖手段進行統治，在這個期間和地方大多數（不是絕對）不會出現顏色革命。這一階段是顏色革命潛伏期。例如前塔理班、薩達姆，現金正日等統治的國家是這一階段的穩定期；但是，大多數都處於鬆懈和失控過程中；中共近 20 年來對大陸統治很能體現這一失控階段的特點。中共現在力圖挽救已經鬆散和失控的頹勢，這一表現的標誌性符號是“政治學朝鮮”。本文也是因應這一政治現實而寫。顏色革命多數發生在如下情況：當統治權力鬆懈和失控到了某一程度，相應的社會民眾力量也發展到某一程度時，一遇上統治者違反民意或行惡事件，很可能會成為顏色革命的觸發點；民眾奮起直接顯示力量，逼迫現專制統治政權迅速垮台、結束專制，社會演變為民主或更民主階段。

失控，主要表現在解除統治者利用一手控制的傳媒；把長期製造的謊言、顛倒了的歷史再顛倒過來；

由謬誤回歸真理，還事實本來面目。這一失控表現在顏色革命的最初跡象就是思想和輿論興起：原被密封的專制權力罪行、惡行、醜事不斷被揭發曝光，之前被壓抑的民眾積怨得到發洩。由之，激發對專制政權的不滿，加強了民眾變革政權和制度的意願。與之同步的是，人們權力意識高漲，自由民主法治思潮興起，給人們變革權力和社會提供思想和理由條件。統治者失控和顏色革命興起是互為因果。

另一方面，與這一階段同步或跟進的是民眾有力量力量的形成、壯大、強化。專制政權，特別是一黨專政的共產極權，對不受政權控制、獨立於體制外民間組織特別警惕。任何民間組織都必然遭到絕不手軟的鎮壓，被消滅於萌芽狀態中。但是，問題不是你統治者要不要鎮壓，而是你能不能鎮壓！任何民間組織都不是因為專制統治者不鎮壓才產生和成長的，而是因為統治者無法鎮壓才出現和成長壯大的。由能鎮壓到不能鎮壓過程中，民眾付出了重大的代價和犧牲。只是，在人類史上（除了歐洲奴隸社會有一個相對長時間外）從來沒有出現過民眾因鎮壓而徹底屈服的事實；有的也只不過是在高壓和恐怖期間暫時潛伏而已。但是，最後的事實是不屈服的民眾起而變天。要不是如此，人類史也只能是第一開國皇帝到今天第 N 代皇帝的「史」了。民眾領袖成員存在與民眾組織出現發展和壯大過程，就是民主的過渡進程。這個過程是以漸進方式和平演變，還是以顏色革命或其他形式過度完成，就由每一個國家具體條件決定了。

統觀現今已經出現的各種顏色革命，其發生的條件大體是這樣的——待罪之身的統治者毫無悔意，戀權不放，憑持其手中權力，以暴力與民對抗。一旦遇上激起民怨的事件，民眾上街顯示實力；民眾一方得道多助，獲得國內和世界各國民眾支持，相反一方失道無助孤立無援。結局是專制當權者逃亡，政權更替，向民主或更民主演進。當然其間出現回潮反覆也是可能的。

三、顏色革命之敵對雙方形勢

因為專制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把民眾當成是愚不可及的蠢豬，蠢豬當然沒有自己權利觀念，也不會為為自己爭取利益。他們就是以這個虛妄為前提，然後

推導出全世界民眾為爭取自己權益的思想和行為顛倒成為「都是美國操縱的，貫徹了美國的利益」！

顏色革命和反顏色革命對壘雙方

顏色革命和反顏色革命敵對實質就是民主與專制敵對。民主是甚麼？

民主就是以個人為核心價值的一種思想、價值觀、和以這種思想為指導所建立的並藉以體現這種思想價值的制度，以及與之相適應的一種文化的綜合。專制則是一種以集體（實質上是以某一特權階級，尤其是這一階級的掌權集團或個人）為核心價值的思想體系。爭取民主的實質就是爭取自己獨有的權益；今天，民主在全球擴張明顯加快，其實質就是世界民眾自我權利意識覺醒和爭權益行動普遍化。把爭取自己權益誤導成為被別人操縱、貫徹別人利益，在邏輯上是錯誤，在事實上是虛假。把世界民眾爭取自己利益的民主運動栽贓成為「都是美國操縱的，貫徹了美國的利益」是專制統治者及其文人的顛倒是非黑白之作。因為民主運動實質是基於每一個人的，不是基於集體的，所以民主運動本身就必然是多元運動。即使是全世界都民主化了，這個世界還是多元的而不是單元的；理由是因為它是民主。誣陷今天的民主運動「都是美國操縱的，貫徹了美國的利益」目的是建立一個美國霸權的單極世界，是用謬誤的邏輯建立一個虛假的“現實”。

今天的顏色革命和反顏色革命較量，是新的自由民主與舊的獨裁專制及其意識型態和制度的總決戰。決戰形勢呈現舊勢力在總體和普遍性方面，趨於守勢和弱化，而且在敗退中；但是舊勢力的中心卻呈現增強之勢。要留意的是，增強的不是舊勢力本身的道義、固有意識型態等方面的軟力量，只是其所劫持的國家的總體國力有所增強而已。還要留意，國力增強並不意味著其專制統治能力增強，相反，總跡象表明，國力增強導致其操控能力衰退。舊勢力核心國力增強對專制舊世界並沒有實質的助益，對延長其本身壽命亦無助益。在另一面，民主勢力的核心因為在推展自由民主時也同時利用自由民主謀取其一國之利，在國際間既作出有效的民主推展工作，也做了種種與民主精神相悖的事，給舊勢力逮個正著。遂把其反民主的專制獨裁意識得以偽裝成維護民族國家利益的愛

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實際上是給苟延殘存的專制舊制度輸送意識型態軟力量，也增加了專制國家人民爭取外援的阻力。但因為顏色革命的外援軟力量強不可摧，硬力量更是沒有敵手，所以專制統治者反顏色革命的一個著力點，就是極力逼迫民眾畏懼和拒絕接受一切外援。其一貫慣用的做法是把民主運動妖魔化為違背自己國家和民族、為美國利益服務的勢力；以此期以民主力量因此陷孤立無援而失敗。可見，一切拒絕外援的思想和行為都是中了專制宣傳之毒的愚行；是自斷手足（編者按：那也要看“外援”是否來自真正的民主力量，或“外援者”是否把“支持”變成了僅僅是對自己有利的操控，甚至不惜搞亂直至破壞被支持者的奮鬥追求。如果是這樣，那還是不要此類外援的好。孫文接受“俄援”的慘痛歷史教訓，當代中國海外民主運動在接受外援上已經一再出現的問題，和因此而被製造的混亂與困境，對此就是最好的說明）。當然，我們也要防止另一極端，把希望全寄託於外力；一切全靠外力的思想和行為都是畫餅。不過，民主興起主要並不是一種外加運動而是發自內需的運動；外加替代的作用遠遜於內部自發演變力量。外來助力減弱，只可能對其運動有所阻滯、延長其進程，而不能根本改變運動的實質和方向。從顏色革命相繼出現觀之，民主世界核心的某些異化行為所起的副作用，已逐漸被民主運動本身消化了。

反顏色革命極端匱乏道義

專制政權反顏色革命的實力遠強於顏色革命，但為什麼又敵不過對手呢？其一是它沒有外援，其二，更重要的是它沒有“內援”。

在過去的四、五十年前後，以蘇中為首的極權集團公開輸出革命，當時中蘇的理論是“解放全人類”、“工人無祖國”、“主權有限”論。即使在中國餓死三千萬人（編按：1962年秋北京全國省委書記碰頭會上所“碰”出來的則是1959-1961年間“非正常死亡”數字是四千三百萬。僅供參考。）之際，毛澤東還能無償地大量援助亞非拉的同志兼兄弟獨裁政權；尤其是中共向全世界輸出毛派革命做得最出色。毛派共產黨和毛派遊擊隊遍佈亞非拉第三世界；連資本主義國家也包養了希爾主席同志的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義），維克托·喬治·威爾科克斯總書記的紐西

蘭共產黨。在國內，內援資源極其豐富，只要黨需要，每分鐘都可以發動億千萬人上街遊行顯示實力，支援外國人推翻顛覆本國政府是當時中共治下的政治生活常態。

這些東西，在文革後的八十年代都消聲匿跡了；為甚麼？

理由是，當時共產黨的道德資源來自其自稱代表全人類中被剝奪權利和受壓迫的中下層（特別是工農）向壓迫剝削者奪回權利；因之，在理論上它站於政治和道德的至高位置。由是，共產極權集團國家擁有極其豐實的內外援資源。當掌權的共產黨對國內人民空前殘酷的政治高壓和迫害，對人民自由權利、經濟上殘酷剝奪的事實大白於天下時，道德外衣被剝，政治意識型態徹底破產，在政治上完全沒有合理性、正當性和合法性，在人心、道義甚至是政治法律上已經成為待審判的嫌疑罪犯，這個時間的統治者內援外援道德資源盡失，失去了任何支持力量。相反，民主因為其符合人類天性、宜於人類的道德訴求、政治正確、權力合法，又因之而給經濟文化科技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空間，於是民主世界硬力量空前強大，民主第三波一浪比一浪高。民主世界的執政者從來不擔心被人民推翻其政府和制度，與專制世界的當權者惶惶不可終日，沒時沒刻不擔驚害怕被人民推翻其權力和制度，形成顯明而強烈的對比。這一對比讓人們確認，人民選擇民主已經成為公理。

四、中國顏色革命的形勢

今天所講的顏色革命和反顏色革命，就是人類道德、良心、權利和政治合法性訴求的平民百姓，與道德敗壞、視權如命的非法暴力政權的較量。沒有道理、沒有道義、沒有合法性、沒有內援外助、處於沒有還擊能力地位的極權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想要保住這個道德敗壞和非法且犯罪的政權，用甚麼辦法來與人民的顏色革命較量呢？

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從認識極權主義入手。

極權制度是專制制度現代化品種。凡極權主義都有如下特徵概：1、絕對性的官方意識形態；2、以這

個理念為合法性依據的集團（通常政黨的一個或數個頭目）控制權力，這個權力壟斷大眾傳播、軍隊、全部的組織（包括經濟組織）；3、實行特務統治。維持極權統治的三件法寶是：鎮壓工具、恐怖威脅、欺騙。極權制度現代化表現有三個主要方面。一是用現代化通訊、交通手段對付從現代化大都會到山高皇帝遠的獨家村人民，無時不在洗腦。人們無法避開聆聽統治者每天貌似公正的訓示、接受精心偽造、閹割具導向性的各種資訊、觀點。長此以往，于潛移默化中消磨掉反抗意識，成為奴隸而不自覺，還以為是正義凜然愛國呢！希特勒的黨衛軍、中共的“憤青”就是極權洗腦的特產，成為統治者的賣力走狗，稍能舞文弄墨者就充當御用文人。二是實力差距絕對化，是沒有組織的民眾對絕對擁有大眾傳播、軍隊、全部的權力組織武裝到了牙齒的極權統治者，幾近斷絕了被統治者組織武力反抗的可能。可見，極權制度是用現代化武裝起來的“超級暴君”（某一集團，或個人）對全民的徹底奴役。

對照中國現極權制度我們發現兩個特點。一是它失去了極權主義的第一個特徵——官方意識形態。雖然口頭上仍堅持，但實際上早已經放棄，因而導致失去了合法性（第二個特徵），在心理上很虛弱；由之，又導致統治者完全依賴暴力統治，在恐怖威脅和欺騙方面更下功夫。取代官方原有意識型態以維護“全黨團結一致”的是純權力和利益輸送，具體表現是現在的制度性、網絡化的貪污腐敗；即以貪污腐敗把全黨權力者捆綁起來。二是，現極權操控能力弱化。對民眾思想訊息和言論失控，表現在網絡對一統天下的官傳媒的突破，這帶有科技特殊性。一般性的突破是民間口頭言論已經無法控制。這是其一，其二是，自由民主共和憲政人權法治等現代人類文明理念，經過包括流血犧牲的反覆較量後取得了生存空間，甚至成了民間意識型態的主流，也在方方面面影響和抗衡官方。其三是，官方對自家擁有的媒體也失控。在市場、民間主流意識型態、民意逼迫和誘惑下不斷出現不官方、離官方、叛官方的言論火頭；官方撲不盡，民意煽又生。本來是官方全部控制的組織也出現了變化，掛官方組織狗頭，賣民間羊肉的大有人在……只是，人們尚未見到統治者對軍隊失控跡象，這也許要到顏色革命真的到來那一天才可見真章。

中國現政權的特徵說明中共進入了極權的後期，現階段會不會發生顏色革命，那是說不準的事。以最近情況觀之，顏色革命多發生在統治者控制力弱的地方；但也不是絕對的，十多年前的蘇東共產主義集團國控制能力並不遜於現在的中共，其社會矛盾也遠沒有今天中國大陸嚴重，但還是出現了並且成功了。所以認為中國不會出現顏色革命，與認定必然會，同樣是武斷。我們或者可以這樣說，即使現階段不會即時爆發顏色革命，起碼可以說，現在的中國已經進入了顏色革命的準備階段。

顏色革命能否取得成功，因素當然很多，但起關鍵因素是現掌權者敢不敢和能不能調動軍隊鎮壓。

中共反顏色革命的豆腐渣工程

張三一言

中共反顏色革命當然離不開鎮壓、恐怖威脅、欺騙三件法寶。

一、以欺騙手段建造反顏色革命工程

鎮壓和恐怖威脅從未停用過，尤今為烈；且旨在徹底到把有礙專政的勢力消滅在萌芽狀態中。統治者全力加強暴力統治，但是民間反抗並不因之弱化，相反是強化了；結果是突破控制多於增加控制，所以總的趨勢是統治範圍縮小、統治強度減弱，社會自由度、人民權利、民間活動空間增加。也就是說和平演變在漸進性地進行中，顏色革命含量增加。前面提到顏色革命成功關鍵因素是統治者不敢或不能用軍隊暴力鎮壓，所以統治者及其御用文人也總結了這一經驗教訓；除了裝出堅定無比會絕不手軟地利用暴力鎮壓的姿態作恐怖威脅外，特別加強欺騙性宣傳，以阻止或延遲可能出現的不能使用暴力狀況。這欺騙主要是用扭曲捏造事實、顛倒是非黑白、偷換概念、栽贓和詭辯等方法達至。目前，中共主要欺騙工作是把民眾為自己權益而進行的顏色革命運動扭曲和捏造為：「目標是建立親美政權。」舉要如下。

把自由民主人權法治扭曲和捏造為「美化美國式

的民主、自由…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還進一步妖魔化民主概念，妖魔化民主制度，指鹿為馬，誣指民主就是混亂、就是分裂。把人民遵從憲法維權、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的行為誣蔑為「反對派進行各種非法活動」，加以反政府顛覆等罪名，即用專政工具強化其扭曲、捏造、顛倒是非黑白的效果。

把世界人民追求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為自己權益而奮鬥的主動行為扭曲和捏造為在美帝國主義驅使下，為美帝國主義服務的賣國行為。他們是這樣說的：「灌輸美國的價值觀，美化美國式的民主、自由，讓廣大人民群眾潛移默化地認同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有朝一日建立親美政權奠定思想基礎。在資本主義國家裏，則是組織親美派，以便帶領不明真相的群眾進行政治活動，伺機奪權。」

美國「灌輸美國的價值觀」，你們近百年來不也是極盡全力宣傳你們的共產主義、特別是前幾十年拼命灌輸宣傳鼓吹你們的毛澤東思想和培植你們的毛派暴力組織嗎？人家在自由空間，「灌輸美國的價值觀，美化美國式的民主、自由」，你們和你們的同志加兄弟的政權也可以利用這自由空間做與之相反的一黨專政宣傳灌輸（你們何時停止過作反宣傳？）。為甚麼別人可以收到「讓廣大人民群眾潛移默化地認同美國的政治經濟制度」的效果？在你們的絕對封閉的空間，“人民群眾”從娘胎起就接受你們的唯一且是單導向的思想觀點“胎教”，一生只聽到你們宣傳的一把聲音和灌輸的一鍋漿糊。這些“人民群眾”不但由你們教育成長起來的，還是被你們組織和控制起來的，這樣的“人民群眾”怎麼會「不明真相」——讓人家一「灌輸美國的價值觀」、一「美化美國式的民主、自由」，就眼白白地給人「潛移默化」掉了！為甚麼你們在與自由民主作較量時表現得這樣窩囊？

他們說：「美國十分注意從政治上培植能起領導作用的“骨幹分子”。波蘭的瓦文薩、南斯拉夫的科什圖尼察、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都是美國相中的“領袖人物”，他們都是受過美國明裏暗裏的鼎力相助，有的還直接在美國接受過“民主教育”。」

有請你們不要忘記歷史，背叛你們的祖宗，你們何嘗不「十分注意從政治上培植能起領導作用的“骨幹分子”」？你們不是也培植過歐洲明燈阿爾巴尼亞

的霍查同志、澳大利亞共產黨（馬列主義）的希爾主席同志，紐西蘭共產黨的維克托·喬治·威爾科克斯總書記、紅色高棉屠夫波爾布特等等「“領袖人物”」嗎？你們不是曾經在全世界尤其是亞非拉第三世界遍植毛黨同志加兄弟嗎？他們不都明裡暗裡（諸如馬共陳平的廣播電台）受過你們的「鼎力相助」，接受過你們的“毛澤東思想教育”嗎？為甚麼「美國相中的」「波蘭的瓦文薩、南斯拉夫的科什圖尼察、格魯吉亞的薩卡什維利、烏克蘭的尤先科」能掌握政權，你們相中的同志加兄弟「“領袖人物”」全都灰飛煙滅、均以徹底失敗為告終？還得進一步問的是，你們現在敢用核訛詐、敢狂言死掉中國十億人與美國“死過”，為甚麼就是不能、不敢與民主世界對著幹，也到美國歐盟日本韓國等國本土，或在他們要明裡暗裡相助的國家，展開針鋒相對的物色和培養建立一黨專政的「“骨幹分子”」、「“領袖人物”」的鬥爭？你們為甚麼不“灌輸你們的一黨專政價值觀，醜化美國式的民主、自由，讓廣大人民群眾潛移默化地認同你們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黨專政的政治經濟制度，為有朝一日建立親中共政權奠定思想基礎？”為甚麼不在自由民主國家裏，組織親中共派，以便帶領「明真相」的群眾進行政治活動，伺機奪權？請你勿以阿Q式的“不干涉別國內政”搪塞。請不要忘了，你們在這方面有極其豐富的實際經驗和完整的理論指導的呀。何況你們自己就是被前蘇俄在中國一手培養起來和直接指揮的呀！你們曾是心甘情願地承認“前蘇聯才是你們的祖國”的嘛！

他們說：「美國發動侵略伊拉克的戰爭，至今已花了 2000 多億美元，人死了 1500 多，得罪了許多盟國，仍沒有完全達到目的，反而留下了許多後遺症；而在烏克蘭，前前後後只投入 2 億美元左右，人未傷亡一個，就大見成效，並得到盟國的一致支持。兩相比較，當然後一種方式合算了。」

這話目的當然是極言美帝霸權的可惡和必須極度提高對其顏色革命的警惕。按反顏色革命理論，顏色革命是當地人民受蒙騙去為美帝國主義利益賣命的勾當，反顏色革命是維護本國人民權益的正義事業。請朋友們想想，霸權美帝只用了二億元就把烏克蘭的 4710 萬人搞定為它賣命，外匯儲備多到流油的中共為甚麼不能為正義的反顏色革命花上二億或者加十倍用

二十億美元，把美國的邪惡勾當壓下去，還烏克蘭人民權益？把“顏色革命消滅於外國地區”，把所有遙遠外圍的顏色革命打掉了，這不就是預防中共的中國大陸發生顏色革命的最好辦法嗎？爲甚麼不這樣做，反而在國內被動懦弱地預防？再就是，中共國家外匯儲備餘額爲七千一百一十億美元；世界人口 60 億，就算它民主國家人口佔一半的 30 億吧，按照反顏色革命論者的理論，理應用外匯儲備中的零頭 128 億就可以，加倍計也只是 256 億，加十倍計也只是 1280，只佔外匯儲備的 18%；花外匯儲備的 18%就能消滅美國霸權於無形，把中共的意識形態和一黨專政制度推向全世界，“解放”全世界自由民主國家的人民了，保中共政權世無匹敵，榮任光榮正確偉大的世界人民領袖，爲甚麼不這麼去做？

上面提了很多質疑反顏色革命者的問題，其實回答也很簡單。物色到你要的骨幹分子和領袖人物，明裡暗裡鼎力相助，出錢，開“反民主訓練班”教育他們……你們都有針鋒相對地做的“硬本錢”；但是，你們有甚麼政治和道德“軟本錢”和人家對抗？你的意識型態是爲了一黨專政必須穩定壓倒一切、必須把民主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必須剝奪民眾的自由和人權。你們有膽量做到：爲了永保一黨專政可以任意殺人，屠殺 1/7 國人（紅色高棉波爾布特集團屠殺了一百萬人，而當時的柬埔寨總人口僅七百萬左右）保柬埔寨毛澤東化，鄧小平屠殺二十萬保政權穩定二十年，死掉 10/13（中共軍頭朱成虎主張讓西安以東 10 億人口提供給外國原子彈炸死）保中共爲世界霸王……你們有膽量提出你們這些意識型態嗎？世界上有多少人會聽你們的話接受你們的訓練？可人家民主世界推動的顏色革命的訴求，在政治和道德方面都符合天理人性、符合人的利益。其自由平等和友愛精神對民眾具有一呼百應之效，對獨裁政權制度具有摧枯拉朽之力量。

反顏色革命者的諸多指責，不但不能貶損、抹黑、否定，相反，強有力地彰顯顏色革命應天道、合事理、得民心、適地利。同時在客觀上暴露了他們逆天道、悖事理、違民心、背地利和無能窩囊。

二、反顏色革命的豆腐渣工程

反顏色革命正在研究和總結顏色革命，他們正在進行“預防‘天鵝絨革命’系統工程”，但其工程基本是自我埋葬工程：

這個工程的第一道預防板斧是「首先，在思想上要加強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做好意識形態工作。」這是一種見到棺材還不流淚的心態。他們認爲「改革開放以來，我們著重反對了對馬克思主義作教條化理解這一錯誤傾向，解放思想，取得了巨大成績」，用幻想自我安慰行將死亡的靈魂。無須多評論，現在還想用馬列教條對抗人類文明的民主，是走死路，故專制失敗的終局已定。這道板斧，只是那些盲塞且低能的御用文人才有膽量提出來，稍有獨立思考能力的現政權中人也不信，且恥於提及。

第二道板斧是「最根本的是要鞏固和加強黨的階級基礎。」他們認爲：「有人反對並不可怕，怕只怕沒有人堅定地支持，也就是說執政黨沒有可靠的階級基礎和群眾基礎。」極權統治者致命的就是沒有民眾基礎，這也是他們怕顏色革命的最根本原因。現政權支持者是上層，特別是“權錢同盟”加上依附的“知識精英”；中下層工農民眾都是邊緣弱勢群體，不但不支持現統治集團，而且是反對主力。今天共產黨還作五十年前美夢：依靠工農，真是世紀大謊言，也是世紀大笑話。他們還幻想“在這種情況下，我們的幹部不問政治，不分姓‘社’姓‘資’，就會自發地倒向資本主義，這是不依人們意志爲轉移的。”請問，今天非富則貴的新興壟斷權錢統治集團到底是姓資還是姓社？請你們清醒一些，政治護照寫著你們姓氏是：“權資”。

以上兩道板斧屬於軟力量，基本上是鏡花水月。如下兩道板斧是硬力量，倒是有實效的。

第三道板斧是「在組織上必須使各級領導權牢牢掌握在馬克思主義者手裏。」甚麼是“馬克思主義者”？掌控最高權力者＝馬克思主義者；極左毛江五人幫、邀請資本家入黨江澤民、向朝鮮金家王朝學習的胡錦濤全都是馬克思主義者。悲劇在於，這些馬克思主義獨裁掌權者，每下愈況，控權能力一代不如一代，今天已經到了顏色革命迫到眼前而無力反抗的險境；與毛澤東無人敢挑戰的絕對控權實力不可同日而語。

第四道板斧是「我們必須加強國家的專政工具。」他們說：「美國加緊對我國推行西化、分化的戰

略，力圖在中國也搞一場“天鵝絨革命”，而我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在美國的支持下也蠢蠢欲動。2003 年搞的那場“民間修憲”鬧劇，就是一個很好的證明。因此，我們對已經發生的“天鵝絨革命”必須認真總結，未雨綢繆。」他們提出對應辦法是「堅持社會主義就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我們叫人民民主專政。」“運用人民民主專政的力量，鞏固人民的政權，是正義的事情，沒有什麼輸理的地方。”」這是他們反顏色革命的最實在也許還是唯一有效的一板斧。這一板斧從它出世第一天起就使用，既用於對付敵方也用來對付自己內部同志。問題只在於共產黨是不是永遠有膽量用軍隊屠殺民眾，更重要的是，共產黨是不是永遠能指揮得動軍隊去屠殺民眾！現在可能在中國出現的顏色革命，實際上就是共產黨為了其獨霸權力，用赤裸裸的野蠻暴力對付正義維權民眾的鬥爭。非正義的野蠻暴力，終有一天必然會失去還保存正義感軍人的支持！

（兩文均參照文章為周新城《必須警惕“天鵝絨革命”——觀察與思考》<http://yqdh.blogchina.com/1963243.html>；<http://peacehall.com/forum/boxun2005a/233878.shtml>

周新城教授，江蘇常州人。1984 年經國務院特批聘為教授，1986—2000 年任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院副院長、院長，現為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榮譽訂戶與謝辭稿酬

新增榮譽訂戶：

張翠南、楊杰倫、黃玉振、彭一帆、張雷、王以源、周光亞、曾勇（王、周、曾均為兩年，訂款尚未入賬）

謝辭稿酬：

本刊第 14 期謝辭稿費者有：徐沛、魏紫丹、丁毅、陳赴義先生等。

特此致謝。

黃花崗雜誌社

歷史上的泡沫 經濟

辛明

梁啟超堪稱中國近代史上的百科學者。他不僅在政治、思想、歷史、文化諸方面都有精闢的論著，還在一百多年前就對泡沫經濟有所論述。戊戌變法前一年（1897 年），梁啟超在上海《時務報》發表《〈史記·貨殖列傳〉今義》，把泡沫經濟稱為“氣泡”。文中說道，“西人論商務中此等情形，比之氣泡，謂其張至極大時，即將散之時也……西人富國之書（經濟學著作）斤斤以此為言，蓋謂苟國中人人盡明此理，則追風逐氣者不至舉國若狂，而氣泡不至屢張速散，而一國之群商亦可無受其牽累也。此有國者保商之道也。”[1]

現在，泡沫經濟幾乎成了國內外經濟學界使用頻率最高的辭彙之一。在 2002 年 10 月中旬國務院召開的有關當前經濟工作和形勢的研討會上，連朱鎔基都坦承泡沫經濟正在中國大陸形成。專家和學者們在該研討會上論證中國大陸泡沫經濟有如下基本狀況：違規入市資金持續增長，據不完全統計達八千億元以上，約占國民經濟總產值的百分之九。積極擴大內需市場政策在五年裏基本停滯不前，受阻於產業結構、低效率。金融不良資產、貸款壞賬高達百分之四十，超越了金融破產的界限。國民經濟產值的增長主要是依靠加大對基礎建設的投資和外資投入的拉動。國債、外債具有高度的政治和社會風險，中央和地方的國債累積共達四千五百八十億元（另一說為九千億元），其中外債為二千三百億美元。中長期國內市場供大於求。社會失業率以百分之十五上升，農村剩餘勞動力達二億五千萬人。在出口增長中，外資的比例由九零年占百分之十五上升到百分之六十，而國有企業積壓的產品每年達千億元以上。資金外流失控，年達五百至五百五十億美元，相當於 2001 年引進外資額的百分之一百二十，即流失額超過引進額 20%[2]。

現在，該研討會已開過兩年多。中國經濟泡沫化的勢頭不僅沒有得到遏制，反而越來越強。有人斷言“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全面崩潰”[3]。有人宣佈中國“銀行已達破產標準”[4]。查辭海“泡沫經濟”條，全文如下：“虛擬資本過度增長與相關交易持續膨脹日益脫離實物資本的增長和實業部門的成長，金融證券、地產價格飛漲，投機交易極為活躍的經濟現象。泡沫經濟寓於金融投機，造成社會經濟的虛假繁榮，最後必定泡沫破滅，導致社會震盪，甚至經濟崩潰。”[5] 通俗地說，泡沫經濟源於人們內心普遍存在的投機心理。在此心理驅動下，人們在一定時間內爭先恐後地對某一領域——通常是股票、證券、房地產等——投入大量資金，造成該領域的迅速膨脹，形成虛假的經濟繁榮，在短期內帶動整個國民生產總值（GNP）大幅增長，使 GNP 注水膨脹，形成富有欺騙性的虛假繁榮。（例如，房地產行業的虛假繁榮表現在：一面是新房空置多年無法售出，一面是新的建房工地紛紛開工；一面是拔地而起的高級商品樓，一面是囊中羞澀的購房者；一面是競相攀升的房價，一面是購房者買不起所需的房屋。）這種虛假繁榮隨時都可能導致毀滅性的大蕭條。

泡沫經濟並非始於今日，並非始於中國，也並非只限於股票、證券、房地產領域。筆者打算在此文對歷史上發生過的重大泡沫經濟現象略加介紹。望廣大讀者以史為鑒，正確認識祖國目前的經濟形勢。

1、鬱金香熱：最早載於史冊的泡沫經濟不是以股票、證券或房地產為投機對象，而是以觀賞花卉鬱金香為投機對象。鬱金香在十六世紀中葉由土耳其傳入西歐，隨即在荷蘭王國身價大漲。罕見品種的鬱金香球莖的價格異常上漲。在 1636 年，一個罕見品種的鬱金香球莖可以換回全套馬車（即兩匹馬、成套馬具和一輛馬車）。於是，對鬱金香的變異品種進行培育變成了一本萬利的事業。法國著名作家大仲馬的名著《黑色鬱金香》就是以這個年代為背景的。當時，貴族、貧民、農民、工匠、水手、店主、僕人……都在倒賣鬱金香。許多人把終身積蓄都用來對鬱金香投資。有的人在一夜之間就變成了財主。鬱金香買賣越做越大、供不應求，現貨交易無法滿足需要，又展開了期貨交易。當時，誰都以為鬱金香熱將永遠持續下

去，仿佛全世界每一個角落的有錢人都在訂購鬱金香球莖……但是，人類對鬱金香球莖的需求量畢竟是有限的，這種畸形經濟不可能持久。1637 年 2 月 4 日，交易所裏擠滿了想賣出自己手頭的鬱金香球莖的“倒爺”。鬱金香球莖的價格急劇下降，市場迅速崩潰。以貸款從事這一投機買賣的捐客突然變得不名一文。大批的破產者使城市陷入混亂，有的國家甚至發生了騷亂。

小小的鬱金香球莖會惹出這麼大的禍，是不是因為四百多年前的人太愚昧？我們不可以這麼想。就在不久前，我們偉大的祖國不也時興過培育君子蘭嗎？如果你能培育出一棵變異品種的君子蘭，你可以賣得上萬元。儘管培育君子蘭還沒有成為一種影響國計民生的泡沫經濟，但是也出現了為了君子蘭而偷竊、搶劫、甚至殺人者。青年女作家張辛欣在其短篇小說《瘋狂的君子蘭》中對此“盛況”作了入木三分的描寫。

2、南海公司泡沫：英（國）西（班牙）戰爭（1701-1713）給英國政府帶來了沉重的經濟負擔。為了促進國債的銷售，英國政府給予認購國債的企業商業特權。南海公司（The South Sea Company）獲得了奴隸貿易的壟斷權和與西班牙殖民地的通商權。人們對它的前途看好，紛紛對它的股票投資。其股價迅速攀升。1720 年 1 月為 128 英鎊，2 月為 330 英鎊，5 月為 550 英鎊，7、8 月份達到 1000 英鎊。許多人因此發了財。於是吸引了更多的人對它投資。一時間搶購南海公司股票成了風氣。“政治家忘記了政治，律師忘記了法庭，貿易商放棄了交易，醫生丟棄了患者，店主關閉了店門，教父離開了聖壇，甚至驕傲的夫人們也忘記了高傲和虛榮。”（加爾佈雷斯：《大恐慌》）大家都瘋狂地搶購南海公司股票，連偉大的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牛頓都不例外。在南海公司的激勵下，各種公司象雨後春筍一樣誕生。其中許多公司只是想渾水摸魚而已。為了限制這些“泡沫公司”，英國政府制訂了“禁止泡沫公司法（The Bubble Act）。”該法於 1720 年 6 月生效，許多“泡沫公司”被指名解散，其股價隨即暴跌。最後殃及南海公司股票，原來每股 1000 英鎊，9 月份降至 174 英鎊，

12 月份降至 124 英鎊。許多地主和商人失去了他們的財產，英國的政治和經濟都受到了深遠的影響。[6]

3、紐約股票交易所的“黑色星期一”：1922-1929 是紐約股票交易所的“繁榮的七年”。它的輝煌成就差不多每天都醒目地刊登在各地報紙的頭版。然而，波士頓統計學家羅傑·巴布森在 1929 年 9 月 5 日發出警告，“一場大恐慌遲早要到來，而且可能是非常可怕的。”幾小時內，紐約股票交易所股價下跌了大約 10 個百分點。胡佛總統爲了安定人心，宣佈美國的經濟從根本上是健全的，以國家元首的聲譽人爲地使股市再度上漲，上升的幅度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大。但是，這種人爲的景氣是無法持續的。9 月至 10 月，股市時起時落。終於，10 月 21 日，“黑色星期一”到來了，出現了 600 多萬股的拋售狂潮，股值急劇下降。以後的幾天股值略有回升，但在 10 月 24 日，紐約股票市場突然崩潰。在一天拋售了 1200 多萬股。交易所大廳裏一片混亂。有的人發現自己突然變成了一貧如洗的窮光蛋，輕生自殺。10 月 28 日是又一個“黑色星期一”，紐約股票交易所成交的所有股票平均下跌約 50 個百分點。第二天，10 月 29 日，作爲 1929 年大恐慌之日被載入史冊。1600 多萬張股票轉手，持續的拋售狂潮將股票變成一堆貨真價實的廢紙。從此，美國進入了長達十年的經濟大蕭條時期，而胡佛總統則成了美國歷史上臭名昭著的“饑餓”總統。

4·日本的泡沫經濟：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作爲韓戰和越戰的就近加工場，在經濟上突飛猛進，很快就走到了世界的前列。然而，1985-1990 年，日本出現了對金融市場管理鬆弛和對投機行爲放縱的現象。在企業投資總額 406 萬億日元中，64%（258 萬億日元）不是用於生產資料的投資，而是流向證券市場和房地產。大量資金流入股票和房地產市場，使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價格猛漲。從而，在八十年代後期出現了在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勞務價格相對穩定的同時，股票和房地產價格扶搖直上的“資本價格膨脹”現象。八十年代中期，日本的股票資產額和土地資產額分別都不到同期國內生產總值（GDP）的一半。從 1986 年起，股票資產額和土地資產額飆漲，在短短的 1-2 年內各自超過了 GDP。1988

年末，土地資產額已是同期 GDP 的 1.4 倍。1989 年末，股價達到歷史最高水準，股票資產額達 527 萬億日元，爲同期 GDP 的 1.3 倍。股票價格和土地價格的飛漲表明日本經濟已經泡沫化。1990 年起，日本的泡沫經濟開始崩潰。年末，股價較 1989 年跌落近 40%。1991 年股價相對平穩。1992 年股價再次大幅度下滑，股票資產額降至 297 萬億日元，也就是說，與 1989 年末股票資產額的歷史最高水準相比，230 萬億日元消失在無形之中。同時，土地資產額也比其 1988 年的高峰值減少了 100 萬億日元。泡沫的破裂使日本經濟受到強烈震撼，嚴重的經濟衰退發生了。中小企業因資不抵債而大批破產，大企業的利潤也急劇減少。1986 年，對世界大銀行按資金額排列，前 7 名全部在日本，其中第一勸業銀行名列第一。1992 年重排座次的時候，第一勸業、三菱、興業和富士等大銀行均被擠出了前十名。泡沫經濟的破裂使日本進入了長達十年的經濟蕭條或准蕭條時期，至今還看不到復蘇的跡象。

5·科技泡沫：科技泡沫永遠是那麼五彩繽紛、引人入勝。因此，隨著科技的發展，在不同時期總是會引發不同的科技泡沫。例如，1835-1836 年的運河投資熱、1868-1873 年的鐵路投資熱、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收音機、飛機、汽車和電力設施投資熱，以及近年來的個人電腦、電信和互聯網等資訊技術投資熱。遠的不談，本文只談近年資訊技術投資熱所產生的泡沫經濟。

以電腦和網路爲代表的資訊技術改變了人們的生產活動和生活方式，使發達國家的經濟產生了令人鼓舞的新氣象，包括振奮人心的高增長與低通脹。經濟學家還沒有來得及充分理解這些現象、對它們作出科學的解釋，媒體就開始盲目樂觀，“新經濟”的概念應運而生。華爾街的經濟分析家聞風而動，推出了“新經濟學”。“新經濟學”把資訊技術革命等同於產業革命，認爲它開闢了世界經濟發展史上的新篇章，宣稱傳統的經濟學原理和傳統的經濟分析方法已經過時，應該用全新的思維和方法來研究新經濟。華爾街的分析家放棄了傳統的以公司盈利爲基礎來爲股票估值的方法，創造出價格/毛收入比、點擊率等估值方法，以此爲幾百倍市盈率或連年虧損的網路公司制

訂定價基礎。

於是，在上世紀末本世紀初，在對新經濟和資訊技術革命的歡呼聲中，納斯達克(Nasdaq)指數一路上升。從1999年10月開始扶搖直上，到2000年初達到了4131點，在3月10日達到歷史最高水準5049點。這種沒有實際經濟效益的科技泡沫是不可能持久的。3月下旬，納斯達克開始第一次重大調整。從此，美國的科技股市場就進入了多事之秋。投資者在對“新經濟學”進行冷靜思考之後，逐漸認識到價格/毛收入比、點擊率等估值方法不能真實地反映股票價值，將股票定價重新轉回到公司盈利上。他們發現大量的科技公司並沒有盈利前景，於是開始拋售這些公司的股票。科技泡沫的破滅就這樣開始了。納斯達克指數不斷下滑，2000年底降至2471點。和3月份的高峰值相比，下跌了50%。網路股情況更加糟糕，大多數都損失了市場價值的90%以上。日本、韓國、歐洲的科技股也無一倖免，價格全部下跌一半左右。科技公司的狀況更加不容樂觀，從老牌的晶片製造商英代爾(Intel)到新秀雅虎(Yahoo)都發出了盈利警報，使投資銀行的分析員和投資者紛紛降低他們的盈利預測。許多排隊上市的科技公司推遲或取消了上市計畫。原本財源茂盛的網路公司或者在市場上焦急地尋找買主，或者關門大吉。整個科技世界仿佛突然從如日中天的巔峰跌入了萬劫不復的深淵，至今難得好轉。[7]

由以上這些歷史上的重大泡沫經濟事件，我們可以總結出什麼經驗教訓呢？概括而言，我們可以說：

1· 泡沫經濟不是真實經濟，而是虛似經濟。它可以在短期內產生虛假的經濟繁榮，但是泡沫的破裂是必然的。泡沫經濟破裂之時就是國民經濟蒙受重大損失之日，而人民群眾、特別是投資（投機）於泡沫經濟的人，則是泡沫經濟破滅所帶來的災難的最後承受者。

2· 盲目地大量投資（投機）於證卷、股票、房地產或其他非生產性行業，忽視對生產資料、生活資料和勞務價格的投入，使國家的實際生產能力下降，往往是引發泡沫經濟的根源。貪官污吏和不法商人在掙夠撈足之後攜款外逃從而導致資金外流則更加為泡沫經濟雪上加霜，會進一步促成泡沫的早日破裂。

3· 對任何投資物件（無論是美不勝收的觀賞花卉鬱金香，還是神通廣大的資訊技術）都不可以盲目樂觀、一風而起，而要進行鄭重的科學研究和分析，以避免最後落得一哄而散、血本無歸的結局。“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與“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和“中國知識份子是中国工人階級的一部分”一樣，是鄧小平時代提出的三個貌似有理卻又很值得商榷的論斷。我們需要對它進行更加深入地分析和論證。對“中國知識份子是中国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筆者曾著專文評述。[8]

[參考文獻]

- 1· 葉世昌：《梁啟超論泡沫經濟》，人民網 2005 年 7 月 16 日
- 2· 嶽山：《中國泡沫經濟正在形成》，新生網 2002 年 11 月 12 日
- 3· 草庵居士：《中國股票市場已經全面崩潰》，新世紀 2005 年 5 月 3 日
- 4· 何清漣：《中國經濟最薄弱環節——銀行已達破產標準》，新世紀 2004 年 8 月 12 日
- 5· 辭海編輯委員會：《辭海》，第二冊 2445 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 年 9 月
- 6· 翁傑明等：《與總書記談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 年 10 月
- 7· 許小年：《世界科技泡沫破滅》，賽迪網，2001 年 2 月 20 日
- 8· 辛明：《為知識份子正名——知識份子不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議報》第 93 期

黃花崗雜誌敬告作者

為鼓勵作者多寫短稿，本刊經研究決定，本刊稿費將仿效海外一些雜誌，採取稿酬“封頂”的制度，即稿酬達 200 元以上的長稿，一律只付 200 元為止。雜誌社願意和大家一努力，為將黃花崗雜誌辦得愈來愈好、也愈來愈活潑而共同努力。

改革的悲慘命運

周 誠

中共在大陸實行了經濟改革，社會經濟得到一定的發展，從而延長其統治的壽命。但是，中共策劃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既不可能放手發展資本主義經濟，更不可能導致政治改革，讓中國和平演變為資本主義。因此，發展自由經濟和民主政治的要求，與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的原則，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並將最終導致改革的徹底失敗。

首先，中共為什麼要進行經濟改革？文化大革命以後，中共政權到了崩潰的邊緣。為了挽救這個頻臨倒台的政權，中共不得不實行經濟改革，使得這個政權能繼續存在下去。這一點從當時流行的兩句話也可以看出，「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紫陽」。當時的局面是家家戶戶普遍都揭不開鍋了。趙紫陽和萬里在經濟上先改一改，使得老百姓先有口飯吃。如果當時不改一下的話，那麼老百姓坐以待斃，還不如挺而走險，揭竿而起。經濟改革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而中共在經濟上稍微鬆一鬆綁，確實使幾近破產的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由此也可見社會主義制度是多麼嚴重地束縛和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由於這場經濟改革的目的是為了讓中共免於破產，所以它提出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也就是給改革設個限，經改不能危害中共統治，不能危害社會主義制度。經濟改革的主動權不僅完全控制在中共手裏，而且在改革成功之後，中共可以隨時剝奪改革的成果。這和蘇聯建國初期的「新經濟政策」一樣。當年蘇聯為了渡過困難重重的經濟危機，採取了允許私有經濟存在的政策。一旦蘇共在經濟上得到喘息，馬上取消新經濟政策，實行社會主義經濟。但是今天這個時代和蘇聯建國初期不同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已經從發生、發展而走向消亡。所以經濟改革一旦開始以後，中共既無力也無能按原先的計劃剝奪改革的成果。社會主義制度，包括其經濟正走向沒落，不可能像以前那樣一成不變地繼續進行下去。經濟改革一發不可收拾，從農村到城市，從局部到全國，改革已不可逆轉。

這場改革是一把雙刀劍，一方面它局部地繁榮了經濟，另一方面也衝擊和動搖了社會主義制度。這是中共所不願意看到的。因為中共改革的目的是為了維護其統治。對於經濟，只要不破產就行，至於發展的快慢，那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穩定壓倒一切，是保住紅色政權千秋萬代永不變色，而不至於立即垮台。政權第一。因為在中共看來，有權就有一切，失去了政權就失去了一切。至於人民生活痛苦，那是必然的。因為中共「有權就有一切」，正是建立在人民「無權又無一切」的基礎上的。中共只要壟斷了政權，就壟斷了全國的資源、財富，甚至人民本身。壟斷政權，就佔有一切。所以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強調的是社會主義，也就是這個制度不許變，中共的統治不許變。但是經濟發展的結果客觀上動搖了中共的統治，這和中共的願望背道而馳。中國出現了信仰危機，人們不再相信中共，不再相信馬列主義，特別是把改革前後情況進行對照，人們開始厭惡、痛恨、對抗社會主義。由於中共對政權的壟斷，使它可以在自由經濟中進行任意的掠奪，所以必不可免地導致腐敗以及社會的兩極分化。政治腐敗的結果，不僅破壞了立足未穩的法制建設，又加劇了道德敗壞和墮落。中共統治下的社會在一天天腐爛下去。

經濟得到暫時發展以後，中共會不會進行政治改革？哪怕是被迫的。回答是否定的。

經濟改革使行將破產的經濟得到恢復，並造就了一些中產階級。這個中產階級會不會逐步壯大、形成政治力量、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從而導致一場政治改革呢？這種美好的願望在中國只能是一種幻想。因為中共不允許顛覆其統治。中共至今沒有放棄毛澤東思想，沒有放棄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雖然表面上不提，做法上更狡猾。中共的做法就是將其或明或暗地扼殺在搖籃裏。中共統治下的政權是獨佔的，決不允許任何人來分享。這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不同。他們認識到資本主義的優越和社會主義的不合理，所以不僅能進行徹底的經濟改革，而且還進一步實行政治改革。中共不承認資本主義的合理性，認為社會主義一定會取代資本主義，所以提出四個堅持，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政治改革不僅不可能進行，經濟改革也只是暫時的，不會徹底進行。中共的經改有極大的局限性。私有經濟雖然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它始終只能

當配角。中共無時無刻不在設法讓國有經濟佔主導地位而且準備隨時剝奪私有經濟。國有經濟比重的增加不僅意味著黨的權力的鞏固和擴大，對私有經濟的剝奪更是假公濟私、借以自肥的好機會。中共決不會讓中產階級坐大，而只是想讓他們為中共火中取栗。

中共能不能政改，取決於政改是否會影響其一黨專政。如果政改不影響其統治，或者能延長其統治，例如，村鎮一級的選舉，多挑些聽話的民主人士到政府裏來當花瓶，進行欺騙，裝飾，那可以。但是如果政改動搖其一黨專政，那它是寧可亡國也決不肯政改的。而現代的政改恰恰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

首先，政改涉及民主選舉。民主選舉是人民行使主權來決定政府的組織路線。人民是多數，他們的選舉標準是賢能，選賢與能。共產黨員是少數，他們的標準是黨性，一切屬於黨。所以在民主選舉中人民推舉的賢能一定能戰勝黨性強的中共黨員。這是中共最害怕的和平演變和議會道路。人民可以用選票把中共擠掉，完成不流血的革命。中共正是通過其組織機制，把黨性強的黨員派到各級政府機關，從而實現一黨專政的。如果非黨的賢能上台了，他們代表的是人民，不是中共，那麼中共的政策不僅不會被貫徹執行；相反，他們會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手中的權力和中共對抗。所以民主選舉是中共絕對不能接受的。因為人民在經歷了幾十年的苦難以後，不再相信中共的主義和宣傳。中共已失去了民心，失去了吸引、動員民眾的能力，當然贏不到選票。失民心者失天下，中共民心失盡，怎敢實行民主選舉，自取滅亡？

第二，黨政分離。黨政分離以後，國家才能實行法治。現在是無法無天。因為是黨大於法，一切都是黨說了算，黨就是法。這和封建社會裏「朕即法律」完全是一回事。如果黨政分離，國家自然可以實行法治了，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共產黨沒有了特權，而且必須守法，黨從一切政府機構中退出來，黨只能管它那幾個黨員，淪為一般的群眾組織，這個黨還能有什麼用？權勢，地位，財富，一切都沒有了。它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台。它的目的就是為了奪取政權，享用政權。至於在這個政權下，人民生活得怎樣，可以不顧，只要政權在手中就行，它就可以橫行。

第三，三權分立。中共領導人早就說過不搞三權分立。立法，行政，司法權都是它的，這樣它不僅不

違法，而且可以吹噓自己是偉大，光榮，正確的。三權分立不僅削弱、限制了中共的權力，而且有了監督機制。一旦被監督，當然就暴露出中共的真面目。所以它必須壟斷一切權力。這樣才可以結黨營私，才可以把黨的利益置於國家和人民之上。中共作為一個特權階級才不會被認為非法。中共獨佔權力、人民無權的社會秩序和等級制度才不會被質疑其合法性。

第四，言論自由。中共要維持其統治，讓穩定壓倒一切，是通過思想控制和暴力來實現的。這就是中共常說的筆桿子和槍桿子。而在當前，思想控制比暴力更重要。思想控制的方法主要是限制言論自由和愚民政策。中共建政以來，運動不斷，整掉了一批又一批知識分子，不僅不給言論自由，甚至不給思想自由。所謂「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人人只能當黨的馴服工具，只能愚忠。中共政權雖然十分黑暗，卻能維持到今天。經濟改革了，可以讓你多吃飯，但是決不能讓你多講話。多吃飯，你還能多幹活；多講話，你就會更反黨。言論自由了，紙就包不住火，一條條罪狀就會被揭露，被批判，民主的思想就會燎原。謊言和欺騙一旦都被揭穿了，人民不僅不會再上當受騙，相反會反戈一擊。中共積惡太重，積怨太深。一旦人民覺悟了，人人都從自發的反抗者變為自覺的革命者，中共就只有土崩瓦解的份了。這就是為什麼中共甚至對於一個化名為不鏽鋼老鼠的女孩都怕得要命的原因。不是這個女孩有多麼神奇的力量，而是她的自由言論可以成為顛覆中共政權的一顆火種。

第五，宗教、結社自由。在外國，宗教起著淨化人心、提高思想道德水平的重要作用。但是共產黨視宗教為精神鴉片，因此處心積慮地要剷除一切宗教。至於結社，共產黨本身就是靠著祕密結黨，從地下組織發展而來，知道組織起來的力量。自然不會允許別人走老路建立組織。如果宗教和結社結合起來，那就更不容易對付了。歷史上有很多農民起義，像西漢末年的黃巾起義，明末清初的白蓮教起義，清末的太平天國起義等等，都是在宗教的旗幟下組織起來的。宗教對中共最大的威脅是它提供了精神支柱。在教徒的思想上神是偉大、正確、萬能的。站在神的一邊就是站在真理一邊，站在永生一邊，就會無私無畏。教徒

（下接第 45 頁）

不為護已專利他

怀念真誠的靳以先生

陳家驊

最近翻看了巴金先生的散文集，他談到靳以先生多卷本選集的出版及和他的友誼。這樣，一個常常出現在腦海和夢境，胖胖的，溫和誠懇的靳以先生，立時又飄來眼前。他是我異常尊敬的長者，只是不在一個編輯部，接觸不是很多，不過有幾件事，一直繚繞在心坎，無法消去。我還是要說：比之我所認識的其他幾位前輩，他更真誠，更有是非。在那殘酷的階級鬥爭主宰每個人生死命運的歲月，他和孔羅荪先生為是非挺身而出。雖然他是一位黨外人士，說不服中共的一個小卒，但那時的氣氛和場面，從此深深植根在我的心底，使我敬佩他，轉而想加以效法了。以後，一九六幾年，我寫過一首[自嘲]的俗詩：

不為護已專利他，
寸步不讓虎狼蛇。
少時不識腹蛇毒，
甘願恭奉作龍蝦！

不僅是對章先生的懷念和讚美，也是對自己的激勵和鞭策！對我說來，靳以先生是不能遺忘的，如果遺忘了，那是對他的大大不敬，也沒有人氣和人情味了，更是對是非的混淆和褻瀆。人世間不能沒有是非，因為沒有是非而造成死了八、九千萬人，一億家庭受到折騰的慘禍是多麼觸目驚心，能夠遺忘嗎！

靳以是黑暗長夜的星火，雖然是沒有力量的微不足道的一粒螢光而已，在那泰山壓頂，萬馬齊喑的年代，他這種對橫蠻、強暴挑戰的自我犧牲精神，多麼偉大！還不值得把他寫下來嗎！

一九五四年那次對我的政治審查，因為初次經歷，沒有經驗，我天真的認為：像我這樣的人，也要審查嗎？我非常反感而且緊張，直覺地想，過去要求我[幫幫忙，幫幫忙]，今天要把我一腳踢了麼！我知道，一旦審查，還有什麼好結果？身邊不是有很多鏡子；如副主編黃源，編輯室主任白得易，通聯組長斯

人和另一副主編雪葦，都是中共黨員，下場如此悲慘，何況我這個平民百姓？再譬如調北京的前任主編雪峰，被弄得遍體鱗傷，走投無路，翻譯家滿濤、魏叢蕪他們的被捕，趙景深教授的跳樓，作協同事小說家徐轉蓬和鄭兩位

的失蹤，長瓣子王的調離，煉的被弄到外地，搞經濟工作的個個頭破血流，那個逃脫了？包括行政科主任陳，歐陽也被鬥得七葷八素等等。以後想想，大家都如此，都要經過脫胎換骨的這一關，被審查似乎是應該的，無話可說。又想，我終究是這麼過來的，與眾不同，近幾年又沒什麼沾黏在身上，現在審查我，毫無理由，不明明要給我按上尾巴、瓣子？這樣一想，不免又怒髮衝冠，立時想到受陷害和被報復了的冤枉。當瞭解到在審查寫自傳的並非我一人，緊張的情況似乎又鬆馳了一些，不過事到臨頭，壓力太大，情緒始終不能安定！

這時，協會括起了一個小道消息：[文藝月報]諸位，在每次運動中，都首當其衝，成了炊刀千斬萬剉的肉塊，那是因為錄用稿件把關太嚴，惹火了一些人。你眼中無他，他眼中怎麼還會有你？所以每次運動，都有人打倒在地，永世不得翻身。那天唐弢先生問我，聽到小道了嗎？我回他說：我不相信是作協內部傳出去的，是外面人的託名而已。唐先生點點頭。我又說，我不相信這個說法。他笑笑沒有答話。

[文藝月報]是通聯、編輯、編委三級制。來稿經過通聯統一初審，再有編輯組複審，由編委定稿，個人的作用微無其微，惹惱誰的說法，實在不著邊際太離譜了，不過有人在搞鬼。但是，這種小道無疑也反映了機關內部複雜和骯髒的一面。

被搞掉的幾位，都是獨擋一面的負責人，是否有人想一步登天，取而代之？由此，對有人搞鬼的說法，深信不疑。當然我沒有黨票，不屬被取而代之這



靳以先生遺像

一類。我認為，我是有人暗算我、陷害我。特別胡的醜惡已生根在我的腦海深處，再也擺脫不了。因為他的惡劣無恥，引起公憤，楊、王等幾位青年編輯，寫了多篇小品文，想在我與孫雪吟編的牆報上發表，剝他的畫皮，由於新任辦公室主任老布的干涉，無法刊出。但是仇已結成，胡是人事科長，大有權力，現在居然由他策劃來搞我，我氣炸了。他除了以公濟私，對我打擊報復之外，以他的品質，還會有什麼好花樣？這是明擺著的！自然不是假想敵，事實俱在！於是胡自己只能躲在幕後指手劃腳，利用新來乍到的人員打頭陣，更說明他的卑劣，是種見不得人的伎倆，青年編輯誰個不曉個中來龍去脈。

無疑雞蛋裡挑骨頭，好事變了壞事。為了抓到所謂我的[問題]，前後足足拖了兩年，自然一無所獲，毫無所得。對我的審查只能偃旗息鼓。可是那個我的對頭仇人，在向我宣佈結論時，還故弄玄虛，吞吞吐吐地：[領導上為了對你負責，為了弄清你的問題，除了西藏、新疆，什麼地方都派人去了，所化的川資，少說說可把你打成一個金人。]他始終不說：[你禁得起考驗，你是金人]。這是專案組一位成員昨天已向我們說了。表示疲於奔命的、冗長時期的外出調查已經結束。先前，不知這位成員從那個渠道，知道了我的過去種種情況，他是不主張搞我的。但他一個人勢孤力單，怕一反對，被說成立場不穩，會搞到他頭上，他沒法堅持。以後正如他所料，一無結果，一無所獲，給他猜個正著。這樣他就把專案組已經得出的沒有問題，禁得起考驗的決定，透露給我。既表示對我的慶幸，也說明他有是非預見、有判斷能力吧。

有是非的自然不只他一人。沈尹默老先生就是其中之一。審查在密鑼緊鼓緊張進行中，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散佈我在審查，有些人就和我劃清了界限。而老資格的沈老，是五四時代[新青年]陣營的一員，他沒當一回事。一天來協會開會，在會場遇到我，不僅並不迴避我，在眾目睽睽之下，他鼓勵似的堂而皇之地告訴我：[是就是是，非就是非，這一點切不可模糊了、動搖了，有些問題是不需要你去考慮的，你只要實事求是地認真寫好自傳就行，任何顧慮都是不必要的。]

特別章靳以先生，尤為突出。他是復旦大學的教授，前滬江大學的教務長，選為文聯和作協的副主

席，較多來協會開會。接觸多了，瞭解更多一些。一次碰到我，他說：[到我們這裡來吧]！太突然了，我一個遲疑，沒有回答，沒法回答，在捉摸他說的是什麼意思？調我去辦公室？介紹我去大學？到他府上去玩？覺得現在我的這種處境，他能直率的這麼說？是不是把話聽錯了？心中疑竇叢生。但我忘記了一點，他是領導，掌握全面的，我的有些情況，全在他的眼底鼻下，在他掌握之中；是否他知道了我的尷尬處境，在寬慰我吧，遷地為良吧、可能我沒有聽錯。

靳以先生一向是我敬佩的前輩作家，在上世紀的三、四十年代，他和巴金先生合作編輯了多種文學雜誌。從平靜的戰前，到烽火漫天的戰時；從荒漠的北方，到繁華的南方；又從孤島上海，流浪到了大後方，都有他倆合作的結晶，且又各自創作了大量作品。像他們這種為文學的緊密友誼，文壇是少見的典範，目標又專一一致：編輯、寫作；因為相知，也就瞭解。所以巴金先生對靳以先生的評價是：一個人道主義的文學家，有一個同情心。巴金和靳以是幾十幾年的密友著稱，他對靳以的論斷，無疑是中肯的，恰如其分，這使我想到了在我命運攸關的當口，章先生和羅蓀先生表示了他倆非凡的勇氣，有些人對我的非分做法，他倆不但沒有隨波逐流，舉起雙手贊成，而是嚴正的表示了不贊同和反對的堅決態度。因此據我的看法，這不正是章先生有人道主義和同情心的最好注釋。也是他有可貴的正直、正義和是非的一面，這種風格，智識文化界消失已經多年，章先生沒有忘懷，在緊要關頭運用了，不愧多年來的為人師表。如此風骨，特別使我敬仰。

原來說我禁得起考驗，是個金人，大鳴大放以後，陰謀陽謀佔了主導，形勢丕變，整風後期，一九五八年的三月七日，竟出爾反爾地要把我重作處理！

在處理我的四個人小會上，那一天可以說，章先生把大學敢說敢為的民主氣息帶到慣於歌功頌德、聖主賢明臣罪當誅的文藝團體來了。在當時大家處於唯唯諾諾，萬歲萬歲的時刻，他和羅蓀先生挺身而出。不願違心地喪失了他們的立場，不僅不同意對我的處理，且反對對我的決定，拒絕對我宣佈。四個人的小會主持人茹，先是一再要求章先生宣佈，章先生毫不猶豫地一再拒絕。他說，妳是新來的，既不瞭解陳的歷史，也不熟悉他的現實，何況搞了幾年什麼具體問

題都沒有，現在要處理他，我不能宣佈，也不插手。茹只好幾次解釋，企圖說服章先生，章先生幾次都拒絕合作。此路不通，無法之際，茹再三哀求之後，轉而要求羅蓀宣佈。羅蓀也十分堅決地加以拒絕後。他婉言地：副主席主管業務，我搞行政，我們不能插手不瞭解的人事工作。這時章先生插嘴說：怎麼不瞭解？有人當過偽軍，做過漢奸，殺過人，不知何故，把他們攔在一邊，眼開眼閉，不聞不問；不能厚彼薄此！羅蓀繼續說：而且在這個決定中，看不出陳有什麼問題。你們這麼做，不好。你們過去搞他，人家嘴裡不說，內心多麼痛苦；大家公開不談，背後閑話不少。迄今我們沒有忘記。不能再這樣！

茹見懇求之計不成，企圖用：這是黨的決定，你們作為協會的兩位領導人，應該尊重黨，支持黨。以此來壓服兩位有異見的前輩。不過他們仍然理直氣壯。章先生說：這是我們對具體工作做法上的看法，和尊重支持黨毫無關係。既然是黨的決定，他要支部書記和人事科長來參加會議。孔羅蓀也一再提醒茹：妳是搞業務的一個編輯，應該積極做好本位工作，有空學習寫點文章，這是主要的；何必插手包攬這種分外的與已無關的工作！這是件協會的大事！這種三四個人的小會形式處置一個人，太輕描淡寫，加重了大家的疑竇。不能這樣做！我也不會參與！

在階級鬥爭的時代，那種嚴厲懲罰人的場合，這麼爽直反對，除了章先生和羅蓀先生，我還沒見到或聽到第三人！為此我要大聲疾呼：在那個時候，章先生和羅蓀先生抵制了某些人的武斷專橫，和一手遮天的莫須有的黑箱作業，表現了他倆的正直和正義。顯然在那時那地，講正義，正直，是非，簡直虎頭拍蠅，只會帶來倒楣和不幸，不可能有正面回應，因此對我的處境並無實質上的改變；不過茹和胡以中共欽差名義，企圖借刀殺人的鬼蜮伎倆，已赤裸裸地暴露無遺，再也無法隱藏。我還是被送去洗腦。一去二十三年，家破人亡。不消說這一段尖銳的是非口舌戰和偽君子的畢露原形，幾十年來一直在我的眼前浮動，當我喜怒哀樂的情緒波動之際。

靳以和羅蓀的正直，並沒改變我悲慘的命運。兩位先生太書生氣了，小看了宣傳部文藝處長把她從南京軍區調來，並給以上方寶劍的這一事實。眼見無法勸說靳以和羅蓀的就範，茹依仗她的有力背景，毫不

退縮。她點了一枝煙，就自己赤膊上陣。她冷冷地：你們既不肯合作和協助，那只好由我來宣佈了：[陳的問題，已不配在機關工作，送勞動教養。]內人才於四五個月前，被出版社趕出編輯部，送農村去做農民，現在又要送我農場洗腦，山坍了，地陷了，長江決口了！驚恐的我再三責問：什麼問題？我一無問題，是莫須有的。於是老茹說了一通三個月、六個月的期限等之後。急急宣佈散會，她慌忙走了，章、孔兩先生也只好默默而去。什麼三個月、六個月回到機關，全是謊言鬼語。一去冗長的二十三年，成了勞教祖宗。直到毛死後，撥亂反正，才於一九八一年回到上海。專案組長楊對我說：[我們查遍了你的檔案，你沒有問題，所以當時並沒有立案。你為什麼進去的？發生了什麼？由誰送你去的？你沒有事]！

送我去洗腦一年後的一九五九年，才五十壯年的著名作家靳以先生，帶著嚴重的哮喘病，下紡織廠清紡車間改造思想勞動時逝世了；孔羅蓀也調離上海去了北京。我一直暗暗懷疑，他倆的遭遇和那次仗義執言，有否什麼千絲萬縷的牽連！是否以官冕堂皇的改造思想名義，也給穿上了小鞋？為什麼我這樣想，不僅由於我自身的經驗，更主要的，因為章先生有高血壓，走到三樓編輯部已經氣喘吁吁，看稿件體力已到了飽和點，怎麼可去工廠勞動？又沒有減輕份內的工作。據說，經常從工廠到作家協會來回奔波，他滿頭大汗，總是上氣不接下氣，站立不住。幾十年後，老同事提到章先生，還被他的[拼命精神]所感動。

此時此際陷身農場的我，聽到噩耗，只能一再流淚長嘆，有何話說！小會上他的正義之聲，早已被陰謀和陽謀的反右浪潮所淹滅。肯定他自己不會對誰去說。除非和巴金先生。不知巴金先生有否留下日記？目睹者只有羅蓀和我，還有誰知道呢？因此我更其有責任非舊事重提不可！章先生已經逝世，無法表現他的心聲！據說羅蓀臥病在床，如能見到這篇短文！那是太好了。孔先生！你們倆不僅為了受屈的我，也為了制止這個社會是非顛倒的不合理現象！一一自然毫無功效！

記得一九五三年，靳以在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部散文選集，才裝訂成冊，正待公開發行，有人發現那篇有關東北的散文中，有[北方熊]的字樣。北方有熊是眾人皆知的，某些場合熊是貶義。而靳以之提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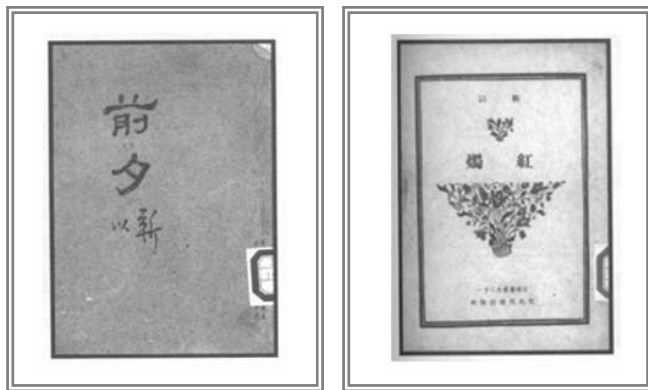
北方熊，有著強烈的愛憎，這是人人心照不宣，也是個個都知道的嚴峻事實。現實情況如此，指責北方熊是千千萬萬人士熱愛民族國家的心聲，實在非常可貴，可是上峰決定非把這三個字抹去不可。那不把矛頭轉移了，開脫了北方熊？把罪責弄到別人頭上去了！本來是表示作家心聲的大好事，所謂有問題，不過是指作者的正義和愛憎吧了！是非和正義是大家所追求的，但有些人見了、聽了，就反感和不舒服，是最犯忌的。於是用了行政手段，打橫裡砍來一刀。在大家動手抹去這三個字時，交頭接耳暗暗不平，靳以先生也一定氣得哇哇直叫的了！

似乎是小事一樁，但是為了掩蓋中共犯忌心病，不得不把[北方熊]三字從幾千部書中抹去不可！豈非勞民傷財？也損傷了作者和一些人的感情？不過話說回來，中共所幹的哪一件不是這樣的？打擊面之大，受害人之多，好事變成壞事和被一些人莫須有的栽藏，都是不言而喻的公開秘密。聯繫到上海文匯報那次短篇小說徵文評獎，也充分反映了靳以先生可貴的正直和是非！

評獎負責人為靳以和峻青，我內人寄了篇諷刺小說[老金]應徵。文稿寄出不久，發生了對我政治審查的風波；當時正在抓我的辮子，又是株連大行其道之際，且是諷刺性的小說，她很懊悔。我也為她捏一把汗，認為何苦呢！後來徵文揭曉，她的小說名列前茅，中了獎。主審靳以先生並不因人廢文，因事廢人、為階級鬥爭的教條所束縛，他的尊重客觀的獨立精神，於此可見！

以後靳以和巴金先生合編，在上海出版的雙月刊[收穫]，靳以先生決定：文稿不加修改，文責作者自負。在當時一言堂的情況下，這是不得了的創舉，不僅是尊重作者而已，更大的在於不鉗制思想，不把作者的思想限制在編輯和某些人認可的窄道之中。遵循這一規定，收穫常常發表一些活潑可喜的佳作，大受歡迎！耿直的硬骨頭靳以先生功不可沒！

這樣一位善良真誠是非第一的著名學者，遇到一些不順眼和不合理的事，每每挺身而出，無疑是人道主義和同情心的最好體現，以上幾個例子也最好不過地說明了他的表現多麼乾脆而且充分。他沒有想到個人的利害得失，想到只有是非和道義！較早，他譴責了北方熊，在我被打入十八層地獄時，又仗義執言。



靳以先生遺作：《前夕》和《燭紅》

他沒有隨波逐流，沒有一窩蜂，沒有為權勢所嚇倒，對一些不良的社會現象抱著不合流和不合作的態度，他有獨立的人格，在逝世三四十年後，人們沒有忘了他，還是推崇他，回憶他，出書紀念他。中共執政多年，只是出現了一些轉蓬式的、曇花一現般馬上消失的欽定人物，扎根在人們心目中的能有幾人？

靳以先生的精力並沒完全運用在編輯和寫作上，干擾太多，額外負擔太重；加之擺脫不了的病魔的侵襲。正當五十盛年，就離開了這個囂攘不安的塵世。使他在一個越江而來，一個跨海而去後長長的十年之久，竟沒有寫出什麼；要知在三、四十年代，他和巴金先生以編輯和創作年年雙豐收而聞名於世，文壇傳為佳話美談。

一個作家當沒法創作時，是夠受的了，實在太可惜！也是文壇的莫大損失！特別章先生過早就離開了人世。一一不過反過來看，如果他在世上抱病再生活若干歲月，他可無法享受壽終正寢的那麼安逸了，他怎麼能擺脫越來越瘋狂的階級鬥爭的殘酷逼害？君不見，受盡折騰的巴金先生和成千上萬文學工作者被斥之為臭老九而被摧殘得生不如死的不堪慘狀嗎？雖然以後，把靳以先生的墳也刨去了，但人已仙去，沒有知覺，再怎麼也不過顯示了對方的心理卑劣和手法的殘酷而已！



還原

“一九五七”

中篇：教訓篇（之二）

魏紫丹

毛澤東的極端自私有四大本質特徵：極端貪婪，極端陰險，極端卑鄙，極端黑暗。這似乎是在謾罵，其實不然，猶如對著“四大不要臉”說：“你們不要臉！”這不是在罵人，是在陳述一件客觀事實。如果你改述如下：“你們有錚錚鐵骨，崇高的人格，頭可斷，血可流，絕不出賣純潔的靈魂……”他們倒要懷疑你在用鐵勺打臉——打得不痛挖得痛哩！

說他極端貪婪，是指他吃獨食，言是一言堂，行是一意孤行，從動機和結果上而不是從策略上說，他決不與任何人利益均沾。至於他作為口頭禪的所謂“為人民服務”，我以書本與生活相結合，深切地體認到，所謂人民，黨，無產階級……就是指毛澤東自己，並且只是專指毛澤東一個人而已；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劉少奇都成了老反革命，資產階級司令部的頭子，無產階級專政的物件；那麼，新的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副司令呢？轉瞬成為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頭子。毛這時候處於萬般無奈下，就又請出了鄧小平，並吹捧他是如何如何“人才難得”當隨即棄之如敝屣時也不說什麼難得不難得了，又成了“鄧小平不懂馬列，代表資產階級。”那麼，誰是無產階級呢？咱們從“卑賤者最聰明”中找吧！一般認為，掏糞工算得上是卑賤者；但勤勤懇懇的掏糞工時傳祥卻是被無產階級打倒的對象；如不嫌麻煩，就一直找下去：周恩來，四人幫，華國鋒……我想，任何一個人在毛當政下，都是全被剝奪了任何一個現代民主國家的任何一個普通人的自由權利。包括你周恩來是終身總理！這就說明，毛澤東霸佔了這些政治概念，就反

映了他在實際的政治上吃了獨食。為人民服務就是為毛澤東服務。蘇共特派員說得對：“連他自己的人民也只不過是他在權力鬥爭中的工具罷了。”至於黨，那就是：他=黨，黨=他。如果誰想染指，他就叫誰滅亡；如果他發現，黨竟然不是他自己獨佔的玩藝，那他就斷然癱瘓這個黨，毀滅這個黨，叫黨滅亡！

或有人問，他既然是一個具有超帝王思想的人，民主之死敵，那他為什麼還能提出：“黨外無黨，帝王思想；黨內無派，千奇百怪。”和與“民主”黨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呢？他還標榜開明地說：“在這一點上，我們和蘇聯不同。我們有意識地留下民主黨派，讓他們有發表意見的機會，對他們採取又團結又鬥爭的方針。”（46）

蘇聯解體，檔案解密，揭了他的老底。原來，按他“有意識地”，並不是“留下民主黨派”而是正好相反。1947年11月30日毛澤東致電史達林說：“一旦中國革命取得最後勝利，按照蘇聯和南斯拉夫的經驗，除中國共產黨之外，所有政黨就都應該退出政治舞臺了，這樣將會加強中國革命的勢力。”

史達林否定毛的意見，於1948年4月20日複電說：“中國各在野黨代表著中國居民中的中間階層，並且反對國民黨集團，所以應該長期存在，中國共產黨將不得不同他們合作，反對中國的反動派和帝國主義列強，同時保持自己的領導地位。可能還需要這些政黨的某些代表參加中國人民民主政府，而政府本身也要宣佈為聯合政府，從而擴大它在居民中的基礎，孤立帝國主義及其國民黨代理人。應當考慮到，中國人民解放軍勝利後建立的中國政府，就其政策而言，還是民族革命的，即民主政府，而不是共產主義政府。目前還難以預料這將持續多長時間，至少在勝利後會是這樣。這也就是說，暫時還不能實現土地國有化和取消土地私有制，不能沒收所有大大小小的工商業資產階級的財產，也不能沒收大土地佔有者以及依靠雇傭勞動的中小土地佔有者的財產。要等到一定時候才能進行這些改革。即使是南斯拉夫，除了共產黨以外，也還有其他政黨參加人民陣線。”（47）

後來的事實證明，毛對主子的命令，唯命是從，一切遵照執行。這裏能夠發現和說明的幾個問題是：1，毛澤東從來都是按著他的需要編瞎話。2，這時是1947年，遼沈，淮海，平津具有戰略決戰性的三大戰役，

是發生在此後的 1948 年的 9, 10, 12 月, 一方面的事實是國民黨還有很大實力, 另一方面的事實是民主黨派正充當毛所謂的反蔣第二戰線的主力軍, 恰如鷹犬垂涎三尺地起勁追逐著前面搖晃著的骨頭。正值此時, 毛卻打算完他們的蛋, 實行 “黨天下”, 自己獨吞預期的果實。3, 反右派鬥爭針對的是知識份子和民主黨派。毛在評美國國務院的白皮書中已埋下反右的伏線, 如再往前追溯, “李銳在訪問過程中揭露一段頗有分量的史實, 他說毛在延安中共七大上說過, 掌握政權以後, 我們的鬥爭物件就是民主人士了。” (見金鐘《回首十年說批毛》, 《開放》2003.12.) 更可以追溯到, 早在毛澤東在 1925 年的《中國社會各階層的分析》一文中看出毛對知識份子的敵視態度。王丹訪問許良英的《撥開 “反右” 運動的歷史迷霧》中說: “此文發表於 1925 年 12 月的《革命》半月刊第 4 期, 1926 年 2 月的《中國農民》月刊第二期和 1926 年 3 月的《中國青年》第 116—117 期, 1952 年重刊於《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 已面目全非, 文中把知識份子分為三類: (一) ‘反動知識階級’ 包括一部分東西洋留學生, 一部分大專院校教授和學生, 屬於大資產階級, 是 ‘極端的反革命派’, 是 ‘民族革命之死敵’; (二) 多數 ‘高等知識份子, 包括大部分東西洋留學生, 大部分大專院校的教授和學生, 屬於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 其左翼可以當作我們的朋友, 但不是真正的朋友。’ (三) ‘小知識份子’, 包括中學生, 中小學教員, 屬於小資產階級, ‘是我們的朋友’。” 王丹說: “這是 ‘知識越多越反動’ 濫調的濫觴。” (王丹: 《我們在寫歷史》第 144 頁) 4, 經過大鳴大放, 他發現民主黨派真要行使互相監督的職能, 便又暴露出他要消滅民主黨派的心跡。他於那篇背信棄義, 惡名狼藉的講話《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中, 後來添加道: “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長期共存, 這是我們的願望, 也是我們的方針。至於各民主黨派是否能夠長期存在下去, 不是由共產黨一方面的願望作決定, 還要看各民主黨派自己的表現, 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這裏當然無需提出這同樣的問題: “至於共產黨能否存在下去, 還要看共產黨的表現, 要看他們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 因為 “人民” 就是毛自己。而於最後, 可能是 “人民” 看到, 經過反右派後各民主黨派的表現, 猶如演

傀儡戲, 由共產黨牽著線, 叫走走就走走, 叫扭扭就扭扭, 完全傀儡化; 搖尾乞憐, 跟屁逐臭, 徹底走狗化了, 才暫且恩准它 “長期共存”, 作為花瓶, 以觀後效, 以騙觀瞻。

一則由於毛的本質, 二則由於列寧的教唆, 兩者決定了毛一則以槍桿子——暴力奪取政權, 二則絕不與人分享政權。他外奪黨權, 用 “人海戰術” 表現了革命不是請客吃飯; 內奪私權, 也是殺人不眨眼。殺 AB 團把一個軍副排長以上幾乎斬盡殺絕, 搞得潰不成軍等等, 以前種種內鬥不再追述; 為了鬥倒王明, 周恩來, 他捧起劉少奇, 並封為白區正確路線的模範, 欽定為自己的接班人, 卻因為劉屢屢 “正確”, 功高震主, 就要把他打成頭號走資派, 經殘酷鬥爭, 死時 “白髮三千丈!” 有一本書, 《左傾二十年 1957—1976》, 顧名思義是反左的, 可書中卻這樣陳述毛對劉的迫害:

就是在 1966 年 8 月的時候, 毛澤東還沒有打算徹底打掉劉少奇……八屆十一中全會通過的中央領導機構調整決定中, 劉少奇名列政治局常委第八名, 雖然不是原來接班人地位, 畢竟還是黨的高級領導人——一起碼名義上是如此。8 月 20 日以後北大貼出一批攻擊劉少奇的大字報, 毛澤東派陳伯達前去阻止。9 月 14 日, 毛澤東在劉少奇按《炮打司令部》的口徑所寫的檢討稿上批示: “少奇同志: 基本上寫得很好, 很嚴肅, 特別是後半段更好。” 10 月 18 日, 首都紅衛兵三司喊出 “打倒劉少奇” 的口號, 清華大學出現 “打倒修正主義頭子劉少奇!” 的大標語後, 毛澤東 10 月 24 日說: “把劉, 鄧大字報貼到大街上去不好, 要允許犯錯誤, 允許改正, 讓紅衛兵看看《阿 Q 正傳》。劉, 鄧兩人是搞公開的, 不是秘密的, 要允許劉鄧革命。” “對劉少奇不能一筆抹殺。” (第 316 頁) 後面又寫道: (1967 年) 1 月 13 日深夜的時候, 毛澤東還派了秘書把劉少奇接到人民大會堂談話。他親切地接待他, 一上來就關心地詢問: “平平的腿好了嗎?” 劉少奇告訴毛澤東: “沒有的事, 是個騙局。”

的確, 是個騙局: 1 月 6 日, 王光美在中南海家中, 接到一個孩子的電話: “平平在學校作完檢查, 回家的路上, 被汽車把腿軋斷了, 現在送到北大附屬醫院, 要馬上截肢, 請你趕快來醫院!” 王光美拿著電話, 兩眼直了……劉少奇說: “馬上到醫院去!”

他們調車，趕到了醫院，不見平平，卻看見另外兩個孩子被當作人質，扣在清華大學的造反派手裏。幾個造反派一見劉少奇來到，也都麻了手腳，這時一個孩子跑到王光美身前：“媽媽!他們就是爲了要抓你!”王光美隻身迎上去，向人們說：“不是王光美的都走。”回頭，她向造反派們嚴肅，氣憤地質問：“你們爲什麼用這種手段騙我?”造反派不敢正視，望著天花板，回答：“這是江青同志支援我們搞的……”

現在，毛澤東關心到平平的腿，臨別時，還親切地把劉少奇送到門口，囑咐他：“好好學習，保重身體。”(第 318 頁)

如果我們在開始爲假像所惑時，我們尚可說：“毛澤東這時還沒打算徹底打掉劉少奇。”可在真相大白之後還這樣說，是何異于屠夫在捅刀之前還在豬脖子上搔癢讓它靜以待宰，好減少掙扎帶來的麻煩，你就說他這時還沒打算宰豬呢?

情景 雖然一模一樣，但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係卻不是屠夫與豬的關係，而是兩位元中共最高領袖之間的最親密的戰友關係。我們事後想起來，毛澤東當時表現的那種親切，關懷，慈祥，尤其是他說“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時呈現的貓哭老鼠狀，真叫人出一身冷汗!又真叫人噁心得出一身雞皮疙瘩!馬上毛就要“劉克思”去見馬克思，還要諄諄教以“好好學習”難道是要他發揚“朝聞道，夕死可矣”的追求真理的精神嗎?

偽善真惡，冷酷殘忍，陰險毒辣，卑鄙下流，與前述的“六個偉大”各司表裏，相反相成。別看林彪提出了“四個偉大”，那是他對毛“看人下菜碟”，他對毛是知人知面又知心的。他確知毛的爲人是“一旦得罪，得罪到底。”但他既然碰上了這種吃得餓，吃的毒的“吃獨食者”的泰山壓頂，也就難能避免如劉少奇先被定爲接班人後被徹底打倒的同樣的命運了，但他對毛不抱幻想，既不做檢討以求毛，也不虛與委蛇以騙毛，而是作最壞的打算。雖最後折戟沉沙，但總不象劉在最後關頭還對毛存幻想，自己承擔路線錯誤的責任，辭去國家主席職務，和妻子兒女去延安或老家種地，企求毛高抬貴手，息事寧人。毛親切握手，教以“好好學習，保重身體”打發他走人。但毛心硬如鐵，對他是一不作，二不休。我們現在再回過頭去看看，劉的下場是多麼淒淒慘慘，窩窩囊囊!

難道即便是個兔子，具有了吃獨食的惡習，也會連窩邊的隱身草也都要吃個精光嗎?作爲當時毛，林，周之後的第四號人物陶鑄，由於竟對毛如上“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的講話信以爲真，就對劉少奇採取了毛禦定的“要允許劉鄧革命”的政策。結果，眾所周知，他被打成了中國最大的保皇派，迫害致死。試想，僅是遵旨保劉，就罪當致死，劉本人還會有活路嗎?更別提“允許革命”云云之類的欺人之談了。再說卑躬屈膝的周恩來，林彪說他像個老當差的，絕對沒篡權的心，毛對他也不放過。因爲他在黨內外，幹部群眾中威信高，毛認爲自己的權力於無形中流失，所以也要對他來個借刀殺人。殺劉少奇借的刀是林彪，殺周恩來借的刀是癌細胞。他不准他動手術，以致失去治療最佳期，讓他先於自己而死。並且，死後還降低對他的評價。我有一位也是右派的朋友，當時看到周的悼詞，感到無法理解：“爲什麼沒有寫‘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他這一說，引起我的同感，因爲連史達林那樣的重大殺人犯還被毛硬說成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哩!我到美國後，看到1999年第9期《爭鳴》上，載有《汪東興私藏“毛檔案”被抄家》，其中有毛拒絕參加周恩來追悼會時說得幾句話。1976年1月12日，毛說：“爲什麼要我參加總理的追悼會?我還有不參加的權利嘛!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是誰送給總理的?我和這個馬克思主義的總理，就鬥爭過不少於十次。不要勉強，建議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參加。”

1976年4月3日，4月6日，毛出席政治局會議時說：“悼念總理，是反對我老毛，罵我秦始皇，我比蔣介石還殘暴。炮打江青，春橋，洪文，他們的總後台就是我老毛。”4月5日，4月6日，毛對華國鋒，王洪文，汪東興等說：“(天安門)廣場，外地，都搞得火熱，悼念總理，要鄧小平上臺，這都是針對我的，要打倒我，我是‘豺狼’的後臺。”5月?日，6月?日，毛多次和毛遠新，張玉鳳談到接班人：“我擔心華國鋒同志，我走了，他頂不住，會倒向右。軍隊聽我的，跟我的。我走了，會聽國鋒，錫聯嗎?我看不會，大多是聽幾個老師的，還有那個老師頭兒(指鄧小平)會翻案，會翻天!”他已打倒了鄧小平，但仍對他的“翻天”耿耿於懷。6月?日，十月?日，毛和華國鋒，毛遠新，汪東興，陳錫聯，江青等人談話：“國鋒

人間樂園五七幹校

王若望傳記連載之七

頂不住，要找江青。她有膽，不怕鬧翻天；但江青結怨不少，東興，錫聯呢，江青都和你們鬧翻天過吧。”6月7日，毛召集了華國鋒，汪東興，江青，毛遠新，陳錫聯等人，講到中央人事安排時說：“江青今後怎樣安排？我看還是在黨務上，抓黨務的要硬，不能含糊，左右搖擺的，這一點江青有資本，能管理好；但她跟不少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不和，要改。改好七七七八才能夠格做黨的工作。”5月7日，毛對汪東興，毛遠新，張玉鳳等說：“我死後，建議小張（張玉鳳）搬出中南海，在中組部，中聯部安排個副部長來鍛煉一下，還年輕嘛！”

可是，又據張玉鳳回憶，主席在1976年7月15日，曾召見毛遠新，華國鋒，江青，汪東興和她本人，提出政治局常委名單。毛遠新，汪東興，張玉鳳作記錄。名單順序為：毛遠新，華國鋒，江青，陳錫聯，紀登奎，汪東興及張玉鳳。江青聽後，要主席再重複一次，並問：“洪文，春橋呢？”主席當即指著江青說：“你好幼稚！”舉手往左右方各斬一刀，說：“老師，王（洪文），張（春橋）都不進！”（《動向》2004年5月刊）

如照此欽定辦事，則這個黨天下，實至名歸為“毛傳侄，家天下”了。至於為什麼未照此辦理？只有待檔案解密，方可得知。

如此這般，毛在一息尚存時，把政敵一個個殺的殺，囚的囚，貶的貶，把新黨羽培植起來，把家人——女兒，侄兒，侄女，妻子，甚至情婦也安置在黨的領導核心；機關算盡而千慮一失者，是他“東征于朝，長子死焉！”否則，中國不也有了自家的“金正日？”國人有的為此而感謝彭德懷，說：“剷除了那個壞種羔子，是為國除了一害。”

審視他一生的所作所為，說他極端貪婪，吃獨食，有一點假嗎？



一九七二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華，北京當局首次與“頭號敵人”尼克森接觸。所有大馬路都得打掃清潔，牆壁沖刷掉塗鴉和招貼，並且通知牛鬼蛇神、黑五類、黑六類分子都得回避，也就是不許出門，不許中午回家吃飯，為了做到天衣無縫，街道幹部，保衛人員，公安幹警，學校老師等等，忙得不亦樂乎！

中國方面上下九等人無緣見著美國總統，倒讓人看見了共產黨的弄虛作假，內外有別和騙騙洋鬼子的看家本領。

不能讓五類分子閑著，按毛澤東的理論還得讓這幫人在勞動中進行思想改造。我走出牢門，頭上還有一頂帽子，不讓你有一絲空閒，於是我被迫下鄉，上海市文化系統在郊縣奉賢建立了“五七幹校”，顧名思義，“幹校”是幹部學習的學校，到了奉賢向下，才知道上了當，名為“幹校”，實際是有問題的人來此勞動改造的。曾記得我從監獄中出來的迎新大會上，台下來了一批五七幹校的學員，巴金也在其中。如今招收王若望這名新學員，真叫做臭味相投了。

在幹校裏，分散在農民家裏，既無老師，板凳課桌也用不著，只有“毛選”和小紅本以及“廣闊的天地”。

幹地裏的農活，自古以來有“春種一粒粟，秋收一擔谷”之普通常識，可是五七幹校卻是“不問收穫，只有耕耘”，好像很有氣派，其實是撒下了豆種不掩土，播下的稻粒不插秧，是不是實行了農業新技術？只須兩、三天，地皮上的穀粒喂飽了天外飛來的鳥雀，真的做到了“不問收穫”。

“五七幹校”的命名來源於老毛胡思亂想的新一章“五七指示”，指示把軍隊兼有黨、政、軍、農自給自足，消滅分工的新型解放軍，於五月七日公佈這個指示，於是“五七幹校”又來個四面開花，無處不是“五七”，如“五七小學”、“五七掛麵”、“五七商場”、“五七牌蚊香”、“五七產科醫院”等等，毛澤東放個屁，不香也是香。

奉賢五七幹校既然在農村，而“五七指示”的精神是自給自足，那麼，吃菜應該自力更生吧，事實上，我們吃的菜難得有捲心菜，空心菜，大多數吃的是鹹菜；沒吃過一回肉，吃魚可是吃了不少，是什麼樣的魚呢？是海邊漁民捕捉的手指般的小魚，用重鹽醃過，厚厚的鹽巴包裹著小魚，吃到嘴裏還有沙粒夾在其中。那日子並不比大饑荒年頭好多少。

五七幹校生活方面確實艱苦，而精神方面倒是愉快，甚至可用“幸福的”來形容它。遠離市中心，也就遠離了那裏的荒誕、緊張、迫害成風和對知識份子的種種侮辱。只因幹校只有學員，並無領導，當領導人的知識份子本身跟同學們屬於一個級別。原來文化大革命中把人們分成“革命群眾”和“非革命群眾”，已經劃為革命群眾的都不樂意到幹校來；非革命群眾都是被迫的，勒令你下幹校，不來也不行。這樣，就給五七幹校無形間造成了真空。“真空”即意味著自由化，就有條件把這兒的小天地變成無管束的人間樂園。毛澤東把人們分成左、中、右，經過上述的自我淘汰，左字型大小的不肯來，剩下的都是右字型大小和少量的中不溜秋的人。志同道合之輩給了他們“物以類聚”的條件，樂在其中矣，便發生了否定“文革”，唱對臺戲的一場“反革命”。

原來物以類聚的右字型大小，其中有六、七人過去是極左派（專指“作家協會”），他們應該帶有革命群眾的桂冠，不幸，這些人犯了什麼錯誤便跌入右字型大小的深淵。

前一節講到本人有條件從監獄釋放回原單位，堅決反對王若望到作家協會的就是這夥極左派；至於他們後來怎樣犯了錯誤，此處略而不談，有一點不妨交代清楚，這些人從前氣焰囂張，讓中、右的作家以及公務員們都望而生畏。如今有了個自由化的無政府狀態，正好抓注機會給他們一頓教訓。對我來說，只是考慮到自己頭上有一頂半帽子，未便輕舉妄動，但又抑制不住心裏的得意，便在別人寫大字報炮轟一名四人幫的爪牙時，我顫巍巍地簽上了自己的名字。

等了好幾天，他們沒有作出回應，大概發現自己非常孤立吧。這邊的大字報便乘勝追擊，又貼出第二張大字報，極左派的致命傷就在於他們始終站在群眾的對立面。

五七幹校一場小小的“革命”，以非革命群眾一面倒的絕對優勢告一段落。

這一場否定文革的交鋒，引起了五七幹校其他連隊來看我們的大字報：前來觀戰的有影視界、戲曲界的明星，有各個報社的主筆和記者、美術界、音樂界等等。

我從他們中間，聽到一些令人震驚的訊息：上海交響樂團長笛演奏演員尹敬修，說過一句“打麻雀有什麼用呀”！五七年成了後補右派，並押至勞改農場服刑二十年，音樂家協會兼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出面交涉，才把尹調回上海。尹敬修出獄後不戴帽子，但還是‘非革命群眾’，調到‘五七幹校’來，他無限欽佩救了他的賀綠汀，他說：“賀老本來也在‘五七幹校’的名單中，賀老太提出他老人家有哮喘病，不能去幹校，這樣才免了他老人家下放到奉賢”。音樂學院中有個於會詠，專以踏著人家的屍骨往上攀升，果然被江青看中，擔任國務院文化部副部長，粉碎四人幫後，此人畏罪自殺。

獲得比利時皇家鋼琴大賽獎第二名（頭一名出缺）顧聖嬰小姐，她一家是基督徒，她父親因歷史反革命押往青海勞改十五年。一九六六年文革開始，不僅抄走了獎狀獎盃，還將聖嬰的鋼琴當作封資修砸毀。顧聖嬰小姐和母親，還有十五歲的弟弟，開煤氣同歸於盡；同一年她的老師——傅雷夫婦倆，雙雙開煤氣自殺。

音樂界更慘的還有一位陸洪恩，他不經心講了：“我們一天一天不是好起來”。毛澤東講過“我們一天一天好起來”，罪狀是反毛，只因多說了一個“不”字，竟將他判了死刑；音樂學院鋼琴系吳樂懿教授，把她隔離在雜物間，送飯進去沒人接，發現她已經死了好幾天，臭味瀰漫開來才知道。

好一個無人管束的樂園，才有人膽敢在這裏講述如此恐怖的人間慘劇。湊巧又碰上個對此有特別愛好的人，有責任把這類慘劇深深印在心裏，我坐牢獄中剛剛撕去了“黨票”的外衣，決心不再作那個獨裁者的幫兇了。

印在心田的還認識了知其名而未見過面的朋友。我的介紹集中於音樂界的精英的被害與自殺，再如知名的京劇演員言慧珠，她穿上豔麗的禮服懸樑自盡；演海瑞的馬連良在審判庭被亂棍打死……等等。如果報

導流水般的血淚帳，可以寫成很長的死靈魂名單，爲了篇幅有限，現只能掛一漏萬，一筆帶過了。

深翻土，廣積糧

在五七幹校混了五個月，忽然把我和王延齡調回上海。那幾個極左派卻未接掉令，我就知道這一去決不是好事。

回到作協，才知道毛又有新花樣，調我們回來就是“玩”他的新花樣，如果說“深翻土”的新花樣來自洋博士錢學森，那麼“深挖洞”的新花樣則來自明朝朱元璋，老毛根據《明史》一個文化人向朱元璋進言：“深挖洞，廣積糧”（這兩句上下顛倒）打仗的時候深溝高壘，便於軍士們藏身，也就是深挖洞，下一句乃保證軍糧供應，這就能戰無不勝，老毛只用他的下半截，因上一句無糧可積也。

於是各大城市馬上推行“深挖洞”，另外還有一個理由，老毛估計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世界大戰晚打不如早打，似乎大戰馬上就要發生。挖洞又可作防空洞之用。在林彪元帥的呵護下，認爲空曠地帶挖洞不好，挑選在房屋下挖洞，警報一響便於躲藏；集中一處挖洞也不好，抗戰時期，日本飛機飛到重慶大轟炸，就死了上千人。

既然說得頭頭是道，保護生命總是一樁好事，不挖也得挖，原來是把頭上帶有帽子的調回來充當勞動力。我們不是從事建設嗎，其實毛的這個新花樣仍然是破壞，破壞花園的草地，破壞樓房建築的地基，破壞性的世界大戰沒有打成，自己倒以大破壞去迎接它，沒參加苦役的人體會得不會這麼深！

地下的工程其艱難的程度非地上建設可比，再加之我們沒有懂行的人技術指導，我們的工具都是農業上使用的貼鋤、撬棒、鋤頭之類，有氣力也用不上，這且不去說它，挖得深一點，地下水便湧流出來，就把挖好的部份沖掉，上海地下是軟土層，缺乏粘性，有時這邊挖了，那邊就塌方；還有挖出的泥土運到哪里去堆積？運輸工具去哪里借？這一類難題誰也無法解決，地下的奴隸們只有以怠工來虛應故事。

我們的怠工、罷工倒有一份功勞，跟左鄰右舍樓宇、飯店比起來，某處塌方壓死了多少人；某大樓地

下挖得深一點，好端端的地坪出現裂痕，險象環生；我們作協破壞得不多正是造福不淺呢！

管我們的工頭是陸行良，他對地下工程一竅不通，此人也算是個作家，可沒有寫出什麼東西，工地上大家叫他‘牛頭’，即牛鬼的頭頭和“牛頭馬面”之謂，他不敢下洞穴發號施令，只敢在地面上指手劃腳。

有一天我在工地上一個不留心，穿著膠鞋一腳踏在跳板的釘子上，當場鮮血直流，馬上甩掉肩上的爛泥，送往醫院治療，包紮好回到家中，讓我的兒子將准假一個星期的假條送到作協。‘牛頭’陸行良竟出了個壞主意，他要我的兒子做替工，要他做到下班才把他放回來，其用心何其毒也！

本人出國以後，有機會接觸到有關文革的資料，其中有一項統計深挖洞造成的損失：工傷死亡一千四百餘人，損失人民幣三百五十七億元，挖的防空洞，乾燥的改作男女幽會場所，積水的成了蚊蠅之地。樓宇塌陷的損害未計在內。

以上數字，無法核實，卻給毛澤東玩的“新花樣”作了啼笑皆非的總結。

工宣隊進駐的變化

毛澤東打算結束文化大革命，可這場大革命結束不了，不得不採取兩個措施：一個是讓紅衛兵上山下鄉；一個是派軍宣隊、工宣隊進駐黨、政、民所有機關，指望撲滅自己惹下的熊熊大火。

作家協會是個小機關，沒有派軍宣隊，工宣隊只派兩人。而這裏的所謂造反派，有的消沉不幹，有的送往“五七幹校”，到那裏挨了炮轟，弄得聲名狼藉。工宣隊不來也掀不起什麼風浪。

派來的兩位工宣隊，原是工廠裏的工人，其中一位姓陸的不是黨員，我不認識他，他對我說：“聽過你作的報告呢”。原來他從我過去的報告裏知道我是延安來的，而“延安來的”也像無產階級一樣，是一種榮譽的符號，他覺著分派我挖防空洞不妥。

工宣隊員文化不高，他們來到作家協會，完全憑著“無產階級”領導一切這個榮譽才被看重。

他找我談話，問我爲什麼派你幹這份勞動？我說：恐怕我頭頂上有頂帽子吧。令人很詫異的是，陸師傅還不知道“帽子”是什麼東西，經我詳細解釋，

他反而覺得奇怪。可見“無產階級”置身於階級鬥爭圈外倒顯出工人的樸素本色，總算沒有受過“毛澤東思想”的洗禮。

感謝陸師傅說情，我離開了尚未完工的地下工程，那個“牛頭”也調職到行政科幹雜務。

沒想到“集中”了兩個人，一位名叫許鐵生，我去湊成第二名，許鐵生當年唱的言派老生，號“思言”。倒嗓子以後就改做編劇，千不該萬不該他編了個“海瑞上疏”，是緊跟北京的吳晗編的“海瑞罷官”而作，前一節已介紹了吳晗緊跟毛主席的海瑞精神，編了海瑞罷官，弄得家破人亡，死於獄中；如今讓我見到了“海瑞上疏”的作者，他沒死卻害苦了一家人，一個女兒已有了人家，尚未成家，受株連發配白茅嶺勞改農場，判勞改五年，刑滿到期還得留場，只是一年有一次回到老家，父母看見女兒已變得嘴癢、臉長、骨瘦如柴的老太婆矣。把一個青春少女如此摧殘，做父親的欲哭無淚，海瑞平反冤獄，而當代的冤獄卻大大超過明朝。

許鐵生對我似乎存有戒心，凡涉及政治的問題他都避而不談，殊不知他把家庭變故告訴我，不也是政治嗎？後來他向我吐露真情：“一個人在牛棚挺太平，雖然孤獨無聊，可以讀書和寫稿，多一個人就多一張嘴，我還以為上級派你來，是監督我的呢”！

京劇院的牛棚設在樓梯下的雜物間，我們不能伸直腰，最舒服的動作是伏案讀書。許鐵生從頭頂的腳步聲裏，能辨別是男是女，是武生還是花臉。我佩服他的聽覺是“第六感覺”。

閑著無聊，作詞一首（蔔運算元）記其事：

不是愛低頭，伸腰便碰頭
人來人往頭上過，聞聲不見頭
幾回碰破頭，青春變白頭
歲歲年年牛棚住，人而不如牛

從樓上時而吊嗓子的唱腔傳來，跟樓下愛好京劇的票友正配胃口，我的京戲因而大有長進。許還逐個介紹誰是名角；誰不肯演樣板戲受著排斥，誰因男女問題罰她靠邊站等等。靠邊站沒有資格正式上舞臺，樓上的名角本來不稀罕“演樣板”（戲劇界簡稱“演樣板”帶有輕蔑之意，略掉“戲”字，即夠不上“戲”的水平，突出“樣板”，因小說，詩歌，最忌

模仿和重複。）只有樣板戲最吃香，“樣板團”在京劇團成了特權階級。

許鐵生評論八個樣板戲，只有“紅燈記”還象個戲，其他幾個戲都是雜湊，戲中的正面人物（共產黨員）在臺上只能給人酸溜溜的味道。這種戲是給人獻醜不是獻美。何況八個樣板戲都是剽竊他人創作的劇本，更無恥的是抹去劇本的作者，這都是江青的心機，江還給原作者劃入五類分子，投入監獄，有的借其他理由將原作者處死，真是駭人聽聞！（許鐵生講了被處死的作者的姓名，可惜我把他忘了）。

毛澤東夫婦的末日

一九七六年可算是多事之秋，天怒人怨，暴君末日，都集中在這一年演出。

周總理於一月八日去世，四月五日丙辰清明，解放後第一次天安門事件即由悼念周恩來而引發。同年七月二十八日，又發生唐山大地震，震區延及京津。種種預兆接踵而來，往後還要報應在毛澤東夫婦身上。

那時我對周總理也是十分欽佩，總覺著周比毛仁慈，假設毛死在周的前面，中國的局面或許會改觀。五年後方才知道毛和周是一丘之貉，原來一點敬仰之心一下子蕩然無存。

同一年的九月九日，我和許鐵生從廣播裏聽到了毛老頭死亡的消息。當時樓上樓下的角兒們一片哭聲。只有許和我哭不出來，當管理我們的“牛頭”鑽進牛棚鄭重報告毛去世，可愛的許馬上吸鼻子抽咽起來，此老善於演戲，看得出他是裝的，我要是聰明一點，也覺得裝只有好處，沒有壞處，不知怎麼，要哭也哭不出來。這時我才體味到：有真情才能哭，一點兒勉強不得。

“牛頭”決定懲處不肯哭的人，命我手執紅小本，跪在毛澤東象下，我的跪是勉強的，屈膝而未低頭，抬起頭看著毛澤東象披上一條黑紗，慶倖將結束牛棚的生活，祝賀暴君終於離開這個滿目瘡痍的世界，我笑都來不及呢！

第二天又有新的差使：派我和許鐵生制花圈，特別關照花圈的花要新鮮的，不要紅的。新鮮的好辦，不要紅的可不大容易，活著的毛澤東不是喜歡五星紅旗、紅太陽嗎？

九月裏菊花剛剛吐蕾，可是並無白的、黑的菊花呀，許鐵生不知哪里弄來一些含苞未放的菊花，他借著毛的名義動員養花的人才弄到手。

我跟許鐵生正在院子裏紮花圈，從樓上窗子裏伸出一個女人的頭，她居高臨下嚷嚷：“沒開的菊花不如紙花……”。

昨天我無緣無故下跪，今天無緣無故出了白花紅花的難題，我窩著一肚子的氣，便沖著那個女人講了一句：“不要咿哩哇啦亂鬧猛嘛”。（上海話，即大聲喧鬧）。

就這麼一句話，竟闖了大禍，樓上那個女的告到公安局派出所，說是王某誣衊毛主席，想用紙花代替菊花，並且說她是“咿哩哇啦”，沖淡大家對毛逝世的悲痛，公安人員再問此人是不是反動分子？壞女人說：“當然是牛棚裏的現行反革命”。

公安人員如獲至寶，連連說：“對頭，對頭”！他對這個女士讚賞有加。

這天我就被關入牛棚，“牛頭”給儲藏室上了反鎖，等候公安局發落。第二天公安人員來到京劇院，先找黨委書記，並且拿出一張拘捕證，上寫著“現行反革命分子乘著國喪進行反革命活動”之語。

若不是黨委書記設法緩衝，我又逃不脫進監獄的厄運。黨委書記看了拘捕證，他提出需要有個證人，於是，馬上找到許鐵生來證實我說了什麼話。

許鐵生來到院部，看到穿著制服的人，他不知道說一句話會這麼嚴重。他從黨委書記口中，聽得出還有弦外之音，他定一定神，便把王某原來的那句話的棱角搓圓了。他證明說：“王若望講了‘咿哩哇啦’，下麵還有半句‘不要鬧猛’。他的意思，悼念偉大領袖，應該安靜肅穆，那個唱京劇的女同志，不懂上海話的‘鬧猛’，咿哩哇啦太鬧猛，這就破壞了莊嚴肅穆的氣氛。要是換了上海人，就不會發生這種誤會了”。

許鐵生配合了黨委書記的眼神，作了合情合理的證詞。公安人員收起拘捕證；他在背地裏介紹這個女同志在劇團原是個跑龍套，她想從政治投機上提升自己，結果賺了個“長舌婦”的“美名”！對“長舌婦”的貶詞雖則甚獲我心，這個跑龍套女人也著實可憐，長舌婦必須有聽得進讒言的首腦做搭擋，如今碰

上個腦子開通的黨委書記，長舌婦就無法施展其技了。所以說，小人得志是由小人的領導培育的。

九月九日毛澤東死了，十月四日，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全軍覆沒，所謂“毛澤東夫婦的末日”即指此。

毛、江聯姻真叫做“天作之合”：一個是殺人如麻的劊子手；配上個嗜血成性的悍婦，至於她也能參與夫妻檔的殺人比賽，完全依靠裙帶關係，便賦予她製造上千件冤、錯、假案的權力。而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之流智商並不低下，他們煞費苦心找門路攀龍附鳳，首先找著老毛的夫人，在中央又有陰險惡毒的康生；在上海還有一個奸刁巨滑的柯慶施，四個小丑只是貪圖往上爬，終於爬上了最高層。

只可惜沒有學過“加、減法”，他們竟不問老毛已是風燭殘年，有朝一日，龍腿一伸，必然是樹倒猢猻散。

四人幫作惡多端且不去說它，只說周恩來去世，中國人民對他有好感，四人幫卻千方百計制止民眾悼念他，並派人到天安門人民英雄紀念碑去毀壞花圈，抓走獻花圈的人（張琴秋的女兒瑪姬就為此而死於獄中），並且還下達中共中央檔，還不得悼念周總理（其中沒有一句說明為何不能悼念他）。這就把人民的哀思轉為對四人幫的憤怒。正好借悼念周恩來的名義，爆發了二十多萬人參加的天安門事件。我們從幾百首“天安門詩抄”中看出，全部是咒罵四人幫的。

由華國鋒、汪東興策劃活捉四人幫，為人民除四害，就憑這一條，華就成了扭轉乾坤的大人物。不過最大的遺憾，是仍然繼續毛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壓制鄧小平，這就埋下了以後失敗的種子。

除四害消息傳來，京劇院牛棚裏的難兄難弟，許鐵生說：“捲舖蓋滾出牛棚的時候到了”！

我說：“我們頭上的帽子也該飛了”！

後來我們才明白過來：鄧小平不得不保護毛，他生前所堅持的東西，正是鄧堅持的“四項原則”，只要中共不肯結束一黨專政，毛的神明就得保護下來。

換人不換馬，換湯不換藥

我們高興得太早了！“牛棚”沒有拆，我跟許仍然在牛棚裏，只是“牛頭”的態度有了轉變，那個跑龍套的女人也怕和我們照面。由江青領銜的樣板團也

宣佈解散，京劇院的“特權階級”成了平民，委屈了好多年的名角們翻了身，預備演個大戲慶祝打倒四人幫的勝利。

編劇許鐵生向樓上的名角們推薦一出傳統劇，戲名有好幾個：上天臺、打金磚（又名“姚期”）。主角是漢光武，靜角姚期，旦角是漢光武的寵妃。光武帝聽信寵妃的讒言，連續殺戮姚期等大臣，直至皇帝有點兒清醒，朝中的功臣宿將都消滅殆盡，最後光武帝被陰司的冤鬼手執磚，將這個昏君打死。

“打金磚”這個戲明顯的借古諷今，古代的劇作者似乎早就知曉當今江氏寵妃篡權專政的故事，不同之處江青在老毛宮闈中並不得寵。

許鐵生不愧是“喜簍子”（熟悉戲曲各種劇目者）

在緊要關頭，許救了我。我們之間無話不談，也曾談過各人未來的理想：我談的是壯志未酬，從我的覺醒過來，後半生再也不做現政權忠順的奴僕了；許說：“我再也不‘緊跟’，一旦摘了帽子，安度晚年”。他被連續的劫難消磨得胸無大志了。

這兒補敘許的女兒因受父親的株連發配白茅嶺勞改農場，年方青春的姑娘與一名男勞改犯產生了愛情。由於她曾罵過江青而加刑，粉碎四人幫後，許的女兒一夜之間成了反對四人幫的女英雄，由寶山縣教育局在她大門上貼上喜報，她從白茅嶺歸來，坐著吉普車，捎上行李，從安徽直駛上海，留在白茅嶺農場她的情人，自己感到高枝兒攀不上，只得退還她定情的戒指。許家吉星高照，許鐵生得到平反，他女兒又被寶山縣推舉為上海市人大代表，父女雙雙戴上紅花，坐在演出“打金磚”的貴賓席上。

相形之下，我的情況還不如許鐵生，他摘去反革命帽子，我的帽子不能摘。上臺不久的華國鋒於一九七七年就提出了“兩個凡是”的信條：（一）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擁護；（二）凡是毛主席制訂的方針，我們都照辦，並且下達通知：“因反對文化大革命者可以平反，並給予適當經濟補償，毛主席生前做過的決定和批示，不在平反之列”。這就是這個“短命內閣”大失人心的一大敗筆。

既然提出了打擊右傾翻案風，那就鼓勵了極左派的復辟，且舉上海就有兩個左派分子：

劉金的批判文章發表於《人民日報》，是用“上海人民出版社協作組”的署名，其中把王若望、姚文元扯在一起，罵成“一丘之貉”；上海作協自報叛徒的唐鐵海撰文在《文匯報》刊出，與劉金的文章一個調子，增加的語句：“王若望比姚文元還要右，他的‘一板之隔’是為資產階級張目”。

劉金的那篇文章，還經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分兩天播出，我的羊子在湖南株洲聽到王若望是姚文元的祖師爺時，嚇得眼淚直流，本打算回上海看望我，聽了廣播只好打消行期。

許鐵生和京劇院的朋友也為我著急，我只有苦笑。私下裏我對許鐵生說：“這些傢伙故意混淆左與右，其用意是給姚文元、梁效打掩護，這是黎明前的黑暗”！

還有一事，多虧羊子在她寫的“我的難題”中提到，她寫道：“大家去看一場電影，是周恩來逝世的紀錄片，因為黨中央致悼詞的是鄧小平，可是鄧一直沒有出現，觀眾所以注意鄧的鏡頭，原來是鄧小平讀完悼詞後就消失了。觀眾情緒顯得沮喪，老鄉（若望）說：‘為什麼把鄧小平的鏡頭剪掉，等於宣佈自己跟四人幫站在一塊去了’。老鄉說：‘華國鋒在臺上不會長的，他不是政治家’”。（港版：《天地有正氣》146頁）

果然，華國鋒成了中共領袖中最短命的內閣。

華國鋒以“凡是”派而聞名，他堅持將毛的屍體永久保存在紀念堂，這就大大違反了“凡是”了，原來毛生前和幾個元老都立下字據：“死後火葬，決不特殊”。如今他卻保存毛的屍體，怎麼不凡了呢？

華國鋒的說詞：莫斯科列寧陵墓的屍體還是保存下來了。他偏偏挑選獨裁國家的列寧為證，為什麼不比照西方國家那裏沒有一個首腦的屍體，展覽給活人觀賞。

凡是觀賞毛澤東紀念堂的玻璃棺材裏的腐屍者，肯定會嘲笑，讓我看到了真正的遺臭萬年，看到了始作俑者多麼愚蠢！

張志新、王申酉之死

上一節講了幾件華國鋒的所作所為，表明他不愧是“凡是”當頭的衣鉢真傳，誰能料到，連毛澤東好殺人的作風，也包含在“凡是”裏面呢？

遼寧婦女幹部張志新，文革期間被投入黑牢，四人幫粉碎以後本該將她釋放，由於華主席的一紙公文，規定不得釋放。

張女士在獄中感到氣憤，又講了衝撞的話，她的罪行步步升級最後升到判處死刑。執行槍決的時候，怕她喊反動口號，事先竟把她的喉管割斷。

那時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瀋陽有良心的公安人員向胡透露張志新慘死的經過，胡耀邦很氣憤，他想抓住這一事件教育幹部如何講人道如何守法，並調了三大報紙一個新華社的資深記者，協力寫出張志新冤獄的始末，還未寫成，華主席知道此案是沖著他來的，爲了照顧他的面子，只得犧牲組織部長的面子，資深記者中途散夥，那篇報導成爲有“始”而無“終”。

四人幫打倒後，一度出現寬鬆局面，再也掩蓋不住張志新慘酷的死。我在做報告讚揚粉碎四人幫的正面意義，往往插進張志新的故事。

感謝左王陳沂在他的“共產黨員要按黨章辦事”文中，批評王若望違反了黨章：“王若望每次出去講話，孩子都勸告他，甚至可以說是哀求他：‘爸爸，你不要去亂說了，不要再給我們帶來痛苦’。他怎麼回答呢？‘有什麼可怕的，我準備了一根喉管’。我對他說：‘張志新的喉管是被四人幫割的（明明是華國鋒執政時期割的，陳沂顯然睜著眼睛說瞎話了---作者），現在是三中全會正確路線領導下的黨和政府，誰會割你的喉管呢？（引自《王若望自傳》第二卷附錄三，423頁）左王對此大謬不然，只能說明他是爲屠夫張目。

我做報告，所以加張志新的慘死，原是要給聽眾一種暗示！對華主席不要抱太多幻想，當我講到張志新慘死的情節，台下一片唏噓聲，女同志甚至哭出聲來。我要把張志新烈士的故事傳播出去，企圖代替三大報紙和一個通訊社。

四人幫粉碎，上海幫在上海市委領導班子一同潰滅，徐景賢，王秀珍，朱永嘉，陳阿大分別判了十年左右的徒刑，由北京市委蘇振華，彭沖，倪志福，組成新的上海市委。

新的領導班子並沒帶來什麼新氣象，毋寧說還湯不換藥，繼張志新慘死在華國鋒的刀下，又製造了華東師大學生王申酉的慘案！

王申酉是全校的高材生，作文、吟詩、音樂、打球都來得，同班女同學都喜歡他。他看中了一位愛好文學的女同學，便寫了一封長長的求愛信。四人幫派進該校的工宣隊，一個老師傅不識字，被他抓到的文字，都以爲其中有問題，對知識份子和知識的仇視，原是毛澤東灌輸的思想，這個老師傅抓到了一封信，並不過目，便交給工宣隊。這封情書沒有一句是談情說愛的，卻是對馬克思主義以及社會主義進行理論的探討，裏頭最嚴重的詞句，竟說社會主義不適合中國，馬列主義到了中國被某些人搞得非驢非馬，我要親自研究馬列主義等等。

上海市委拿到了這封信，立即逮捕王申酉，把他與死刑犯關在一起，關了不到一年，徐景賢大概忙於篡黨奪權，無暇顧及黑牢裏的小將，一直沒有審問和判刑。

四人幫粉碎的消息傳進了牢房，王申酉慶倖自己很快就會釋放。他興高采烈迎接這一天的到來，果然，這一天終於來到，申酉剛走出牢門，就被五花大綁，他的樂觀完全錯了，萬萬沒有料到，他是走向刑場。一個二十多歲的青年爲了一封情書丟了性命！

華東師大的學生們，前往北京上訪，要求胡耀邦爲死者申冤，並舉行記者招待會，其結果卻令人失望，中央領導人不敢出面，報刊更不會報導這件慘案了。

這是彭沖根據華國鋒的兩個“凡是”判王申酉的死刑，上報華國鋒批准的。

或許是胡耀邦批評了上海市委不重視人命關天，希望作出善後處理，彭沖得調離，政法委員會主任嚴佑民，卻調往安徽省擔任同樣的職務。

這一年我的小兒子殿佑，在奉賢新海農場插隊，他也講起一名上海青年，寫了一封信投給報社，不同意建立毛主席紀念堂，這個青年發信不到一個月，未經審判便把他處決在海邊叢林中，死屍拋入大海。

張志新、王申酉和新海農場一位連姓名都不知的青年，正是胡耀邦大力推行平反冤錯假案的一九七八年，由於沒有推翻華國鋒的那個衛護死鬼毛澤東的紅頭檔，一方面平反冤錯假案受到極大阻力，一方面還在製造更多的冤錯假案。把活的志士仁人殺了去祭奠躺在玻璃棺材中的魔鬼，我相信，慘死在兩個“凡是”下的，決不止上述提到的三位犧牲品！

抗日漫畫家 麥非的命運

——發自美國的報告——



本刊特約記者 辛然

八十九歲的麥非



這是一篇發自美國的報告，如若還是在中國，就怕這位“抗日漫畫家——麥非的故事”，至多也只能真假摻半地留在他的故土人間，這對於一個年高九旬的老人來說，究竟是喜是悲？是滿足還是遺憾？所幸的是，麥非先生今日生活在他曾大加“漫畫”的美國，卻以自由之身，在紐約巧遇了深愛中華、亦深愛自由的晚輩朋友——《黃花崗雜誌》的同人們……

引子：“送你一幅蝦，換你一本書！”

那是一個天朗氣清的秋日，在紐約唐人街一家有模有樣的中文書店裏，一位老人正在興致勃勃地向大家介紹著一幅幅掛在牆上的“水墨蝦圖”。也許是緣份吧，老人因突然發現了一個人，便忽然收住話，轉身便興致勃勃地擠了過去，劈面就說：“我是麥非，我知道你，你就是xxx！”說著，他便拉著那人的手，擠回人群裏，也不放開那人，卻抬起他的另一支手臂，指著牆上的水墨蝦圖大聲說道：“我的蝦比齊白石的好，他連蝦腳都畫錯了！”他也不顧這位晚輩的詫異，轉臉又盯著他說：“我要送你一幅蝦，換你一本書！”他滿是皺紋的臉上，一雙已經深陷下去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一套灰色的舊西裝穿在他身上，那渾身上下的稜稜角角，就象是要戳到晚輩的身上；還有他那一頭亂蓬蓬的頭髮，雖藏著閃爍的銀絲，卻依然黑亮得讓你心動……

上篇：

一、走出僑鄉為學畫，甘赴敵後為中華

廣州，中國最美麗的南國都市。1938年春夏之交，彼時彼地，在她爛漫的叢叢花海裏，在她永遠熙攘的人群中，天天都在響徹著抗日衛國的呼聲。

蓋因為國民政府率軍堅決抵抗——平漢、平綏、津浦三線的頑強防禦，早已使日軍西進和南下的戰略企圖歸於煙滅；淞滬大戰中，“與天地同浴血”的中國軍人，更是破滅了日本妄圖“三月亡華”的迷夢；台爾莊戰役的血色壯歌，不僅鼓舞了全中國人民抗戰衛國的勝利希望；徐州五十萬大軍的神奇戰略突圍，也已讓日本帝國的皇庭痛心扼腕……。彼時，武漢會戰剛剛打響，一場保衛大武漢的民族戰爭，正打得硝煙瀰漫，血肉橫飛——我大中華民國的對日前期抗戰，在打掉了侵略者的驕狂、霸氣和對“速勝”的切望之後，正處在就要轉向“持久戰和消耗戰”之偉大戰略的關鍵時刻。

誰能知道，這同樣也是一個愛國青年的生命轉折點呢？在那些歲月里，又該有多少中華兒女，因為這場衛國戰爭而改變了自己人生的命運？

麥非，這個來自廣東台山僑鄉的英俊少年，這個在幾年之前就考進了廣州美術專科學校、並在短短的四年裏就畫了三萬張人物速寫的勤奮學子，他還在學生時代就已經在當時中國的“藝術之都”——上海不

斷發表作品，還連續兩次獲獎，已經被美術界稱為青年畫家……

那一天，剛剛參加完畢業典禮的麥非，正攀援在街邊那株大樹高高的樹幹上，將他和同學一起製作的通街橫幅，懸掛在東山的街頭，通紅的橫幅上就寫著“堅決抗戰保衛大武漢”幾個若大的藝術字——那可是麥非的手筆。

這一帶，是廣州城最繁華的街區，也是民間所謂“東山少爺”們聚居的地方。

未想，年輕的麥非剛剛從樹幹上爬下來，正要當街對著“東山的少爺們”再喊他幾句抗日的口號——他可不是個老實巴腳的角色，一個同學卻跑到他的身邊，對他又急切又有些神秘地說：“葉淺予、葉先生也給你來信了！”

麥非先是一愣，後又一喜，一時間，滿臉的快樂，象是就要在他方正、清俊的臉上化開了似的，毫不掩飾的興奮之情，使他那一對特別黑亮的眼瞳愈加顯得晶亮晶亮的了。“快，快拿給我！”他一把奪過信，臉上突然又閃出些迷糊不解的神情，拿著信的雙手信也象是在遲疑著。等到那位同學小聲告訴他說“聽說葉先生要請你參加抗日漫畫宣傳隊，他給校長也寫了封信，我剛剛知道的——你願不願意？”麥飛晶亮晶亮的眼睛一閃，也不回答人家，卻反問道：“還請了誰？”“聽說還有張樂平、廖冰先、特偉和……”

麥非急不可耐地重複著每一個人的名字，臉上的表情，象是既緊張，又快樂非凡，好家伙！全是有名的畫家，雖然誰都比他大，誰也都比他有名！尤其是葉先生，那可是全國著名的漫畫家啊！他對先生可是崇拜得很呢！雖然自己已經在武漢他主辦的抗日畫刊上連續發表過好幾幅作品了！

他連信都還沒有拆開，沒有讀，就已經無須思索的下了決心：去！這不正是我報國的好機會嗎？

他攢著那封依然沒有拆開的信，飛快地趕回學校，去找他的校長去了。他還想知道得更多，還想校長能夠了解他更大的決心……

剛剛畢業的他，雖然就要“離開珠江上長江，告別僑鄉上戰場”，然而，在年輕人的心頭，卻只有快樂，沒有畏懼；只有興奮，沒有惆悵。就算是深入敵後真的會有生命危險，他麥非，也不怕，更不在乎。

是的，這場戰爭，已經使多少中國人光榮地戰死在戰場上，為什麼別人能死我就不能死？他本該義無返顧。那個時代的中國青年，可是單純得多。

從校長室走出來的麥非，已經鐵定了他的決心。

他離開了僑鄉，離開了廣州，直向著他早已向往的長江奔去了，那“日出江花紅似火、春來江水碧如藍”的江南美景，特別是那正在迸發著鮮血與火光的戰場，彼時，就象是在鼓盪著他心頭已經沸騰的熱血。他那顆年輕的心，早已把台山的母親、美國的父親，還有他們的擔心和掛念，消融在列車那一聲聲尖厲的呼嘯聲中。他知道，前面就是血與火交相迸發的抗戰前方……

麥非生於辛亥之後的 1916 年，生於廣東台山農村的一戶華僑之家。那一年，他剛滿 22 歲。要不是全面衛國戰爭爆發，這位才華初露的年輕畫家，又怎麼能夠不與詩人徐志摩們一樣，同樣擁有一個美麗的“人間四月天”呢？



昔日之雄如今安在

作於抗戰時期

造成這次歷史空前慘劇的納粹黨魁希特勒自食其果，在柏林死於非命。
法西斯首領墨索里尼，也在米蘭被人民判處死刑。如今日本軍閥自知其命不長。

二、日出江花紅勝火，愛恨情仇在畫端

年輕的麥非，懷著一個青年的愛國情懷和一個年輕藝術家的創作激情，甚至還懷著那個時代許多年輕人都曾懷有的“朦朧共產主義理想”，成了抗日漫畫宣傳隊的一員。

麥非和他的抗日戰友、藝術同道們一起，來到了駐扎在敵後江南的國民革命軍第三戰區。

麥非和他的戰友們一起，在第三戰區的幫助之下，南下皖南，北上蘇北，東去福建。他們或沿江而下，或溯江而上，或在炮火之下穿梭，或在青山綠水間挺進……。總之，哪里烽火連天，哪里正在抗擊著日寇，哪里有我們的國民革命軍人在浴血抗戰，哪裏就有麥非他們的身影……

晚年的麥非回憶說，戰爭時期怎麼可能不艱苦？可第三戰區還月月發給他們每人 600 元的生活補貼，比帶兵打仗的營、團長們都不差些，生活根本不用愁。

晚年的麥非還回憶說，那個時候，雖然生活在國民黨的軍隊之中，可是他想畫什麼就畫什麼，想怎麼畫就怎麼畫，想辦一個怎樣的戰地畫展，所有的畫，都用不著“送審”……，國民黨還是和共產黨太不一樣。

晚年的麥非非常動情地回憶說，他整整在敵後辦了十四次個人畫展——這在 1949 年之後，可是他連想也不敢想的。而每在敵後辦一次畫展，他都要深入淪陷區一次。爲了親眼看見淪陷區人民的生活，爲了親眼目睹日寇如何蹂躪我同胞，爲了在他的筆端能夠凝聚著淪陷區人民的苦痛和敵人的殘忍，他曾多少次化裝成“良民”，穿梭在敵人寒光襲人的刺刀尖下。他說，不要以爲漫畫就是讓人看著笑的，那笑裏含著的還有愛和恨，情與仇，就不用說，更包含著每一個愛國的中國人，都深深埋在心底的家仇和國恨……

晚年的麥非只要一說到他在敵後辦畫展，他都會情不自禁地將屯溪的明山秀水，黟縣的綠水青山，黃山的峻嶺奇峰，還有那怒濤般翻滾的雲海，形容得令你心跳。特別當他回憶起哪些山山水水的風采豐姿時，他都會告訴你，他每在敵後辦一次畫展，都要畫幾幅當地的風俗畫，將當地的風土人情描在紙上，印在心裏。當地的女孩子和年輕人因在他的畫展上突然

發現了自己，而開心不已。他說，他的畫，大約正是浸透著當地的民風民俗，也浸透著他對祖國山河、江南山水的深愛至情，才使敵後的鄉親們感到親切和美好吧……

晚年的麥非特別地回憶說，國民黨在重慶的中央日報，曾整版整版地發表過他的那些抗日漫畫；身處皖南黃山腳下的地方國民政府機關報——安徽日報，也曾一次又一次地爲他主辦過抗日漫畫展；1942 年在莫斯科舉辦的“中國抗日畫展”上，也曾高高地懸掛著他的五幅若大的漫畫作品；這在當時的中國畫家中，他大約也是最幸運的了。然而，這在 1949 年以後的中國——他也曾爲之賣過命的紅色中國，就只能是一個“荒唐”的夢……。他說，當時，雖然我也是一個左傾青年，對國民黨總有些看不順眼，對共產黨總覺得他很有希望，但是你要說國民黨不抗戰，那不是事實！

老人說這話時，目光顯得十分的堅定，臉色也顯得相當的凝重，還有些若有所思的形狀。他說，抗戰是國民黨打的，打的很慘，打得也很激動人心……聽得出，他的話裏，就象是藏著一種說不清楚的揪心感覺……

也許，日出江花紅勝火的江南美景，國民革命軍拼死衛國抗戰的愛恨情仇，當時雖凝聚在他的畫端，只怕至今仍然恍惚在他的心頭，更夾雜著絲絲對人生的感悟和對自己的感傷吧……。

三、千古奇冤真亦假，上饒惹上是非身

當然，老來的麥非，在他已經達到“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另一番人生境界時，他對自己的藝術和人生，自然也就懷著幾分能夠說得清楚的清醒和覺醒了。

麥非身在的抗日漫畫宣傳隊屬於重慶國防部三廳管轄，三廳的主任是郭沫若。

郭沫若不僅是著名的詩人，還是魯迅死後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旗手”。這可是 1939 年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決議”——一個多麼可笑和荒唐的決議！

所以，郭沫若管轄下的國防部三廳，雖然明爲國民政府領導的抗戰作宣傳，卻暗爲“假抗戰、真擴

張”的共產黨招兵買馬；更要在文化戰線為未來的內戰奪權做準備。為此，他們就在宣傳抗日的幌子之下，半公開、半秘密，半地上、半地下地將共產主義思想的觸角，伸向了中國的文化界，特別是伸向了一批又一批志在報國、卻又渾然不知“延安絕非西安”的年輕文學家和藝術家們……

也是在 1939 年之後，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開始了最艱苦的相持階段：國民革命軍為堅持抗戰正在組織一次又一次的大型會戰，正逼迫著侵略者不得不陷入著名的“中國泥淖”之中……

彼時，不論是在大中華民國孤獨地堅持著反法西斯戰爭的艱苦歲月裏；還是在珍珠港事變發生，大中華民國的衛國戰爭已經和全世界的反法西斯戰爭連成一體以後；甚至是當盟軍在歐、亞戰場都節節敗退的早期失利局面中；大中華民國的國民革命軍——不含共產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都在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的血和肉與侵略者拼殺，誓死保衛家國……。如是，1940 年以後的英國《每日電訊》報，才會在報導我長沙大捷的時候，感傷而又激動地寫道：“唯有在中國長沙的天空，華軍勝利的煙雲光彩奪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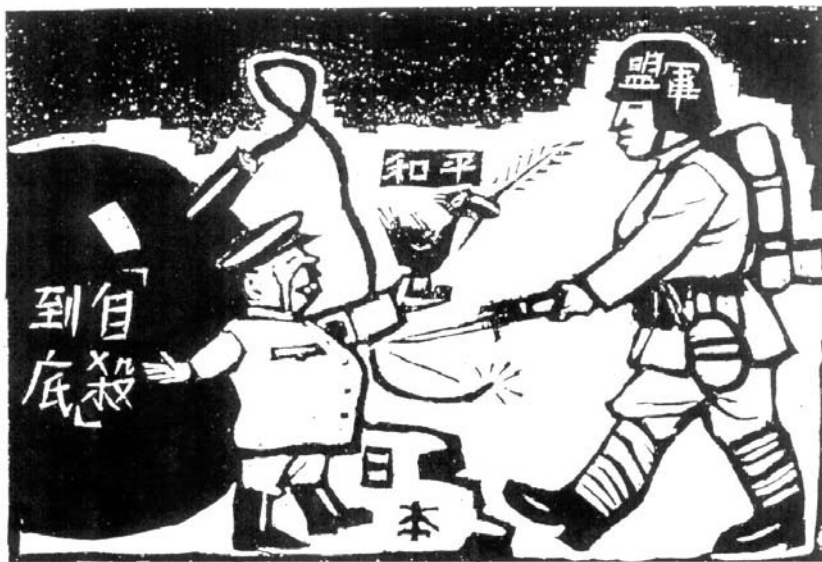
然而——用共產黨自己的話來說，1939 年之時，“中國共產黨已經領導著五十萬大軍活躍在敵人的後方”了；1939 年之後，共產黨就更是“只有後方，沒有前方”了！而“高喊抗日卻游而不擊”、“專打國軍卻不打日軍”，也已經成了他們的家常便飯了！

在毛澤東“要讓日本人多佔地、共產黨才能多佔地”的“抗日總方針”之下，在共產黨已經有了相當的“家底”之後，更在“共產黨在遠離日寇、在向國軍防地異動、在大種鴉片準備內戰、在和淪陷區的日本軍隊做鴉片生意”的消息，已經不脛而走，引發了國民政府和國民的巨大憤怒之時，共產黨和毛澤東又在“反擊第二次反共高潮”的號角之下，製造了所謂打擊“國民黨頑固派”的“革命理論”——由於他們一口咬定說，“今天還在領導抗日的國民黨頑固派”，“將來一定會投降”，所以，毛澤東遂將一道道“打頑”的

命令，發到了他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指揮員手中，指示他的黨徒們說，“蔣介石的最高統帥部要你們向東，你們就要向西；要你們向北，你們就要向南”，——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任務就是要“多佔地”，以在“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的幌子下，篡立他們的共產黨政權，藉抗戰來繼續分裂中國……。1982 年曾內部出版、2005 年已“巧妙”出版的《延安日記》——莫斯科駐延安記者佛拉基米洛夫的回憶錄，已經詳細地記錄了中共賣國通敵、甚至大種鴉片以準備內戰的種種不堪行徑；而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裏面，就更是清清楚楚地記錄著毛澤東和共產黨們抗日時期的種種“革命罪行”……

所謂“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皖南事變，就是在這種政治背景下發生了。事變就是在不抗日的共產黨新四軍已經打夠了正在艱難抗日的國民革命軍之後，國軍才揍了他！——當年新四軍軍部所在地——安徽皖南涇縣茂林村的鄉民們，後來對下放到他們那里的倒霉紅衛兵們說道。

老來的麥非——那場事變的歷史見證人，證實了



粉碎敵人的和平攻勢

作於抗戰時期

茂林的老農們沒有撒謊。他在接受採訪時，似乎是喃喃自語地說，“那時，我知道新四軍常打國民黨，我知道”；但是，他也說，“那一次是國民黨狠狠地揍了新四軍……”。老人說得若有所思，似乎他至今仍在對當年那個“千古奇冤”的真與假，感到困惑與迷

惘……

然而，那時，年輕的麥非卻萬萬沒有想到，他居然因皖南事變的發生，而惹上了一身的是非。

因為，皖南事變終於驚醒了重慶的最高統帥部，也驚醒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共產黨在幹什麼，雖然

——當然，他不知道，他後來的厄運，卻因此而埋下了“禍根”。

年輕的抗日漫畫家麥非，唯其有著對共主義的本能傾向，對共產黨的天生好感，和對一位同鄉同學同道的共產黨的真誠同情，才會因為皖南事變，惹上了一身的是非。



[你在中國搶有什麼回來？]

[..... 就是這件東西。]

作於抗戰時期

已經明明白白；郭沫若的第三廳究竟要藉宣傳抗日做什麼，似乎也已經清清楚楚。而第三廳里面究竟有多少共產黨，主管的國防部也不能再不與問。一方面，國民政府還要堅持對外和對內的團結抗戰路線，不宜大動干戈；另一方面，若再不“限制”出賣國家、破壞抗戰的“異黨”，不僅抗戰的勝利前途、甚至大中華民國的前途都有可能被葬送……。於是，新四軍建制不變，但是皖南事變的真正禍首葉挺諸人，還是被送上了國民革命軍的軍事法庭；第三廳的建制雖不撤銷，但暗藏著共產黨人的抗日漫畫隊等，卻要受命解散……

年輕的抗日漫畫家麥非，因被查明不是共產黨員，才被突然提升為抗日漫畫宣傳隊的隊長。然而，他的任務，卻是宣布解散抗日漫畫宣傳隊；他自己則被留在第三戰區，不僅照樣畫他的畫，而且官拜少校

少其告訴他說，他在劇中也有一個角色，所以他還是有機會……

老人的話，使採訪他的晚輩深以為然。因為，這位晚輩曾於八十年代初就參觀過上饒集中營。當時，他和領著自己去參觀的那幾個年輕軍官，曾對當年國民黨的牢房居然管理得如此的松弛，而大惑不解；尤其對國民黨居然還在他們囚禁共產黨人的監獄裏，設有文化班、體育班、文學班、象棋班和戲劇團，而感到無比的新鮮。至於說到國民黨監獄里面還曾有“獄卒要向政治犯們敬禮”的規矩，那就更加令所有的參觀者們大為吃驚了。要不是近些年來，人們多少已經能夠看到一些記實報告，說“七君子、八君子”們在國民黨的牢房裏居然還能夠“一邊飲酒誦詩打麻將，一邊破口大罵國民黨”，並有照片為證，也許，中國人至今都會以為那不過是天方夜譚，是在給“國民黨

反動派”們涂脂抹粉呢！

然而，賴少其們，還當真藉在小鎮上演戲，而逃之夭夭了。

然而，就在他脫逃前一天去探望過他的麥非，卻因為他的逃跑，而惹上了偌大的麻煩。

中統的逮捕令下來了，他們懷疑賴少奇的逃跑，與麥非有關。因為，就是在麥非去上饒集中營探監之後，賴少其才突然逃掉的。

這一回，該輪到麥非“逃跑”了。

麥非眼見第三戰區那個姓丁的特工，看他的眼神全變了，他心裏不覺一驚。

那一天，他再不敢回到住處，只托朋友取來自己需要的東西，茫茫然地走上了他的“逃亡之路”。

然而，只因為他是一個有名的抗日漫畫家，國民黨很賣力地為他宣傳過，更為他舉辦過好多次很有影響的畫展，所以，他才忽然想到，要跑到江西去，乾脆就去景德鎮，他早就想去那里了。於是，他便去找國民革命軍第五十軍的軍長田新武將軍，說自己要到景德鎮畫畫。田軍長一聽就說，正好五十軍有一個師就駐扎在景德鎮，並且那個師的師長恰巧開完會就要趕回景德鎮。軍長還說，反正你麥非只要給他畫一張像，他保準會好好地招待你！

這對於正要逃跑的麥非，豈不是正中下懷？於是他就跟著那位對他熱情得不得了師長，和他的隨從們一起上了竹筏，順著一江的春水，迎著兩岸的青山，飽覽著江南的秀色，來到了中國著名的瓷都——江西的景德鎮，還在張燈結彩的歡迎之下，坐上了師長大人專為他接風洗塵的酒桌。江西老表們對他的那一番熱情，五十師的官兵們對他的那一份尊敬，居然使他這個在逃的共產黨“嫌犯”，享受到了一番又一番盛情的款待。他以在逃之身，居然就徜徉在贛中的紅土、青山和綠水之間，游逛在贛東風光古樸的小鎮

上，那光溜溜的青石板小街，那翹檐破月的老屋，那憨實的江西男人和俊俏的年青婆姨，就不說中國瓷都那些身懷絕活的瓷工們……就又都成了他筆下多姿多彩的藝術形象。他畫了足足兩百多幅哇！他早年在校的功底，使他在素描、水彩、油畫、人物和山水等各個方面，打下了扎實的基礎，他的畫路之寬，常令同



道們感嘆不已。

一年之後，在江西曾“樂不思皖”的在逃漫畫家麥非，當他知道中統的特工已經復命交差之後，便又回到了皖南，回到了第三戰區所在地。第三戰區的前線日報又收留了他，而他還是畫抗戰漫畫，編抗日報紙的畫欄，照樣辦他的個人畫展，他的畫照樣經過重慶被送到了莫斯科……好象，那會叫他心驚肉跳的一切就象是全然沒有發生過……老來的麥非說，那一次幸虧是在國民黨的手裏，要是共產黨，他早就完了……！老人說這話時，不覺哈哈大笑，他是真的幸運啊，雖然這幸運之星，絕不會在變了天之後的麥非頭頂閃爍。

四、單騎渡海闖台灣，孤身遭遇二二八

重慶的中統局雖然沒有忘記漫畫家麥非，但是在皖南的麥非還是活得挺自在。他不但因第三戰區前線

日報總編輯的介紹，到盟軍部門去工作了；而且還娶了一個俊秀的皖南女子，不久便生了一個漂漂亮亮的小女兒。衛國戰爭的連天烽火，使他成了一位卓有名聲的抗日漫畫家；皖南的明山秀水，卻使他成了家也安了家。

然而，畫家的腳是很難在原地踏步的。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他麥非，卻是要“行萬里書，畫萬張畫”。從歲歲花叢的南國，到春花如火的江南，何止是一方水土一方人，對麥非來說，也是一番天地一番畫呀！

麥非在皖南迎來衛國戰爭的勝利。勝利的興奮和快樂豈但正鼓舞著他依然年輕的心，而且使他對那一片皖南的青山綠水不能滿足了。只因他聽說國民革命軍第 208 師要勝利接收台灣，便忽然動了心——他也要到台灣去，就隨 208 師一起去，他本來就是軍中的畫家嘛！彼時，他跟年輕的妻子整天談的都是台灣，都是阿里山那白雲飄繞的秀峰，都是日月潭的那幽清見底的泉水——妻子聽他描繪得那麼美妙，說他就像是早就去過似的。

那年頭，當畫家的，做作家的，真是想去哪里，就能夠去哪里。就不說麥非還有著那份抗日漫畫家的名氣了。他果真拖家帶口地趕到了福州，隔著海，就象是能夠望得見台灣島呢！

一到福州，他居然就找到了一個軍中的劇團，這劇團要隨 208 師去台灣接收。

就是在福州，他才忽然聽到內戰之火已經罪惡地燃燒起來了。那時，麥非就象許多中國人一樣，以為是國民黨要收拾共產黨。殊不知，就在日本宣佈全面投降的當天晚上，自十點整到第二天下午兩點整，毛澤東就已經在他延安的窯洞裏，以延安總部的名義，命令他八年來“養在深山人不識”的幾十萬軍隊，沖出深山，沖向平原，直撲華北，借搶奪受降權，開始大打已經投降的日本侵略者，更開始大打趕來受降的國民革命軍。抗日名將馬步芳軍隊還沒有趕到受降地點，就已經被共產黨的八路軍消滅了三千餘人；在山西，正在等著國民革命軍受降的日本降卒三萬人，只因為遵守中國國民政府的受降令而不向共產黨投降，竟全部被共產黨消滅……平漢路、津浦路被共產黨炸了、扒了的消息天天傳來，黃河、永定河、子牙河被共產黨挖開決堤的惡耗不斷——共產黨

僅僅是在日本投降不到一個月的時間裏就槍佔了 200 多個縣、市，這些，都明明白白地記錄在毛澤東一道又一道發動內戰的命令裏，記錄在“光輝的《毛澤東選集》”裏面……

208 師奉令被派上了內戰前線，漫畫家麥非要隨軍去台灣的願望頓時煙消雲散。

然而，駐防福州的憲兵八團卻要去台灣，而正在劇團幫忙搞美工的麥非，卻恰巧結識了八團的團長，剛答應要給他畫像。於是，團長便安排他免費乘船到了台灣。他可是“不到台灣心不死”，只帶走了妻子，卻把孩子留在了福州，交給人照看。

剛剛收復不久的台灣，一片亂象。攜妻赴台的麥非，先找到陳儀部的青年軍，住進了該部宣傳委員會的旅店。他開始興致勃勃地畫那些撤退日軍，畫他們投降後飄零返鄉的淒涼景象。可是，沒有多久，他倒弄得比敗軍們更淒涼了——宣傳委員會撤了，青年軍也奉命調走了，他突然變得無家可歸、無飯可食了……在台北的街頭，他和妻子幾乎整整餓了三天。幸虧他畫的那些日軍撤退的漫畫，三天後終於被《新生報》的老板看中，不但拿到了一筆不小的稿費，而且就此做了《新生報》的編輯。麥非又有飽飯吃了，又能夠自由自在地畫他的畫了。

時來運轉的麥非，還有了他樂意的工作，甚至還開始走俏——他沒有想到《新華日報》先是暗中向他約稿，要發表他的畫；後來乾脆也聘他做記者，使他轉眼間便有了兩份薪水和稿費。他樂得全付身心都投入了工作，連何時把孩子也接到台灣來，他似乎連想都沒有想過。

麥非幸虧沒有想。因為，對岸，內戰已經打得血肉難分；台灣，也突然間就鬧得不可開交。看似街頭的一件小案，卻於轉瞬之間就釀成了“二、二八”慘禍。當然，那個時候的麥非不可能知道，今天的台灣島也“不想知道”，其實，那不過是共產黨為了在毛管區打內戰，卻又要在蔣管區反內戰——以配合他們正在大打的內戰，便在 1947 年初發動了第二場反蔣反美的學生運動和群眾運動，用共產黨史家的話來說，這個運動可是有力地配合的“我黨”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呢！而“二、二八”，恰巧就成了共產黨要燒掉台灣的那一點火星罷了！只要再聽一聽毛澤東在當時延安電台的廣播講話，只要再讀一讀當時延安解放日

報所發表的社論，就可以知道共產黨和毛澤東是怎樣在支持、指揮和領導著台灣“二、二八”騷亂暴亂的，又是怎樣直言不諱地“以支持台灣獨立來反對蔣介石反對國民黨的”！

麥非傻了。麥非不僅當時就傻了，而且直到今天，他甚至象是更傻了。因為，在畫家麥非老人的記憶裏，“二、二八”發生後，台灣島上到處在趕殺著的可是“外省人”哪！全不像是現在台灣人說的這樣！台灣那當口，凡是不會說台語——中國閩南話的，誰不嚇得個渾身哆嗦，甚至屁滾尿流。剛剛在台北過了幾天好日子的麥非，甚至正在樂不思蜀的麥非，做夢也沒有想到，他那滿嘴的“老廣”話，要是一旦被“老台”們聽見，他就會死得很慘，他已經親眼看到多少外省人橫尸街頭了！

可是，所謂吉人自有天相的話，又在麥非的身上應驗了。因為麥非做編輯的《新生報》，原來是台獨報！現在竟成了“二、二八”的指揮部。而他就住在《新生報》的集體宿舍裏面。他不覺想起了一句哲人的話：最危險的地方，往往就最安全。可是

最安全的地方，不僅讓他感到別扭——他可是反對台獨的，而且，當“二、二八”誘發的暴動，已經被台灣的共產黨謝雪虹們鬧騰得殺氣騰騰、天昏地暗之時，一天傍晚，幾天來一直躲在《新生報》集體宿舍裏死都不敢跨出去半步的麥非，竟或然聽到了樓外幾理哇拉的台灣話，居然就直逼著向他住的這棟樓傳了過來，那聲音越大，他的心就越抖得厲害，就不說他還依稀聽見了駁殼槍拉保險的聲音和老台們的陣陣吆喝聲。此刻，他的心已經吊到了嗓子眼上，整個樓就只有他麥非夫妻倆人和走廊頂頭沒有外出的那一家，

其他人可都跑出去干台灣的“民族革命”和“獨立革命”去了……他嚇倒得連房門都沒有插上也一點不知道。

然而，就在這時，卻突然有人悄聲地、卻又是急切地推开了他的房門，進門就扑咚一聲朝他跪下，雙手朝他頻頻作揖，滿嘴裏都在哀求麥非能夠救他一命——他可說的是外省話。

麥非傻了，妻子呆了。不救他，他們可都是外省人；救他，萬一引來了那些正在追殺他的本地人，豈非是天降的橫禍就在眼前！

做妻子的已經不知道如何是好，就象是已經站立不住，正往下蹭呢；麥非雖然心跳得就象是要頂到喉嚨眼上，可他還是情急生智，一把拉起來人，也不說話，就把他拖到了屋後的廚房裏面，讓他藏到了碗

櫃後面。待那人已經哆嗦著藏好時，麥非已經聽見那伙人闖進隔壁的人家裏去了，

幸運的是，那些他聽不太懂的閩南話，在走廊頂頭的那戶人家理鬧騰了片刻兒之後，終於揚長而去了，麥非的家他們根本就沒有來搜查。後來他才知道，原來

是走廊頂頭的那戶台灣人曾告訴那伙人說，這是《新生報》的宿舍，都住的是自己人，查什麼查？又有什麼好查的？外省人麥非又逃過了一劫，還救了另一個外省人的命。真是吉人自有天相。

大吉大利的麥非，此後算是在台灣消停了不到兩年。這兩年，也是他的創作頗獲豐收的兩年。雖然經歷了“二、二八”的洗劫，他還是象一個雖受了傷卻又迅速復員了的少年，繼續在煥發著他的創造精神。因為，比起彼時大陸的滿天烽火，遍地狼犬，台灣島就算是一個安寧幸運的寶島了。特別是對畫家麥非而



麥非的水彩畫：福州海灣 1946

言，他無須躲避戰火，無須到處流浪，更無須擔驚受怕，而是消停地做著編輯，當著記者，一心一意地畫他的畫，情緒飽滿地搞他的創作。他甚至還能環島而遊，畫下了二百餘幅水彩、並被大師張大千譽為“麥非的作品是富於民族風格的，他的勾勒用線是中國畫式的，只是使用材料與工具不同而已……”。

然而，麥非的這些水彩畫，雖然飽潰著台灣的美、台灣的情、還有畫家自己對台灣的愛，卻在後來被共產黨燒成了一堆堆斷魂的紙灰，慘淡地飄舞在文化大革命開始的血腥歲月裏……。而麥非在台灣所畫的一幅題名為“同心協力”的巨幅漫畫——只因“無幸”被麥非帶回大陸，後來竟為美國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所收藏。這幅畫描繪的是當時台灣參議會全體議員和省主席魏明倫共 29 人的漫畫群象，畫中人，個個姿態各異，微妙維肖，將台灣民主制度的雛形活靈活現地表現得力透紙背——它有命被保存在異國他鄉，卻無命回歸家園，這到底是這幅漫畫的幸運，還是畫家麥非和我們中國人自己的悲哀？

兩年的台灣歲月，雖然是畫家麥非人生中難得的美好歲月，但是，俗話說，逃得過正月，逃不過十五；在麥非而言，則是逃得過台灣的“二、二八”，卻逃不過正在大陸兵敗如山倒的國民黨。因為，當年那個眼看就要丟掉大陸、只能棄人民於水火的“國民黨反動派”，為了求得一塊日後還能夠卷土重來的土地，他們看上了台灣島；同樣也是因為歷史曾給予他們的慘痛教訓，他們才決心要在台灣清除他們早該決心清除的赤禍——雖然他們的後人今天已經在爭先恐後地投降著……

麥非又該倒霉了，又要逃難了。因為中統通輯麥非的文件終於追蹤到了台北。

抗日漫畫家麥非，雖然是抗日有功，卻當真是在劫難逃嗎？

（待續）



紀念詩人楊春光



開啟為民請命詩歌時代的勇敢先鋒詩人

鄭 貽 春

——簡評鄭貽春詩集《詩歌時代》和《黑太陽時代》

楊 春 光

剛剛被中共“以言治罪”秘密抓捕的我親密的朋友鄭貽春先生，他不僅是一位大家都熟悉的大陸網路政論家，同時他還是一位鮮為人知的大陸先鋒詩人。他不僅是一位當代網路上思想活躍豐富、著述雄厚的政治思想理論家、現代化學者，同時也是一位才思敏捷、勇敢先鋒的前衛詩人。

他被捕後被警方從電腦裏調出 600 多篇文章，其中有近一半是詩歌作品。除他著述浩繁的政論文章外，光他在大陸出版並由我作序的後政治批判詩集《大陸架的命運》和《洗腦時代》等就已八部，總計有 300 多首詩。可以說，在他自 2003 年從國內《漢語文學》網站轉移登陸海外自由網站開始大量發表批判和揭露中共極權謊言的政論文章以前，即在國內印刷時代的鐵版一塊的黑鐵環境下，主要是以創作詩歌藝術先鋒形式來批判中共極權中心話語、揭露共產專制謊言的。如果說他的政論寫作是批判和揭露共產極權統治文化的理性抽象工程，而且這項工程只有在海外自由寬鬆的互聯網上通過“自由之門”得以有效進行與完成。也就是說，他的詩歌寫作也是揭露和批判共產極權霸道文化的形象思維工程，而且這項工程也的確是在國內從印刷時代到網路時代的中共都一直嚴格以“敏感話題”限制的紅色恐怖下還能有效破禁的必須方式。因此說，鄭貽春是以他的兩項並舉的方式對中共的反動體系和所有黑暗領域毫不妥協地進行勇猛直前的決戰的傑出民主自由鬥士。

下面，我就鄭貽春在形象工程方面的卓絕貢獻，並以他最後在大陸出版的《詩歌時代》和《黑太陽時代》這兩本詩集為背景而簡以評價，以饗大家在這方面對他研究的可能缺憾。

《詩歌時代》和《黑太陽時代》是於 2002 年同時出版的兩本詩集。這兩本詩集可堪稱是鄭貽春繼《大陸架的命運》與《洗腦時代》這一雙胞胎詩集出版之後的又一雙胞胎詩集的新誕生。在不到一年之內生了四胎即兩個雙胞胎，這在詩歌生產出版史上都可算是奇跡，尤其在當代能夠製造出這樣的詩歌蘑菇雲現象，實乃非鄭貽春莫屬！這是在當代中國大陸詩壇又由鄭貽春一手策劃爆炸成功的無比威力的雙柱體氫彈蘑菇雲，由此在當代一片陽萎的詩歌沙漠中永遠升起了令中共極權統治者膽戰心驚的核子試驗“蘑菇樹”！這不啻是鄭貽春蓄心積慮地製造的詩歌“陰謀”的大勝利！！在當今犬儒盛行、萎靡不振的一片疲軟的詩壇上，他（它）的橫空出世，是已經代表了後極權時代的公共知識份子詩人開始走向時代的最前沿的話語現場開始獨立講話了，並以知識份子詩人所握有的天然藝術話語權力開始向時代和當下現實勇敢說“不”了——即以詩性的政治批判，批判腐朽沒落的專制暴政體系；以詩性自由語言，揭露黑暗垂死的暴力統治。如果這樣的勇敢前衛詩人再有十幾個、幾百個、幾萬個，那麼就會定然形成足以粉碎和必定爆破共產極權統治基礎的巨大衝擊波和無可阻擋的毀滅力。請問現在還能有幾個這樣“歹毒”、這樣連續性轟炸、這樣令一些人恐怖也令更多人歡欣和鼓舞的“詩歌蘑菇雲”現象呢？！

毫無疑義，這對新生的雙胞胎（《詩歌時代》與《黑太陽時代》）較之前一對雙胞胎（《大陸架的命運》和《洗腦時代》）來說，無論從形式到內容都更為一致、長相也相差不多、脾氣屬性幾乎沒有多大的區別，命運臍帶也難以剪斷，因此這是絕對一脈相承的姊妹篇。也就是說，《詩歌時代》與《黑太陽時代》血脈和衣鉢幾乎完全相承、難分軒輊，不僅提襟見肘，而且幾乎胼體出乎左右、一往無前，亦使其在平面化解構政治中心權力話語寫作向度的平原上，突兀地出現了可說具有雙刃鋒芒的聳入雲霄的雙劍峰。為此，我對文本的寫作主旨方面的評價意義，僅可參照前一文本對《大陸架的命運》和《洗腦時代》的批

評是論，這裏不予重複。

這裏我所要特別說明的是，《詩歌時代》之所以命名為“詩歌時代”，則命名的緣由來自這樣的意義。因為它與它的姊妹篇或曰同胞者《黑太陽時代》有所不同的是，它集中寫就了鄭貽春的新的烏托邦的詩歌理想，和由此創造變構的種種詩歌事件。其理想有如新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其事件有如新的金斯伯格的當年垮掉一代們的種種怪聲鬼氣的“嚎叫”；這看起來不是不可思議的，就是讓人親臨現場卻也不免膽戰心驚；這聽起來也不是不可順耳的，只是讓人置身其中就會難以讓人與他同樣同時地付出不具艱險的不共戴天的自我犧牲代價罷了。這就是真的詩歌時代、真的理想詩歌蘑菇雲、真的爆炸和核子試驗成功者路，也是真的猛士面對腐敗的現場所進行的先鋒詩的衝鋒與拚刺的開始。儘管可能他在探險的詩歌遺路上走得過於貧乏或頻繁，使詩的藝技枝蔓過於蔓蕪了些，許多重複的主題和用得單調乏味的錯位排比形式，也給人實驗性過濫的感覺，但經過修刪之後的精華和主旨還是讓人耳目一新的，或者給人唯有新生的則難免紕漏的可愛，尤其在整體上可堪稱是對真正詩歌時代的籲求與創造，是我們寫詩生命族的太陽必須普照的蠻荒之地。

何謂詩歌時代？詩歌時代就是即使在目前專制體制情況下，也能僅僅只是個人獨立行為，而與無法驅從的他人無關，更在體制之外。我們的詩歌時代，正是如此超越所有現存時代而存在的。在我們的詩歌時代裏，我們行使著獨立自主和運用自如的詩歌藝術話語權力，我們並由此充分利用並掌握這一特有的話語權力行使著人的自由權利，我們由之為民請命，為自己藝術自由立法，我們也由之以我們握有的話語權力權威，去對抗並解構一元極權專制政治中心權力活語和因握有行政權力而具有的不可一世的話語威權，我們進而去批判並消解一切為著平面政治中心權力話語的鞏固而賴以生存著的深層歷史結構的霸權主義封建傳統文化。這樣的以消解中心和解構絕對權威權力為主旨的多元共存的遊戲規則著的開放演進的寫作時代，才是我們的正宗的真正的詩歌時代。其次，在藝術形式上，我們的詩歌時代將從根本上打倒古往今來的“詩言志”和“詩緣情”的傳統宮庭大賦模式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詩學時代，力求把一個偽詩學的理性時

代轉變成非理性時代、把一個假詩學的抒情時代轉換成敘事時代。這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鄭貽春的《詩歌時代》給我們大致做出了這樣的描繪和身體力行的前鋒實驗。首先，他的詩基本上撥亂反正了由韓東提出的偽詩學口號“詩到語言止”的嚴重影響，他開始努力落實並有所突破地實現了由我提出的“詩從語言始，到政治止”的詩學戰略口號的構想；同時，他在“不講道理的詩歌寫作”方法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探索和初見成效的實驗，並且基本上開啓了從抒情到敘事的詩學敘述方式的轉變機制。當然，他骨子裏的抒情和說理還沒有徹底擯棄。這樣看來，他即以努力完成的如此形式革命並不像他所努力完成的解構權力話語的內容革命那樣容易；另外，在內容與形式革命的同時，我提出的重要詩學原則“破壞即建設”，也切實在他的詩歌時代裏得到卓有成效的回應和付諸於詩學文本行為的逐步落實。

一個詩歌時代是必須用它（他）的作品見證的。鄭貽春在他（它）的“詩歌時代”裏製造了無數起氫彈爆炸的“詩歌蘑菇雲”事件。如果說他的《詩歌蘑菇雲》見證了“原子彈安裝在詩歌”上的“大爆炸”是“粉碎一切的激情”，那麼就可以說他的《活理》是佐證了“把”犬儒主義“詩人的腦袋扔進去”“再用土一鍬一鍬地填坑”埋成墳的徹底詩歌革命的決心；如果說他的《大陸出版社聲明》是見證了“一律封殺”的嚴酷的對言論自由的圍剿，那麼他的《拐杖在前面走》就是佐證了“那麼，我只能跟隨拐杖/慢慢地走”的民族人被專制權力異化成的只得當順民或當奴才的慣性；如果說他的《眼疾》是見證了“把邪惡的嘴臉看成了善良”的被欺騙了的幾代人的“眼疾”症，那麼他的《雞打鳴》就是佐證了“我把黑暗當光明”的“半夜雞叫”真的“叫出了”人人都是“周扒皮”的以假亂真而假成真的事實；如果說他的《升旗》是見證了“一塊血污的、鮮紅的屍布/覆蓋著中國的遺體”的可怖真像，那麼他的《南巡》就是佐證了“乾隆六次下江南/為的是搞女人”的“皇帝無恥淫蕩的秘密”；如果說他的《稻田》是見證了“無論對於稻穗/還是對於人民”其“削脖肯定是逃脫不了的命運”這一別人不敢言而他敢言的普遍真言，那麼他的《詩歌時代》就是佐證了“更加豐美的詩歌時代像黑色的雄鷹一樣 俯瞰著灰色的人生、俯瞰著黃色的土

地、俯瞰著冷峻的懸崖峭壁以及萬丈深淵”的為民請命的詩人偉大職責和絕決不投降的赴死的犧牲精神……如此“詩歌蘑菇雲”等等。這樣的為人民命運代言、為歷史真像見證的英雄詩歌時代正在向我們走來……我們也應當從鄭貽春這裏有信心走向這樣的詩歌時代！

2005年3月27日於盤錦藍屋子改定

有關大雁塔

組詩選

楊春光

造大雁塔

那一年那一天的深夜
我突然來到大雁塔下
趁四處無人我一手將大雁塔推翻
然後我站在那裏
我就是大雁塔
等太陽出來
人們開始不斷地朝這裏來瞻仰
誰都不發現我就是大雁塔的複製品
他們都不時望著我的頭頂——大雁塔的塔尖
表示了對我的崇敬和高不可攀的神奇感
我也把頭昂得高高、胸挺得筆直
儘量不讓我的頭晃動——不讓我的塔尖歪斜
而把原版的大雁塔徹底地踩在腳下
踩成金色的陽光
連一點廢墟的痕跡都不留
讓它的影子成為我的影子
成為我的一條被我徹底馴服的風景線
就這樣
我並不能站得很久
但我仍然成了人們心中不可動搖的大雁塔
在西安我是大雁塔
我離開西安我把我的影子留下一半
我那影子的一半至今還是那裏的大雁塔

而且我從西安回到盤錦
我又是盤錦的大雁塔
甚至我走到全國的每一處
全國的每一處都把我看成大雁塔
大雁塔在全國隨著我的足跡到處出現
人們都認為西安那個是真的
可有時西安的那個會一夜之間突然不見
有人親眼看見西安的那個已飛到了盤錦
可一夜之間盤錦的那個又座落在南寧
在南寧的那個又來到了成都
如此大雁塔的真偽之案風靡全國
這不僅驚動了國家文物保護局
而且驚動了中央政治局
總設計師和總書記都分別親自下令

一定要限期四小時破案並在即刻下達命令之日起
四十八小時內徹底查處這樁全國最大的首例假冒偽劣
案件

如此紅頭文件下發
全國驚駭、世界震驚
電傳、衛星通訊、新聞媒介迅速追蹤報導
質量萬里行——大眾話題評說、熱點透視
焦點訪談、各大報刊頭條新聞、街頭巷尾
全國上下唏噓、偵破運動波瀾壯闊、席捲全國城鄉各
個角落
從一九六六年發動文化大革命到一九九七年的北京時
間現在時
這個案件尚未偵破、一直懸而未決
我幾次投案自首，向當局有關部門說明
這件案子是我一手製造出來的
我對這件案子負責
但中央不相信
地方也不相信
老百姓一部分親眼見到的相信
大多數都無法相信我楊春光會有這樣的本領

而作為國家公安部門他們則以懷疑為主
以“就怕萬一”的安全為需要
他們三十一年來一直跟蹤我不放

但卻一直不做結案

我成了如此大雁塔
沒想到麻煩也如此之多
而且生活處境越來越艱難
想說明自己真假也不行
想擺脫這種糾纏也擺脫不了
如今市場經濟了
我想我乾脆弄假成真
就像有人可以把長江備用大橋私自變賣那樣
我還不如就這樣把自己變賣而獲得暴利
有了一筆鉅資也好徹底結束我的窮日子
也好把自己寫的十多本詩集及編好的叢書全出版了
這樣也好當一個富翁詩人

我的這個想法剛一形成
還未來得及去找合適的文物商交易
郭沫若就從八寶山跑來了
他請我找他做中間人把大雁塔賣給日本
其好處費是30%提成
其好處費是50%提成
緊接著是毛澤東從紀念堂、楊虎城從渣子洞、魯迅從
魯迅墓、林語堂從林家墳地等
一千人也跑來了
他們推舉楊虎城為總代表嚴正警告我大雁塔賣是可以
賣但不能賣給外國……

正在楊虎城措辭強硬、話音未落之時
我的原本大雁塔電流般迅速而及時地趕到
它站在我和眾人面前高興地說
要想變賣就變賣它好了
它說它才是正牌
它說它以前之所以被我推翻而替代之
那是因為它覺得自己站在那裏太沒價值
所以它才找了我這個替身而自動下野的
現在它有價值了它要重新站在那裏並向世人公開拍
賣……

一件大雁塔的真偽之案就這樣有了終結
我仍然很窮

我畢竟不是大雁塔
我的想像只歸是想像
想像中的我也可以依然存在
正如真正的大雁塔依舊站在那裏

真正的大雁塔是不可變賣的——
我想像創造的大雁塔也不能變賣
一旦你想變賣時
它就不復存在
它就會在眾人面前徒然倒塌

凡詩人創造的大雁塔就絕不可以變賣
詩人創造大雁塔就是創造不可以有交換價值的大雁塔
——
這也就是我造的大雁塔！

觀大雁塔有感

大雁塔

我站在你的腳下
瞻仰你
試圖在你的塔頂找到我的感覺
找到一種爬上去又下來的感覺
找到有好事者執意往上爬去——
可爬不到一半就被釘死在上面的歷史悲劇
找到從遠方匆匆趕來又匆匆離去的旅愁
找到勇敢地爬上去又高喊著跳下來的
自殺者的快慰
找到你從塔腳到塔的最佳仰角
這些都不是我親自走上去又飛下來的情景
因為我至今沒能爬上去
我的角度也只能是一種仰視
我的感覺也就只能是局外人的獵奇
或是一種只緣身在此塔下的近距離觀賞
一種走進了反倒不如遠一點的好——
而離遠了反倒不如走近一點的好奇

現在我是離你遠了
看不見你了
但我的思想卻想真正地爬到了你的頂上去

在你的塔尖上重新俯瞰你的英雄
重新審視我們的歷史和文化
這時的英雄只不過是我的一場夢
歷史文化嚴重點說只不過是我的一次夢遺
夢醒了
英雄不復存在
抑或是歷史上的楊貴妃那肥奶子——
也只是給了我床單上的一灘死精子
那大雁塔在我掀開被子扒掉褲衩時——
它已經陽萎
這事後怎樣讓我勾起對夢中楊貴妃的回憶
甚至專門為她進行手淫——
也無法調動或再勃起我這英雄的快感和挺舉

所以自從這次觀了大雁塔之後
給我最深刻的一點體會就是——
真正的英雄和歷史是靠自己的夢來塑的
英雄和歷史一旦離開夢的支配與創造
英雄和歷史就會自己疲軟
低下頭來——
你拿真實越加仔細看它
它越加蒼白無力

它完全失去了以往的任何說服力
觀大雁塔有感
實際上是觀自己第二生命的有感。

有關大雁塔

有關大雁塔
我以為它就是沒有大雁的塔
大雁自從用肉體和靈魂建造了它
它就一直成為埋葬大雁的墳墓
曾經一批一批大雁落上去
就立刻都死了
（它們被塔上的殘風剝去了羽毛和皮
殘風把它們的心臟和骨頭埋在塔頂上
而把它們的羽毛、皮肉全埋在塔的腳下

這樣來一批就被埋葬一批
一批又一批大雁的血液為大雁塔
刷上一層又一層鮮紅的新漆……)

自此以後
新的大雁不再來了
因此我們的大雁塔沒有了新的血液的餵養
——它開始逐漸陳舊和剝落
塔尖在夕陽中越發傾斜了
它不再像從前那樣年輕而健康

可有關大雁塔
人們總是說還能看見偶有大雁來過
但它們來了只是盤旋一圈就趕快飛走了
也有的人說看見大雁還落了上去
說在塔頂仍有大雁做巢
此類目擊者確有不少
我也是這種目擊者之中的一個：
你想像大雁塔就是大雁的塔
你想像大雁仍然飛來
你就能看見大雁飛來
反過來你再仔細想一想
如果真的有飛來
那大雁塔怎麼會衰老褪色呢？
大雁如今不再來了
大雁在全國也越來越少
大雁在趨於滅絕
大雁如今不會再為一個下葬的玄奘而去
自殺自己的種族了
大雁越來越離開公開場所
大雁要重新回到它們的大自然
大雁正在加緊教育自己的孩子們將如何
徹底地把大雁塔的影子從心中抹掉——
所以目前的大雁塔是孤獨的沒有大雁的塔

有關大雁塔
我要說的就只能這樣

也就只有這樣
沒有別的

所謂大雁塔也就只好成為沒有大雁的塔了
甚至根本沒有大雁塔本身
所有的只是它自己把自己親手推倒的故事。

後記：我寫完這組詩之前還沒有去過西安，更沒有見到所謂
的大雁塔，這就是我寫這組詩的原因——作者

風雨同行

雪莉

不經意的風，
似已吹醒朦朧的愁緒；
我，佇立在灑滿月光的窗前；
心，卻要凝視“執著”在磨難中消去。
猶如那往事前塵，
已在闌珊燈火處化成絲絲煙雨……
修煉——就象在穿越著浪谷波峰，
名利——鎖不住蒼鷹要騰飛天際，
磨難——又怎能將你與信念分離？

就算是電閃雷鳴，
哪怕它風狂浪巨——
如海心懷，
何在乎谷險峰利；
朗朗乾坤，
豈能夠負了師意……
坎坷人園包藏的，
才是改天換地的真經；
我與你風雨同行
倘使你苦修遠去……

2002年12月22日於悉尼



堅持反共防獨，才能夠在全世界範圍內，為追求中國的“民主、統一、和平”而建立一個最為正確和最為廣泛的“民族民主聯合戰線”。這個聯合戰線一旦形成，其結果，一是中共打出的“假民族主義牌”將因此而失靈；二是反華台獨勢力的“假反共民主牌”將因此而失算；而反共在先、防獨在後；民主在先、統一在後；解決中共專制統治在先，追求中國國家統一在後——一言以蔽之，也就是“治本在先、治表在後”的這樣一個正確的大戰略，蓋因它“義旗高揚”，從而必得大陸民心，必轉台灣人心，必結海外僑心，必能凝聚和奮發整個中華民族包括海外華人為愛國而團結反共的偉大民族民主精神。

——引自辛灝年講演錄“民主統一為中華”（黃花崗雜誌第八期）

中華自由論壇（之一）

（該欄文章不代表本刊立場）

台灣的親共潮和的美國的弄潮兒

前世界日報著名記者 李 勇

手把紅旗旗不濕，弄潮兒在濤頭立。

——宋詞

台灣的中國文化大學美國所所長陳毓鈞，最近經常在中共宣傳機器——“中央電視台”第四台出現，接受訪問並分析台灣海峽兩岸形勢。從他的談話中聽出，他對台灣的當權政黨反感，對美國在亞洲的防共、反共政策不以為然，他的主要論點是：美國不希望兩岸統一，不想中國強大。他認為美國協防台灣是為美國在亞洲的利益，台灣不應該充當美國在亞洲的“看門狗”。甚至認為美國催台灣充實軍備是想賺台灣那筆六千多億的軍費。

陳毓鈞對台獨的攻擊，對台灣執政當局的批評，那是他在台灣的言論自由，台灣的政權不可以干涉或禁止，因此海外的華人也不必根據自己的立場來非議他。但是，他對美國政府的詆毀與誣賴，作為一個從台灣出來而定居美國三十多年的華人，不得不站出來為美國說幾句話。

美國政府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就開始密切注意以蘇聯為首的國際共產勢力的擴張，因為這群瘋子打著“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類”的旗號，唆使他們在亞洲各地“信徒”以革命的理由從事顛覆活動，然後以武裝暴力奪取政權，並囚禁殺害他們統治下的人民。由於他們的終極目標與歐美西方揭櫫的自由民主人權有所抵觸，因此美國便以自由世界盟主的地位，當仁不讓地站出來對抗、圍堵，不惜以區域性的戰爭去堵截共產赤流的蔓延。這就是一般人口中所說的冷戰！

自從中共以蘇共附庸姿態君臨中國大地後，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便積極以行動來抵制共產黨的擴張。他們一面與接近中共的東南亞及東北亞的國家結盟，簽訂協防條約，一方面圍堵中共，不希望他們在蘇共策動下破壞亞洲和平。因此，他們出兵打了一場韓戰，後來又打了一場越戰。韓戰結束，南北韓對峙；越戰結束，越共“解放”全越達成“統一”，導致越南逾百萬人民投奔怒海求生，這是美國倉促結束越戰所導致的慘劇，因為百萬逃赤禍的難民，至少有一半

葬身魚腹、死於非命，而在印支境內，則有數百萬人死於“解放浩劫”與“共產災難”中。

美國目睹此種種慘劇發生，更加強了他們的防共政策。他們在中共君臨中國大陸二十九年間，始終不承認他們的存在，也不承認他們代表中國；相反，統治彈丸之地——台灣的中華民國政府則是他們心目中的中國。在那段時間，他們每年均以好幾億的經援與軍援幫助台灣，同時並派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美其名是防止兩岸之間發生武裝衝突，影響亞太和平，其實是保護台灣使台灣的人不至被中共“解放”、“共產”，這才使台灣人民在過去五十六年來享受著安和樂利的生活，並在締造經濟奇蹟後又創造了政治的奇蹟。

陳毓鈞是美國庇護下成長茁壯的一代，假如不是美國仗義護台，台灣很可能被中共“解放”，於是大陸上一切災難性的政治運動便理所當然地在台灣上演。陳毓鈞居然忘記美國的庇護，歪曲美國協防的好意，甚至指責美國爲了自身的利益要台灣做他的“看門狗”，這豈不是含血噴人、恩將仇報？

六千億軍費，相當於美國二百億美金，這樣的數字對美國以數千億美金幫助伊拉克人民擺脫暴政、重獲自由的數字比較，根本就微不足道，美國豈會只爲這區區二百億的美金的利益而要台灣充實軍備。

其實，希望向美國購軍備的國家很多，就連中國大陸也千方百計向美國示好，表示想買美國先進軍備，其所付的代價絕對超過台灣的二百億美金，只是美國不願意賣給他們，因此中共千方百計以走私方式偷買軍火去大陸。過去多年來，美國情治單位破獲了不少類似這種將軍火非法買賣給中共的案子。

中共向美國買不到軍火，轉向歐洲採購，若非中共在六四屠城中濫殺無辜，侵犯中國人的人權，歐洲國家是不會禁運軍火給中共的。最近由於歐洲國家爲了利益想把軍火賣給中共，遭到美國干涉，美國不止一次派人去歐洲勸阻，希望他們不要解禁。因爲中共是一個侵犯人權、不知節制的共產極權國家，絕對不可相信他們，賣軍火給他們會破壞世界和平。這就是歐盟今日仍維持禁令不變的原因！

類似陳毓鈞這種思維的人很多，尤其是反對此刻執政民進黨的人更爲顯著。這些人都有一個特徵——

由於反對台獨而投入共產黨的懷抱，並願意賠上台灣的安全。

最近一家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題目是：“世界日報昔日反共今日鼓吹台灣投降中共打美國”，從這個題目看出，陳毓鈞的同路人在台灣固然多，在國外也不少。正如此文作者“魏眾生”所形容，“世界日報”是“國民黨大佬創辦的聯合報系在海外擁有一個世界最大、影響力最廣的中文民主自由宣傳基地……”

一點也不錯，世界日報一九七六年二月十二日在美國創刊，總社在紐約。創辦人王惕吾是國民黨中央的常務委員，是決定中華民國國策的重要人物；社長馬克任是國民黨資深黨員，屢屢出任“黨和國家”的酬庸性職務；更重要的是，繼任其社長職位的李厚維，更是國民黨大特務李崇詩之次子；而在世界日報工作的人都是在美國庇護下在台灣安居樂業、學有所長的報業工作者。這樣的組合，曾經被中共及其在美國的左傾份子形容爲“國民黨的台灣大本營”，對他們謾罵、打擊不遺餘力。

回憶一九七五年“世界日報”在紐約籌備出版之際，中共方面便指使他們的爪牙對世界日報造謠攻擊，並派人到報社叫罵騷擾，甚至向報社所在地的樓房放火，戳破報社員工汽車的輪胎，派人到世界日報門前拍攝進出者的照片，派人到報社門口示威抗議、呼籲僑胞不要購閱“世界日報”。此刻在香港主持一份新聞性雜誌的左傾份子邱某，就曾經撰文攻擊“世界日報”爲“世界謠報”，並到“世界日報”門前派發請僑胞不要看“世界日報”的傳單。直到“世界日報”從紐約華埠遷到皇后區的法拉盛，左傾份子還是如影隨形跟來鬧事，就連李厚維本人也接到過不少恐嚇性的電話。

某次，有左傾恐怖份子在電話中警告並恐嚇當時世界日報總經理李厚維，說是在“世界日報”法拉盛社址內裝置了定時炸彈，嚇得李厚維悄悄通知了社長馬克任一同離開世界日報到外面避難，兩個小時後打電話回報社發現沒有意外發生，這才返回報社工作。

“世界日報”之所以被中共及其海外爪牙痛恨，是因爲他們離開台灣後繼續擁護中華民國，堅持反共立場。報紙上面標明中華民國年號，對中共及其爪牙在紐約華人社區的活動全不理會，目中全無“偉大、

光榮、正確”的中國共產黨。這已不僅是“反共、反華、反人民”，甚至是國外敵對勢力，必欲剷除而後快。於是，供中共驅策的一群來自台灣的達官貴人的下一代，以保釣英雄姿態乘機為共作伥。他們長期打電話到世界日報叫罵、騷擾，在社交場合碰見則叫罵恐嚇不止，此刻為中共從事“反獨促統”的某左派份子，就曾經是親共陣營的頭號打手，不止一次在公共場合驅趕“世界日報”的採訪記者，借此向中共方面表示他對共產黨的忠誠。

上述共產災難，世界日報嚐了將近十年，直到毛死江囚鄧小平改革開放後才放緩。沒有想到，這樣一份“歷盡劫波”的報紙，此刻竟開始為共張目，變成中共若即若離的同路人。他們自稱那是為了迎合從中國大陸來美國定居的“新移民”，因為新移民把中共政權當作中國，誰反對中共就是反華、是漢奸、是賣國賊。“世界日報”既不反華。又不想做漢奸，更不想賣國，因此只好轉變成親共，為共揚聲，為共辯護，甚至為他隱惡揚善、報喜不報憂，於是黨心大快！民心大快！

那家網站的文章說：“這份昔日愛國反共報紙，民主自由的火炬，已經被中共滲透改造，成為半遮半掩的中共喉舌。”

一點也不錯，中共對付“世界日報”採取“打入拉出”的滲透方法，也採取收買利誘的統戰策略。尤其是中共經濟發展改變了一窮二白形象後，收買利誘的統戰策略召開得更為順利。

對中共來說，每年花千萬美元在海外辦報紙、開電視台，其宣傳作用並不顯著。現在，只需花很少的錢就可以誘使那些在“世界日報”工作的敗類為他們效勞，既經濟又便捷，在上下交征利的情況下，中共的統戰工作展開得十分積極，“世界日報”也就從此隨著他們的指揮棒起舞。

舉例來說，曾經從北京來紐約在中共駐聯合國代表團擔任副團長的中共外交聞人沈國放，就與“世界日報”的社長李厚維關係密切，兩人私下往來頻繁。某次李厚維亡妻王友蘭去世，在紐約法拉盛的全福殯儀館出殯，各界人士前往致祭者不少，名流雲集，兩岸官員齊至，因為王友蘭是聯合報系的大老闆王惕吾之次女。

在整個公祭過程中，沈國放隨侍在側，到了來賓致詞，他是唯一上台致悼詞的人。殯儀館介紹沈國放官銜時，使人以為去世的人是左派陣營中的頭面人物，也是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忠誠擁護者。

多年前，我去北京旅行，在一家日本餐館與美國“華盛頓郵報”駐北京分社社長潘文先生餐敘。他問我：你在“世界日報”做事，知不知道“世界日報”已經左傾親共？我告訴他，“世界日報”並未投共，也不左傾。他說，怎麼不左，從前這份報紙的文字是直排的，用右手向右翻看，現在用左手向左翻看；從前報眉上的年號以中華民國作紀元，現在已改西元，剩下第一頁有中華民國的紀元，但在西元之後。

潘文是一個會說流利中國話的美國人，他討了一個北京女子為妻，但其政治立場明顯地反對中共，對政治動作十分敏感。他最後斬釘截鐵地說：“世界日報已被共產黨收買了！”

我當然不相信這是事實，因為“世界日報”的根還是在台灣，而台灣雖被有台獨傾向的民進黨所統治，但至今不得不標榜中華民國，不得不繼續使用“中華民國”年號。而當李登輝說中華民國不存在之時，“世界日報”還以社論申辯並駁斥李登輝“去中華民國化”的謬論。

大約十年前，世界日報有一個喜歡舞文弄墨的孟姓男子，由於來自台灣，立場反共。某次隨我參加一個中共駐紐約總領館副總領事安排的記者宴會，他在宴會上滔滔不絕地描述台北政壇內幕，談到台灣當局的反共立場，一口一個“共匪”，並強調“漢賊不兩立”的必要性，弄得在場的共幹十分尷尬。之後幾年，他借著宴會上建立的關係與共幹攀交，結果建立了相當密切的交情。某次中共僑辦為了籠絡華文報紙記者，邀請他們去大陸免費遊覽絲綢之路。全程一個月，一切免費，由“黨和人民”承擔。另外還發一筆為數不菲的零用金。孟某接受邀請上路，一個月後回來，就轉變成中共的熱烈支持者，“共匪”變成了同路人，專替中共喉舌新華社傳話，對“世界日報”偶然出現不利中共形象的報導表示反感，告誡編輯應該改正。他在報上發表的文字，跟著中共所指的方向一路罵去；對美國“干涉內政”不滿，其用字之尖銳毫不遜色於中共在美國的喉舌。

除了或明或暗拉攏“世界日報”內的人之外，還派曾在中共喉舌做事的“忠誠黨員”考入“世界日報”擔任採訪工作，在華人社區遊走，對左派僑團吹捧，所拍照片必突出五星旗，避開中華民國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故意歪曲新聞對象的談話，使他們一個個表態熱愛“共產祖國”。

一名唐姓的世界日報記者，就曾經編造謠言，把一個立場反共的同事姓名，經常放在送往迎來的左傾人士及中共官員的名單，使社區認識此人的華人以為此人已經改變，親友之間議論紛紛，迫使此人在報上公開刊登啓事澄清才了結。

前面提到一個在香港主持一份雜誌的邱姓男子，早年曾經到“世界日報”門前示威，在左報上攻擊“世界日報”是國民黨在紐約的特務機關；又在地鐵站口發傳單，要華人讀者停閱“世界日報”。這樣一個積極親共的左傾份子，現在居然攀附世界日報一個駐香港的小編輯，想方設法擠入世界日報的副刊寫一個窮極無聊專欄，不但賺“世界日報”稿費，還轉彎抹角為中共揚聲，並以中立的姿態為台灣的親共份子捧場，並讚揚他們“愛國”的誠意。

上述種種小故事，都是“世界日報”轉變當年跡象，也許因為立場轉變引起絕大多數不喜歡中共政權的華人讀者反感，紛紛放棄看“世界日報”，導致來自香港的星島日報的銷路上升，廣告銳增。再下去，世界日報花了三十年拚搏得來的一點成果，就會丟失在這些人的手上。等到中共“解放”了台灣或美國，他們就會嚐到大陸上中國人所受到的“共產”災難了。

台北某巨奸

鄭文英

不親藍綠只親民，欺人自欺愚弄人，
反復無常謀私利，五莽劉裕與朱溫，
喪心病狂不知悔，禍國殃民狼虎心，
不待蓋棺已論定，千古罪人留罵名。

注：五莽篡西漢，劉裕篡東晉，朱溫篡唐，台北某巨奸，禍國殃民，不知悔改，必貽禍子孫蒙羞。

台灣新黨研究

編者短評

郁慕明 從地下走到了地上？

幾年前，就有大陸人請一位海外民運人士轉信給紐約的兩位新黨大姐，詢問台灣新黨是否“中共在台灣建立的地下黨”。當時，我們都只願意相信，此不過是新黨的某些言行有使大陸民眾誤解者。雖然，新黨近年來過於親共媚共的言行，已經使許多人愈疑愈深，所謂“大陸真好，山也好，水也好、姑娘更好，共產黨最好”的新黨人士名言，也幾乎傳遍海外華人社區。特別是今年台灣泛藍大軍紛紛發起“種種大陸之旅”，風起雲湧，而新黨也當仁不讓，非但黨小而心不小，其種種媚態，較之其它泛藍，有過之而無不及。因此，海內外、包括泛藍陣營內的有識見者，也都在懷疑台灣新黨的來路和本相了。特別是台灣新黨主席郁慕明，在結束了令他興奮不已的大陸“民族之旅”之後，又開始了他的“美國之旅”。蓋因他在“之旅”中，曾極力地用新黨的“真民族主義”為中共的“假民族主義”塗脂抹粉、因而大獲中共嘉許，遂使郁主席久久處在感動不已的興奮心情之中。所以，他一不小心，就將原本只能在“地下”講的，全然地搬到了“地上”。他在舊金山的講演，便是一例。但是，泛藍裏面，畢竟還有很多持正義感者。於是，舊金山的兩位著名泛藍人士，只因“郁主席之言差矣”，還因“骨哽在喉、不吐不快”，尤因郁主席的說法，對泛藍、對台灣中國國民黨，直至對台灣人民和全中國人民，乃是一種禍害，他們才決心做一回紅臉漢子，寫下了兩篇要同郁主席辯理的文章。其中一篇已經在舊金山世界日報發表，另一篇則逕投本刊。本刊遂決定轉載發表這兩篇文章，以饗讀者。更奉勸原本是一心要追求民族、民權、民生之真正三民主義政黨——台灣新黨：切勿做中共在台灣地下黨，更不要做中共地上的花瓶黨，以壞了新黨的黨譽，變了新黨的性質，斷了新黨本該有的錦繡前程……。

郁主席，您此言差矣！

中國國民黨黨員、泛藍大聯盟理事 賴可正

九月上旬參加了郁慕明主席在灣區主持的泛藍講演會，有數位泛藍的立委及新黨的公職人員也都與會。其中，李勝峰、費鴻泰、賴士葆、吳成典等委員們對民進黨執政下的亂來以及產生的亂相有生動的批評、深刻的描述。同時夾雜著無耐的詼諧和努力不懈的鼓勵，獲得台下群眾熱烈的掌聲和許久才能等到發洩機會的叫好聲；郁主席更是風度翩翩，像一位大家長般的介紹諸位委員給所有的來賓，不疾不徐，又非常風趣，也贏得許多的掌聲。

在演講即將結束之際，郁主席因有人提問，把話題轉到兩岸關係上來，當時筆者覺得這應是郁主席想要表達重要訊息的關鍵時刻吧！因為好酒沉甕底啊！

當我聽完郁主席的高論之後，我驚訝得不敢相信，這些媚共的論點是來自我多年一向敬佩的郁主席？沒有錯，世界在變，我們也跟著在變，但總有些立場與原則是不應該變的吧！

郁主席貴為新黨的主席，他的立場與高論，筆者認為應該可以代表新黨及其支持者，筆者非常欽佩郁主席在台灣用以小博大的智慧與民進黨及台獨勢力相抗衡，但是在兩岸關係的大是大非上，實應謹守分寸，保持立場，否則，在最後關頭——黎明即將來到之前，失身於歷史的洪流之中，為億萬人所唾棄，實非明智之舉。下列三點，即是郁主席在台上及台下所發表的大致內容：

第一點：郁主席感慨自從台灣開放政黨政治，民主化之後，亂相不斷，政經失調，為了避免大陸步向台灣的後塵，他當面向中共主席胡錦濤建言，以台灣政壇的亂相為鑒，提醒胡錦濤減緩大陸政治民主化的腳步！

第二點：郁主席認為海外的六四民運組織與法輪功應有美國 CIA 的介入，而中國人的問題由中國人自己來處理，不容外力干涉，造成中國的再分裂。所以他不會支持！

第三點：希望中國共產黨能夠穩定執政，共產黨是大陸安定的力量，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會出大亂子。

郁主席，您此言差矣！放眼天下，包括英國、荷蘭、法國、西班牙、德國、葡萄牙，甚至最近的俄國等西方國家政治發展史，可以總結的是，這些國家都是在民主革命與專制復辟的反復較量中，經歷少則五十年、多則近百年的波折，才在驚濤駭浪中建立起屹立不搖的民主制度，各國人民對民主自由的信心，也就是在這種長期痛苦的試練中鐵打出來的，那裏會有一個一蹴而就的民主成績單？中國百年來的政治歷程，不也是在反映整個歷史潮流的趨勢嗎？因此，中國也必須經過民主與專政反復較量的普遍歷史進程。並且，只有經歷了這一艱難、甚至是痛苦的歷史進程，民主和民主制度才能夠最終地戰勝專制和專制制度。

郁主席，您應該記得，你與趙少康等幾位國民黨內的菁英，因為堅持民主化的改革路線而與李登輝專權下的國民黨分道揚鑣，因此而獲得大批群眾的支持。因為黨內民主是中華民國實行民主法治的基石，而台灣自由民主的成果也成為大陸民主自由的願望。但十數年後，已在野的中國國民黨才以選票完成世代交替，實踐了您當年曾大聲疾呼的理想，雖已為時晚矣！

您說“世界在變，我們的作法也要改變！”但是立場和原則要怎麼變呢？民主自由只有一個標準，那就是“民主自由”並無所謂的“中國社會”的，“西方社會”的不同，若有的話，那只是獨裁者的遁詞罷了！

國民黨在一步一步的辛苦向前邁進，而您卻帶領新黨“快跑式的進入了社會主義祖國的圈套”。

您與胡錦濤有這樣精彩的對話，一定讓胡錦濤半夜樂得睡不著吧！專制與獨裁是共產黨的專長與特色，經濟上的改革開放是不得不為也，否則共產黨能生存到今天？這也證明共產黨有一定程度自省的能力，但若認真研究改革開放的思維及作為，會發現共產黨自省的範疇就還是要退縮到以該黨的生存與安全為主軸，凡是有利於該黨發展的就開綠燈，凡是有害於該黨生存或發展的就禁止杜絕。在這樣沒有民主自由做牽制，任由專制極權來統治的畸形經濟發展，其

弊端就在所難免——腐敗貪污，浪費造假，城鄉分治，一國兩策，貧富懸殊，投訴無門……這樣子的新聞在大陸已經不是新聞了，而郁主席，您難到真能無動於衷、視若無睹嗎？更有甚者，您還要替共產黨出主意，堵住因經濟發展而帶來的民主自由“缺口”？平心而論，共產黨不會因為有了您的薦言就變得更加專制，但千千萬萬的中國人卻會因自由民主的不能落實而記您一筆！這種重責，您擔得起嗎？

郁主席，您在大陸的表態，的確符合胡錦濤與共產黨的期望，但同時也延伸了許多想像的空間。數位原是新黨的菁英，現在成為國民黨的中央委員，筆者仿佛看到中共中央的紅手正要伸進國民黨的口袋裏一樣。這個場景，神似一九二四年，國民黨通過“聯俄容共”的政策，允許中共黨員“個人”加入國民黨的那一段歷史。其結果如何？眾所周知，毋庸再言。現在，看到快速向共產黨靠攏的新黨，而他的菁英又在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且進入了國民黨的核心，怎能不讓人憂心？

郁主席，您說此次美國行有一個重要的任務，就是親赴華府拜訪涉台的美國官員，把現今民進黨執政後違法亂紀、胡作非為的惡行、表達給美方知道，以節制美國政府對陳水扁與民進黨的支持——您自嘲說是“來告洋狀的”。此事原無可厚非，筆者也樂觀其成。但同時筆者想請教郁主席：您剛剛才表示不與“六四”民運為伍，懷疑他們與 CIA 有牽連，而您自己卻要來美國“告洋狀”，是否“請外力介入，以制造中國台灣的分裂”？而且，你是否能夠確定“沒有 CIA 的人士涉入？”

筆者認為，您這種“責人以嚴，律己以寬”的行為，說明了一個問題，可能是郁主席在美麗的憧憬下已經拋棄了中華民國之政黨和政治人物應該堅持的原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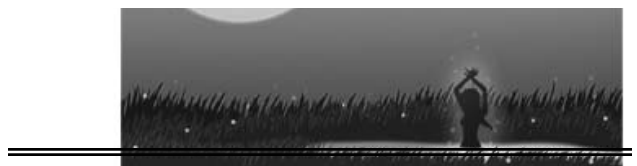
另外，值得省思的是：台上的諸委員在賣力的批評台灣亂相，呼籲泛藍一定要團結，才能在二零零八年勝選，否則絕無機會；但筆者環視上台台下，卻沒有見著一位灣區泛藍大聯盟的理事受邀參加的，其中蹊蹺，也值得深思！

對大部分的中國人（包括台灣人）而言，中國國民黨，他不僅僅是台灣的在野黨，也更是大陸人默認的在野黨；換言之，既然中共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他就必須承認中國國民黨為中國的在野黨，否則，怎麼會有所謂的“黨對黨的談判”。眾所周知，在野黨的天賦就是要以全民的福祉為依歸，以自身的經驗、能力、視野為依據，規劃國家未來的大方向；以人民的利益為前提，宣揚本黨的主張；反對執政黨的錯誤與缺失，爭取執政，取而代之，進而執行允諾的政治支票。姑不論共產黨表現如何，身為中國的在野黨，反對共產黨的專政，準備取而代之，這是中國國民黨天經地義地該替中國人背負的責任。更何況，共產黨在大陸執政五十多年中，倒行逆施，天怒人怨，荒誕銳於千載。反對共產黨的一黨專政，已成為中國國民黨無可回避的天職。

幾年來，台灣年年向聯合國叩關，也年年壯烈，屢敗屢戰，勇氣可嘉，究其失敗原因，大部分的會員或都投了反對票，為什麼多數投反對票？誰願意得罪作為常任理事國的中國及執政的共產黨？台灣的民進黨政府，每年利用金圓外交，勞師動眾，浩浩蕩蕩，遠赴半個地球以外去拼搏一場豪無勝算的戰爭，其結果，每次都是“決戰境外”。還未登場就“壯烈犧牲”了。然而，決定戰爭勝負的操盤手，卻只在台灣一百海裏之外，捨近求遠，豈不怪哉？

所以環顧台灣的政治環境，中國近代的歷史軌跡，可以精準的預測，中國國民黨的將來已經是“退此一步，即無死所；過此一關，海闊天空”。為了中國儘快步上民主法治的正途，為了台灣二零零八年最後的聖戰，站在泛藍的立場，筆者向支持泛藍的所有人士提出呼籲，共同樹立“為中國的將來而反共，為台灣的前途而反獨”的兩面大旗，或者“內拒台獨，外抗共毒”的宣傳主軸，如此以來，定可贏得大選中的台灣民心，兼得大陸人民的一致推崇。（舊金山世界日報）



新黨，

你要做大陸的 第九個“民主黨派”嗎？

著名泛藍人士、民運人士 郭平

拜讀《郁主席，此言差矣！》一文後，感觸良深。新黨主席郁慕明三點附和中共的言論，著實叫人不敢領教。第一點提醒胡錦濤以台灣政壇亂象為鑒，放緩民主腳步。第二點指控應有 CIA 介入海外民運組織和法輪功。為“不容外力干涉，分裂中國”，所以他不支援民運和法輪功。第三點肯定中共是安定力量，希望中共穩定執政。如果共產黨垮了，中國會出大亂子。

新黨儼然已成中共的親密友黨，如此為之文飾幫腔，甘心充當霸道鷹犬，毋作王道幹城，令許多有正氣和骨氣的新黨朋友難以認同。新黨經過此番“夠可以”的表態之後，按中共國務院新聞辦十月二十一日所公佈的《中國的民主建設》白皮書，肯定可繼往開來，在原有的八個民主黨派之後，夠資格成為一個符合條件的第九個民主黨派。什麼條件？則是必須在中共執政領導下，與中共團結合作的親密友黨和參政黨，而不是反對黨或在野黨。而貨真價實的民主黨派存在的意義，就在做好監督制衡執政黨。沒有反對黨的監督制衡的政治，是假民主政治，哪有民主可言？

就郁先生第一點而言，台灣今天所出現的各種問題，是因過去給的民主不夠，經驗不足所引起，而不是給得太多，是建立民主社會必須付出的代價，所有因之衍生的腐化或異化的亂象，包括統獨爭議，應可透過民主法治機制加以修正調和，何需因噎廢食？就像一個嬰孩，生下來不可能就健步如飛，總要跌跌倒倒一陣，步伐才能逐漸穩妥。民主制度也不例外，必然會經過一個從幼稚到成熟的過程，而這裏的關鍵是過程。眼下流行源自著名的社會與政治學家李普瑟特觀點，“經濟成長會增加受過教育中產階級的人數而加快民主化”，說要等中產階級興起才能開始實行民主。也有人認為，民主不是什麼大道理，而是一種生活方式，要活過才知道；也需要長時間累積經驗，方能達到較為完善水平。確實，中產階級與國民受教育

水平可提升民主素質，但並非絕對，其他因素也的確存在，比如說實施時間的長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印度與香港，印度較窮，香港較富。十億人口的印度 2004 年人均收入只有 622 美元，是十三億人口的中國大陸 1272 美元（編按：這是中共官方公佈的數字，應予存疑）的一半。印度 2003 年人均受教育年數為 5.1 年，而中國大陸為 6.4 年。眾所周知，印度民主體制行之多年，除了喀什米爾和宗教衝突問題，少有動亂，政黨輪替，家常便飯，司空見慣，民主意識強大。相形之下，香港雖然人均收入達 23600 美元，比台灣還高，中產階級強大的香港依然沒有實施普選。足以可見中產階級的存在並非實行民主的必要條件，不然為什麼中產階級比例少的印度可以民主，而中產階級比比皆是香港卻不可以？筆者認為，中印之間的差別是在“行”的問題，不在“知”的問題。恰恰驗證了中山先生《知難行易》學說所強調的“行”的重要性。當從實踐中汲取並總結成功和失敗的經驗，才能逐步改進和完善成為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自由開放體制。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越早開始，越少學費，越早政通人和。任何人幫腔鼓吹延緩民主改革，鼓吹“民主導致動亂”，不但昧於國父的《知難行易》哲學真諦，而且遠離他民權主義的遺教。延遲民主，不訂出一個時間表來，只會天怒更多，人怨更深，終致得不償失。當下中國的發展已經到了政治體制改革的關鍵時期，中國共產黨在中國的前途，完全取決於中共自己的一念之間，到底是以天下蒼生為念，或是以一黨之私為念？

就郁先生第二點而言，民運和法輪功是否有 CIA 介入，請拿出證據。“應有”和“有”，一是猜測，一是確定，二者有天壤之別，必須講清楚，不能臆測。如欲利用仇外的民族情結，來迎合中共，則更令人不齒。怎麼一向“反共”的郁先生也跟素來擅長開設“美國特務台灣特務帽子工廠”的中共沆瀣一氣，幹起這種行當來了？筆者作為來自台灣的學人，自參加中國民運二十多年來，老老少少、上上下下的民運朋友認識許多，做過全球民運組織理事長、監事長，還沒發現過 CIA 介入的蛛絲馬跡，從未和 CIA 打過交道，也從未收過 CIA 的銀子。否則怎有些民運朋友生活潦倒，有些“老字號”大小民運刊物停刊？反而台北和僑胞們，以前倒是常對民運慷慨解囊，民運人士至今仍

銘感在心，也自愧有負海內外厚望。郁慕明所說的話，連中共領導人自己都不敢講，所起的壞作用，非大陸上八個花瓶黨派所能起到。或許，郁欲借此撈取政治資本，一躍而成爲大陸第九民主黨派？郁既然指出 CIA 介入民運，想來必有所本，許多民運朋友倒是盼望他拿出證據來，以昭大信於天下，不要平白冤枉眾多民運人士。

2004 年 10 月 25 日，美國前國務卿鮑爾在北京接受 CNN 和鳳凰衛視訪問時，強調了《台灣不是獨立的，台灣不享有主權國家地位。這是美國的政策，美國的堅定政策》。歷任美國總統，布希和克林頓在內，都宣示不支持台獨。郁慕明“外力介入，分裂中國”的說法，明顯落後於事實，不攻自破。

就郁先生第三點而言，他怎會不瞭解如今大陸最流行的口號“建設一個和諧社會”的背後是一個不安定的局面？就從近的來說，新華社主辦的《瞭望東方週刊》披露：全國 2003 年共發生 5 萬 8 千宗較大社會騷亂事件，平均每日達 160 宗，比 2002 年增加了 15%。除了 2004 年 10 月底，四川漢源十餘萬農民包圍省委書記抗議事件外，大規模農民維權、職工與國企抗爭行動，到如今還層出不窮。所有問題的矛頭都指向執政黨的長期貪污腐敗。大陸的順口溜說：貪官越反越貪，腐敗越反越烈。難道這與體制、黨治之長期缺乏監督制衡無關嗎？從長期來說，就憑共產黨的暴力專制本質，它能營造一個安定的社會嗎？早在 1023 年《孫文越飛聯合宣言》就明白指出，“孫逸仙博士以爲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國”。我們都知道決定一個人或政黨的本質，不是他的外表，而是他內在的文化底蘊。中共表面是中國人的政黨，它的政治文化底蘊是馬列主義，不是三民主義所論述的中國固有道德和固有文化。無庸爭論的說，歷史發展已經作出選擇，歷史淘汰了馬列主義。共產運動的老祖宗俄羅斯人民和東歐人民也已經做出選擇，他們拋棄了馬列主義。遺憾的是，馬列教條至今依然在政治上、社會上、文化上、教育上，束縛桎梏著中國人民；特別是一黨專政，還在嚴厲的迫害異己、控制互聯網。然而，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難道一黨專制會是中國現在和未來的安定力量？除非中山先生錯了，或世界潮流錯了！**中山先生在民族主義第三講裏批評了保皇黨專保護外來的大清**

專題征稿啟事

本刊決定自明年起開展關於“自由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討論。凡有興趣的海內外作者或讀者，本身即稱“自由派”或稱“自由派知識分子”的朋友，或對“自由派”及“自由派知識分子”有研究心得者，均可以投稿本刊，參加討論，各方意見亦均可以發表。特別是關於“自由派”和“自由派知識分子”的學術概念、歷史由來、哲學基礎，及其在歷史和現實中與專制及民主的關係，則更在該討論的範圍之內，亦為本刊展開討論的重點。

敬希各方支持。

黃花崗雜誌編輯部

皇帝。現在郁先生卻在異曲同工地專保護著舶來的馬列黨，只看到同種，看不到異文，誤入了虛假民族主義情緒的陷阱，真是有違中山先生關於馬列主義的批判教導。中共改革開放以後，比較討喜而不危害一黨專制的施政，如在經濟上，國防上，衛生上，體育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應該加以肯定。但更應該認識到，如再加上體制改革，出馬列，入三民，成就肯定會如虎添翼，大大超越現有水平。否則，連目前的成果也會曇花一現。**唯有拋開馬列的死水，回歸孫文的活源**，才能大力促使中國永續地民主、進步、繁榮、安定、幸福、和諧、統一，這才是根本，根深本固方能長久地枝茂葉盛。把孫文學說發揚發展光大，就能發出真正的巨大安定力量。

郁慕明現正在瀋陽作“民族之旅”，連上次北京和胡錦濤見面之旅，以及以前大大小小的大陸之旅，是不是全部或大部由中共用民脂民膏招待的？十月底病逝、有“紅色資本家”之稱的原中共國家副主席榮毅仁，官方新聞稿竟然稱爲“偉大的愛國主義、共產主義戰士”。他 1985 年就參加了共產黨，1987 年《人民日報》卻報導：“一些好奇的西方記者，常常問榮毅仁，你是不是共產黨員？榮笑笑說：我還不是，但我希望將來能達到黨員標準。多麼虛假而又無聊！當然，我衷心希望鬱慕明千萬不是下一個榮毅仁。像臭老九得吞聲忍氣一樣，這第九個民主黨派畢竟也不是好幹的哪！

中華自由論壇（之二）——李敖批判專題

編者按：今年十月，辛灝年先生應邀赴澳洲作《誰是新中國》系列巡迴講演。首場講演「專制改良與共和革命」成功結束後，又即席回答了一個多小時的聽眾問題，其中以「五胎說李敖」最為精彩。現根據講演錄音整理出該文字稿，經講演者本人校閱並略作修改、補充以後，發表如下，以饗讀者。

「五胎」說李敖

辛灝年於墨爾本講演後即席答聽眾問

李敖要是跟我相比的話，那是個坐在牢房裏也能罵國民黨和蔣介石的人，我是一個坐在牢房外面也不敢罵共產黨和毛澤東的人。我對此不想再作太多的說明，因為大陸來的朋友都懂我的意思。但我想說的是，李敖根本上就是個「禍胎」，具體地說，就是「五種禍胎」。

第一、**李敖是共產主義的胚胎**。實際上他一向是有共產主義的思想傾向的。1949年時，一個十四、五歲的少年，對敗退到台灣的中華民國和國民黨蔣介石，有天生的厭惡之情；對49年佔領了中國大陸、貌似引導中華民族走向強大的中國共產黨有天生的歡喜之情，雖可以理解，但卻成了一個共產主義的胚胎。這種人，在台灣七十多歲的人中間，並不少見；在中國大陸七十多歲的人中間，以前也並不少。李敖最近去大陸，已經公開地說他是「歸隊」，也就是說他不是回國，而是「回到了共產黨的隊伍」。他在復旦的講話已經將他和共產黨的思想感情關係交待得夠清楚的了。所以說他是共產主義的胚胎，就一點不牽強。只是他「無辜」待在大陸，否則，他這個共產主義胚胎，是會成長起來的，並且一定會害人不淺（後面我還要說到）。

第二、**李敖是威權民主的怪胎**。49年敗退台灣的蔣介石，在1950年就開始在台灣實行縣長的選舉，後來連台北市的市長都是選出來的，而且不是國民黨的黨

員。共產黨在大陸，四十多年後才開始搞非政權性質的「村選舉」，還沒搞好（甚至還是假選，選的人不合共產黨的意，或者不是共產黨的人，就要廢選、甚至抓人，比如最近廣東的太石村事件）。可是，五十年代以後的台灣，面對的最大威脅是共產黨天天喊著要「解放」它，所以，安全對於台灣來講，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這樣一個政權，面對著共產黨的持續干擾、顛覆和威脅，面對著曾在三、四十年代大陸氾濫過的紅色思潮又要企圖卷土重來，面對著自己又必須堅持從來就有的基本民主

理念，那麼，台灣怎樣才能保得住？台灣怎樣才能走向民主和富強？於是，蔣介石吸取了他49年前在中國大陸的一些教訓，在一九四六年已經建成的中華民國憲政體制下恢復「訓政」。所謂訓政，就是一邊推動地方

自治，一邊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國民政府。前者是為訓練人民用權，後者則是為防止形形色色的外患內憂，特別是專制的公然復辟和變相復辟。這就是所謂的「威權政治」，但卻是「威權民主政治」，也是蔣介石「威權統治」的由來。因為它的目的，還是要「走向民主憲政」，而不是「走向專制」。雖然，超越了訓政的範圍就是專制，越過了威權的限度就是獨裁。但是，三十年代，共產派、所謂的自由派都罵他是「獨裁無膽，民主無量」，卻也說明了他雖然推行訓政，卻沒有「過界」而成為專制。所以，49年後，台灣一批號稱「自由派」的知識份子，當他們依然要像在大陸一樣窮追猛打地批判、否定、直至要與大陸的共產黨「裏應外合」，意在推翻中華民國台北政權時，那個威權民主政治下的國民黨蔣介石就要對他們實行一定的「限制」。也就是說，你想罵，我也可以給你罵，但你們也不要罵得、鬧得太過份。雷震的那個《自由中國》雜誌，出版了27期，期期都罵蔣介石國民黨，直到第27期，實在是罵得太過分了，國民黨蔣介石認為已經對台灣的安全和安寧產生了不良的影響了，才把他抓了起來，把雜誌停掉了。這在大陸是不可思議的事，連一期也出不來。能夠讓他出版27期，罵27期，已經表現了這個政權本身確實尚擁有一個基本的民主理念，尚提供了一個起碼的言論自由環境。把

雷震抓起來，停了他的雜誌，是爲了台灣的安全，是爲了不再重蹈被共產黨顛覆的失敗命運。因爲共產黨還在天天喊著要解放台灣，對岸的大炮還在天天瞄準著台灣島。可是，人的同情心總是在「在野」這一邊。就這麼一抓一放，一放一抓，李敖們的名氣也變大了，膽子也變大了；國民黨和蔣介石的膽子倒「變小」了，只要事不關大局，只好繼續讓他罵。因爲威權民主政治還是要表現出：「我們是有一定的言論自由的。」這才是我稱他是一個威權民主政治的原因。他既不是一個完整的民主制度，卻又帶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和民主內容。李敖就是在這樣一個社會裏被培養成的一個「怪胎」。你們看李敖，開口就是下流，下筆就帶齷齪，髒話爛話，滿紙都是。我想問大家，在澳大利亞、在美國、在全世界自由民主政治成熟的國家裏面，哪有學者像這個樣子的？這是起碼的修養嘛。反過來，在中國大陸，你能找到一個李敖嗎？十三億人中，當真找不到一個比李敖聰明的人嗎？不，但就是沒有，也不可能，誰都不敢啊！如果有，共產黨早就滅了他的「十族」了！所以我說他是國民黨蔣介石威權民主政治下的一個怪胎。

第三、**李敖是台灣社會的一個壞胎**。大家都知道儲安平這個人，他在1947年說過這樣幾句話，「我們今天在罵國民政府、在罵老蔣，我們是嫌他給我們的自由還不夠多，我們想要更多的自由。但是如果我們真的把他給罵倒了，真的是共產黨掌了權，恐怕我們就連想罵一句話的可能都沒有了」。是的，49年以後他再也不敢罵了，也沒有機會給他罵了，先是打了右派，被送去勞教放羊去了，最後死在紅衛兵的亂棍之下（也有資料說他是「生不見人，死不見屍」）。那些曾經罵國民黨罵上了癮的所謂自由派知識份子，只要稍稍正派一點的，哪一個有好下場？沒有一個。就是不正派的，也幾乎沒有好下場。但李敖不一樣，李敖在台灣卻罵蔣罵出了名。實際上，李敖是遇到給他罵的蔣介石就拚命地罵，罵到蔣介石死了他還在罵。可是，你看他到了大陸，竟是一個講演不如一個講演，東扯西拉，做醜作怪，他真敢罵嗎？他只敢羞羞答答地抱著「毛著」做擋箭牌，但胡錦濤連這個擋箭牌也不給他。有人說李敖是「打著紅旗反紅旗」，我問在座的各位朋友，「打著紅旗反紅旗」的結果是什麼？是「必被紅旗所打倒」。但李敖根本就不是在「打著紅旗反紅旗」，他是在「舉著紅旗捧紅旗」，你看他在關鍵的「六四」等問題上的鮮明「擁共」立場和胡

說八道——一個活生生的共產黨專制的衛道士，是不是躍然在大陸了？

李敖是個壞胎。他壞在哪裡？就壞在他在台灣竟然成了威權民主政治下的英雄。但在絕沒有言論自由的大陸，他只敢爲共產黨塗脂抹粉，死也不敢逞英雄。他對凶惡的共產黨，根本就不敢真正地吠一次；可是他對於給了他自由、給了他罵的台灣，他卻吠到今天，咬到今天，咬緊台灣的腳後跟，絕不肯鬆開一點點。所以我說他是台灣的一個壞胎。

第四、**李敖是馬列中國的一個毒胎**。李敖曾說：「你們不要看我在台灣是反蔣英雄，就認爲我在大陸就一定反毛英雄，我在大陸說不定比姚文元的地位還要高，我會是另外一個李敖。」這就是說，在什麼環境下，這個人就可以變成什麼樣子；在另一個環境下，他可以變成和他自己相反的樣子。實際上，他在心裏面是非常害怕共產黨的。他可以在威權民主制度下做英雄，但他也可以在共產制度下做狗熊，甚至於可以踏著別人的鮮血往上爬。他自認在大陸，是一個能夠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姚文元爬得還要高的人。姚文元是什麼人？姚是個毒胎嘛，是個壞人嘛。大家知道，在大陸說你像姚文元，那就是在罵你嘛！一個靠耍筆桿子、幫助毛澤東江青把知識份子與無辜人民推向「文化大革命」火坑的人，當然是個毒知識分子，壞知識份子。作爲一個人，他就是毒胎和壞人。但李敖之所以是紅色中國的一個毒胎，還因爲今天共產黨捧他的目的，一是要利用他來破壞大陸人民對中華民國歷史的反思，要李敖這個從台灣來的反蔣英雄，這個所謂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來向大陸人民、特別是青年一代控訴國民黨蔣介石的罪行，來肯定——「是中國人民選擇了共產黨」！因爲今天共產黨罵國民黨蔣介石已經沒有人聽了，反過來，大陸人民在說蔣介石好，稱他是民族英雄！也就是說，共產黨要請一個愛共產黨、恨蔣介石、討厭過去國民黨（不是今天投共的國民黨）的「台灣自由派」，來爲自己的罪行背書，來幫助它繼續對大陸人民實行欺騙。如此惡毒的用心，自然也就使李敖成了馬列中國的毒胎了！

第五、**李敖最後必將成為死胎**。因爲李敖一旦遇上了一個真正自由民主的制度，一個高度文明的自由民主制度，他就根本沒有市場了，這個「五胎俱全」的禍胎，就一定會死的。他只是威權民主制度下的一個令人噁心的記錄，是大陸共產專制統治下一個令人生恨的玩偶，

是中國傳統知識分子中一個最壞的典型，卻必將成為真正自由民主制度下的一個死胎，並且永遠不再有「投胎」的機會。倘能如此，那才是中華文明之福。

李敖——文化界的群氓化身

大陸 楊天水

身居中華民國，高度享受那裏的言論自由，卻又百般謾罵國民黨與民國的知識界市儈分子李敖，自稱他的大陸之行爲「神州文化之旅」，簡直荒唐可笑。他到大陸來，言談中除了插科打諢，吹牛拍馬，呼籲大陸民眾支持專制中共之外，就是自吹自擂，自我虛誇。他的大陸之行實質上是「神州毒化之行」，以一種群氓主義的思維與言語，再次毒化、汙染中華大眾的心靈，智者拍案而起，而群氓爲之雀躍。

「文化」一詞，在中文裏最初含義包含這樣的積極意義：以文明的知識、教育、風氣教養人們的生活。李敖大陸之行，只是誘導人們擁護專制主義，這明明是要人們放棄爭取權利與尊嚴的志氣，自甘墮落，自我作踐。他的講話沒有絲毫文明教養的成分，對大陸人民的尊嚴、人權、民權，沒有任何明確的主張，只是敦勸人們要配合中共的專制，甚至指責六四血案是人民逼迫統治者殺人，這樣明顯反文化的、即反人權、民權進步的旅行演講，如何稱得上「文化之行」，沒有喪失正確知識的、而且稍有良心的人，都能夠看出這明明是毒化之行。

李敖的大陸之行，是以群氓主義危害人們精神健康發展的神州毒化之行。

「氓」最初中文裏的意思多指野民，即沒有開化的人類成員。這類人最突出的特點是非理性，思想蒙昧，麻木冷漠，野蠻粗鄙，庸俗刁橫，惟利是圖，沒有道德原則，自我利益至上。爲了自我利益，他們會漠視人間痛苦，充當麻木看客，或者百般狡詐，費盡心機，以攫取世俗名利，或倚仗暴力，危害弱者，危害社會，以營造自我安樂。很多這樣的人聚集一起，或者在社會上遙向呼應，就形成了群氓。

群氓是一種非常可怕的力量，粗野、淺薄、汙濁與

卑下是他們的共性，胡攪蠻纏，恃強凌弱，燒殺搶掠，顛覆文明理念，煽動或實施人際暴力，對人類具有極大危害，很多時候強烈摧毀社會與文明的道德秩序。

秦始皇「焚書坑儒」的執行者是群氓，他們藐視人類成員持有主張或見解的權利，濫殺無辜，製造恐怖。明朝末期張獻忠的造反軍是群氓，所到之處，燒殺搶掠，無所不爲。歷代宦官群體，多是群氓，那些非男非女的群氓中，魏忠賢等最爲知名。他們麻木冷酷，對眾生毫無愛憫之心，肆意踐踏人權、傷害人命，無視任何法律的道德的要求，隨心所欲地顛覆社會秩序。十八世紀的英國殖民主義時期，英國的很多國民，包括報界、銀行界、大眾等等，多是群氓，他們爲英國野蠻的殖民主義歡呼，不管那樣的殖民主義造成了殖民地居民多少血淚之痛，當時那些僑居上海的很多西方群氓，在義和團不得不動用「私刑」（辜鴻銘語）抵制列國殖民主義而遭到聯軍大肆屠殺的時候，他們成群結隊，騎自行車，高舉火把，在上海大街上歡呼屠殺者的勝利；希特勒的法西斯主義的追隨者是群氓，他們錯誤地認爲猶太人是德國人民的敵人，實施種族屠殺，當時很多報紙、大亨、官員、大眾，吶喊高歌，鼓噪不已，一致行走在一條罪惡道路之上。俄國末期興起的布爾什維克群體，是群氓，他們在一種原始仇恨的驅動下，野蠻粗鄙，暴虐成性，對俄羅斯剛剛建立不久的自由民主制度，實施了顛覆，對前沙皇家庭不分男女老幼，一起屠殺，對勤勤懇懇的有點土地的俄羅斯農民，對整個國民中不願歸順紅色恐怖的人，甚至對它自己內部的爭執善良的人，實施了幾十年的一輪又一輪的虐殺與虐待。發動侵華戰爭的日本軍國主義者以及支持它的大眾，是群氓。二十年代興起的中國共產主義農民造反派，是群氓，儘管口頭上他們辭藻美麗，甚至提出共產主義的烏托邦幻想，迷惑人心，但是他們的心靈深處，裝滿了仇恨，只信奉強權、鬥爭、復仇，粗暴與野蠻是這個群氓群體的主要特性，內部互相殘殺，毫無法紀與道德可言，外部對異己實施群體復仇，搶劫有產者，殺害異見者，以破壞爲職業，顛覆民國的社會秩序。後來掌權了，則繼續濫殺民國的擁護者，以反右的名義，摧殘中華知識階層中敢於堅持真話的勇士，或以牢籠羈絆之，或用盡手段殘害他們的生命。「文革」時代由於專制獨裁制度的脅持，幾乎使整個中國國民淪落爲群氓，紅衛兵造反中，造反派武鬥中，國家政府機構裏「革命」幹部互相傾軋中，

普通百姓追隨「偉大領袖」「破四舊、立四新」中，知識界普遍麻木地跟隨「四偉」（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批判人道主義思想家孔子的愚昧吼叫聲中，在大眾的惡性被「四偉」煽動到舉國將「四類分子」打得皮開肉綻中，在那些「革命」軍人不用麻藥，將異議人士年輕女子鍾海源的後肋切開，於她被槍擊後未死時活取她的器官中，群氓主義達到了歷史的高峰……不但如此，前伊拉克的薩達姆統治群體，金正日統治群體，都是群氓。

在普通民眾中，群氓現象更加容易觀察。大陸經常有這樣的事情發生：有人落水，幾百人觀看，其中有人勾肩搭背，有男女親熱擁抱在一起，要麼看到那落水者活活淹死，要麼好不容易等來一兩個義士，救活落水者，還會竊竊私語，冷嘲熱諷，甚至乘義士救人的時候，偷走他們情急之下脫放在岸上的貴重物品，這裏群氓冷酷自私、汙濁卑下的一面多麼明顯！

以前廣東收容站裏，員警或者保安經常將被收容者一個又一個瘋狂打死。

中原地帶不久前發生的幾起強姦案，犯罪者都是在眾目睽睽之下，當眾強姦女生。

2003年5月6日晚，陝西城固縣二里鎮三個初中的小男生，毆打沿途討乞返鄉的四川女村民李文蘭兩個多小時，施加皮帶、拳腳、棍棒之外，還「用菜籽桿捅了她的下身」，天亮她半死不活，呻吟在一家醫院的門口，鎮中心醫院的值班醫生李創民發現，不予治療，只是6點左右報警了事，「民警魏國華接警後，8時多才安排片警魯小軍（司機）去察看，魯小軍在醫院沒有找到李，回派出所時在橋頭碰到渾身是傷的李文蘭。李文蘭對魯小軍說她被3個流氓打了。魯只對她說了句『你是哪裡的，走就是了』，便開車回到派出所。8日下午，二里鎮二里村村支書劉國棟兩次請示派出所如何處理李文蘭之事，最後商定將李送到轄區以外的地方。村上據此將李送至城固縣與南鄭縣的交界處。9日下午，二里鎮苟家灣村村民向派出所報警，稱發現一具『女屍』，派出所負責人尚龍德帶著民警和當地村幹部趕往現場，當時李文蘭仍神智清楚，並敘述了3名施暴者的形象，隨後他們將李送到鎮醫院救治。10日上午，李文蘭因搶救無效死亡。法醫鑒定，李文蘭全身多處臟器受損，陰道內挫傷嚴重，因受鈍性外力致腹膜下腔出血，左側多根肋骨骨折及腹腔感染而死亡。」（摘引自【看中國 2005

年10月01日報導】報導：任不寐《祭李文蘭文》）

以上的事情，都是生活在大陸的居民經常耳聞目睹的慘劇。那些隨意打死被關押或監禁者的人群，那些人數大大超過歹徒，眼看女孩子遭到強姦，面對女孩子撕裂人心的呼救聲，均毫不動心的人群，那些還在年幼時期就喪失了良心並陷於瘋狂殘暴的孩子們，那些面對李文蘭危難，喪失了作為醫生、員警、村鎮「公僕」們應該保持人類最基本同情心的人群，肉體上和心靈是何等的麻木！一種陷於僵死般的冷酷與麻木。他們喪失了人性，更準確地說，他們喪失了人性中美好的德行。

辜鴻銘先生曾經批評過英國殖民主義者張伯倫與中國的野心家、北洋流氓團夥的頭目袁世凱，說他們「實在都屬於群氓黨，分別代表他們國家那粗野、淺薄、汙濁與卑下的群氓志趣」。又說：「群氓之所以不高貴，是因為他們無法克服和抑制其自身的動物性——他的欲望。」「群氓是粗俗不堪、無優雅之處可言的。」他的結論對於我們理解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共產主義為什麼製造那樣多災難，大有帮助，他的結論是：「這種粗俗與強烈欲望的兩相結合，便使得民眾在掌權之後，總是蠻橫殘暴。」

就像在政界會有自己代理人一樣，群氓在文化界也會有自己的化身。上個世紀初期的新文化運動中，有群氓的雜訊，他們對古典主義實施了淺薄的鄙視與謾罵；三十年代在上海灘左翼文聯，則更是群氓的聚合體，他們口頭上的言談、文字上的知識學問，絲毫也不能掩蓋他們精神深處的粗野、淺薄、汙濁與卑下，他們就像陳獨秀一樣，口頭上說著美好前景，而自己的靈魂與私德卻極其汙爛。他們在生活中對於他人幾乎都是施暴者，不是拋棄道德責任，導致他人生活在痛苦之中，就是狂妄自大，語言施暴，他們幾乎都是言行不一的傢伙。

如果人們還不能理解什麼叫群氓的話，請看趙本山與潘長江的熱愛者，就知道如今中國大陸的群氓，是何等粗野、淺薄、汙濁與卑下。那些粗俗不堪的，甚至是低級下流的節目，竟然能夠獲得台下或者電視機前那麼多傻乎乎的喝彩！

李敖作為一個通俗作家，同樣受到大陸甚至是整個華人世界裏群氓的喝彩。如果李敖是個（政治學意義上的）真自由主義者，那麼獲得喝彩，是理所應當，因為真自由主義者，為真理與公義而戰。

我們說過，自由主義大略分為四種，即莊子類的擺

脫了物欲羈絆的心靈自由主義者；經濟學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即提倡國家不干預經濟運行，讓經濟通過市場自身供求規則調節經濟運行；政治自由主義者，熱愛、贊成、提倡平等、博愛、寬容、人權、民權、民生；生活上的自由主義，就像西晉王朝的所謂「竹林七賢」，以及元朝末期的「玉山草堂」顧阿瑛等人那樣，放浪形骸，以酒色娛樂、口舌之快與世俗享樂為人生主調。

李敖不是心靈自由主義者，他有強烈的物質欲望，金錢、美女、世俗享樂、他都狂熱愛好，追逐感官享受與世俗浮華，是他心靈的主旋，或者說是他心靈的根本動力。

李敖最起码也不是系統的經濟自由主義者。中共之下，經濟混亂，權貴資本主義壟斷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政府與民爭利，權力操縱經濟民生，任意貪汙、搶掠、偷盜國民財富，國民無論在那個方面，也不享受真正自由競爭制度下的經濟自由，中共的持久統治就意味著大陸不可能有真正的經濟自由主義，而李敖卻要大陸國民繼續支持中共，希望中共持久統治大陸一千年，這樣的人會是經濟自由主義者嗎？不會。

李敖是假政治自由主義者，他為中共特權政治辯護，歷史事實證明了中共專制腐敗的醜惡，舉世越來越多的人認清了中共一黨專政與政治上的自由民主水火不能相容，而且是文明進步的一大阻力，不但危害本國國民，也構成對世界民主和平的威脅，但是李敖的群氓志趣，決定了他無視事實，毫無廉恥，為了取悅中共與群氓，吹捧中共的統治是漢唐以來的太平盛世。這種江湖郎中式樣的謊言，不顧大陸人權民權的悲慘狀態，以美化專制腐敗為指向，與政治自由主義風馬牛不相及。

李敖是個生活上的自由主義者，他放蕩不羈，背信棄義，愛好女色，愛世俗名利，愛感官享樂，玩世不恭，心懷仇恨與刻毒，除了親共之外，幾乎謾罵一切，藐視古今所有偉大的文化成果，藐視很多偉大人物，用淺薄、刻毒、卑汙、狂妄、粗鄙不堪的言語，嘩眾取寵，取悅群氓，並以此為手段，獵取商業利益。

生活上的自由主義，如果超過一定限度，就必然墮落為群氓主義。李敖就是這種類型的典型，他實質是群氓在文化界的一個化身。

這樣的說法，一定會惹得李敖的支持者大為惱怒，他們會說：「大師李敖先生著作等身，你們這樣不公平啊，不厚道啊！」

我們節選劉宗正先生的評價作為答復，劉先生客觀公正，寫道—

李敖曾說：「我自感身處亂世，卻一生倨傲不遜、卓而不群、六親不認、豪放不羈、當仁不讓、守正不阿、和而不同、抗志不屈、百折不撓、勇者不懼，玩世不恭、說一不二、無人不罵、無書不讀，金剛不壞，精神不死，其立德立言，足以風世而為百世師。」。李敖這番話，實在令我驚奇，難道他是用反面的語言，來描述自己？還是他自己犯了自我認知的錯亂病症？我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真正的缺點？

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他必須具備有對人類真誠的愛，如此他才能透過文學作品，來幫助人類淨化靈魂。像李敖這種人，自稱六親不認的人，他怎麼可能對人類有真誠的愛？如果他心中沒有這種愛，那麼他怎麼可能成為一個令人尊敬的文學家？李敖自認為他是中國 500 年內的文學翹楚，他是不是患了嚴重的精神妄想症？

李敖的一生，有太多值得作為文學創作的時代題材，這些時代的題材，關係到近代中國億萬人的命運；每一個小故事，都可以創造出類似列夫·托爾斯泰《戰爭與和平》的作品。然而，李敖從來就不敢面對自己真實的生命與故事，來從事文學創造，反而經常寫一些垃圾作品，例如，《北京法源寺》、《中國性研究》、《且從青史看青樓》、《中國命研究》、《奇情與俗情》等著作。他的文章，充滿了玩世不恭、流氓氣息與鄙俗語言，甚至經常談論男女性器官、處女膜與色情的議題；這樣的人，是不是如同上述那只烏鴉一樣，喜歡逐臭而不願意品嘗美食？

李敖自命為史學家，我認為不然，充其量他只不過是一個喜歡收集歷史資料的人，算不上是一個夠格的史學家。我認為，一個史學家，必須具有基本道德與正義的立場，並且能夠為人類指出一條有價值的道路，具有這種基本道德與智慧的人，才算得上是一個夠格的史學家。李敖是一個缺乏基本道德與正義的人，而且無法為人類指出一條有價值的道路；這樣的人，不論花多少時間研究歷史，或者寫多少歷史著作，都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史學家。

20 與 21 世紀，人類文明的大趨勢，就是人類追求愛、正義、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權與幸福的價值。任何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或史學家，如果缺乏對上述價值的信仰，那麼他就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

文學家、思想家、哲學家或史學家。我認為，李敖缺乏對上述價值的信仰，即使他讀再多的書，或寫再多的著作，最後大部分的作品，都會被人類拋棄在歷史的垃圾之中，成為過眼雲煙的垃圾製造者。

我認為，李敖的著作，除了《孫中山研究》、《胡適評傳》與《蔣介石研究集》等，具有歷史資料性的價值之外，其他的著作，都應該丟進垃圾堆裏。前述三本書，並沒有什麼高度的價值，任何一個歷史研究生，都可以透過整理資料後寫出；其他的著作，由於李敖缺乏對人類的愛，也缺乏對上述價值的信仰，因此沒有任何流傳的價值。

為什麼我會如此地評價李敖？李敖雖然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但是沒有人可以在他任何一篇作品之中，找到他對人類的愛；如果他缺乏這種對人類的愛，那麼他的作品，還有什麼價值可言？他的著作雖然多，但是絕對不會比垃圾場的廢紙多。（摘引自劉宗正《無恥的李敖》）

有人曾尖刻地指出李敖的流氓痞子習氣，他說：「而李敖……以耍流氓自豪，沾沾自喜，看我多流氓，多麼會耍。而李敖的耍流氓不是一天、兩天了，在訪問台灣時，我就在電視上看到，他談哪國的女人叫床聲，能喚起他的性感覺，全是談那些簡直不堪入目、不堪入耳的東西，完全是個小痞子。別說他不是什麼思想家，他都根本不是一個成人。今天我們看任何一個成人，怎麼可能在北京大學這樣的學府說流氓話，他說你們北大學生是精英，因為你們父母做愛時，二三億精子跑出來，跑得快的一到，你們就出來了，這就是精英。在談什麼呢！堂堂的北京大學，他就這麼談『性』風生，什麼女人大腿、女人絲襪呵，絲襪不是套在毛澤東大腿上等等。」

說過辜鴻銘先生說過，群氓的主要特徵是「粗野、淺薄、汙濁與卑下」。強烈嗜欲是群氓的心靈，粗俗是群氓的外在，而蠻橫殘暴，則是群氓主義粗俗、粗野、粗鄙的極端形式。

在李敖那些信口雌黃、惡意謾罵的文字中，在他的以性為樂的文字與節目中，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粗俗、粗野、粗鄙的心靈與行為。根據《開放》雜誌主編金鐘先生的回憶，九八年某天他拜訪台北一位世伯，正好看到李敖在電視節目裏汗言穢語，其中有這樣的低級下流的言語：「馬英九，你小心點，不要行差踏錯，如果掉進牢房裏，你這個小白臉，一天要被別人操幾次！」他

的語言是蠻橫殘暴的，就是說他是語言上的施暴者，如果他這樣的人掌權，一定會如同張獻忠、太平天國、毛共那樣蠻橫殘暴。

李敖是淺薄的，不要以為他編寫了幾本歷史資料加上謾罵民國、國民黨的書籍，就以為他有什麼深厚的學養。三民主義是人類文化結晶之一，它博大精深而又深入淺出，決非一般學者、政治家多能夠達到，更不是流氓文人、痞子文人、群氓潑婦都能夠理解領悟，而民國以三民主義為立國、治國、護國、民有、民治、民享為指南，上承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近採西方善政之長，抗戰時期，歷盡千難萬險，與盟軍共同浴血，挫敗日本軍國主義滅亡我華夏之陰謀，憲政以來，則充分尊重人權民權，廣泛選賢舉能，保護民有產權，發展自由經濟，開創了五千年華夏前所未有的太平盛世，但是在李敖的眼中，是「偽民國」是他要顛覆的物件，「九六年台海飛彈危機中，他在香港明報發表《草蜢的尊嚴》一文，把台灣人民反抗中共武力威脅喻之為在一隻大公雞面前亂跳的蚱蜢」（摘引自金鐘先生：《一個「匪諜」在台灣的故事》）。西元兩千年中華民國大選時，他在香港鳳凰衛視節目中公開發表中共武力攻打台灣。而中共最初乃蘇共的中國支部，秉承馬列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以仇恨、煽動仇恨為聚眾之手段，以消滅有產階級、文化精英、思想自由、人權民權為階梯，以一黨獨霸天下為指向，無論其內部與外部，其奪權與掌權歷程中，陰謀、濫殺、暴力、恐怖、毫無原則、不擇手段、喪失善根、以惡為能、邪正倒置、殘害賢良、惡人當道、群氓主宰一切，造成了大陸政治上、經濟上、精神上、風氣上、生態上、國民體質上癌症般的如山弊病，這種違背人性、反對科學與文明的統治體系，竟然受到李敖的高度讚賞。這樣的文人還有什麼深刻的見識？它的淺薄無聊已經到了滑稽可笑的地步。

他的淺薄還表現在生殖器與性一類言談成了他話語主流。當他洋洋自得大談生殖器與性的時候，他的淺薄無聊，最為明顯了。不錯人類與生殖器官以及狹義上的性，無法分離。正人君子同樣擁有這樣的生活，但是正人君子絕對不會跑到廣場上或者大庭廣眾之前脫下自己的褲子，大肆炫耀自己的「不同與眾」、「古今第一」。人類文化養育中出現羞惡之心，甚至我們在一些動物的身上也能夠觀察到非常簡單的羞惡之心，但是李敖藐視人類多數人共同珍惜的羞惡之心。

他的淺薄還表現在盲目狂妄自大。在李敖個人網頁的「五十自述」中，他自我吹噓是思想家、偉大的思想家，中國百年來第一名，五千年第一名，五萬年第一名，永遠是他第一。

很多人都知道李敖病態的狂妄言語中，有過這樣的表達，即似乎中華文明史以來他是第一。這是何等的淺薄！僅僅就先秦諸子對人類思想與理性的貢獻，真是泰山般的功德無量；五千年來哲學家、文學家，不可勝數，傑作橫數千百年而熠熠生輝；清朝末期辜鴻銘的淵深博大，梁啟超的才華橫溢，皆是中華文化之珠寶。我們不屑於拿這些人來比李敖，那樣簡直是對哲人的羞辱。他幾本歷史資料性的編撰與大量的垃圾文字，在古今中華哲人面前，不過像臭蟲在大象面前。李敖只有一樣是第一，那就是病態的狂妄、淺薄、無恥。

孔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李敖就是這樣的人。他花言巧語，巧舌如簧，取悅看報紙的群氓，取悅看電視的群氓，取悅統治大陸的群氓。這種巧言令色之徒心靈深處幾乎沒有仁義，只有利害。他這個「中華第一」對母親也喪失了仁義之心，有人寫道：「李敖爲了出風頭到了什麼地步？他的母親長期有病，據他自己的說法是植物人了，但他母親去世時醫生診斷是心肺衰竭，他事先竟告訴醫生，如果他母親情況再惡化的話，醫院不要搶救。今天我們看看全世界，無論是西方人、東方人、還是中國人，哪一個當兒子的會告訴醫生，我媽要死的時候不要搶救，這怎麼叫做人？而且最後他母親咽氣之後，他要求盡速火化，他母親生前有遺囑，說百年以後再火葬，其實就是要土葬，可是他就要立即火葬，可那天火葬場不開門，等第二天開門後，他就把母親送去火化了，而且不開追悼會，沒有葬禮，沒有訃告，連念經、禱告也不讓，無情到如此地步，你說這還能叫『人』嗎？這不是畜生嗎！台灣的親民黨主席宋楚瑜跟他關係很好，希望來行禮致意，表示一下，你猜他跟宋楚瑜怎麼說的，他說『已經燒掉了，向我行禮嗎？』一個做兒子的說他的母親已經燒了，用燒掉了這種話，你說這叫人話嗎？」「已經燒掉了，向我行禮嗎」這樣玩世不恭的說法，根本原因是其心靈喪失了仁義。

我們來看看李敖的背信棄義。「第二次坐牢就更難以啓齒。那是一九八一年八月李敖以「侵佔財產罪」入獄六個月。侵佔誰？他的恩人，老闆蕭孟能。此事大陸作家范泓今年五月已有專著《與李敖打官司》揭其始

末。李敖利用蕭孟能的高度信任將蕭的房子、古董及字畫等據爲己有，包括一幅絹綢「乾隆御批」，李敖前妻胡茵夢曾出庭作證。此事當年在台港轟動一時，「無不認爲李敖欺世盜名，見利忘義。」他自廢武功，臭不可聞。但是，李敖今天以鬥士、名嘴之名，把兩次坐牢籠統加在一起，還附加一年多軟禁（實際爲監視居住，出門跟蹤），作爲他反抗國民黨高壓政策的光環，自我加冕，騙倒不少人。」（摘引自金鐘先生：《一個「匪諜」在台灣的故事》）

到此我們還不能夠看清李敖粗野、淺薄、汙濁與卑下的流品嗎？很多人說他是大師，保持仁義理性的、深入研究的人，都能夠看清他不是大師，而是個文化界的大市儈、大阿混、大潑皮、大小丑、大牛皮，一個精於算計的病態的自大狂。不過我等還是想用文雅點的正規點的名稱，即**李敖正是群氓在文化界的化身，他集群氓所有的特徵，並且將之極端化，他非常懂得如何取悅群氓，並且以此作爲他發財致富、攫取名利的職業。**

楊天水于南京東山

2005年10月4日

狼 的 共 性 與 李 敖 的 個 性

——兼悼自由鬥士楊春光

德國 徐 沛

我2002放棄海歸夢，驚慌失措地從故園逃回異鄉後，就開始像祥林嫂一樣一有機會就告誡世人：中共是正在吃人的狼！爲了讓東西方的東郭先生不要上中共狼的當，我可謂費盡心機，也因此學會了上網，並欣喜地發現挑戰中共狼的早行人不少。我有幸結識了無數同行，其中包括剛去世的楊春光。我還清楚地記得楊春光接到我的電話時，表示他以爲徐沛是個男的，我聽了直笑，因爲在我收讀的各種郵件中稱我爲先生的不少，我已習慣，倒是叫我小姐，我會反對，畢竟我已年近不惑，

並早已知天命。楊春光比我大十歲，還不到知天命之年，但給兒子命名天倫。楊春光以文抗暴，遭中共狼追殺，死裏逃生，留下後遺症，並最終導致他英年早逝。楊春光沒有逃過像八千萬中國人一樣被中共狼吞噬的厄運。

六四屠殺後，大批專家、學者被迫流亡海外，與中共臭味相投的李敖則乘虛而入，汙染了不少人，包括楊春光這樣的因反抗六四屠殺而被捕入獄的自由鬥士，他甚至被人譽為「大陸李敖」。可他染上的李敖習氣卻是我讀不下他作品的原因。想來這也是楊春光既受到中共迫害又難得到民間支持的一個緣故。不過，楊春光不是唯一一個爲了反抗中共的假正經而竭力地像李敖一樣不正經的大陸同行。對此我能理解，但不能認同，也不影響我和楊春光在電話上暢快地交談，畢竟我們的思想方向一致，都在揭露中共的暴政和謊言，更何況他身在「黨天下」也能認識到中共偶像魯迅原來是個「侏儒」。

當真正的自由鬥士要麼坐牢、要麼流亡、要麼夭折時，自由鬥士的演員李敖登場了，開始了他的所謂「神州文化之旅」。然而被中共媒體稱為「文化名人」的李敖與文化不沾邊，他是在褻瀆文化和神州，因爲連身在中共軍隊，但見過世面的劉亞洲也知道「宗教決定了文化」。而李敖卻是個目中無神無教也無人的自大狂，他對宗教一竅不通，就像佛廟道觀這樣的淨土在中共領導下變成了賺錢的場地一樣，金剛菩薩等佛門用語到了李敖嘴裏也變成了他賣弄學問的技巧，簡言之，李敖徒有知識，沒有文化。

評論家唐子認爲李敖是中共面對《九評》引發的危機請到大陸滅火的消防隊員，然而胡錦濤用保持共產黨的先進「性教育」抵擋不了的退黨大潮，豈能靠李敖用其個「性」來號召大陸同胞擁抱中共得到解救？李敖雖有意識地表明要「休戚與共」，但卻下意識地借毛選透露共產黨要滅亡！

本來我早知推崇進化論的共產主義者或自由主義者多是缺德之人，表現之一便是好色，但李敖的表現豈止是好色？「萬惡淫爲首」是中華古訓，但這一佛門戒律肯定是李敖詆毀佛教的原因，就像假惡鬥的中共迫害「真善忍」的法輪功一樣。

李敖有「台灣魯迅」之稱，他與魯迅的「共」性不僅僅在於都以罵人著稱，都大批傳統文化，都抹黑國民黨，粉飾共產黨。

面對李敖在中共領導下的北大、清華和復旦的三篇講演，我真擔心大學生被他嘴裏吐出的雞零狗碎糊弄，因此迷亂，甚至墮落。魯迅生前被正人君子斥爲「墮落文人」、「流氓大師」，但他只敢暗中與新女性亂來，在日記裏也要使用委婉語遮掩，有了私生子後，還敢於寫下「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爲孺子牛」來鼓勵自己承擔後果。

而李敖則把無恥當有趣，把魯迅的阿Q精神發揚到了極至。早年，當他獲知女友有孕後主張把新生命扼殺在腹中，好在女友其時正好留學美國，法律保護腹中胎兒，於是他得以當上一個美國人的父親，從此多了一項炫耀的資本。他不僅以私生女爲榮，還讚賞能把自己想像成處女的蘇共妓女，實在是條公開誘人的「大色狼」。「大色狼」是李敖在北大講演後回答提問時詆毀馬英九的用詞。就憑這一問一答就能看到李敖如何在欺騙世人、汙蔑他人的同時此地無銀三百兩！

李敖竭力阻擋德才貌三全的馬英九出任國民黨主席，然而反共、反六四屠殺、支持法輪功的馬英九深得民心，以高票當選國民黨主席，畢竟生活在中華民國的華人有機會像馬英九一樣接受傳統文化（儒釋道）的薰陶，享有自由獲取資訊的公民權，容易辨別正邪，不易被狼欺騙。

查看中國現代史，可以發現，不少才子佳人都是在青少年時代因魯迅這種大灰狼的誘導而走上邪道，加入中共。李敖則在一次採訪中宣稱他交女友的標準之一是「幼」，他最後的一個女友 84 年才生，與他有染時 17 歲，也就是說他公開聲稱 2001 年時玩弄了一個未成年的女孩。不知與他私生女同齡的第二任妻子聽到丈夫的如此自白作何感想？看來，這位被李敖追求時才 19 歲的李敖迷沒有前任胡茵夢的自尊，更沒有膽識像身爲女明星的胡茵夢那樣在結婚三個月後站出來證明丈夫侵吞恩人的家產而「捨婚取義」！就是說，李敖這條大色狼也像中共狼一樣只能欺騙年幼無知和沒有獨立思想的年輕人。玩弄女性也是李敖與毛澤東、江澤民等的共性，只不過毛江在人前裝模作樣，不敢像李敖這樣招搖過市。雖然如此，還是有人以流氓燕的名字表示：「如果我有宋祖英的嗓子，我要爲李敖唱一首讚歌……」

如果李敖是在德國，那麼，就憑他這番厚顏無恥的自白就可能招來官司，哪兒還有資格涉足政界？李敖能被選爲立法委員就說明在台灣中共邪惡勢力不小。事

實上，中共派了不少匪諜或曰共特潛伏在台灣，其中包括李敖最喜歡的一位中學老師。這個共特是把進化論引進中國的嚴復之孫嚴僑，可喜的是嚴僑後來皈依了佛教。李敖自認深受共特嚴僑的影響，他也知道「地下黨的工作方法很厲害」。史料揭示所謂的「白色恐怖」就有潛伏在國民黨中的共特發揮的巨大作用！

李敖的作風或曰罵風毫無疑問來自魯迅，而非胡適，雖然他既瞭解魯、胡，也罵魯、胡。李敖的父親是魯迅對人不善的見證人，他則是胡適善惡不辨的見證人，但他現在罵親共的魯迅捧反共的胡適，不全是個人恩怨，而是爲了自欺欺人，畢竟共產主義無法騙人了，所以他宣稱自己是自由主義者。這讓我想到共產主義和自由主義好比一雙皮鞋的左右兩隻，都是五四後崇洋媚外的中國知識分子用來踐踏中華傳統（仁義禮智信）的西方理論，貽害無窮。

李敖在台灣與魯迅當年一樣謾罵國民黨，歌頌共產黨，然而能自由獲取資訊的華人都知道：是蔣介石領導了抗日衛國戰爭，是中華民國廢除了不平等的條約，擺脫了列強的殖民主義。在中共依靠魯迅似的筆桿子、林彪似的槍桿子和嚴僑似的共特把國民黨趕到台灣後，大陸人民便從此失去在中華民國所享有的公民權。連中共的高官比如胡績偉也在其 90 誕辰表示共產黨不如國民黨。

蔣介石或許算不上正人君子，但毛澤東則完全是個邪惡小人。流亡英國的中共高幹之女張戎在花費了十二年時間寫成《毛：不為人知的故事》後，回答記者問時表示：「毛澤東在道德上是一無可取的。」就憑共產黨在和平時期要了 8000 萬大陸人的命，而國民黨在面對中共威脅和共特破壞的情況下才鎮壓了 5000 台灣人的事實，就可以證明李敖心眼不正，是非不分。不過他自己到達北京時也承認他有「毛」病，所以，我非常贊成唐子在評論《李敖不是個東西，是個玩藝》裏所說：「魯迅就是市井毛澤東，毛澤東就是山寨魯迅。」李敖就是台灣的紅衛兵，只不過紅衛兵是被強行灌輸毛魯讀（毒）物的狼孩兒，而李敖則是個性使然。他在北京的同學表示，三歲看老，李敖小時候就愛打架。所以，我說，李敖天生有狼的「性」格，而沒有人格！

當一位大陸記者詢問李敖如何看待《與李敖打官司》（一本揭露他真相的專著）時，李敖表示這是小人物的作品，不值得注意，但多謝「小人物」如胡茵夢的

正直善良，李敖才能被繩之以法。簡言之，李敖在台灣牢獄之災是罪有應得，因為國民黨當年爲了保衛中華民國反共反台獨，李敖卻既幫台獨，又「爲共匪宣傳」，就是說，李敖像魯迅一樣狼性使然，甘當不是共特的共特。

好在 89 年後的大陸畢竟不是 49 年後的大陸，李敖無法像魯迅那樣因中共的吹捧而變成「思想家」來欺騙和毒害世人。同胞們對李敖的評價十有八、九都是負面，可惜還有人借魯迅批李敖，不知李敖就是魯迅的好學生，是他把魯迅總結的二醜藝術落實到了行動上。李敖也像魯迅一樣說了不少動聽的謊言，比如：「我認爲對邪惡、對黑暗，你表示沉默、表現出閃躲、與世無爭，你就是共犯，是罪惡和黑暗的共犯。壞人做壞事，你看著他做（而不阻攔），你就是共犯。所以我才力竭聲嘶，要出來講話。」面對李敖在名爲鳳凰實爲烏鴉的電視台和這次在大陸和香港的拙劣表演，誰相信這段話出自李敖？

可喜的是李敖的這段謊言正被越來越多的中華兒女當成真話在身體力行，我相信不久的將來李敖和他穿的魯迅、胡適兩隻鞋都會和中共一起被歷史淘汰！

2005 年 10 月於德國萊茵和河畔

評李敖的共產主義之旅

大陸 任 詒

從共產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開始起，就有利用著名文人歌德的歌功頌德愛好，彌補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不足，爲自己的臉上貼金；列寧繼承了這一點，也有自己的著名文化人高爾基；毛澤東也有自己利用的著名文化人魯迅；而現在胡錦濤還沒有自己利用的著名文化人，所以中共控制的鳳凰電視台老闆劉長樂十分精明，爲中共找來台灣的所謂大師李敖，毛遂自薦的想當共產黨的文化人，要接魯迅的班，這也是李敖爲什麼反復批判魯迅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共和鳳凰電視台聘請李敖到大陸訪問講演的根本原因。鳳凰電視台用重金買下李敖，讓李敖反擊中國民主派的理論家，就像毛澤東讓陳伯達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樣，開展理論戰爭，把中國再次引向專制的黑暗。李敖的秉性是「狗肚子裝不了

二兩香油」，在復旦大學的講演，說出了這次到大陸來最想說、最真實的話，就是說「共產主義按需分配是美好的！共產主義一定能夠實現！」

我是一直在通過海外的媒體如鳳凰資訊、中天新聞等，觀看李敖在大陸 13 天的講話的，許多東西不是文字可以表達出來的，只有親眼看到，才能瞭解其中的含義，我在這裏說的都是我的親身感受。大部分的中國人是聽不到李敖講話的，因為所有的大陸媒體都「保持沉默」，只有香港的鳳凰電視台和鳳凰網及海外的媒體可以看到，而在大陸是很少一部分人有這樣的通訊條件的，再說老百姓也從來不關切什麼李敖，關心的是自己的安全，比如太石村事件，煤礦難民事件，農民工討錢事件等等。而且，鳳凰電視台對李敖的講演做了冷處理，頭一次在北京大學的講演，鳳凰電視台是現場直播，但在關鍵的時候，比如講到「六四」、「共產黨也要被消滅」等處，也沒有了信號。第二次在清華的講演，明顯感到中共的壓力，主席台和北京大學的不同，上面只有一個美女主持人，領導都到下面坐了，為什麼？因為，在北京大學的時候，李敖把主席台上的三位中共領導人弄得很尷尬，既說他們不笑，又說他們不鼓掌，和丁關根一樣，這次坐在台下面，大家就看不到領導人的面孔了，既可以不受李敖的諷刺，也可以不得罪中共，保住官位。正如有人在節目中表示「李敖在北大的表現看得出他很緊張，對於共產黨他想捧不敢捧，想罵又不敢罵，所以他用了演戲手法，使得演講的內容讓人覺得語無倫次、邏輯混亂；投機性格與遊戲本質盡顯無遺，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對於這場演講批判比較多的原因。」

清華講演鳳凰電視台沒有現場轉播，而是過後經過審查，發現沒有問題才重播的，許多觀眾自然錯過了觀看的機會。李敖在台上出賣鳳凰電視台的老闆劉長樂，把明顯吹捧中共的言論的錯誤推給了劉長樂，他說「報告劉老闆講到目前為止還安全嗎？外面謠言說我和鳳凰的情緣已盡。我告訴大家，胡扯！」明顯感到李敖和鳳凰電視台的金錢關係，因為，鳳凰電視台是中共的喉舌，李敖受到鳳凰電視台的壓力，是金錢的壓力，他最怕的是「和鳳凰的情緣已盡」，斷了他的財路，每期「李敖有話說」，是鳳凰電視台罵台灣、捧中共的熱點節目，李敖可以得到幾百萬的錢。

在上海復旦大學的講演，李敖大肆讚揚毛主席、鄧

小平、共產黨、共產主義，所以鳳凰電視台又進行了現場轉播，劉長樂也真的樂了。但學校領導們還是學習清華在下面坐著。可以說，李敖的講演是被中共限制在大陸的校園裏面，老百姓是幾乎不知道，儘管他沒有正面罵共產黨，只是引用了毛澤東、《憲法》裏面的話，儘管他的話和「六四」以前大陸的知識界批評中共的文章相比差不多，中共還是封鎖了他的影響，可見，現在大陸的所謂民主自由是多麼的有限？

我說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完全是「共產主義之旅」。因為，一是他訪問的是共產主義中國，而且去的北京、上海、香港都是中共最重要的城市，沒有像國民黨、親民黨、新黨一樣去拜仰中華民國等標誌性歷史文物。二是李敖發表的言論都是五花八門的政治言論，很少有文化言論，他一會兒罵美國、日本、蘇聯、布希、克林頓、蔣介石、李登輝、連戰、陳水扁、魯迅、馬克思、國民黨、民進黨等，一會兒變相的罵辛亥革命、共產黨、北京大學、毛澤東、周恩來、八九民運等；一會兒讚揚北洋軍閥、胡適、蔡元培、共產黨、馬寅初、等，一會兒變相讚揚毛澤東、鄧小平、《中國憲法》，一會兒大講性文化、吹捧自己、吹捧兒女等，而且海內外各種各樣的媒體各取所需進行了分配報導，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馬列主義說「社會主義是『按勞分配』，共產主義是『按需分配』」，實質，李敖的言論表面看是共產主義的「按需分配」，整體聯繫的看是為共產黨辯護，替共產黨說話，所以說李敖是共產主義之旅，而不是他自己標榜的「神州文化之旅」，一點也不冤枉。比連戰的「和平之旅」的「歷史潮流」，宋楚諱的「搭橋之旅」的「制度競爭」，郁慕銘「民族之旅」的「共同抗戰」，走的更遠了，但離中共更近了。

他在北京的天安門城樓參觀時，題詞「休戚與共」，並解釋說「我要與共產黨同憂愁共歡樂」，表達了自己「歸隊」的決心。但是，李敖也知道張學良、張治中、宋慶齡、李宗仁等人歸順共產黨的悲慘下場，所以當清華大學主持人曾子墨說「說他特殊，還因為他闊別了大陸 56 年之後第一次回到北京，他說他不希望自己被當做是一個客人，他不過是一個歸隊的老同志」，他激動的趕忙脫去了上衣，當學生問他「李敖先生您好，我是來自公共管理學院的學生，我覺得我們是以清華最熱烈的雙臂來擁抱您，歡迎您回到我們祖國的組織，歡迎您

回來。」李敖不滿意的說「你這叫什麼問題，我根本就沒有離開。」李敖在回答復旦大學學生提問時，回答「當你沒有金錢的力量時候，你就沒有支撐點」。這些可以看出，李敖爲了金錢歌頌共產黨和共產主義！就是這次所謂「神州文化之旅」的英雄本色，儘管他沒有穿在鳳凰電視台穿的紅色衣服，抱怨中共沒有給他鋪紅色地毯，但李敖對大陸的 13 天訪問，確實是紅色的共產主義之旅。下面我重點批判李敖的一些謬論，並且和李敖等人商榷：

一、批判李敖『『六四』是民眾『逼政府開槍』』

李敖演講中提到 1989 年的「六四」，咋一聽新奇，他說「看這個表，1932 年美國群眾在中央政府盤居不屈，政府開槍，1953 年德國群眾盤居不屈開槍，1956 年匈牙利群眾盤居不屈開槍，1970 年美國又來了，又開槍。可是人民來講，逼他開槍，局面造成了我們逼他開槍，我們要不要反省。」他諷刺六四天安門事件，是老百姓逼政府開槍的。這完全是欺騙老百姓，和共產黨唱一個調子，這段話是李敖精心設計爲共產黨鎮壓學生辯護的。

天安門血案是歷史上最後一次專制制度鎮壓成功，之後所有政府鎮壓百姓的運動都失敗，半年後柏林圍牆倒了，接著羅馬尼亞獨裁者齊奧塞斯庫鎮壓百姓也失敗，最後被軍事法庭處決。難怪李敖到北京就迫不及待地到天安門廣場參觀，從不愛照相的他高興的照了許多。胡平說「李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李敖在中國大陸，先是讚揚自由主義，然後是讚揚決心要消滅自由主義的共產黨，令許多人感到迷惑。北京之春的主編胡平表示，只要觀察李敖這些年的言論，就可以知道，李敖這些言論的背後，並沒有什麼別的東西。李敖連中共實行六四屠殺也認爲是有道理，可以說他已經沒有什麼原則了。」

二、批判李敖說「我們要和共產黨合作」

李敖拿著毛澤東著作說「還有一個毛澤東你們知道它是誰嗎？我念給你們聽，共產黨是在歷史上發生的，凡是在歷史上發生的東西，都要在歷史上消滅，因此，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共產黨總有一天要消滅，消滅就是那麼不舒服嗎，我看很舒服，共產黨哪一天不要了，我看實在好，我們的任務就是促使他們消滅得早一

點。我們希望共產黨活一千年，我們在它背上活一千年，抱著它，貼著它，哄著它，耐著它，奴役它，讓它爲我們服務，有什麼不好。我們不服氣，要打，我講過，玩言論自由你們玩不過我，你們要革命你們玩不過坦克車，不要再走這條路。」

咋一看佩服李敖「我在打著紅旗反紅旗」，分析看，李敖還是替中共鎮壓「六四」辯護，還是和鄧小平「殺二十萬，穩定二十年」唱的一樣調。二十年過去了，中共還是封建專制制度，還是要鞏固政權殺人民的，照李敖的一千年觀點，中共 50 年殺 8 千萬，一千年殺多少？中國的知識分子都像李敖一樣的無恥，中國就真的「國將不國了（魯迅）」北京獨立評論人士劉曉波批評李敖說「李敖的北大演講以言論自由爲基調，多處針貶時弊，並對社會主義的合理性提出置疑。這一點出乎他的意料。在這個演講裏頭，他儘管說過共產黨存在一千年也好，一萬年也好，我覺得這些都是抽象的，沒有實際意義。他有實質性的講話還是一種對這裏的批判。中共很可能出於統戰大局的考慮，容忍李敖的言辭。」

三、批判李敖說「大陸的貧窮不是中共造成的」

李敖說「中國人沒褲子穿從唐朝就開始了，叫共產黨負責任負到唐朝未免遠了點。我們中國是這麼窮，這個賬不能算在共產黨頭上。可是我們必須說，從 1949 年以後有賬目我們要和共產黨說，共產黨是不是要負責，可是 49 年共產黨所接受的攤子是什麼攤子？是國民黨，國民黨把能帶走的全帶到台灣走了。我帶走了 500 本書，國民黨帶走了全中國國庫裏的黃金，當時的黃金折成美金是 3 億美金，現在不算什麼，可是當時是全中國的錢，國民黨把這個錢帶走了，能帶走的全帶走了。」可惜李敖的歷史學家名稱，對中共的歷史十分健忘，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四清運動、抗美援朝、人民公社、大躍進、文化大革命、六四、法輪功等等，李敖都不知道，8 千萬大陸人民被無辜殺害，也不知道，這些都是唐朝帶來的嗎？

中華民國的幸福日子也是有目共睹的，正是共產黨鬧革命分裂國家才造成了國破家亡的局面。至於國民黨把這個錢帶走了，有點經濟學常識的人都知道，貨幣不變成資本是不會增值的，中共反對的就是資本主義，提出「認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我在農村生活過，沒有褲子穿是普遍現象；台灣的錢都給中

共，也會坐吃山空。台灣制度是民主制度，就是資本主義制度，所以黃金成了資本，發展了台灣的經濟。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沒有什麼功勞，只不過是放鬆了對人民的經濟限制，客觀上讓人民的生產力重新發揮出來了一些而已！

評論家劉宗正在《無恥的李敖》一文中說：「李敖自命為史學家，我認為不然，充其量他只不過是一個喜歡蒐集歷史資料的人……李敖是一個缺乏基本道德與正義的人，而且無法為人類指出一條有價值的道路；這樣的人，不論花多少時間研究歷史，或者寫多少歷史著作，都不可能成為一個有價值的史學家。李敖雖然是一個多產的作家，但是沒有人可以在他任何一篇作品之中，找到他對人類的愛；如果他缺乏這種對人類的愛，那麼他的作品，還有什麼價值可言？他的著作雖然多，但是絕對不會比垃圾場的廢紙多。」李敖的講演是失敗的，給知識分子丟臉。

四、批判李敖說「我敢講真的話」

李敖說「今天我做個樣板給大家看，我捐了三十五萬人民幣做胡適銅像。現在大家知道，胡適的思想是最溫和的，可是當年胡適在我最困難的時候，送了一千塊錢給我，今天我相當於 1500 倍的人情來還的，給他做個銅像。你們是這種人嗎，你們可能有點錢，可是捨不得花，可能覺得這銅像不花，也好。我花了，十天以前我離開時看到高金素梅去聯合國去宣佈日本人可惡的時候，我還送了他 100 萬台幣，不要以為我李敖有錢，我李敖是台灣的所謂立法委員，大家知道我在坐計程車嗎……威武不能曲，富貴不能淫，貧富不能賤，時髦不能動，我敢講真的話，謝謝各位！」

李敖口口聲聲說感謝胡適的大恩大德，但是，他說謊，胡適在《美國退還庚子賠款記》中詳細的說明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經過。我們從胡適的文章裏看到李敖至少兩點說謊：第一說謊：浮報賠款不是華盛頓，這問題也不是梁誠首先提出來的，而是美國政府主動提出來的。第二說謊，賠款辦教育同樣不是梁誠首先提出來的，而是美國政府主動提出來的。無恥在於：列強中只有美國人退還餘款，卻成了李敖抨擊的物件，而其他 7 國，卻成了好人。同樣無恥者，把義和團說成是愛國者，完全是顛倒黑白。這些流氓殺的主要不是洋人，所殺害的人中，80%是無辜的中國人。

我們也許不知道李敖在台灣騙取朋友的財產，被判刑入獄的事情，他捐了三十五萬人民幣做胡適銅像的錢，就是用騙朋友的錢，他在清華還說這錢是胡適送給他的字畫賣了的錢，不能自圓其說。有人揭露說，「李敖在鳳凰衛視一次節目就有十萬台幣的收入，一個月兩三百萬，李敖捨得嗎？這才是對他的『自由主義』的最大考驗。看在錢份上，還是不要那『英名』吧。也怪不得主持人一開始就很有把握的稱讚李敖是『歸隊』的『老同志』了。」可見，李敖為了錢什麼壞事情都可以幹。李敖說「有錢是非常的一個力量，可以保護我們的自由。」毛澤東的第一桶金是貪汙了留學法國學生的盤纏，李敖的第一桶金是盜竊來的，所以就難兄難弟的歌頌毛澤東。

五、批判李敖說「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好的理想」

李敖說「共產主義也是如此，共產主義是人類最好的理想，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這當然是最好的理想，我們中國裏面所講的，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己。前一句就是各取所需，後一句就是各盡所能。」我們知道共產主義是德國人馬克思、恩格斯創立的一種學說，經過「巴黎公社」的試驗證明是失敗的。但是，俄國的列寧、史達林把馬克思主義附加上封建主義，採取了暴力革命推翻自由共和的政府，建立假的所謂的社會主義社會制度，經過近百年的實踐，證明是錯誤的、反動的，在上個世紀末被蘇聯人民推翻，重新建立了民主制度。現在，全世界和中國大陸人民都不相信共產主義了，世界上只有中共、朝鮮、越南、古巴幾個孤獨的共產主義國家正在苟延殘喘。李敖為了金錢利益還宣揚什麼共產主義制度，支持中共做什麼共產主義的「中流砥柱」，真是大逆不道。

有人認為「李敖在北大關於中共的表態是『擁抱專制』。他的言論是不是應該受到那麼大的重視？我表示很大的質疑。因為以我在台灣的經驗，李敖的言論在台灣社會根本沒有什麼影響。至少在知識界，沒有人把他的言論當成值得回應的言論去看待。」

六、評價李敖在三所大學的座談

李敖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的講演，也反映出了這三所中國目前最著名大學的精神面貌。從各個方面看復旦大學最好，清華大學次之，北京大學最後。

復旦大學的學生，在講演堂外爲了爭取觀看講演的門票和校方進行爭吵，在講演堂內爲了爭奪提問權同樣發生了爭吵，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都沒有這樣的熱烈場面；而且師生們提出的問題也是理論水平很高，而且十分的尖銳，不是提前準備好的發言稿，都是即興提問。例如：一位教授提出「李敖你憑什麼說你是中國運用白話文的第一個人？你爲什麼批判魯迅？」問得李敖半天回答不上來，只好狡辯說「我常常有耳背，我的耳朵常常聽不到對我不利的聲音。」還有一位學生問「今天我看見您 3000 萬字的李敖大全集，我仿佛看見一個句點的落下，是您對死亡的恐懼讓您有這個動力寫這 3000 萬字嗎？當然我希望您長命百歲，因爲我很喜歡您的書。我還看過您的節目，其中有相當部分的內容在北大的演講的時候有雷同，比如說提到過艾森豪威爾等，這些在書上都有，請問這是您老闆劉長樂有安排，還是您真正成熟的智慧可以信手拈來？」李敖「我的老闆劉長樂是安排了我這次回到祖國來演講，到處白吃白喝，別的他安排不了。我告訴你，剛剛你說我怕死，你在我文章裏面看到我怕死，我 14 歲的時候寫的文章，我 14 歲的時候怕什麼死，所以我認爲這個不是問題，問題是我對生命的看法。我告訴你，基本上對人生，我這個年紀有某種程度的悲觀，我不相信基督教，可是新舊約全書最後的啓示錄第六章第八節有一段說，見有一批灰色馬，騎在馬上的名字叫死，我告訴你，我隨時會騎上灰色馬，再見！」這說到了李敖的悲傷之處，李敖公開說「怕坐飛機」，「怕進秦城」，「怕是最後的講演」，問得李敖也無所適從。一個女學生問「我是復旦大學新聞學院的研究生，您一貫的言論和兩種色彩來概括，就是灰色和粉色，灰色是批判，粉色是女人。您有一位朋友曾經說過一句話，您一生最喜歡的是女人，最瞧不起的也是女人，我相信您對您身邊所有的女性都是非常真誠的，但是我覺得我很難看到平等，我想問您的就是在您的字典裏女性除了喜歡和追求的以外，是否也是您真誠的欽佩和欣賞的物件？」不一一列舉了，可以說，目前中國最有希望的大學是復旦大學。

在清華大學和北京大學的學生提問都是準備好了的政治化言論，索然無味。清華大學的學生在李敖講演前，打出紅色布條，上面寫著「認知敖哥，超越自我」，被學校的保衛人員沒收，反映了大學生們對民主自由的要求。北京大學也有可取的地方，例如：學生反駁李敖

說「李敖先生我非常尊重您，我對您剛剛那樣說馬英九先生好像不太公平。」

總之，李敖所謂的「神州文化之旅」是徒有虛名，他的三場講演是性文化、加罵文化、加捧文化，等於共產主義文化，並沒有講中國的優秀傳統文化。9 月 25 日深夜，鳳凰電視台的記者問李敖「明天在復旦大學講演的中心是什麼？」他說「台灣獨立不是問題，兩岸關係不是問題。我關心的是中國整個的大問題。」李敖關心的中國整個大問題是什麼？是「共產主義一定會實現嗎？」還是準備和宋江一樣打著「替天行道」的欺騙大旗，接受中共的「招安」哪？我想在鳳凰電視的畫面上，看到深夜的燈光下，大桌子上擺滿了《毛澤東選集》，李敖帶著老花鏡，勤讀毛主席的紅色寶書，好似又恢復到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年代，就不難找到準確的答案。

李敖 和他坐牢的原因及真相

（標題為本刊編者所加）

石 巍

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終於收場，他昨天回到了台灣。一路上都是他講，現在也該論到我們來說幾句了。

早就聽說李敖玩弄女人成性，與他有染的女人，有名有姓的就有二十幾個。他在《大師李敖大事年表》中自己就炫耀「在我床上，……不乏歌星解帶、空姐橫陳」，「兩次和有夫之婦私通」，「五次和妓女在一起」。羅列起他睡過的女人更是如數家珍：「張敏英是最令我作夢的女人、君若是最慧黠多才的女人、尚勤是最有幽默感的女人、海蒂是最美麗的女人、小蕾是最可愛最令我懷念的女人、Martha 是最好的女人、胡茵夢是最風華絕代的女人、汝清是最惹我憐愛的女人」。早年流覽李敖著作，每每讀到「大師」毫無掩飾地直書「長程射精」「雞巴」「陰道」「手淫的快樂」「手淫台灣，意淫大陸」，總感到有一種難以言狀的厭惡。近年又聽說「大師」把台灣稱爲「中國的睪丸」。筆者雖懷疑「這就是大師嗎」，但未敢據此過多地揣測「大師」的人品。倒

是這次李敖的「神州文化之旅」著實使人們看到了他的靈魂是何等骯髒。

許多人對這位聲名赫赫的「大師」在北大清華和復旦的三場演講抱有很大的期待。但聽過後莫不大呼噁心。在大庭廣眾之下，當著向他求知求真的後學男女們，他居然一直把「睪丸」「女人的那個部位」「下部」「男生褲子前邊的拉鏈」掛在嘴邊。真所謂「三句話不離本行」。尤其當他在台上表演「把帽子抓下來放在下面撒尿」的下流動作時，台下的莘莘學子們真不知道「羞恥之心人皆有之」的古訓，「大師」是否讀過。

人們不明白，「大師」既然對男人和女人的生殖器如此感興趣，何不去當個泌尿科醫生，或者做一個 A 片攝像師？

如果「大師」僅僅是語言下作也許無傷大雅，只要有真正做人的原則。可惜我們看到的卻是一個表裏不一，見風使舵，阿諛強權，勢力媚俗的小丑。

李敖名出一個「罵」字，據有心人統計，被他以各種方式罵過的不下 3000 人，從中國的孫中山蔣介石蔣經國連戰陳水扁馬英九魯迅國民黨民進黨中華民國一直罵到外國的林肯羅斯福邱吉爾布希美帝國主義和小日本。並且據說即使為此蹲監坐牢也不改初衷，照罵不誤。「罵」為他帶來了名。

這次他初到北京，似乎有點忘乎所以。雖然他祝願共產黨活一千年，也發揮他獨有的蒐集資料的功夫，旁徵博引，幫助共產黨「證明了」六四殺人有理，但他在北大的演講還是被中共所不容，立刻假以顏色。不僅講演內容被下令全國媒體封殺，而且圈內盛傳清華演講被取消，「大師」被「約談」。其後雖然清華演講勉強開場，但台下共、國兩台辦官員已不見蹤影，明顯流露出「上邊」的不悅，只差沒被「看茶」。共產黨不是國民黨，北京小湯山的秦城監獄不是台北的土城仁愛教育實驗所，其間的差別李敖這樣見多識廣的「大師」不可能沒有耳聞。果然他在清華的演講就從「金剛怒目」變成「菩薩低眉」了。豈止「低眉」，簡直就是跪地求饒了。如果說在北大還敢虛假地「打著紅旗反紅旗」，到了清華他就趕忙改口說「只有……共產黨」能做到「避免挨打挨餓……收回香港」，等到他到了復旦，乾脆就把中共的統治說成是「中國自漢唐以來所沒有一個盛世」。其「轉化」之快，阿諛獻媚之態，無以復加。中共則立刻通過國台辦那個姓李的召開記者會誇獎李敖

「講的愈來愈好」。中國歷史上的文人不乏對當權者阿諛奉承之徒，中共統治下的知識分子，直到今天，對黨，對「中央領導同志」曲意逢迎歌功頌德之輩也比比皆是。可是像李敖這樣閉眼不看黑暗殘酷的現實，裝出批判者的樣子，把當今之中國譽為漢唐以來的「盛世」，可謂鮮有如此寡廉鮮恥者。此人張口不離「睪丸」，可是他的媚態使人懷疑他自己到底長沒長睪丸。

他在北大罵了馬克思，甚至引用鄧小平的話也「罵」了「毛主席」。他還無關痛癢地揶揄了不足掛齒的小人物丁關根一番，甚至連坐在台上的那個姓閔的也沒給面子。他知道現在在大陸罵幾聲馬克思毛澤東已是街談巷議茶餘飯後司空見慣的話題了。他做為被邀訪的客人罵上幾句也不至於「上不了長城進秦城」。但他絕對懂得拿捏分寸。對當朝聖上「胡老弟」絕不露半個不敬之詞，還要高唱「數風流人物還看錦濤」。即使對千夫所指的前朝太上皇鄧小平，他也知道那可不是誰都可以罵的。他自詡是「很聰明的」，知道共產黨很不滿足於「王婆賣瓜」。它最需要「別人」的捧，要不怎麼歷史上會有那麼多「黨外布爾什維克」？把自己裝扮成「別人」，最好的辦法就是煞有介事地「罵」它幾句。李敖的「罵」是為「捧」，所謂小罵大幫忙。他知道他要是像大陸的那些御用文人一樣「唱主旋律」，他就毫無利用價值，共產黨早就把他棄之如敝屣了。用他自己的話說，他懂得「講話的技巧」。

可惜中宣部這班弱智對「大師」玩的這套「技巧」完全沒有會意。北大演講一結束，緊急通令全國媒體只准報導李敖的活動，不准報導講話內容。就連主辦人鳳凰衛視也從北大的全場直播，改成清華的監控下分段直播，當大師的演講可能就要「出格」的時候，馬上切換新聞或廣告，待大師的言論進入「安全區」再恢復直播。直到他們聽完了「大師」的全部演講，才知道自己「多慮」了，於是在第二個時段才全程重播了清華的這場演講。等他到了復旦，中共已完全相信「大師」原來是「自己人」，所以又放心地恢復了全程直播。「大師」果然沒有辜負黨的信任，在復旦他公開宣佈「放棄自由主義」！

共產黨最令全世界詬病的就是它的獨裁專制，為了維持自己的血腥統治和既得利益，動輒以「顛覆國家政權」，「煽動顛覆國家政權」，「非法集會」，「擾亂社會秩序」，「洩露國家機密」，「傳播邪教」等莫須

有的罪名，肆無忌憚地拘捕、綁架發表異議言論的人士，宗教人士，維權人士，上訪人士，NGO 成員，艾滋關愛團體，民間投資者，律師，學者，作家，詩人，工人，農民，學生，記者，編輯，退役軍人，集會申請人，甚至發牢騷的網蟲，公園練功的老人，等等。他們被判刑，勞教，送精神病醫院關押，抄家，監控。他們遭受的肉體和精神折磨超過中統、軍統、藍衣社、軍情局、國防部二廳所有特務黑窩裏的「慘狀」千萬倍。這些人間悲劇，在我們身邊每時每刻都在發生，包括李大師洋洋自得地發表各種高論的時刻。但是這位「大師」卻說：「我在秦城監獄裏面看不到政治犯，我覺得這是中國最大的進步。」一個人爲了邀寵，竟至於顛倒黑白，信口胡言，厚顏無恥，莫此爲甚！

就在「大師」發表「看不到政治犯」的高見同時，有十八個農民連同他們的律師郭飛熊就爲了要罷免一個村長而被押在大牢裏；而「大師」他可以在議會殿堂或在凱旋格蘭大道上沒完沒了地高喊「陳水扁是王八蛋」，卻不會有任何人干擾。「大師」據說是因爲罵了蔣介石和蔣經國而繫獄，對此他耿耿於懷；而姜維平只因揭了一個大連市長的瘡疤就被判刑 8 年。「大師」即使在蹲監期間還是可以「每月出版一冊「李敖千秋評論叢書」，有關司法黑暗、監獄黑暗文字，一直不斷」；但是在大陸因幾篇網路文字關押的作家師濤連筆和紙都被沒收（這還不是在毛澤東時代，否則早已家破人亡！）。「大師」在監獄過生日，已嫁人的舊情人可以來探監，送一部 The Best of Life；可是鄭貽春連家屬都不能會見。李敖刑滿可以全身而出；可是中國的勞改隊教養院裏有多少精壯男女進得去出不來，萬幸活著出來的又有多少被折磨得面目全非，人鬼難辨！我們可以隨便舉出一長串名字：作家師濤、鄭貽春、張林，新聞工作者俞華峰、李英民、程益中、趙岩、姜維平、高勤榮，律師鄭恩寵、朱久虎、郭飛熊，法學博士李柏光，教授袁紅冰，盲人維權人士陳光誠（要是當真數起人名字來，就怕總共十五期黃花崗雜誌全部用來刊載 56 年來被害者名單也不夠用——編者）……他們都正在享受著千年不遇的「漢唐盛世」。

面對比自己命運更慘烈兇險的同類被共產黨殘酷折磨的現實，李敖不僅沒有任何仗義執言，沒有任何同情的表露，甚至沒有無奈的沉默，反而對統治者高調塗脂抹粉，爲屠殺百姓的劊子手百般開脫，此等敗類還有

做人的良心嗎？他自己自吹自擂「沒人能像我這樣集正義、力量、勇氣、真誠、血性、智慧、博學和活潑於一身的人了」，豈不成了滑天下之大稽的黑色幽默嗎？

哈巴狗「汪汪」地叫，可以是敵意的狂吠，也可以是親昵的表示。外人一般很難分辨，只有它的主人聽得出來。

「大師」此次大陸行，每到一地，只要有講話的機會，必定要談一番胡適如何送他一千元錢，他如何捐 35 萬建胡適銅像，他如何在念初中的時候就給錢穆寫過信等等。無非是爲了借名人之名揚己之名，雖然無聊，但情有可原，因爲不少無名之輩就是這樣成了名人的。

但是不少人認爲他大可不必如此笨拙，因爲他自己屢屢因言獲罪，多次入獄的自身經歷比借任何名人的幫襯都更容易樹立「英雄學者」「民主鬥士」的高大形象。

國內的眾多媒體競相炒作李敖下獄一節，幫他塑造高大形象。奇怪的是李敖本人對此卻諱莫如深。這讓眾多的「敖粉」們百思不得其解。

央視「東方時空」專訪李敖節目說「1972 年，李敖被台灣當局以「叛亂罪」判刑 10 年，後於 1976 年獲特赦，1981 年又因批評台灣當局，再度被捕入獄 1 年。」流行於多家平面媒體和網站上的一篇《李敖金庸余秋雨誰更牛》的文章卻說：「李敖居台北，俯瞰世界風雲，雖數次入獄，但屢敗屢戰，而且越戰越勇。雜文刀刀見血，見血封喉。另（疑爲「令」之誤——引者注）挨罵者聞罵喪膽。蔣氏父子統治台灣時期，對付李敖的辦法簡單有效——收監。李敖三次入獄，累時 20 餘年。」銀川市委宣傳部下屬「銀川晚報」則在「本週人物」欄裏說：李敖「早年主持進步刊物《文星》，……批評當局保守的文化政策，並因此前後三次入獄。」鮮爲人知的《澳門日報》9 月 21 日也發表社論說，「台灣歷史學家、作家、當代著名學者李敖……挑起文化論戰，批評當局保守的文化政策，傳播「自由、民主、開明、進步」等觀念，並因此前後三次入獄。」連 BBC 中文網也稱「李敖因出版「文星雜誌」被蔣介石的情報部門，以叛國罪監禁，前後入獄三次。」徐吉徵的《國民黨研究》一書則稱：李敖「1970 年 1982 年兩次入獄，前後達十年之久。」《黑龍江日報》稱：李敖「由於曾遭到蔣介石的迫害入獄長達 7 年。」「中青傳媒」在一篇《我們應以什麼姿態歡迎李敖？》的文章裏稱：李敖「批評當局保守的文化政策，傳播「自由、民主、開明、進步」

等觀念，並因此前後三次入獄。」「千龍網」稱：李敖「在兩蔣時代，他因發表抨擊當政者言論而入獄五年八個月。」

只要符合中央的宣傳口徑，中宣部就大開綠燈，不管是不是事實。以至李敖入獄這麼一個簡單的問題竟鬧的眾說紛紜。

所有這些說法都肯定李敖是因為發表了當局不滿的言論而判刑入獄。但是在三個問題上他們的說法又混亂不堪，即：何罪入獄，入獄幾次，入獄多久。這引起了筆者的興趣，也學著「大師」蒐集資料的辦法，「考據」了一番，終於弄清了事實真相。也懂得了「大師」回避這段經歷的原因。

據《李敖回憶錄》《大師李敖大事年表》《回憶錄·監獄》《李敖五十年表》（以上李敖著）《與李敖打官司》（范泓著，江蘇文藝出版社，2005年5月）等著作，李敖共吃過三次官司。

第一次，1967年，時年32歲，案由是妨害公務。說來荒唐，事件竟因14年前的一樁舊案引起。當時李敖18歲，正念高中三年級，他的老師地下共產黨員嚴僑被捕。李敖因師生之誼對師母和三個小孩多有關照。到了1966年，李敖發表《歷史與人像》《教育與臉譜》《上下古今談》《烏鴉又叫了》《孫悟空和我》等書，為當權者所厭惡。於是舊事重提，把他1953年與嚴僑老師合謀偷渡大陸一事翻出來，並於1967年4月8日提起公訴。此事後被判刑1年，但由他的恩師多方奔走，沒能入監執行。這大概就是有的文章說他入獄2次，有的說3次的原因吧。實際上這次並沒有「入獄」。

第二次，1971年3月19日晚上被捕，時年36歲。案由是台獨。事件的起因是被稱為台獨教父的彭明敏偷渡外逃。當時台獨勢力還處於萌發階段。參與彭明敏台獨活動的主要幹將是他的兩個學生謝聰敏和魏廷朝。李敖與他們過從甚密，參與了他們的一些活動，以至被他們作為「外省人也參加台獨」的實證到處宣揚。當時蔣介石還在世，對台獨活動採取嚴厲鎮壓政策，彭、謝、魏等人東躲西藏，李敖給予一定資助。彭終於1970年1月當局抓捕之前偷渡出境，隨後謝、魏被捕。他們在審訊中供出了李敖。情報部門經過了長期的軟禁、跟蹤，最後將李逮捕，並於1972年2月28日以叛亂罪判刑10年，褫奪公權6年。李敖沒有提出上訴。1975年蔣介石去世，台灣實行大赦，李敖獲減刑，於9月22日改判8

年6個月。1976年11月19日出獄，時年41歲。實際坐獄時間為5年8個月。

第三次，1981年，時年46歲，案由是背信和侵佔。事件的起因還得從《文星》雜誌說起。這是由原中央通訊社社長蕭同茲之子蕭孟能於1957年創辦的一份自由主義月刊。1961年26歲的李敖從國軍退伍，蕭大膽啓用，委以重任。李敖以《文星》為陣地發表《老年人和棒子》、《傳統下的獨白》等有影響的作品，從而聲名鵲起。1965年《文星》雜誌被查禁，文星書店被迫關閉，債權人盈門，蕭不得不逃往島外暫避。行前他將超過2000萬元的家產託付最信任的李敖代管，不想半年後蕭孟能回國後，李敖卻將所托之財產悉數據為己有，以至蕭不得不與之對簿公堂。經兩審，李敖侵佔罪名成立，終審判決入獄6個月。1981年9月10日入獄，1982年3月10日刑滿出獄。

由此可以看出，事實是：李敖三次被控，兩次入獄，坐獄時間總共6年另兩個月。兩次入獄的案由分別是台獨和侵佔他人財產。大陸媒體所謂三次入獄，累時20年，因言獲罪，叛國罪，顛覆國家罪（說慣了共產黨的語言），等等，純係子虛烏有。至於傳播「自由、民主、開明、進步」等觀念根本就扯不上干係。共產黨弱智到以為給豬八戒穿上燕尾服戴上禮貌它就可以變成紳士。

說到李敖的言論，筆者決不否認他尖酸刻薄辛辣大膽的一面，儘管那算不上對國民黨威權統治的真正批判，但在白色恐怖下能百折不撓地指著兩蔣父子的鼻子罵，也確實難能可貴。

不過事實上，國民黨並沒有以他的言論治罪。筆者不排除國民黨有借「台獨」、「侵佔」罪名報復的可能，就像共產黨經常用「嫖娼」，「詐騙」等罪名修理政治異議人士一樣。但是和共產黨不同的是，李敖被控罪的事實卻不是國民黨捏造出來的。

就以「台獨」罪名而論，我們且把在警總保安處處長吳彰炯少將主持下審訊中李敖的供詞，同案謝聰敏和魏廷朝的證言，軍法處檢察官的訴狀全都棄之不顧，只看李敖出獄後多年自己寫的《年表》，就可以知道那個罪名對他並不冤枉。讓我們看看其中的幾個片斷：

「1969三十四歲。以販賣舊電器維生，暗中支援其他出版活動。義助彭明敏。」

「1970 三十五歲。一月，因彭明敏偷渡，全年被警總軟禁、跟蹤。九月三日，在被跟蹤中約集外國記者，接雷震出獄。」

「1971 三十六歲。軟禁、跟蹤至三月十九日晚上被捕。」「當時謝聰敏、魏廷朝已被捕去一二十天，我因誤信兩人（尤其是魏廷朝）平時給我的英雄形象，竟以為他們什麼也沒供出，因此就我所知，一路掩護，什麼答案都不吐實，並且不斷扯謊以為掩飾。由於我生怕我的口供不利於謝聰敏和魏廷朝兩人，結果一開始就給特務們『李敖不合作』的壞印象，」「魏廷朝說『兩個半』是指他是一個『台獨』，謝聰敏是一個『台獨』，你李敖是半個『台獨』。在台灣肯定的『台獨』，只有你們『兩個半』。事實上，魏廷朝從來沒跟我提過什麼『兩個半』，我又從何答起？最後偵訊人員告訴我，他們得到的情報是以某某（指彭明敏——引者注）為首的叛亂活動『台灣本部』有五個委員，我是其中之一。我聽了大惑不解，因為關於這『台灣本部』，事實上，我一無所知，乃是被逮捕以後才得知的。聽了這一天方夜譚，我說半個正好是『兩個半』的五分之一，『兩個半』自是指五委員而言，這樣看來，『兩個半』豈不正是五委員的秘密代號嗎？——我在憂患中仍不失幽默，這段諷刺，我記憶猶新。」

「兩個半」演繹成五個委員，確實有點滑稽。不過從李敖自己在沒有壓力下自己寫的這段文字看，說李敖是台獨運動的啓蒙者和創建人之一，應當不算太過分的恭維。現在被同仇敵愾指為台獨的李登輝陳水扁都不過是李敖的「後來人」而已。現在李敖高調反台獨，又是一個轉彎子快的例證。

至於他第二次入獄的原因，令「大師」感到難堪，我們當然表示理解。

這就是「大師」一向不願提起多次入獄的經歷的真實原因。可惜大陸媒體完全不懂箇中甘苦，胡亂吹捧，無限拔高，反使得「大師」既不能澄清又不能否認，只好默不作聲。相比之下，還是北大的那位主持人高明，他在介紹李敖的時候，只點到李敖對台灣的教育制度不滿，並未涉及專制，迫害，言論自由，追求民主之類，而對幾次入獄一節則隻字不提。為親者諱，為友者諱，為奴才諱，不愧號稱中國最高學府！

李敖在接受北大學生提問時說，他最怕提兩岸關係。這又是一個叫人費解的事。李敖用極明確的語言宣

示他反對台獨，主張一個中國，擁護一國兩制，擁護分裂法。那他身在北京，還有什麼怕的呢？

豈不知「大師」也有自己的難言之隱。他在台灣多次說中華民國已經不存在了，現在世界上只有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次在北大和復旦，他又明確地說，「中華民國從 1949 年就死了」「中華民國已經亡國了」。如果這時候有一個學生站起來問：「請問李先生，您現在口袋裏揣著哪個國家的身份證？您是哪一個國家的立法委員？您 2000 年競選的是哪一個國家的總統？」「大師」將如何回答呢？我們都不是大師，所以無法回答這樣的問題。要是承認他競選的是中華民國總統，那不是等於說他在競選一個根本不存在的職位或寧做一個亡國之君嗎？假如李大師不是像他在香港說的那樣，「用最愚蠢的回答答復最愚蠢的問題」，他將給出一個什麼答案呢？

這個無解的矛盾就出在一個「利」字上。

李敖 1959 年台大歷史系畢業，但是他並沒有打算老老實實地做學問。兩個月後入伍，以圖在軍中發展。那個時候「八二三」炮戰還沒完全結束，大批軍官得到飛速提升。入伍不失為人生的一條捷徑。豈料澎湖軍營兩年過去了，才提了個少尉，照這個速度要提到少將不是得等到猴年馬月？於是投戎從筆，開始著書立說。可惜市場反映並不如期，加上當局查禁，並未賺到幾個現銀。於是把主意打在朋友的財產上，借蕭孟能出走之機一舉吞掉託付的 2000 萬家財。在審理這個案子的時候，他的前妻胡茵夢毅然出庭證明李敖將蕭孟能的房子、古董、字畫等據為己有，僅她記得的就有傅抱石、吳昌碩、齊白石的畫，還有扇骨、青花瓷器，以及她印象最深的「紅匣子泛黃卷上」的乾隆御批。事後胡茵夢更在其自傳《死亡與童女之舞》中說，李敖「他的心中只有錢，為了錢他可利用任何不法手段賺錢」。他可以「每天站在窗前用望遠鏡觀察對面一個大廈的工程，想找出施工差錯，預備將來以此威脅建設公司送他一棟房子。」胡氏的話李敖在北大清華復旦的講話裏給予了印證，在號稱「文化」之旅的這三次演講中他沒有一次不談到錢。「口袋裏沒錢，脊梁骨不硬」，這就是他的哲學。

在威權時代，李敖的罵確曾獲得不少喝彩。可是台灣進入民主時代以後，罵，不只是有膽的人或有名氣的人才敢。市井小民，誰都可以罵政府，罵大官，罵總統，罵執政黨。罵人不僅漸漸失去了看客，罵得多了反被指

爲俗、粗、鄙，遭人藐視。2000 年大選中李敖得票只有 0.13%（這也恐怕是創下了世界競選史上最令人難忘的紀錄）就是最好的民意測驗。現在在台灣靠罵人吃飯已經越來越難了。以罵爲特色的《李敖大全集》印了 50 套，至今乏人問津，不得不拿到大陸來到處送，受者還以爲是什麼珍品。「大師」著作等身，裏邊究竟有多少學問，一般凡夫俗子當然很難瞭解，可是翻過幾本的人卻都說裏邊錯別字連篇，僅在當紅的《北京法源寺》裏人們就可以發現「大師」把「美輪美奐」寫成了「美侖美奐」，把「如數家珍」寫成了「如屬家珍」，誰還願意掏錢買這種東西貽誤子弟？書賣不出去，欠了國稅局 500 萬稅金繳不出來，被禁止出境。偏在這個時候中共又安排他訪問大陸，這著實讓「大師」感到爲難，於是對外宣揚說「大師」有「恐飛機症」。直到已經「亡國」的立法院長給出具了保函，向稅務機關承諾尚欠的 350 萬稅金從李敖立法委員的薪資裏按月扣還，「大師」的「恐機症」這才有了轉圜，於是神州之旅開場。

「大師」真的需要錢。

李敖是個聰明人，他要把書變錢，只有拿到大陸去賣。這需要煽起一股李敖熱。所謂文化之旅，如此而已！

「大師」者，小人也！

李敖的胡言亂語：

關於美國 1932 年拖拉機進城 與中共對六四的鎮壓問題

現在網上的熱門，有一個是有關美國 1932 拖拉機進城的問題。這個問題是混混李敖引出來的。

李敖在北大的演講中，爲中共鎮壓六四做了他自以爲有根據的辯護。他列舉了自 1932 年以來，包括美國、德國等多國政府以軍隊鎮壓示威群眾的事例，強調政府無法容忍民眾佔領中央政府廣場，「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個時候都是王八蛋」，但人民逼使政府開槍，也要反省。

混混就是混混，偽裝應當剝去。

1、「全世界任何政府在這個時候都是王八蛋」，李敖用一句看似罵全世界所有政府的話，來清晰地表達了

全是王八蛋，等於全不是王八蛋的概念。因此，中共與全世界所有政府一樣，也不是王八蛋。同樣的話李敖還可以這樣說：全世界的人在某個時刻都是王八蛋。於是全都王八了，也就無所謂王八了。當然，李敖的假設不成立，因爲全世界的人在任何時刻總是王八蛋和非王八蛋並存。但如果話這麼說就沒毛病了：李敖在許多時候都是王八蛋。

2、「人民逼使政府開槍，也要反省」。李敖在這裏打了個馬虎眼。他的意思是說，中共也不願意開槍鎮壓，它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被逼如此，所以人民和政府雙方都應反省。被逼開槍的事是有，比如前幾年出現過貪官逼使胡文海開槍的事。結果胡文海被反省槍斃了，那麼逼使胡文海開槍的貪官也應被槍斃幾個才合理，雙方都應反省嘛。但六四的情況正好相反，當時學生較長時間佔領廣場完全是政府逼的。現在已經很清楚，當時是中共高層內部意見不統一，遲遲拿不出如何對待學生的辦法。政府對學生的正當要求拖著不回答，導致了學生們無法名正言順地撤出廣場。如此，人民要反省什麼？再進一步剖解李敖這句話的荒謬性可能更有意思。89 年的「六四」與 76 年的「四五」性質雷同，都是人民在表達對中共的不滿。只不過後者被中共肯定，說是爲粉碎四人幫奠定基礎的偉大運動。「四五」雖沒有人長期佔領廣場，但政府也面臨一個清場問題。按照李敖的說法，中共也不願意動用工人民兵的木棍鎮壓，它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被逼如此，所以人民和政府雙方都應反省。你李敖也出來說一句「四五」人民「也要反省」如何呀？混混！

現在該談談美國 1932 拖拉機進城與中共鎮壓六四的問題。

首先應該看到，32 年美國出動軍隊對付群眾與 89 年中共出動軍隊對付群眾的性質根本不同。美國軍隊的使命是「驅散」，所以沒有蓄意向群眾開槍；中共軍隊的使命是「鎮壓」，包括蓄意向群眾開槍。所以在這兩次行動中的傷亡人數有天淵之別：

美國 32 年的傷亡，包括出動員警和軍隊對付群眾的全過程：

2 人在國會山附近中員警的槍彈死亡；

1 個旁觀居民被子彈擊中肩膀；

1 個 11 週的嬰兒因爲催淚瓦斯毒氣導致嚴重昏迷；

- 1 個 11 歲男孩因催淚瓦斯造成部分視力喪失；
- 1 個退役軍人被刺刀紮傷屁股；
- 1 個退役軍人被軍隊騎兵的馬刀削去半隻耳朵；
- 2 個員警頭骨被磚塊砸裂，傷勢嚴重；
- 12 個員警被磚塊砸傷。

中國 89 年的傷亡，按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官方關於傷亡人數統計報告資料檔案：

六月四日下午六時報告：現場死亡及送抵醫院證實死亡人數，一百四十九人。

六月八日第二次報告：死亡人數，二百六十一人；

六月十八日第三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一十九人；

八月十五日第四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一十九人；

十月十五日第五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八十五人；

十一月二十二日第六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八十五人；

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第七次報告：死亡人數，四百九十人；

一九九〇年四月十日第八次報告：死亡人數，五百一十五人。

兩者可比嗎？

但是，上述還不是問題的關鍵。問題的關鍵在於：兩者發生的時間相差了 50 多年。在這 50 多年裏，世界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類已經開始成熟了。

當中共為六四屠殺辯護時，曾反復說美國歷史上曾經殺過印地安人。不錯，美國歷史上是發生過這樣的事，但是美國在進步，在不斷糾正自己的錯誤。直到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繼承了中國少數統治者殘忍習性的中共則在繼續著和擴大著這種屠殺，進步何在！一個毛頭小子在學校裏經常與同學打架，人們會說，他還不懂事，可以原諒。但如果這個人成熟了，還不時地向他人動拳頭就不可原諒了。二戰以來，人類從整體上走向成熟，因此中共的野蠻不可原諒。32 年，人權的概念鮮為人知，89 年，人權開始成為世人的共識。中共逆世界進步的方向而動，做出了美國 32 年做不出的事，做出了過去北洋軍閥都不敢做的殘暴行徑！

儘管如此，美國總統胡佛 32 年出動軍隊對付群眾仍然值得批評，而且美國人民也以實際行動對胡佛進行了裁決。雖然 32 年胡佛下台主要是經濟問題，但拖拉機進城事件也有重要的影響。正如雲兒轉豬頭書生的帖子所說：「電影院裏，只要一提陸軍或者麥將軍，觀眾就是一片噓聲。紐約總督羅斯福當時正問鼎白禁城，看了報紙之後羅某拍案叫道：今科吾必當選矣！三個月後，羅總督勝選，變成羅總統。胡佛黯然神傷，讓出白禁城。」

李敖，一個企圖巴結中共推銷自己的混混，妄想拿六四運動作秀，結果只能是胡言加亂語，為人所不恥。

中國現代史研究中心 黃花崗雜誌社董事會

第 15 次 財 務 報 告

(08/1/05 - 10/31/05)

總收入 (雜誌銷售回收、訂閱及捐款)	\$3684.86
---------------------------	------------------

總開支	\$25110.32
------------	-------------------

雜誌印刷、打字、郵寄、稿酬、運輸開支、郵政信箱等	\$7405.03
研究中心及雜誌社房租	\$4800.00
電話費 (含寬頻上網及網站年費)	\$989.53
購買兩台電腦及採訪用相機等辦公雜費	\$2949.08
購買資料書籍	\$81.50
芝加哥會議等差旅費 (包括邀請人員)	\$4323.72
雜誌社招待大同盟年會等	\$1520.00
訪澳洲講演旅費	\$2041.34
對外捐助	\$1000.00

說明：

- 1、主編捐回稿酬\$513 美元。
- 2、MAX、段昱臣、楊錚、朱煥彰捐款已經計算在內。
- 3、主編講演旅費休士頓汪洋捐回機票\$203.30，明尼蘇達朱煥彰捐回機票\$203.90。
- 4、捐助北美三民主義大同盟第 22 屆紐約年會\$1000 美元，另招待會議餐費\$1065 美元。
- 5、訪澳講演，為陪同並作現場翻譯的副主編李剛機票費，由雜誌社負擔。主編辛灝年赴澳的機票和旅館費用均由邀請方付出。
- 6、本期財務報告由董事長周光亞核定 (11/19/05)。

編後

又是一年。黃花崗雜誌第十五期終於問世。我們在此僅向讀者和作者早問一聲新年好！

本期與上期一樣，又是特大贈刊，四十萬字，160頁，其“年份量”，絕不少於許多月刊。自主編從澳洲巡迴講演回來，可謂薦不暇暖，就立刻投入到本期的工作之中。他面對留學生義工已經初選的各類稿件，雖有眼花繚亂之感，但其後三十餘日，卻在無一日可以休息的繁重工作中，一再地告訴我們——他還是深感安慰與鼓舞。是的，如偌沒有讀者的鼓勵、作者的支持，如若沒有海內外“愛我中華、期我民主”者們更其艱難奮鬥的榜樣，主編和我們恐怕都是堅持不下來的。

從本期的目錄上，讀者可以看到我們一如繼往地保持了自己的本色。但在短稿的選編和言論的取向上，已有所不同。我們是歷史文化刊物，正因為弘傳的，是我中華的優秀文化；追尋的，是我民族和人民理應“承上啓下、繼往開來”的民主共和之路；所以，凡我大中華之事，就是本季刊所關心之事；凡是我大中華民國的歷史，就是我雜誌一心要予以澄清的歷史；不論在海外還要遭遇到怎樣的“明槍暗箭”，我等都將矢志而不渝。

愛國愛島的華僑們：請支持海外這本

沒有任何背景、沒有任何資源

完全沒有工薪、全面義務奉獻

只願依靠民間、財務徹底公開

的歷史文化刊物

黃花崗雜誌！

訂閱《黃花崗》

就是對孫文革命的深情緬懷

就是對三民主義的嶄新理解

就是對中國現代歷史的公正澄清

就是對中華優秀文化的重溫和傳承

就是對大中華民國民主統一的竭誠追求

就能夠幫助你將陸、島的命運緊密相連

《黃花崗》得之於手、應之於心

會溫暖更會堅定你那顆熱愛中華的

遊子之心！



敬請訂閱歷史文化季刊 — 《黃花崗》雜誌

一年四期

本刊新電話: 718-898-9100

榮譽訂戶(包括寄費)為 \$100.00

本刊電子信箱: hgang2001@hotmail.com

普通訂戶(包括寄費): 美國為 \$ 22.00; 加拿大為 \$ 44.00; 其它地區為 \$ 55.00

___ 是的, 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榮譽訂戶

___ 是的, 我願意作為《黃花崗》雜誌的普通訂戶

附上支票 \$

我的郵寄地址是

支票抬頭請寫:

(姓名)

(中文名字)

(街名)

(城市)

(州名)

(郵編)

**THE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INC.**

(縮寫: MCHS)

(電話)

(email)

《黃花崗》雜誌 地址是:

P. O. Box 425



墨爾本



主講人辛灝年

誰是新中國澳洲系列巡迴講演

自由中國、百鳴文化沙龍、澳洲大紀元時報主辦

2004 . 6 . 12 — 6. 25



布理斯本 格瑞菲斯大學

與袁紅兵教授同台講演
→



悉尼大學

為驅除馬列還我中華鼓掌
←



悉尼

青春無悔？



陳永生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P. O. Box 425
New York . NY 10163

NON - PROFIT
U . S . POSTAGE
PAID
FLUSHING , NY
PERMIT NO . 619